Unknown

Y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Unknown

Y

敬爱的领袖

——从御用诗人到逃亡者，一位朝鲜反情报官员眼中的朝鲜

张振（进）成 著

关于这本书

“敬爱的领袖”包含了只有政权内部人士才能披露的有关朝鲜的惊人内幕。

张振成（大陆一般译作张进成，百度百科可查）曾在朝鲜宣传机器的核心部门工作。他年轻而雄心勃勃，能够接触到国家机密，包括军事、外交政策和权力分配的信息。他还是这个神秘国度的主要诗人之一，他的作品使他得到了金正日本人的接见。作为领袖钦定之人，他完全有理由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

然而，他不能忽视自己的良心，也不能忽视自己的特权生活与那些在街上挨饿的人们的生活之间的巨大的贫富和阶层差距。在违反安全规定后，他和一个朋友被迫逃亡。

这是张进成逃向自由世界的扣人心弦的真实故事，也是对世界上最神秘的极权国家的令人震惊的揭秘。

作者简介

张振成(Jang　Jin-sung，也译作张进成)曾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Kim Jong-il)的宫廷诗人和宣传员。离开这个国家后，他成为了畅销书作家和媒体的轰动人物。他曾被授予雷克斯·华纳文学奖，并于2012年在伦敦文化奥林匹克竞赛上朗诵了他的诗歌。现居韩国，是韩国权威网站“新焦点国际”(http://newfocusintl.com)的总编辑。

张进成，1971年生人。

小时候接受小提琴家崔亮的钢琴教育，1986年15岁时，进入平壤艺术学校学习作曲，期间受拜伦诗歌影响，转而立志于诗歌创作，1990年得到曾在统战部任高级职位的朝鲜著名诗人金相欧的栽培。

1992年，献诗金正日50岁生日，获得金正日的感谢信认可。于1994年破例分配到朝鲜中央广播委员会担任艺术作家。

1996年，由于金相欧的遗嘱举荐，在朝鲜统战部操作下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文学和语言研究学院，1997年被统战部正式录用。

1998年进入统战部政策制定部门的101办公所下辖第5科（文学）的第19股（诗歌）部门工作，接触朝鲜之外的新闻和书籍。

1999年，受统战部任务，写作主题是赞扬金正日和先军政策的诗作，获金正日认可并亲自接见，成为“钦定者”。之后被统战部特许回乡放松，被家乡的贫困和饥荒深深触动。更加痴迷于外部新闻和书籍，萌生反叛思想。

2001-2002，在金正日先军政策动员令下，服兵役。

2002夏，回到101办公所，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黄永明，一起分享禁闻和禁书。

2004年1月，黄永明丢失禁书，开启二人逃亡之旅。

地图



Pyongyang
(not to scale)
Daedong River
1 UFD guesthouses
2 Central Broadcasting Commitee
3 Eundok Village
4 Pyongyang Arts School
5 OGD Headquarters
6 Office 101
7 Pyongyang Station
N
W
E
S
Changchun
Yanji
Longjing
Tumen River
Musan
CHINA
Shenyang
NORTH KOREA
Pyongyang
Sariwon
SOUTH KOREA
Seoul
0
150 km
0
100 ml

目录

敬爱的领袖 1
- 关于这本书 2
- 作者简介 3
- 地图 4
- 目录 5
- 英译者序 7
- 序幕：一九九年五月 10
- 第一部：独裁者 20
  - 第一章 心理战 20
  - 第二章 返乡 35
  - 第三章 故乡变了 46
  - 第四章 窥视边境之罪 60
  - 第五章 告别之罪 69
  - 第六章 步枪瞄准之下 77
- 第二部：逃亡者 83
  - 第一章 “延边看世界，世界看延边！” 83
  - 第二章 构陷谋杀罪 91
  - 第三章 《金氏王朝实录》 104
  - 第四章 罪行 115
  - 第五章 朝鲜女人当“猪”卖 127
  - 第六章 不知所措 138
  - 第七章 再会，永明 146
- 第三部：自由 155
  - 第一章 从延吉到沈阳 155
  - 第二章 命定相遇王裘龄 168
  - 第三章 成为钢琴老师 179
  - 第四章 金正日战略 188
  - 第五章 迎合裘龄 197
  - 第六章 谋杀犯政权 207
  - 第七章 自由万岁！ 215
- 跋 226
- 后记：朝鲜的未来 231
- 名词解释 233

英译者序

我第一次见到张振成是在2012年6月。他来伦敦是为了参加由英国伦敦南岸艺术中心主办的“帕纳苏斯诗会”，这是夏季奥运会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在英国学习的韩国人，我被要求为朝鲜和韩国代表做翻译。当我在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的入境大厅等待他通过时，我看了看手机，查看了一下我在网上找到的他的照片：照片中，他穿着深色西装，一头黑色的卷发，微笑着看向相机。当他推着行李车走到大厅时，他的头发凌乱，穿着深蓝色西装，看起来仿佛沉在水里。他的白色袖口从夹克袖子上不均匀地伸出来，浅粉色的领带也不太直。我们用韩语互相问候，鞠躬握手。当我们走向汽车时，我替他推着手推车。他为我打开那辆黑色货车的车门，他伸出手扶我上车。当我们出发前往南岸艺术中心时，他在脖子上挂了一个相机，而我则准备好与他交谈。我为他指出伦敦的景点，他一边拍照，一边欣赏地标。在我指出的那些建筑中，有位于沃克斯豪尔十字路口的军情六处总部，我借此机会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僵局：“很明显，这是想要寻找詹姆斯·邦德式伴侣的女人常去的地方。”突然，我们之间相当正式的气氛消失了，他大笑起来。他说，如果那些女人发现真正的间谍只是像他这样的人，她们可能会大失所望，转而去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在他的逗留结束时，我们已经成为朋友，轻松地交谈，而不是像那些半个世纪没有接触后的相邻国家的人们那样，成为遥远的陌生人。即使在今天，朝鲜人也不被允许与外界的任何人自由交流——不能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面对面交流。基于局外人的视角，媒体对朝鲜的描述集中在其制度的不可思议之处：奇怪的金氏王朝，不断列队行进的沉重靴子，以及朝鲜核武库那令人不安的前景。展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大规模服从和歇斯底里的眼泪，远远不是朝鲜人民的全貌，而只是体制与被体制所困的人民之间的复杂而不正常的关系的一部分，而张进成是这方面的一个独特见证者。他不仅曾身处朝鲜体制的中心，而且还逃离了它。

张进成在这本书正文内容的叙述止于2004年。从那时起，朝鲜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经济崩溃的灰烬中崛起的非官方和非法市场，继续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2013年12月，现任统治者金正恩(Kim Jong-un)的姑父张成泽(Jang Song-thaek)遭到清洗和处决，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对他的生动指控以非常公开的方式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并迅速向外国观众发布；这一事件因在许多方面违背了朝鲜过去的传统而受到外界关注。

但这些事件的发生其来有自，为了理解朝鲜的现在，你必须了解它

的过去。特别是，你必须认识到它持续存在的二元性——宣传和现实之间的二元性，以及这种二元性如何分别应用在朝鲜内部人和外部世界的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朝鲜就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关于朝鲜的讨论也将毫无新意。

张进成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诗人，这正是为什么他非常熟悉政权的神话制造，也是为什么他的回忆录是关于解构的。外界对朝鲜的态度建立在许多谎言的基础上，对于这个现状，各方都有责任；而张振成真正开始逃离朝鲜是在他意识到："我焦躁不安，渴望根据我看到的东西写现实主义诗歌，而不是根据我们都被告知要看的东西写忠诚主义诗歌。"

外部人士仍然不可能通过与朝鲜做生意或前往朝鲜访问来了解该国的内部运作。因为朝鲜不仅有严格的层层控制和隐藏的权力结构，而且每当朝鲜与外国人打交道并向世界展示自己时，代理人和特工都故意伪装成显赫的内部人士。长期以来，人们还认为，由于该系统的高度划分性质，任何叛逃者都不能就其运作方式发表权威言论。在这方面，张进成显然是个例外。

起初，我并不怀疑对于朝鲜的不可知论，但我还是想要寻求解答。我问他，为什么外界仍然不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他回答说，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在我们会面前一年多离开情报领域。我们都认识到需要他传播知识来让更广泛的受众了解朝鲜。正如他所说："如果朝鲜有谎言和核武器，我就有真相和文字。"

张进成从未夸大自己的知识或经验。反而是他太谦虚了，直到写了这本书，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少重要的见解需要分享。我承认，他经常低估或被要求低估自己的知识，这让我感到沮丧。我尊重他的决定，理解当时的情况，但这并没有阻止我希望他能透露更多的真相。

在这本书中，作者有很多话没有说，也不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真相披露出来；同时，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我们更新对朝鲜的认知的基础。

朝鲜政权的口是心非和不透明是其重要的两大权力支柱。不管世界是看不透这些表象，还是不愿意这样做，张进成的回忆录表明，了解朝鲜的过去及其持续的二元性是澄清朝鲜的当下并开启未来变革的关键。

SHIRLEY LEE

序幕：一九九年五月

（注：序幕从豆瓣全篇复制）

午夜过后不久，我刚要上床睡觉，电话响了。我决定要等到第六响才接，希望它到第五响就停。但是，第六响响了。我猜想这已经吵醒了我父母亲。我拿起话筒，准备不管是谁打来的，都要好好骂他一顿。

「喂？」深夜安静无声的房子里，我的声音听起来比刚刚的铃声还大声。

「我是第一党委书记。」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自主立刻立正站直，头贴着话筒伏下去。

「我现在发给你特别召集令。一点钟到办公室报到。穿西装，不准告诉任何人。」

在这个国家，就算是最奇怪的命令，我们一向都认为接受命令是理所当然；但是，由第一党委书记本人下命令给我，我却不能不为之怔忡不安起来。他是我们这个部门对中央党部的对口联络人。在正常情况下，我通常是接受第十九股或第五科的命令，这样才符合我在整个党组织的职位层级。超过整个组织层级之上，他才会下「特别召集令」。

特别召集令指的通常是部队动员。每次美国和南韩在朝鲜半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就会召集全国动员演习，以为回应。参加动员演习的召集令，就是「特别召集令」。不过，我们通常会从人为刻意泄露事先得知有这样的命令。劳动党各个单位或部门，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总力求比别的单位出头：关系好的人早就得知有命令要执行，会在特定的某一天留下来工作，比那些浑然不知、已经下班回家的人及早向执行单位报到。

不过，这一次我接到的召集令如果是标准的军事动员令，他们不会规定我要穿西装。我们这种高干和一般隶属于地区或部门党支部的北韩人不一样。我们隶属中央党部，所以知道「特别召集令」有时候是要叫我们去见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正日。

要把一个人叫去见他，都不会事先通知。即使是最高阶的将官都不知道这一类召见操作的细节。见金的召集令由第一党委书记转达，第一党委书记则是先前接到命令早已到达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在一间已经由敬爱的领袖的亲卫队加锁的会议室，第一党委书记在亲卫队严密监视之下接下一张名单，然后逐一发出召集令给名单上每一个人。整个召见的程序全部在严格保密之下执行。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召集令」一词成了推动整个隐密过程的密语。

不过，这句密语还有第三种含意，但也是比较恼人的含意：国安部

长要整肃高阶官员时，有时也会用这句密语发动整肃行动。晚上，高干一接到特别召集令，必须小心翼翼不要惊醒家人，然后单独离家；之后不是消失在监狱里面，就是遭到处决。

幸而，我很有把握第三种剧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事实上，我等不及要赶快动身。才不过几天前，第一党委书记已经给了我微妙的暗示，意指我不久就要蒙受极高荣誉。

我依照指示穿上自己最好的西装，打好领带。在平壤，午夜之后叫不到出租车，因为此时机动车辆必须有夜间特别牌照才能行驶。所以，这时虽然外面一片漆黑，我还是骑上脚踏车，往办公室骑去。脚踏车在平壤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不过，我的脚踏车和别人的不一样，很新，还是派驻海外的亲戚特别运回来给我的。

外面，路灯都没有开。整个城市非常安静，要是有路人，我必须等他黑暗的身影出现在我视野中，才会发觉。平壤虽然有两座发电厂，可是电力供应永远很吃紧。老旧的平壤火力发电厂是一九六一年由苏联援助建造的，另一所东平壤火力发电厂建于一九八九年。不过两座发电厂发的电都不足以同时供应两区以上所需电力。所以电力像个四处漫游的幽灵一样，在平壤各区每一天轮流供电约四小时。

不过在平壤，有一区永远灯火通明：中区，位于平壤市中心。中央党部办公室、高干住宅、外国人住宿大楼——例如高丽饭店等——都在这一区。我的办公室统一战线部101联络所就位于这灯火通明中心区的中央。那天深夜，我骑车骑到这里的时候，发觉这里比平常更加明亮；所有的场区，还有平日的岗哨，全部灯火通明。从大门骑进去的时候，我心里对自己呼喊：「是的！我要去见将军！」

中庭里站着三十几名士兵，穿着深芥黄色制服，那是敬爱的领袖的亲卫队。他们穿着特有的X形皮马甲，两边都有枪袋插着手枪。三辆日产米色厢型车依序排列，车窗的窗帘已经拉上。这三辆厢型车都很大，每一辆足够坐十几人。对韩事务党委书记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他旁边是颇具威严的第一党委书记，刚刚打电话给我的就是他，人看起来比较苍白。党委书记领着我们来到一名二星中将面前。二星中将手上拿着写字板，这次行动似乎是由他主控。我听到士兵称呼他「副部长同志」。

他上上下下看了我一眼，然后喊说：「让他站到那边！」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主掌朝韩关系部门、全北韩最高阶的几个干部都列队站在那里：对韩事务部长金容淳、统一战线部第一副部长林东玉、统一战线部政策部长蔡昌国（Chae　Chang-guk，音译）、统一战线部政策副部长朴永洙（Park　Young-su，音译），另外还有两名朝鲜祖国和平

统一委员会的干部。气氛非常紧张。这六名权力人士排排站在那里，像学童一般，要向他们致意变得很奇怪。我走过去站在他们的最后面。

我低声问我前面那个人：「我们要去晋见将军吗？」旁边有个人立刻喊道：「不要讲话！懂吗？」

我气愤的看着那个士兵，想要请他对我讲话客气一点，但是他那凶恶的眼神立刻把我压制了下来。

副部长同志按照名单一一核对我们几个人的身分。我们按照名单上面标示的个人位置，安静无声的爬进中间那辆厢型车，依序就座。刚刚喝斥我的那个士兵最后进入车内。我原本以为他刚刚那样倨傲对我，是因为我才二十郎当，但是现在我听到他就算对比自己年长一倍的中央党部高干也一样粗鲁恣肆。

他叫着说：「不要拉开窗帘！不要离开座位！不要讲话！」他的傲慢固然让人惊讶，但更令人惊骇的是，我这几个同志竟然嚅嚅诺诺回说：「是，长官。」在敬爱的领袖的亲卫队面前，就连金容淳、林东玉这两个全北韩最高阶的高干都变得那么卑微。

厢型车的门还开着，我往外看出去，看到亲卫队士兵鱼贯钻进另外两辆厢型车里。车门随即关闭，引擎发动。车子开始行驶。我焦躁不安，肚子一阵翻腾。但是我知道，晋见敬爱的领袖乃是神奇而重大的事件。

厚重的窗帘遮住了车窗，也把我们和司机隔了开来。因为看不到车窗外的景色，我开始感觉有点头晕。在众人安静无语之中，车子行驶了两个小时，终于抵达一个火车站。我不禁松了一口气。这时大约清晨四点。我们下了厢型车，我恢复清醒之后，发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一号站」平壤龙城驿。全北韩人口两千多万，其中向来只有金日成、金正日两个一号公民。一号站专供他们使用，这样的车站在北韩全境有数十个之多。车站屋顶隐藏在一片绿意之中，很难从卫星照片中认出来。从地面上看，车站本身没有标示，可是筑有高墙，还有重武装卫兵来回巡逻。

龙城驿位于平壤北郊，要是从我们出发的地方开始走，通常不到半小时就到了。由于我曾经来过这里几次，所以我还记得周围的环境。起先我有点搞不懂为何到这里要那么久，后来想通了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车队其实是故意绕圈子，混淆我们的方向感。从厢型车向火车走过去时，我们受到第二轮身分检查。

为我们这一次召集所派遣的专列和一般火车不一样。车厢两边外壁漆为草绿色，车顶白色。从外面看，标示牌说这车厢是中国制造：车门

把上方用红漆写着中文「北京」两字。但是一走进车厢，我却看到著名的Mitsubishi（三菱）商标。这商标泄露了车厢真正的制造国是日本。车厢里的座位已经改成单人床，所有的装置都是开放式的，应该是为了让卫兵方便监视我们的缘故。

如同我们刚启程时那样，卫兵再次厉声宣布规定：「不要碰窗帘。床下面有毛毯。全程都躺在床上睡觉，火车没有停不要起来。想上厕所告诉我们一下。你们要是敢违反规定，就把你们丢出去——马上。」

卫兵特意强调「马上」这两个字，让我感觉好像我只要有个动作错误，就会给丢到车外，也丢到我享受特权的生活之外。在这漫长的夜行中，没有人讲话，没有人说要上厕所，有的只是车轮在铁轨上一路嘎嘎作响的声音。我闭上眼睛，数着节拍，试着入眠。

专为我们七名文职派遣的这列专列大约在早上六点停了下来。我们停在江原道的一号站葛麻驿。下火车的时候，清晨冷冽的空气扑在脸上，感觉特别清新。我这才发觉自己刚刚在卫兵面前有多紧张。政策部长蔡昌国从我后面追过去，用手肘挤了我一下，还咧嘴对我笑了笑。他像个小孩子，克制不住兴奋。

我们几个人在这里再次转车，进入一辆厢型车。这一次，车子行驶了约一个小时，整车人从头到尾安静无声。我们在一座小码头下车，码头四周围着水泥障碍物，我们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一艘快艇。码头边水波荡漾，空气中飘着强烈的海水咸味。

快艇发动引擎，引擎声震耳欲聋，整艘船蹭蹬了一下，开始驶出码头。快艇开了一会儿，我才突然想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船。我坐在上面，快艇恣意加速前进，象是要把我抛到艇外的海浪里。我倾身向前抓住栏杆，一名士兵突然伸出手臂，从我身后按住我的手。我不觉浑身打了个寒颤。我告诉自己说，我们距离敬爱的领袖越近，越要强烈表现对他忠诚。我转头瞄了一眼，看到我们另外六名乘客每一个都和我一样，由一名士兵原地维护，这几个士兵的作用彷佛是人体安全带。回头看看船尾，船尾远端海上两道白浪向着船尾逐渐汇集为一道水流。我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大声问身边的卫兵：「这是海军的船吗？」

他不屑的笑了一声，因为极力要在巨大的引擎声中了解我的话，整个额头皱成一团。「海军？哈！海军没有这么快的船。这是我们的船，属于护卫总局。很快，对不对？」护卫总局负责保护金氏家族的安全，全部人员包括步兵、海员、飞行员，总计约十万人。

这个士兵虽然说话是用喊的，可是我看得出来他已经放弃恣肆的态度，讲话口气像平常谈话一般，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旁边没有别的观众在

场的缘故。这让我感觉轻松了一些。如他所说，这艘船开得很快：一名护卫的帽子飞掉了，往海里飞去，最后终于落入海面。我看着那顶帽子在海浪间越变越小，最终消失不见。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快艇慢了下来。我们逐渐接近一处种满树木的小岛。我很怀疑这趟海上行程是不是也和刚刚前往龙城驿那一段一样，故意在小区域内绕圈子。船头低了下去，小岛情景开始清晰可见。道路两旁，从干净的码头到修剪整齐的树林，一切看来毫无瑕疵，整个地方好似昨天才建设完工。我发觉自己其实一直在期待敬爱的领袖会像他在革命电影里所演的那样，在码头张开双臂迎接我们，所以现在看到这里没半个人来迎接我们，不禁觉得有点意外。

卫兵领着我们来到一幢大房子，我们在屋内一间大约一千平方米的厅堂一一就座。有人告诫我们要安静，不要讲话。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白色的：椅子是白色的，地板是白色的，墙壁也是白色的。整个厅堂完全没有窗户，不过有一片片墙板透出绿色的光。

大约中午十二点半，我们抵达这座小岛四个多小时后，身边突然有人开始走动。卫兵戴着白手套往一张椅子喷了一些什么东西，那是敬爱的领袖等一下要坐的座位。

副部长同志要我们站起来排好队。我们奉命脱下手表交给卫兵，这是安全程序的一部分。接着每个人都接下一个小封套，封套上面印有日文，里面有一块棉花纸巾，透着酒精的气味。副部长同志指示我们：「你们不可以直视将军的眼睛。」然后他指着自己制服上的第二颗钮扣说：「你们要看这里。懂吗？」

我心里想说这是不是在灌输我们面对敬爱的领袖要保持卑微的态度。不过这个想法一下子就过去了。副部长同志必须决定最后的座位安排。我们继续等着。最后我还是排在最末一个。厅堂里面总共有我们七名文职，加上二十几名护卫。我们姿势僵硬的站在那里，安静注视着那一扇关起来的门大约有十多分钟。那扇门很大，漆白色，门板上有镀金花朵装饰。

门终于开了，一名大校阶级的护卫走进来，立正宣布：「将军现在就要进来。」

顿时每个人都肃静了下来。我稳住头部不动，把视线保持在金正日要进来的那个门上方一半的地方。

大约又过了一分钟。一只白色的小狗突然滚了进来。那是一只卷毛玛尔济斯。接着一个老人跟了进来，追起那只小狗。我们全体一致提高音量开始向敬爱的领袖致敬。

「将军万岁！将军万岁！」

我们全体一起欢呼的声音震痛了我的耳膜，但那只小狗倒不为所动，或许早已习惯这种排场。敬爱的领袖想必是要嘉许牠表现出此等勇气，弯下身去摸牠，还附在牠耳朵边说话。

这样近看敬爱的领袖，我觉得非常失望。我面对的这个老人没有一点平日大家熟悉的「人民的领袖」的样子。我们这样热烈鼓掌，欢呼，他却毫无反应，若无其事。他象是不高兴被一群比他年轻的人包围，径自和那只狗玩着。接着，他象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的心跳了一下。大家象是一直在等待这一刻那般，顿时呼喊得更大声。

「将军万岁！将军万岁！」

他看了看四周，然后对着我这边走过来。

我已经准备要接受这荣耀的一刻。可是，他直直走到我后面，站在墙壁前面，看着墙上的标语。标语以红底黄字写着：奉献生命，服侍伟大的领袖金正日同志！

他喊道：「金容淳！」党委书记金容淳立刻跑到他面前。金正日问他：「这是手绘的，还是印上去的？」近在他身旁，他的声音这时听起来的确是属于伟大领袖的声音，每一个音都震鸣着绝对的权威。

副部长同志看到金容淳在那里迟疑，自己原地喊说：「长官，是手绘的。」

金正日说：「看起来不错。上个星期我去一个地方，看到那里的标语都印在珐琅上面。像这样手绘的，看起好多了，你不觉得吗？」

这一次，金容淳准备好了答案。「是的，长官，我同意。事实上，我已经问过。但是他们说我们还是会用珐琅印，因为手绘要用到昂贵的进口材料。」

金正日不理他。他往后退几步，端详了几秒钟，快速挥了一下手，下命令说：「全国这一句标语现在全部换成手绘。」

我做了一下心算。这个计划要花多少钱？就在这个时候，他转过身来，逮到我在那里分神，便喊说：「你，孩子！那首枪杆诗是你写的吗？」

我措辞谨慎，大声回答：「是，将军！我很光荣与您同在！」

他不屑的笑了一下，对着我走过来。「是别人写的对不对？别想要骗我。我会把你杀掉。」

我惊慌起来，可是敬爱的领袖却大声笑了出来，往我的肩头搥了一下。「你这个呆子，我这样讲是在恭维你。你为整个先军时代树立了模范。」

我讷讷的讲不出话来，即使金容淳在旁边瞪着我也没有用。他赶着将军还没有就座，趁机贴在我耳朵旁边低声骂我：「你这个混蛋。你应该要谢谢他才对。你应该回答说，就算要你从坟墓爬出来，你都要写忠诚诗。」

骂完了我之后，他马上又换回喜形于色的表情，赶过去服侍金正日。回到他自己的座位时，他用手拂了一下屁股才坐下去，好像女人就座之前用手挽衣服下襬一样。除了他之外，另外几名高干也极为正经严肃。他们几个好像不是真人坐在椅子上，而是人家搬进来摆在那里的雕像，动都不动一下。整个厅堂里面，动得最厉害的是敬爱的领袖带来的那只玛尔济斯，牠一边兴奋咽呜，一边挤着主人的脚厮磨。

金正日似乎对闲聊没有兴趣，兀自顾着那只玛尔济斯。将军一直看着那只狗，偶尔抬头起来喊说「嘿，林东玉！」、「嘿，蔡昌国！」。叫到了谁，谁就跑过去接受他询问。这个情景很奇怪。在他的对待之下，那只小狗比他所有最忠诚的部属都来得有尊严。

十至十五分钟之后，两道双开门开了，陆续走出几个侍者，身穿白色制服，打红色领结，每个人手上都高高捧着托盘。厅堂的另一端，几名技术人员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或是弯着身子调整麦克风和灯光。接着乐队就座，开始演奏音乐；宴会就要开始。但是，我原本期待的是敬爱的领袖跟我们讲一些崇高的或智慧的吉光片羽，现在这一来，我实在不能不觉得这真是有点反高潮。只是，随着菜肴一道一道送上来，在音乐声中，我坠入了其中。我着迷了。

每次一道菜送进来，墙壁板子上的灯光便随着变换怪异的颜色。如果送进来的是青菜类菜肴，灯光会从鲜草绿变为淡紫色；如果是肉类，就从粉红色变为深红色。发现灯光颜色会是上菜过程的一部分，真让我惊异。送来鱼食的时候，那盘子光可鉴人，亮得简直教我食不下咽。灰色大餐盘盘缘缀饰一圈小灯光，照得鱼皮发亮。

酒的味道有点呛鼻。我的侍者——和金正日所有的人员一样，属于护卫总局，也有军阶——指着酒瓶标签上的Baedansul这个字描述说，其成分含有百分之八十由基础科学院研发的烈酒。基础科学院是个学术单位，专门研究敬爱的领袖的健康情形，所以也隶属于护卫总局。基础科学院有三千个研究人员在工作，专门筹划与准备金正日吃的药物及菜肴，目标是使他长寿。他们为了测试各种药物及饭菜的效果，还设立了试吃队，从全国各地找来和金正日身材一样、生的病一样的人民组成。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哥哥就在这个单位做事，所以我比大部分人了解这个重大的任务，这一点我很自豪。

整个宴会的高潮是甜点。侍者送上来一个玻璃杯，杯子里一大球冰淇淋。侍者在上面倒了一些白酒，然后点燃，冰淇淋上面只见蓝色火焰猛烈摇晃。我用小匙舀起冰淇淋，火焰就跟着上了小匙。金容淳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建议我说：「先吹熄再吃。不过别吃太多，很烈。」他自得的告诉我这一点。

嘴里凉和烫并存那种矛盾的感觉让我一时十分忘我。后来我看到金正日挥手叫我过去。

一个有权参加敬爱的领袖所开的宴会的高干，你去他们家或工作场所参加这种宴会时，拿来和金正日敬酒碰过的酒杯通常后来都会收藏在玻璃柜里，放在明显的地方展示。我知道敬爱的领袖现在就是要给我这种珍宝。侍者原本就一直刻意在我身边走动，等待着这一刻，他立刻递给我一个大酒杯。我毫无心理准备，只能急忙接下酒杯，跑到金正日面前。他往我的酒杯倒满深红色的酒，然后说：「继续好好做事。」

我站着弯腰鞠躬，视线往桌子下看过去，看到桌巾底下他的脚。他脱掉了鞋子。将军也会脚痠！我一向认为他很神圣，连上厕所都不用。学校里这样教我们，党也这么说：我们将军的生命是一连串的天佑奇迹，我们这些凡人的寿命全部加起来都不足以比拟。今天我受到如此光荣的邀请，进入他的圈子内，我一直以为我将会进入并参与时间当中一个神圣的次元。

然而，此刻的我，却看到他的鞋子：鞋跟很高，鞋内的鞋垫至少有六、七公分厚。他的鞋子欺骗了他的人民。虽然他稀疏的头发烫过之后让他看起来高了一些，但是敬爱的领袖如果不穿这样的鞋子，身高不会超过一百六十公分。

刚刚接受过他严厉的督导之后，将军现在在饭桌前讲的话让我大惑不解。他讲了一些粗鄙的俚语。我从小就在很多书籍和演讲当中读过、听过他所说的话，那些书里面，他说的话不但是遣词用字的完美典范，还反映了我们国家真实的国情。敬爱的领袖讲起话来总是那么典雅又优美，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他的人民礼数周到。但是，今天晚上他讲话不论称谓或叙述都胡说一通。他甚至没叫过任何人「同志」，而是称那些高干「你！」或者「男孩子！」，完全没个规矩。

甜点快吃完时，彩色灯光暗了下来。一个女人，穿着西式露肩白色洋装出现在舞台上。乐队奏起前奏，接着这个女人开始唱起一首俄国民谣。

她唱着唱着，只见金正日身体开始颤动。舞台灯光虽然集中在女歌者身上，但是，按这种场合的规矩，金正日才是我们唯一应该注目的焦

点。大家看着他抽出一条白净的手帕。我禁不住猛眨眼，接着我身边那些高干也一一抽出手帕。更奇怪的是，随着那些高干之后，在场其他人也纷纷抽出手帕。然后，将军低下头去，开始用手帕擦拭眼角。我难以相信自己眼睛所见。我就在这里，看着他掉眼泪！亲眼目睹他这种私人的事情，我要如何自处？

我紧闭眼睛，感到畏怯恐惧。

接着我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这一辈子看过的最不寻常的事情。我那些同志，刚刚还那么得意自己参加了敬爱的领袖的宴会，现在却哭了。这怎么会？我能够全身而退，逃离这场宴会吗？但是，我连想一下都还来不及，自己已经眼睛开始发烫，接着眼泪落到了脸颊上。对，我一定要哭。我活着就是要效忠将军。我不能只是思想和行为忠诚，还要打从灵魂里衷心服从。我和我这些同志一样，一定要哭。我心里一直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哭，我一定要哭。于是我眼泪更热了。然后，从内心某个深处，我痛苦哭喊了出来。

就在我克制不住浑身震颤之际，舞台上，歌唱完了。全场没有人鼓掌，只听到一片哭号声。灯光转亮，大家的哭声又忽然转为低泣，好像我们事先曾经排练过。

揉一下眼睛，我抬头两边看了一下，瞄了一眼身旁那些高干的脸。刚刚他们还在哭，现在却个个目不转睛看着敬爱的领袖，等待着下一个同步行动的指示。生平第一次，我开始对忠诚感到迟疑。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想一个恼人的问题：敬爱的领袖为什么会哭？我知道一九九四年他父亲金日成死的时候，北韩的宣传鼓动部曾经描述他两眼充满眼泪。一九九四年，北韩的全国配给体系崩溃；一九九五年初，首都平壤也开始有人饿死，先前其他各省有人饿死的谣传一变而为真实的事情。

粮食配给中心开始一间一间关门，旷工逃班找东西吃的人像病毒增生一样，越来越多。这时党开始喊出这样的标语：「吃得千里苦，享得万里福」。官方文书提到粮食吃紧的状况，说这是一趟「苦难的行军」，呼吁人民学习将军的榜样，站上斗争前线。

将军的榜样是有证据的：电视上重复播放〈将军的饭粒〉这首歌。〈将军的饭粒〉歌词说，敬爱的领袖在全国各地日行数百哩，为人民加油打气，一天只吃一粒米饭。「苦难的行军」之前，电视广播看到的都是将军带着笑容，领导大家迈向社会主义的胜利。现在，人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神圣的敬爱的领袖掉眼泪，大家都无可抑遏同声痛哭。

继续着回家的路途，我对自己看到金正日本人掉眼泪的反应深深不

安。一个想法盘踞在我心里，让我很懊丧，却又甩不掉：他的眼泪不是慈悲神圣的眼泪，而是绝望之人的眼泪。

第一部：独裁者

第1章　　心理战

我忠诚无畏。我不必生活在面临上班迟到的惩罚的恐惧中。我也不需要像其他干部那样低着头，在党的会议上保持低调，以免成为下一个批评的对象。我获得了豁免权，这要感谢敬爱的领袖，我为他写的一首诗感动了他，他赋予了我特权地位。

世界可能会谴责朝鲜是一个残忍的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声称这个制度是压迫性的，是由武力统治的。但这只是对该国治理方式的部分看法。金正日一生都强调，“我通过音乐和文学来统治。”尽管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但他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事实上，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项颇富创意的工作，他为继承权力所做的准备始于他在朝鲜劳动党的宣传动员部(PAD)的工作。

金正日的独裁包含两层含义：是的，通过物质控制，他是一个独裁者，但他通过控制人民文化认同的绝对权力，更是一个无孔不入、包罗万象的独裁者。在意识形态比物质更重要的社会主义模式下，他垄断了媒体和艺术，将其作为其绝对权力范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朝鲜的每一位作家都要遵照隶属于劳动党宣传动员部的作协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来创作作品。

根据规定，任何人创作的作品只要不是通过中央指令创作的，就都犯了叛国罪。在朝鲜，所有文字作品都必须根据劳动党的具体要求而开始创作。一旦作者提交了他的作品，在新作品被承认之前，它必须先得到法律上的批准。那些在这些标准下写出杰出作品的作家当然会得到奖励。在每一项既定任务中，朝鲜作家的工作是根据事先确定并与劳动党协商的审美要求，将指定的思想进行最佳表达化。作家的工作不是根据自己的心血来潮阐述新思想或者试验美学。

因此，文学不仅在朝鲜艺术中，而且在该国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1994年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在世之前，小说艺术非常流行。几乎所有的最高国家荣誉，如金日成勋章、英雄勋章和金日成同志称号，都被御用小说家包揽。这学小说提供了一种完美的叙事形式，作家可以通过它来阐述最高领袖的伟大事迹。

金日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沉浸在小说世界中，这也对文学在政权中的地位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对“4·15文学团体”的小说家们的作品特别感兴趣。“4·15文学团体”是专门研究金日成和金正日革命历史的一流文学团体。与“头等”火车站一样，“头等”一词也被纳入朝鲜专业人员的头衔中，他们只负责与金氏家族直接相关的事务。事实上，金日成自己的回

忆录《与世纪同行》是由4·15文学小组的一群一流小说家编写的。在精英圈子里，这本回忆录被认为是金日成最喜欢的书之一。有一次，在一次与日本有亲戚关系的朝鲜干部聚会上，金日成讲述了他多么喜欢阅读《与世纪同行》，这让在场的客人感到很有趣。在他死后，随着他的儿子金正日的统治在国家机构中建立起来，小说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诗歌成为文学的时尚。这不仅仅是因为金正日偏爱这种形式。朝鲜经济崩溃、人们忙于求生的社会现实助推了金正日对诗歌的偏爱，显然缺纸的社会现状更适合诗歌而非小说创作。当时，全国连印刷教科书的纸张都不够，没有多少人买得起一本厚重的革命小说。然而，通过诗歌，对金氏王朝忠诚的必要信条可以强有力地浓缩在一页纸上。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成为金正日实施文化专制的主要文学载体。

随着小说家数量的减少，对诗歌和诗人的需求增加，于是需要一个更严格的职业等级制度。史诗诗人写长诗，抒情诗人写短诗；这种一般的区别决定了诗人的等级，尽管只有劳动党才能决定诗人可以采用哪种体裁，允许哪些诗人通过诗歌赞美金正日。特别是金正日诗歌的史诗体裁仅限于6位诗人，他们也是朝鲜的桂冠诗人。1999年，二十八岁的我成为宫廷诗人精英中最年轻的一个。考虑我的年龄和资历，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我同时还是统战部的一名雇员——这份工作让我进入了一个大多数普通朝鲜人完全不知道的世界，在那里我不仅可以接触到国家机密，而且可以接触到一个远远超出劳动党管辖范围的世界。

统战部(UFD)是劳动党中负责朝韩间谍、政策制定和外交的重要部门。自1953年以来，朝鲜半岛一直被一条由双方的军事力量所共同维持的、被称为朝鲜非军事区(DMZ)的停战线所分割。朝鲜半岛的分裂不是基于语言、宗教或民族的差异，而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朝鲜版本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维护绝对的制度统一之上，它把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劳动党一直积极和勤奋地开展针对朝鲜和韩国人的心理战行动。

我被委以这一最神圣的使命，在101办公所下属第5科(文学)第19股(诗歌)工作。尽管这与奥威尔(Orwell)的101号房间(Room 101)有着不可思议且无意的呼应，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办公所之所以如此命名，正是为了避免透露出我们工作的性质。该机构成立于1970年，金日成于10月10日批准成立，所谓命名为“101办公所”。

101办公所甫一成立，就专门通过媒体、文学艺术、音乐和电影等文化媒介，对韩国进行心理战行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尤其努力

利用当时反对军事独裁的民主抵抗运动，在韩国民众中放大反美情绪，培养亲朝倾向。

在这里出版的作品以韩国出版商的名义传播，甚至采用了他们独特的文学风格、喜欢的字体、以及纸张的质量和重量。在音乐方面，器乐和人声编曲的风格也模仿了韩国的录音。以这种方式制作的书籍和磁带由我们部门通过日本的亲北组织或其他东南亚国家有系统地分发，并传递给韩国的民主抵抗运动。我所在的部门以这种方式播下了一种乍一看可能是政治悖论的种子：即使在今天，韩国人对朝鲜的同情几乎完全集中出现在该国政治分歧中的民主、进步和反威权阵营。

就像在海滩上，穿泳装比穿西装更合适一样，本着忠于韩国环境的精神，统战部的制度口号是“本地化”，我们被要求融入韩国人的性格和身份。1998年8月12日，我在101办公所上班的第一天，也就是我进入它的韩国氛围的第一天。那年我27岁。当我踏入统战部的秘密世界时，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为自己感到骄傲。

101办公所位于平壤中心区的龙华区(Ryunghwa District)。我一跨进办公所的门槛，就能明显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那里有一扇四面高墙的大铁门，意味着普通人无权窥视。员工们使用一个小入口进出，这个小入口是大门的一部分，每次只允许一个人挤进去。只有一个士兵站岗。

这名士兵的出现也是该机构区别于朝鲜社会其他机构的一个标志。在朝鲜社会，员工通常轮流对同事进行确认和监视。好像是为了确认在这个机构里，警卫的职责与统战部的职责是分开的，我们部门党委的一位男性干部不得不向警卫解释我的存在，并对我的身份进行了再次检查，然后我才被允许第一次踏上办公所大院。

我一进去，院子就显得很大，与狭小而不起眼的入口形成鲜明对比。地面都是用水泥铺成的，没有一丝可见的裸露的土地。来接我的干部解释说，我们对面的四层楼是101办公所的总部。主楼的左边是一个韩国文学图书馆和一个会议厅。右边的813号通信处，是印着韩国出版社的假书的地方。这位干部指着图书馆告诉我，在日本占领时期，图书馆大楼是平壤唯一的妓女学校。他会意地笑着对我说：“离这里不远的牡丹峰月香洞是过去有名的风尘女子聚集地。”

我在19股（诗歌）的办公室在主楼的二楼，那时我们团队有八个人：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打开办公室的门，我立刻看到房间两边的长木桌。每张桌子上坐着四个人，我们在工作时将面对墙壁。当我踏上办公室的大理石地板时，我几乎要转身离开：我仿佛误入了朝鲜最可怕的犯罪现场——叛国罪——其程度是该国其他人无法想象或夸张的。在整

个朝鲜的任何其他房间里，被禁止的材料如此随意地散落在房间的每一个表面上，都会被判处死刑，而在该国的任何其他地方，墙壁上被框住的令人震惊的标语，对半个世纪以来对南方的妖魔化的大胆反驳，都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在我眼里，办公室里随意散落的敌方报纸和书籍只比金正日对101办公所的指示稍逊一筹，它被恭恭敬敬地装裱起来，摆在原本光秃秃的白墙上，十分显眼："虽然你在平壤，但要居住在汉城。"墙外可恶的叛国行为不仅在墙内被允许，而且还受到金正日本人的积极鼓励！他要求我们居住在韩国！领导人要求我们融入进韩国的集体心理，以便破坏和战胜它。我在统战部工作的每一天，都对我们的世界与院外的封闭社会形成的鲜明而秘密的对比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把劳动党的通行证放在衣服口袋里，每天早上8点到达101办公所，通过阅读韩国报纸开始一天的工作。虽然朝鲜的官方名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它把自己称为朝鲜，把韩国称为南朝鲜，并从朝鲜的角度定义韩国的边界。然而，在101办公所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在报纸上随处可见"韩国"一词，这成为我们对南朝鲜的第二本能认知。在朝鲜，南方政府被描绘成一个由奸佞的领导人领导的叛国政权，他继续背叛朝鲜人民和他们的土地，以使他们成为美国的傀儡；但通过充斥房间里的媒体，我们认识到他们的领导人是韩国总统。

由于我们办公室里没有人被允许谈论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人被允许了解同事的工作，所以除了一本日历之外，任何人的桌子上都没有任何非严格意义上的任务所需的物品。房间里唯一突出的物品是我们的女同事桌子上的一面小镜子，强烈地标记着她作为一个女人的领地。如果不是我们每个桌子的抽屉上都有不同的锁，我们其他人可能会忘记哪个桌子是我们自己的。

就像我们的抽屉总是锁着一样，我的团队成员很少谈论他们的个人生活，尽管只有我们八个人。有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在统战部职位较高的熟人这其中的原因。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大家之所以在办公所大院里独来独往，并不是因为安全方面的限制，而是因为我们工作的性质。在外面，我们是平壤居民和朝鲜人。然而，在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韩国公民。而穿上这双外国鞋时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谈个人话题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习惯。经过这样的解释，我更明白了"本地化"的本质是我们变色龙般的双重性。（注：这里作者的意思是当一个人作为外国人存在时，他连对自我的感觉都是陌生的，自然就没什么可谈的。）

然而，这种特殊的"本地化"受到严格控制。韩国报纸每次只能借出

一天，而且我们必须在下班前将其归还图书馆。如果是韩国小说或诗歌，我们可以借几天，但离开统战部的时候必须把它们放在上锁的抽屉里。禁止将任何韩国材料带出这个区域，图书管理员有时会突然造访办公所，检查我们的阅读材料是否被妥善保存。

我们的主要任务，从我们到达工作地点的那一刻到离开的那一刻，是把自己变成韩国的诗人，写韩国的诗歌。更准确地说，我们要成为支持金正日的韩国诗人。我在韩国的笔名是金敬民。我们的名字和姓氏必须与我们的真名不同，当被要求选择一个假名时，我使用了第一个想到的亲戚的名字。朴哲主任就这个名字是否听起来像一个韩国诗人的名字而审议了三个多小时，然后他允许我使用这个名字。

作为对我们的专业工作的回报，在我们的标准口粮之上，我们每周六都会收到额外的进口食品口粮。由于我们的身份是外部世界的居民，我们收到的资源——每次都不同——来自外部世界。它们来自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捐赠的人道主义物资，以及韩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在我们收到的5公斤的包裹中，有来自美国的大米、奶酪、黄油、橄榄油、蛋黄酱，甚至还有内衣和袜子。有时，还有饼干和糖果，或者为婴儿准备的奶粉。因为我们得到的东西太多，所以从公共分配系统领取常规口粮是件苦差事，而朝鲜的其他地方都是靠这个系统生存的。

国外的包裹总是带着完整的标签来到我们身边。这种国际援助的存在被视为一个可耻的秘密，在大范围饥荒的时候，政权不能向普通公民透露，因为这会破坏国家的“自力更生”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我们部门的作用是作为外来人员生活和工作，我们应该接受外来物品，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我们被精心挑选来从事这项工作，并被信任不会因为与这些外部声音和物资的联系而受到侵蚀。被允许居住在这样一个优越的世界里，感觉是一种祝福。

消费外部产品很容易，但像外人一样思考却不容易。有一天，我觉得要像韩国人一样成功地写作太难了，就向朴哲主任咨询。他是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尽管他的头秃了。他有双眼皮和浓密的眉毛，充满了魅力。

我说：“我对南朝鲜其实了解不多，而且我没有知识或经验，无法将南朝鲜的生活变成文学。那么，我到底应该在这里做什么样的写作？”

朴哲主任笑得很厉害，以致于刘海盖住了眉毛。他把刘海摆回原位。“你和我都没有去过汉城！”他说。虽然我们都是同胞，北方人和南方人，但我们的文化现在是不同的。但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实

际上是在为北方的观众工作，而不是为南朝鲜的人民工作。

他停顿了一下，把一些煮熟的蛋黄揉进一个装有三条鲜红鱼的鱼缸。把剩下的蛋黄倒进嘴里后，他擦了擦手，继续说：“要想在这里成功，你必须放弃许多事，比如你自己的名字或作为作家的声誉。你知道，当我曾经为作协工作时，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明星。你可能读过我的诗。比如说，《渴望我的乡亲》。”

“是的，”我回答说，虽然对这首诗的标题没有任何印象。

他继续说：“如果我坚持做一个诗人，我的名字现在可能已经家喻户晓了。但由于我一生都是统战部的职员，这里和南方的韩国人都不会知道我的作品。不过，至少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还是很轻松的。”

听到他的叹息，我想到他是一个孤独的、年迈的人，他不得不对自己和他的同事保守秘密。就像他说的那样，在统战部工作意味着不仅要对南方的同胞隐瞒我们的工作，还要对北方的同胞隐瞒。随着南北经济差距的加大，对南方的意识形态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被认为是徒劳的，对南方的宣传活动也已停滞。

在我那时，统战部正在利用以前针对韩国公民的经验和技术，对我们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攻势。已经学到的经验和技术被复制到针对朝鲜人的心理行动中，尽管在其他方面，我们仍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文化战争。

101办公所的工作从不局限于单一的体裁或媒介。它采用演讲、视频、音乐和其他文化表达形式——都是以韩国或外国作者的名义——用来渗透和影响韩国人的价值观。

例如，1998年4月，在我开始在统战部工作的四个月前，101办公所第1科（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得到了金正日的赞扬。这篇文章是假借外人的名义写的，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金日成是世界的太阳。有关的证据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日期，1912年4月15日，也恰好是金日成的出生日期。第一科用这种巧合作为历史证明，解释说“太阳在西方落下，就在东方升起”。然后，统战部的这种创作被刊登在党报《劳动新闻》上，或在电视上播放——电视只播放国营频道——作为外国作家、记者和知识分子的作品。朝鲜人民永远不会想到，所有这些明显的外国作品是由位于其首都平壤中心地带的101办公所制作的。朝鲜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绝，所以他们认为包括韩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钦佩我们国家的强大领导力和许多成就，这并不令人惊讶。

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随着作协中央委员会的金万荣发表了一首诗，史诗成为政治宣传的主要载体。该作品采取了为金日成的永生而祈

祷的形式。金正日在《劳动新闻》上发表了这首长诗，并宣称金万荣是朝鲜最忠诚的工作者。不久之后，军方的宣传部为了表明他们对敬爱的领袖的忠诚，推广了申炳江的诗歌。金正日宣布申炳江的作品和金万荣的作品为“人民文学”；两位诗人获得了进口汽车和家用电器，以及装饰奢华的豪华公寓，其中的家具包括成套镀金餐具。

在我的部门内部，一场恐慌随之而来。虽然统战部也雇用了诗人，但它没有能够用一首史诗来满足金正日——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有可能导致对整个统战部不够忠诚的指责。在我加入统战部时，这已经成为我的同事们越来越担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由于他们雇用的人员类型而变得更加严重。由于统战部运作时受到心理战的限制，行动人员在意识形态说服方面受到高度训练，但没有对他们所创作的作品的文学性进行过多思考。这也许是匿名艺术创作的悲剧性和不可避免的后果，正如朴哲主任在描述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作品时所说的那样。此外，统战部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还必须适应他们特有的两个谎言：他们必须在崇拜金正日的感情中假装成韩国人，而这必须以捏造的韩国人的方式来表达。

虽然我是部门最年轻的作家，时年二十七岁，但纠正这种情况的责任落在我身上。当我被传唤到统战部总部，接受第一副部长林东玉（Im Tong-ok）的命令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林东玉是统战部的最高权威，即使是101办公所主任也不能在没有明确传唤的情况下见他。统战部有几个部门，每个部门下有更多的办公所。我所在的101办公所属于统战部的政策制定部门。在我和林东玉之间，从下往上依次是第19股的股长，然后是第5科的科长，再然后是101办公所的其他各层级长官。在这个指挥系统之外被传唤是一个惊人的反常现象。

统战部的总部位于平壤莫兰峰区（Moranbong）的全兴洞（Jeonseung-dong）。这座长长的三层楼房，掌握着劳动党历史的秘密和我们国家的间谍史，看起来比101办公所还要气派。似乎是为了掩盖它的秘密，大楼面向北方，远离阳光，并被常春藤覆盖。

101办公所的副政策主任把我领到大楼一楼林东玉部长的办公室门口。每走一步，木质地板就在我们脚下吱吱作响。这座雄伟的老楼似乎是按照古老的俄罗斯风格建造的，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和大窗户，而通往林部长办公室的气派的双门更增加了宏伟的感觉。

我的向导敲了敲门，进去后发现了另一扇敞开的门。他对着房间咕哝了几句，一个响亮的声音从里面回答。

“请他进来。进来吧！”第一副部长林东玉说。

他的第一副部长头衔意味着他在国家的一个重要部门中以金正日的绝对权威行事。只有六个机构被认为重要到可以由第一副部长领导：组织指导部（金正日的行政指挥系统，位于宪法之上，拥有不受限制的管辖权，可以干预任何领域）、宣传动员部（其第一副部长职位一直空缺到1998年，之后郑海哲Jung Ha-chul被金正日任命为该职位）、统战部、第38办公厅（负责金正日的个人财富）、第35办公厅（进行海外情报活动）和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

林部长在门口迎接我。他锐利的目光和表情表明，作为金正日的代表，他确实有权处理与韩国有关的一切事务和朝鲜的对外展示。然而，也许是他被自己所处的形势惊呆了，把如此关键的任务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也可能是他只是不知所措。他擦了擦宽大的额头，把所有的忧虑都凝聚在深深的皱纹里，用他那长篇大论的方式表明，这项任务不是他轻易指派的。然后，他突然立正站好，极其确信地说："现在要传达将军的命令了。"

林部长来到门口迎接我。他锐利的目光和面容表明，作为金正日的代表，他确实有权处理与韩国有关的所有事务和朝鲜的对外展示。然而，也许他对自己所处的情况感到茫然，要将如此关键的任务分配给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也许他只是不知说什么好。他擦了擦宽大的额头，把所有的关心都凝聚在深深的皱纹里，用他那啰嗦的方式表明，这个任务不是他轻松分配的。然后他突然立正，以最坚定的态度说："现在要传达将军的命令了。"

每当金正日的话在命令、信件或感谢状中传播时，发言者必须立正，并确保他的外表是适当的尊重，他的制服是无可挑剔的，他所有的衬衫纽扣都是正确的。对金正日的忠诚甚至必须在最小的行动中以及通过一个人的整体态度来体现。当林部长立正时，我也本能地做了同样的动作，等待着他的下一句话。

他继续说："将军已经发出命令，要求在进行心理战时使用一首史诗。""这部作品必须宣传我们的先军政策是为了保护韩国而制定的这一概念。统战部将这一行动分配给金敬民同志，"他说道。金敬民是我假扮的韩国名字。

林部长看起来似乎要继续说下去，但当他注意到我在惊愕地咬着嘴唇时，他停了下来。先军（Songun）或"军事第一"政策应该是通过我们军事力量的优势，在金正日的领导下统一整个朝鲜半岛，并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我现在不得不在这样一个政策是为了保护南方的前提下写一首诗。我对此不知所措，对这样一个显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禁苦

笑起来。林部长表情严肃，但似乎不知所措。“你有两个月的时间”他说。会议结束了。

那是1998年12月中旬。从那天起，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基本的论点是直截了当的：我的工作是赞美金正日是枪炮的主人，是正义的使者，是只知道胜利的人民的神。但任务的实质是为这些真理寻找证据，并将其塑造成一种文学形式。为了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阅读韩国文学，找出支持我所要阐述的论点的主题。

我决定将韩国的民主烈士纪念碑和朝鲜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放在一起比较，用双关语将国军（韩国国民军的名称）和先军（朝鲜的军事第一政策）联系起来。这让我把南北方比作一枚硬币的两面：南韩的民主烈士被国军的子弹打死，而北韩的革命烈士甚至在来世也会被我们的先军政策所照顾。我的诗将韩国的军队描述为具有侵略性，而朝鲜的军队只关心如何保卫朝鲜人民。当我提交提案时，林部长和其他统战部官员对我选择的方法大加赞赏。

1961年5月16日，一场军事政变结束了南韩的文官统治，迎来了朴正熙的军事独裁统治。他长达18年的统治因被同伙暗杀而结束，但在随后的不稳定中，全斗焕将自己定位为新的军事独裁者。这样一来，分裂的半岛不仅由北朝鲜的军事独裁者统治，而且也由南方的军事独裁者统治。

然而，1980年5月18日，韩国的民主活动人士在韩国光州起义抗议。他们在街头遭到韩国士兵的暴力镇压，韩国的专制领导人声称，抗议者持有武器并破坏政府财产和警察局，是渗透到该国的北朝鲜特工。诗作的灵感来源是我以一个在5月访问平壤的韩国诗人的激动口吻，从韩国军队曾经屠杀自己的公民这一事实出发。

对诗人来说，韩国的春天不可能仅仅通过自然的意志来实现。它只能通过人民为自己的权利而奋起的坚定抗议来实现和维持。这位韩国诗人只知道一个沾满鲜血的春天，却在平壤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朝鲜春天：在这里，两个朝鲜都受到金正日的先军政策的保护，因为他挥舞着他的父亲金日成交给他的枪，他曾经用这种武器将朝鲜人民从日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诗人是这样结束他对这把枪的赞美的：

所以这就是枪
在一个低等人的手中
就只能犯谋杀罪
但是，当被一个伟大的人挥舞的时候、

可以创造奇迹。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战争和杀戮属于
弱者。
金正日将军，
是唯一的将军
是“枪王”、
是正义之主、
和平之主、
统一之主。
啊，朝鲜人民真正的领袖！

这首诗是在1999年5月18日光州起义周年纪念日时献给金正日的。

这首诗发表后，我收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消息：金正日把我的诗读了很多遍，边读边在关键语句上划线。他甚至在诗的标题旁边亲笔写道：“这是先军时代的艺术标准”。这是统战部在文艺领域超越军队和党的宣传部门的历史性胜利时刻。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获得了我国唯一最有权力的人的个人认可。在得到金正日的个人认可之后，又接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出版的指令。在我提交这首诗的四天后，即1999年5月22日，《春天停在主的枪杆上》在《劳动新闻》报上向全国发行。这导致我被邀请成为金正日的“钦定者”之一。

我进入这个圈子后，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就像在资本主义国家赢得彩票那样。我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机会，我可以从中挑选出我想要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新身份保证了一种强大的豁免特权：即使是朝鲜的最高当局也不能调查、起诉或伤害一个钦定者。唯一可能遭遇发生起诉的方式是，罪行是叛国罪，并且组织指导部要得到金正日本人的明确许可。没有人愿意走得太远，冒着被将军本人恶整的风险，所以这样的程序很少被采用。

负责保护金正日的党的组织指导部运作着一个专门为钦定者服务的特殊部门。标准很严格，圈子很小。就像我的情况一样，金正日必须亲自要求你出席，并与你关起门来相处20分钟以上。我为自己被接纳为这个小而独特的精英阶层而感到自豪，我每天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全新的人。我在统战部工作的第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在朝鲜，7月8日的金日成逝世纪念日——被称为“金日成永生庆典”——是干部们急于展示他们对金氏崇拜的忠诚的战场。林东玉部长在

统战部2000年议程会议上宣布，我们将成为向金正日献上最佳史诗的人，再次胜过军队和党的宣传部门。由于我现在是钦定者之一，所以这个光荣的任务不可能落在我之外的任何人身上，而我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这项任务。

从第一次专题规划会议开始，林部长就风风火火地接过了领导权。

“请静一静。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讨论统战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将在7月8日为纪念最高领袖的不朽生命而出版。我已经要求金敬民同志将他的诗作命名为“微笑的太阳颂”。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持‘微笑的太阳’这一主题。”

正如林部长所说，讴歌最高领袖不朽生命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微笑的太阳”这一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劳动党一直以金日成和他的继任者金正日为中心开展宣传活动。在这个传统背景下，“微笑的太阳”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主题。它首次出现在1994年金日成的葬礼上。

通常情况下，葬礼上的画像显示死者的表情是阴沉的。然而，金正日宣称“最高领导人还活着，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他下令将其父亲的标准葬礼画像换成他微笑的画像。从那时起，最高领导人被称为“太阳”，其不朽的生命就是“微笑”。

1997年7月8日，在金日成去世整整三年后，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和议会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将金日成的生日定为“太阳节”。同时，宣布我们的日历将被改变。金日成的生日，1912年4月15日，被定为新主体历的第一年，主体（Juche）是朝鲜国家批准的基于自力更生原则的哲学。2000年成为“主体”89年。

“现在，金敬民同志将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直到有人拍了拍我的胳膊，我才意识到大家都在等我站起来说话。我一跃而起。“虽然这部作品的标题指的是‘微笑的太阳’，但我希望这首诗能在文学上暗指眼泪。

我可以听到周围嘈杂声四起。

我解释说：“如果你研究一下到目前为止由党或军队制作的‘微笑的太阳’作品，它们主要是在我们的成就背景下提到最高领导人的微笑。例如，最高领袖从他不朽的高度微笑，因为他对我们将军统治的伟大美德和遗产政治感到满意，或者当他高兴地俯视我们独特的社会主义时，尽管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和压力，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在我看来，现在是统战部转向满足我们观众的文学感觉的时候了，而不是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

“这个想法都很好，但你将如何满足他们的文学感觉？”林部长客气

地问道。

“这就是我提议说的：当我追溯‘微笑的太阳’的历史时，我发现我们的最高领袖从幼年开始就被泪水包围。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生活，最高领袖战胜了个人的苦难和痛苦，并通过微笑将他的整个生命奉献给他的人民和祖国。换句话说，我们的最高领袖是为他的人民而不是为自己而活。这一进展将导致以下结论：所有本应由他的人民流下的眼泪，我们的最高领袖都独自承担了下来；他所拥有的微笑，都是为了让他的人民能够微笑。通过将他的眼泪和他的微笑并列在一起，‘微笑的太阳’将显得更加耀眼。这也使得‘微笑的太阳’可以被赋予以下的诗意：当最高领袖把他的微笑礼物送给人民时，它表现为他的爱；当他把礼物播撒在我们的土地上时，它表现为太阳的光芒；当他把礼物留给历史时，它表现为不朽的生命。”

我一说完，林部长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的兴奋之情无法抑制，他拍了好几下桌子。他感叹道：“就是这样！如果这一切按计划进行，将军无疑会被感动得流泪，国家的其他人也会如此。宣传动员部和总政治局都不是我们的对手。让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这样做了，统战部会取得胜利。这就是真正的诗意!同志们，你们有什么想法？”

统战部强大的负责人对我的提议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难怪房间里的其他人也爆发出赞美和惊叹。有一个人承认，在听我讲话时，他很难忍住眼泪，并开始拍手。

突然，朴哲主任站了起来，带着严厉的表情，与房间里的其他人形成鲜明对比。他是我的直属上司，是101办公所第五科的科长。“林部长同志，”他说，“虽然这个提案在文学潜力上值得称赞，但我认为提到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流泪是很有问题的。”

房间里一片寂静。

朴哲主管继续说：“金哲（Kim Chul），我们国家的三位经典诗人之一，采用了“露水”一词来委婉地指称领袖的眼泪。因为这个错误，他被流放到乡下十年了。

“你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可以提到眼泪。难道你不记得我们的将军是如何在我们的最高领导人的葬礼仪式上流泪的吗？而且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播!除此之外，我相信我还看到过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被他所读的小说所感动时流泪的记载。”当林部长恼怒地反驳时，其他干部都热情地点头。

朴哲又说话了。“小说是一种描述性体裁，但诗歌是一种抒情体裁。诗歌是与人类的情感有关，而不是与人类的心理有关。在诗中如此明确

地提到眼泪，会促进‘个人的悲观主义’。此外，在诗中，你只能有忠诚的眼泪。然而，敬民同志不仅提议提及个人的眼泪，还提议提及我们的最高领袖本人的眼泪。天哪！这可不行！如果我们被指控宣扬‘我们的最高领袖的悲观主义’，我们每个人都将不得不面对后果。”

没有人说话，也许是在可怕的“后果”的提法下。有一个人关上了他的记事本，似乎是在承认会议已经结束。

我又站起来说话了。“当然，你说忠诚的眼泪是正确的，它必须由个人来流，是诗歌中唯一允许的眼泪。但这里讨论的诗歌作品要以史诗的体裁来创作。史诗是一种叙事体裁，就像小说一样。此外，作品的重点不是我们的最高领袖流泪，而是他如何不断地保持克制，忍住了眼泪。正是由于这种克制，他的眼泪才被表现为爱、阳光和不朽的生命。因此，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朴主任对他的一个雇员说出反对他的话显然很恼火，但他拒绝改变立场。“提到我们最高领导人的眼泪一两次？这没有什么不对。但你说的是一首史诗，其长度需要反复提及我们最高领导人的眼泪。你在我们国家的任何一首诗中见过这样的东西吗？现在，当我们的国家度过这个饥荒和歉收的时期时，党的口号是‘旅途艰难，但让我们在笑声中前进’。而你却提议写一首关于我们最高领导人流泪的诗？”

听到这些话，就连先前听到我的提议时差点落泪的干部也点头同意。现在大家都看向林部长。他用双手推着桌子，站起来，严肃地说道。“这就是计划。从今天开始，敬民同志将把所有其他工作放在一边，以六个月为期限，根据他的提议创作一首史诗。但他将确保避免过多提及我们最高领导人的眼泪。在统战部，你承担了一个韩国人的身份，这让你有了一些回旋余地。我们不受作协规则的限制，不必经过他们的审查或批准程序。我们只需在统战部中尽可能地在内部进行判断。就其文学价值而言，目前的提案非常好。让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好吧。”

林部长让大家离开会场，但要求我留下。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不要理会朴主任说什么，”他告诉我。“我肯定他是在嫉妒。他能夸耀什么成就呢？你还有6个月的艰苦工作要做。你应该休息一个星期。去给自己充电。你想去哪里？”

我告诉他我想回到故乡。见到将军后，我一直在想我家乡的朋友。能被统战部录取已经很光荣了，但我甚至已经成为钦定者中的一员。大家会多么羡慕我啊！我说，重访我的出生地将有助于我在情感上为今后的任务做好准备。林东玉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的请求。

第二章 返乡

我从平壤站给我的童年朋友英南（Young-nam）打电话。我们在幼儿园时就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同一个班级，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是形影不离。

“你要在车站接我，对吗？”

“在你最疯狂的梦中！”他的回答和以往一样可预测，我突然大笑起来。

英南的绰号是“Jappo”——日本侨民的简称。和我一样，他出生在朝鲜的沙里院，但所有孩子都叫他Jappo，因为他的父母是来自日本大阪的移民。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来到沙里院，作为被称为“朝鲜人民大运动”的朝鲜人从日本遣返的一部分。当时，金日成为了促进北朝而不是南韩成为统一的朝鲜的祖国，欢迎约10万名居住在日本的朝鲜族人进入朝鲜。

朝鲜战争结束后，冷战的环境使北朝鲜在经济上的优势更有吸引力，这使金日成能够推行拥抱侨民的政策。朝鲜国家利用这些移民作为人们选择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证据，在宣传活动中狂热地提及他们。从表面上看，金日成似乎从基于拥抱庆祝朝鲜民族的宣传政策中获益匪浅。但实际上，移民的到来给朝鲜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实际上，他们带来的东西才是最大的影响。移民带来的日本产品被认为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奇妙商品，是普通朝鲜人从未见过的。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认为金日成的社会主义的任何产品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但现在他们接触到了日本的先进状况。随着移民们根据自己的意愿或祖先的关系在朝鲜各地定居，一个非官方的新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资本主义可能已经腐烂到了极点，但他们确实制造了好产品！”几乎在一瞬间，朝鲜就被卷入了“日本制造”的热潮中。

朝鲜人捡起“Jappos”扔掉的标签或包装，并把它们像宝贝一样摆在家里，这已成为一种时尚。通过对日本产品的喜爱，移民们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很快就在朝鲜社会舒适的中产阶级中站稳了脚跟。

他们被钦佩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的产品，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日本文化特征。无论是他们特有的问候方式、语言、礼仪，甚至是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成熟和优渥的。相比之下，作为对忠诚服务的回报，官方对更高地位的奖励似乎并不那么令人兴奋。那些在国外没有家人可以寄来日本产品的人，至少在文化方面试图模仿日本人，这种现象越来越多。

孩子们对这种趋势太敏感了，他们向父母抱怨说，他们的长辈都没有远见卓识，跑到日本去定居。朝鲜国家将金日成的合法性建立在他作为抗日战士的资历上，因此，他的移民运动导致普通朝鲜人崇拜日本，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朝鲜已经从日本人统治下的殖民奴役的耻辱中解脱出来，但现在它又被日本人，或者更具体地说，被代表在日本的朝鲜裔人的统战部所管理的组织——Jochongryon "殖民化"了。实际上，通过制度上的共同体主义来加强的日本禁忌已经开始从公众意识中消失了。

对朝鲜人来说，即使是普通的衣服也是由国家规定的制服，个人使用的私家车的概念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种特权却被随意赋予了Jappos，他们的私家车在平壤空旷的道路上飞驰，在朝鲜人眼中，这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他们提出了一个危险的建议，即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旅行速度，而不是在国家的哨声中大步流星地前进。这样一来，这些移民的出现就提供了一个大胆的邀请，让人们蔑视传统的忠诚框架。

朝鲜国家的嫉妒最终导致了对Jappos的压迫。有着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经验和记忆的移民被分配到"动摇"阶层，该阶层是为那些思想被认为对国家有风险的人保留的。他们的职业前景受到严重限制。金正日甚至在法律上禁止Jappos驾驶白色汽车。这样做的原因似乎是小题大做：因为白色汽车的颜色与日本国旗的背景相同。在党的讲座中，干部们声称，日本只向世界出口白色汽车，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却对红色汽车情有独钟；其原因是他们想在世界地图上画上他们的国旗，作为他们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的象征。这显然是来自上层的警告，Jappos不能像朝鲜族人那样被信任。

尽管有这些努力，许多朝鲜人对"富士山人"的偏爱，与"白头山人"和金日成的抗日功绩相对立，并没有消失。因此，我的朋友英南是被普遍敬佩的一群人中的一员，这与官方的立场相悖。此外，他的家庭曾经是沙里院最富有的。

然而，在他的祖父母在日本去世后，他的家庭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的日本货币和商品供应已经结束。由于他们是来自日本的移民，英南和他的父母没有希望进入受人尊敬的职业，因为工作的分配是由劳动党控制的。他们不得不开始逐一变卖自己的财产，最终，他们变得一贫如洗，生活状况比当地的朝鲜人差得多。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家里有一架雅马哈钢琴，是英南的父亲在他还是个有钱人时送给我们家的。我记得母亲告诉我，英南一家刚在沙里院定居时，我父亲通过劳动党的分配帮助他们获得了一

套新的公寓。由于钢琴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到了家里，我从小就认为每个人都有日本钢琴，就像每个人家里的墙上都挂着金日成的画像。

然而有一天，当我去一个朋友家玩的时候，我意识到他们没有一架钢琴。我大吃一惊。当我回到家时，我跑进屋里，对我母亲大喊，好像我刚刚目睹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妈妈，你知道吗？他们家里没有钢琴！"

她冷冷地回答："他们可能不希望家里有钢琴。他们更喜欢看书。"

当我开始在东里人民小学就读第一年时，我才明白，拥有一架日本雅马哈钢琴确实是件大事。孩子们——还有大人——都称我为"拥有日本钢琴的孩子"或 "医生的孩子"。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住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口琴公寓 "里，所谓"口琴公寓"，是因为每层楼的公寓都像口琴上的方孔一样紧密相连。我们住在一栋公寓楼三楼的一个大公寓里，那是为官员准备的。我的母亲是一个专供党员干部使用的医疗中心的主任医生，她希望我的两个姐姐能成为教师，而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她最后劝说我父亲为我找到一位著名的钢琴教师。

有一天，我父亲带了一个家庭教师回家。这个人长着一张脸，说话时带有北方咸镜省特有的浓重口音。但比他的口音更让我吃惊的是，他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朝鲜族人。而且他身上有一股烟味，我不喜欢。更糟的是，他是个烟鬼，我的姐妹们一开始也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他弯下腰，把我的耳朵拉到他的嘴边，用他那冷漠的声音强调说："我叫崔亮。你听到了吗？两个音节。崔亮！"

他的大嗓门和烟臭味一样让我感到害怕。当我父亲宣布那个人和他的家人要搬来和我们一起住时，我很受打击。我假装要上厕所，跑到外面，抽泣起来。

崔亮成为我的第一位正式教师。他曾是中国上海交响乐团的一名小提琴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了躲避红卫兵对受教育者的攻击，和许多其他朝鲜族人一起来到朝鲜。他在朝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平壤艺术学校担任小提琴辅导员。当时，他和白高山被认为是朝鲜的主要小提琴家。白高山曾在1982年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了他所在组别的最高奖和荣誉奖。1978年，他也是第一个被任命为该比赛小提琴部分评委小组终身成员的亚洲人。

白高山有一个弟弟叫白道山，他侮辱了崔亮，称他为"肮脏的杂种"，这是朝鲜人用来指代中国人的常用贬义词。以脾气暴躁而闻名的崔亮给了他一拳。为此，崔亮被放逐到乡下，直到我父亲把他从乡村流放中解救出来，雇用他来教我音乐。崔亮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和他一起搬

进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安静的家在成为我们两个家庭的家，突然生活变得不习惯。

在我早年的时候，崔亮老师在我看来是最残酷的人。他让我从练耳开始，并且毫不留情地完成这项任务。一天几百次，我不得不努力辨别他在钢琴上发出的音符或音程。渐渐地，我学会了毫不犹豫地挑出这些音符和音程。最后，他转向了和弦，到最后他教我如何为弦乐四重奏编曲。

我父亲非常努力地想让崔亮被聘为沙里院艺术学校的教授。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外国出生对这个职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他被聘为讲师。即便如此，由于他是朝鲜领先的小提琴家之一，学生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向他学习。崔亮经常邀请他们来我们家，甚至给他们看我的弦乐四重奏编曲。

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崔亮对弦乐四重奏编曲的看法，因为他经常重复这段高见："最重要的是，乐谱上应该到处都是黑音。半音程应谨慎使用，但要根据需要频繁使用。明白了吗？"

崔亮不仅仅是进行音乐教育，还向我灌输了巨大的艺术抱负。我每天都听他讲贝多芬、莫扎特的轶事，以及在他们死后仍然围绕他们的名声。当其他孩子渴望成为党的干部或为党的干部开车时，我却梦想着成为德沃夏克，并通过创作自己的《新世界交响曲》获得世界声誉。有一次我向母亲提起这个梦想，她狠狠地训斥了我，说如果我和别人分享这些想法 ，我们整个家庭都会被指控为修正主义或道德败坏。她一定要给我一个可怕的惊吓，说如果我对外说出这些想法，那我可能会被逮捕。

我的母亲意识到她13岁的儿子已经迷上了德沃夏克的音乐，这让她感到很不安。我之所以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崔亮从中国偷运来的录音带，也因为我唯一能接触到的其他类型的音乐是我在学校听到的东西。这不只是因为这些音乐只限于革命颂歌。相反，在接触了令人激动的和声可能性的世界之后，我发现听朝鲜的完美胜利的歌曲是令人沮丧的，它不允许通过音乐的不和谐或紧张来暗示不完美。

有一次，在学校的歌唱课上，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想法。我自愿为这节课做伴奏，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演奏，而不是按照规定的模式。我在风琴上的踏板（学校里没有钢琴）并不完美，但我知道我弹得很好，没有错误。尽管如此，我们的音乐老师还是因为我的偏差而惩罚我，在全班同学面前羞辱我，把我当作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但在我心里，我相信是学校——而不是我——缺乏对音乐的理解。因此，我无法阻止自己开始怀疑学校教给我们的其他一切，质疑将其视为最准确和客

观的知识形式，不管是金日成的革命历史、语言学还是其他科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确信西方音乐在艺术上要优于我所学的朝鲜音乐。这并不是说我喜欢一套风格的规则，而不是另一套。西方音乐也有它的规则；但它有朝鲜音乐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打破既定规则的无限可能性，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规则。有了崔亮在我身边解释音乐规则破坏的复杂性，我越来越有信心，对期望和规则的超越并不是没有音乐性，相反，这是音乐性本质的一部分。

从黎明到黄昏，我一直在听德沃夏克的歌。父亲担心我的听力，几次把我的耳机拿走；但我是如此入迷，有一次我从母亲的包里拿了一个听诊器，把它顶在磁带机的扬声器上，这样我就可以在晚上的被子里听。我的父亲自豪地支持我的雄心壮志，并坚信我注定会有大作为，但崔亮却固执而真诚地持有异议。

他说："这个男孩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钢琴家。他的手指太短了。不过，他确实有创造性的天赋，我建议他应该训练成为一名作曲家。"

我15岁时进入平壤艺术学校。我决心成为一名世界著名的作曲家，实现崔亮在我心中播下的梦想。但是，我突然遇到了"百册收藏"中的一本书，导致我的音乐抱负一夜之间被文学抱负所取代。

这本书是《拜伦勋爵作品集》。作为北朝鲜"百册收藏"的一部分，这本书的印刷量被限制在100册。在朝鲜，外国书籍的流通受到这样的限制，因此只有执政的金正日及其家人、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朝鲜精英阶层的特定成员才能接触到这些书籍。一套100册的书中的每一本都在第一页上盖有一个编号，以显示它是100册中的哪一本。当然，盖有"1号"印章的书只提供给执政的金正日。因此，在干部和其他精英成员中，拥有一本盖有个位数数字或最接近数字的书，被认为是一种高地位的标志。

这些外国作品限量版的秘密翻译和印刷工作继续由宣传动员部和朝鲜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由平壤中区的一个翻译小组完成。朝鲜驻外使馆的文化或科学专员有责任通过这个系统获取外国书籍，进行有限的分发。

我不知道我们的《拜伦勋爵作品集》怎么会出现在我父亲的个人书柜里。有一天，我仅仅是出于好奇，从书架上拿起它，注意到这本书的书脊与堆放在那里的其他书不同。朝鲜的书通常以其明亮和华丽的设计反映朝鲜的国家美学。然而，这本书的颜色很低调。深色和褪色的封面让人联想到一种古老的外国文化。一个框架的图案，类似于油画的设计，围绕着印刷的标题。普通的书是大规模生产的，但这本书似乎是手

工制作的，因为它厚而笨重的封面上的书页是由精致的线缝固定在一起的。

我怀着模糊的好奇心打开了这本书，但我从第一页就被拉了进去，诗歌一下子抓住了我。词汇很大胆，这些词把它们的定义和联想推到了极限，与我曾经读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在朝鲜，对思想的制度控制从巩固语言开始，这是一项旨在统一思想的囊括公私领域领域的政策。为了使个人表达的领域遵守共同的意识形态，党的宣传动员部为书面和口头文字设定了严格的界限。任何朝鲜文学作品都不得偏离金正日的《主体艺术理论》的法律框架，该理论印制了几卷，规定了社会主义艺术可以存在的条件。监督和执行这一理论的思想权威是国家文艺审议委员会，它对所有让离经叛道的作品漏网的人处以监禁。作为一个在这样一个固定的语言表达框架中长大的人，拜伦的诗歌对我来说就像一本新朝鲜语的字典。当我弄清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词语的含义和推论时，我体验到了从一个讲外语的人那里学习如何说朝鲜语的奇怪感觉。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语言的礼貌性。在朝鲜语言中，有两种不同的说话方式：一种是与领导人有关的，一种是与其他人有关的。在遇到拜伦的诗歌之前，我曾认为“亲爱的”和“尊敬的”等形容词是朝鲜语言中为金日成和金正日保留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代词。与“伟大”一起，它总是在指称金日成为“伟大领袖”的术语之一中看到，我曾以为这些形容词和金正日一样是特有名次，因此从词源上看，是纯粹的朝鲜语。但我通过拜伦的诗歌了解到，这些词是尊重的术语，是一种普遍语言的一部分，而不是朝鲜语独有的。我发现这些词语可能适用于任何一个人，感到奇怪的欣喜。

最重要的是，词语和诗歌的模式——与诗歌的基本节奏相平衡——唤醒了我对文学的崇高感，超越了音乐本身所能传达的。正如我对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所做的那样，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拜伦的史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海盗》的朝鲜语翻译版本。《海盗》的结局——主人公，一个流浪的海盗，在得知他爱人的死讯后从岛上消失了——让我坐立不安，这种激动在每次阅读后都久久萦绕在我心头。我以前只知道对最高领袖的忠诚，认为这是人类能感受到的最崇高的情感。但这些诗歌证明，情感可以在不包括领袖的个人领域中体验。这种理解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顿悟，在这种认识之后，我突然想向一个女人表白我的爱。我想坠入爱河，我想因为爱而变得软弱。出于这种渴望，我开始写自己的诗

歌。

我甚至考虑过从平壤艺术学校退学，但我不敢让父母失望，因为他们对我充满了信心。不过，我至少可以做的是试图找到一位文学导师。

有三首诗是所有朝鲜人必须熟记的。这三首诗是李秀福（Ri Su-bok）的《为了我唯一的祖国》、金哲（Kim Chul）的《母亲》和金相欧（Kim Sang-o）的《我的祖国》。在《为了我唯一的祖国》中，诗人说，尽管他只有一生的时间，但他将为他的祖国牺牲，而祖国也只有一个。在这首诗中，个体归属于国家。《母亲》描述了劳动党的母爱如何比任何人类母亲的母爱更深，她不能把自己的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个体来抚养。在这里，母爱本身是不够的，而且深深地不如党提供的爱。《我的祖国》将伟大领袖描述为诗人真正的祖国，国家被归入其领袖的身份中。

如果我有一个老师，我希望他是朝鲜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幸运的是，尽管我的世界看起来很宽广，但它也很小。李秀莲，金相欧的孙女，恰好是我的同学。当她告诉我，她的祖父同意与我见面，并要求我在课后和她一起回家时，我欣喜若狂，拉着她的手疯狂地摇晃。那是1990年的冬天，我本应全身心投入到平壤艺术学校的音乐学习中。

金相欧的公寓位于中区（Joong-gu）的大潭洞（Otan-dong），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大同江（Daedong River）。1948年朝鲜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后，金相欧从日本回来，担任黄海省一家报纸的副编辑。当金日成来到黄海省时，金相欧被指派为他的演讲稿作者。这种合作最终导致他晋升为朝鲜作协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然而，1966年开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导致许多知识分子在朝鲜也遭到了清洗。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朝鲜政府将赫鲁晓夫定为“修正主义者”，而当时朝鲜更喜欢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金相欧在日本留学期间的记录让他失望了，因为这让他与亲日派合作者联系在一起，并被视为破坏了金日成作为抗日战士的权威。在失去作家资格后，金相欧被放逐到农村，在那里做了15年的农场工人。

然而，金日成的记忆力很好。当他在黄海南道进行现场指导时，他要求找那位年轻的演讲稿作者，他曾在朝鲜解放后不久在黄海省为金正日的第一次演讲作过稿。金相欧随后被召回平壤，他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创作了抒情诗《我的祖国》，赞扬金日成这个人（而不是国家或领土）是他真正的祖国。我的同学李秀莲出生在黄海省瑞兴郡，金相欧曾在那里流亡，但在他复起后，她与他一起搬到了首都平壤。

金日成任命他的前演讲稿撰写人为统战部101办公所第五科科长。从那时起，他不得不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为劳动党的目标服务，用假名工作，并被剥夺了自己的身份或历史。在我访问他家的时候，他已经从统战部退休了，尽管由于他是金日成助手的官方身份，他仍然是101办公所的名誉主任。由于他的统战部头衔没有实权，对于有这样背景的人来说，他过着尽可能安静和普通的生活 。从我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他也有时间来见我。

当金相欧亲自开门时，我吓了一跳，从腰间深深鞠了一躬。他高大的身材和威严的面容给我留下了强烈的第一印象，表明金日成的核心圈子里的人，即使在外表上也是不平凡的存在。然而，正是他的谦逊使他在我眼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

尽管有这样的身份，但由于平壤的供暖系统不稳定，金相欧的房子很冷。当我进入时，他的妻子给了我一件他的大衣让我取暖，我惊讶地发现布料上有三处香烟烧伤。

直到最近，电力供应还不算太糟糕。但是，由于它是一个集中组织的系统，即使一个地区出现轻微的中断，也会影响平壤其他地区的热水供应。管道老化和经常爆裂是一个问题，许多家庭不得不从传统的朝鲜地暖系统中抽出热水用于洗涤。因此，总是缺乏热量，而且由于基础设施效率低下，即使在严酷的隆冬，最好的供热也不过是温热的地板。

尽管金相欧住在党的高级干部退休公寓里，该公寓建于20世纪80年代，位于与普通平壤居民不同的住宅区，但情况仍然如此。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他感叹说，比寒冷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无法正常地踏上光秃秃的土地。他被分配到一个12层的公寓，由于电梯总是出问题，他被困于大地和天空之间。

当他开始谈论他的家乡时，我看到他外套上的烧伤痕迹与他心中的伤痕相比，简直不值一提。20世纪80年代初，朝鲜国家决定，残疾公民在平壤的存在是对城市之美的侮辱，并将他们集体驱逐到农村。金相欧的唯一女儿有身体残疾，当家庭其他成员被指示搬迁到平壤时，她被留在了黄海省。这个女人就是我朋友秀莲的母亲。

在我第一次访问的那天，金相欧不厌其烦地阅读了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的每一行诗。当他读完我尝试写的史诗时，他开怀大笑，说他知道我是在模仿拜伦写的。令我惊讶的是，他并没有责骂我，而是接受了我的作品：“如果你来找我，说什么‘哦，我的祖国!哦，我的党！’，我就会拒绝与你交谈。我喜欢你对爱情的个人叙述。我看得出，你对自己的声音是忠实的。”

金相欧的道德鼓励的话语成为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的基石。他教导我说："一篇文章会顽强地追求它的作者，让他负责到底。看看你的良知；说出你自己的真相。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可以超越你所受的教育，完成真正属于你的文学作品。"

在金相欧的最后几年，统战部不断恳求他，希望他能为他们制作更多的国家文学，但他到最后都拒绝了，说他的身体不允许。不过，我想知道，在忠于劳动党的一生中，他选择保持沉默是否是金相欧的良知和真理的决定性行为。

在金相欧的推荐下，我得以向党的宣传动员部组织的文学作品评选活动提交自己的诗作。最好的作品将提供给金正日本人评判，而我的作品入选了。

1992年2月19日，国家报纸《劳动新闻》刊登了一则公告，大意是在金正日将军50岁生日时，向他赠送了一本名为《有福之人的歌》的50首诗集。他阅读了这本书，并给这两位诗人写了一封表扬信。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平壤艺术学校党委书记将金正日的感谢信交给我这个因偏离指定学习课程而辜负学校的音乐专业学生时的表情。他不得不当着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的面这样做，虽然他别无选择，只能说："我很高兴我们学校有这样一颗明珠，"但他用力拧了一下我的耳朵，我差点在台上大声哭了出来。

这并没有结束。金正日在信中说，我对他的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我受益与其指示。党要求音乐专业的毕业生在其剩余的工作生涯中以音乐身份为国家服务。但党为我破了例，允许我首先选择职业：我被分配到宣传动员部管辖的朝鲜中央广播委员会担任艺术作家。

在朝鲜，只有一个电视频道。中央电视台的播出时间为工作日下午5点至晚上11点，周日上午10点开始。在我作为艺术作家的新角色中，我负责策划朝鲜的诗歌，我帮助以适合电视的形式呈现诗歌。我的父母和老师对金正日批准我的愿望感到震惊，当然，平壤艺术学校的党委书记也是如此。

那是1994年，我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活。在我第一天上班之前，我去见了金相欧的遗孀，按照朝鲜传统的敬意，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

1992年，金相欧因肺结核在金万玉（Kim Man Yu）医院——国家最先进设施——11楼的一个特殊病房里去世。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也在为我铺路。所有干部在接近死亡时都必须签署一份忠于金正日的誓言，发誓他们死后将继续一心一意地奉献。诗人金相欧在他的手写遗嘱中加入了以下文字：我留下了未完成的作品，将由我的孩子和我的学

生来完成。他的葬礼由统战部处理，这与国家政要的身份相称。金日成还决定在他的葬礼当天将祖国统一勋章——朝鲜的最高国家荣誉之一——颁发给金相欧。《劳动新闻》正式宣布这是国家的一项法令。

虽然我最初申请的是艺术作家，但正是金相欧的遗嘱促使统战部将我招入麾下。在金正日严厉指责民盟不再创作金相欧那样质量的作品后，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林东玉亲自招募我。中央党员干部的审查过程至少需要六个月的严格背景调查，但这个过程是根据上面的命令匆匆完成的，我很快就被调到了统战部。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党要求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文学或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生，而音乐专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1996年9月被录取到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文学和语言研究生院，出借到统战部做试用期。但这并不是正当的程序；这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年的统战部试用期也被我的研究生学位所取代，毕业后我被统战部录取。

由于这段历史，我要求回到我的出生地，不仅仅是为了重访朋友和再次看到我的家乡。它实际上是为了朝拜那个把我带到崔亮和金相欧身边的地方，他们曾牵着我的手，引导我走向我的使命。

第三章 故乡变了

平壤站非常拥挤，很难看到站台上的情况。花了好几天时间等待延误的火车的乘客似乎比在那里买票或踏上旅程的人要多；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是朝鲜首都的中央铁路终点站。

在朝鲜，除了连接新建车站或开发区的部分轨道外，该国其他地区依靠的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期间铺设的单轨铁路。朝鲜人已经习惯了火车从来没有按照正常的时间表运行的事实。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强调，铁路是国家的神经系统。但实际上，朝鲜就像一个神经受损的人，一半身体瘫痪。鉴于不断出现的物理故障、发动机或轨道的问题以及频繁的停电，自然灾害甚至不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在电力真正工作的时候，电力也很低，当火车在轨道上"打嗝"时，乘客就会上下颠簸。有时，沿线的村民会用他们的牛车与火车赛跑，当他们超过车厢里的乘客时会大笑。

此外，还有更高优先级的影响因素，因为客运列车必须始终让位于执政的金正日的专列，为了安全起见，无数条线路都要保持畅通，只为在最后一刻能被改变。许多货运列车的运行比计划晚了几个月，党和军队用各种理由来获得金正日的批准，以获得轨道的优先使用权。在金正日的命令下运行的列车，往往载有军事物资，以最大的优先权穿越国家的轨道，而客运列车在优先级中则处于最低级。

幸运的是，我的家乡在平壤南部，与其他地区相比，那里的铁路交通较少。这要归功于日本殖民计划的性质，它将基础设施集中在该国的北部地区，以帮助其完成利用朝鲜作为控制北部满洲的立足点的任务。朝鲜的贸易网络集中在这些铁路交通上，而南部地区则相对没有发展起来。

从平壤到我的家乡沙里院的距离是六十三公里，开车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但当我到达车站时，我被告知，火车将晚点三个小时出发。我并不介意这种等待。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去了，而且我决心乘火车返乡，所以我充满了兴奋的期待。说实话，我是作为钦定者之一满怀荣耀回家的。我甚至打算带着我的特制酒杯，用它来向家乡的朋友们敬酒，因为将军曾亲自往里面倒过酒。但我母亲严厉地拒绝了我的请求，说这样的传家宝不应该从家里拿走。因此，我在背包里装满了酒和罐头肉。背着这个包，在排队买票时，我站得很高，很自豪。

在朝鲜，排队的情况到处都是一样的。有三块牌子指示干部、军人和普通居民的排队方向；每条队伍的前面都有武装士兵站岗。虽然我只有20多岁，但我带着我的中央党员身份证件走到干部队列前，这些证件

装在一个棕褐色的皮夹子里，上面压有金色的党徽。这条队伍中的人还被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候车室，所以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枯燥乏味地排几个小时的队。

在任何一列火车上，火车前部的车厢都是专门留给党员干部使用的。而站台上的人很多，因为这是一个限制区，车厢里除了几个人之外，空无一人。在车门附近，有四个黑脸的人，他们似乎很紧张，不停地四处张望。看来他们是通过贿赂一个官员而非法登上火车的。似乎他们的目标不是沙里院，而是安全地开始旅程，当火车开始行驶时，他们松了一口气，弯下腰来，互相傻笑。

在朝鲜，没有行动自由。你只能通过出示身份证大小的官方旅行证来购买火车票，并说明你旅行的原因。如果你没有这种通行证而旅行，并被发现，将被判处三个月的劳役。一名安全人员很快出现在车厢里。他一定也受到了贿赂，因为他没有要求查看那四名乘客的旅行证。似乎是为了感谢我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一检查了我的旅行证，他就立正，非常正式地向我敬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目光都无法从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上移开。途中我们不得不在黄州（Hwangju）站等待了两个多小时，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打断我。我对要回到我的家乡感到非常恍惚，就像一个朝圣者回到了一个纯净而神圣的春天。

当火车在行驶了半天后终于抵达沙里院站时，我兴奋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但看到拥挤的站台时却感到很惊讶。我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悠闲地旅行，看到这么多乘客和我在同一个站台上下车，我感到很疑惑。我甚至看到有几十个人从我的车厢顶上跳下来。起初，我对他们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只是为了得到一次免费乘车而摇头。但是，当我走近月台，遇到前面的骚乱时，我知道问题并不在于钱。安全人员正在殴打几名乘客，并大喊问题：回答我！你们这些混蛋有旅行证吗？他妈的回答问题！”

在所有跨越县和省边界的道路上，甚至在山上，也都有安全检查站。那些未经授权而冒着法律风险出行的人，为了方便和便于逃跑，不得不在火车顶上行驶。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被安全人员挑中的人没有表现出冒着生命危险在车顶上旅行所需要的力量，而是用眼泪和他们能想到的各种可怜的解释来哀求。

我家乡的气氛与平壤的气氛是如此不同。这种陌生感破坏了我朝圣过程中所有平静的兴奋。我周围的叫喊声、尖叫声和粗俗的咒骂声使我感到这个地方很黑暗，很可怕。有一阵子，我站在那里感到迷茫。我环

顾四周，看着那些来到车站迎接火车的尖叫的人群。他们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迎接家人和朋友，而是为了领取他们的货物。大多数乘客都在运送大袋的玉米或大米。

Until 1994, and the start of the Arduous March, all North Koreans relied for sustenance on the socialist 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 (PDS), which determined the allocation of every basic necessity of life. This included household items and items of food, whether rice or eggs. The ration size was determined by the state, and it also served as a marker of class in North Korea. The highest ration that was granted, the Daily Ration, conferred a generous amount of supplies for a household. The Central Party's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made sure that every morning, a refrigerated Nissan truck delivered fresh supplies to the honoured few. The Daily Ration was granted only to the households of Central Party Secretaries, Directors and Corps Commanders in the military.

直到1994年，也就是“艰苦的行军”开始前，所有朝鲜人都依靠社会主义公共分配制度（PDS）维持生计，该制度决定了每一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包括家庭用品和食品，无论是大米还是鸡蛋。配给的大小由国家决定，它也是朝鲜的阶级标志。最高的配给，即每日配给，为一个家庭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中央党的财政和行政部门确保每天早上，一辆冷藏的日产卡车将新鲜的物资送到少数受表彰的人手中。每日配给只发放给军队中的中央党委书记、局长和兵团司令员的家庭。

Further down the hierarchy came Three-day Rations, Weekly Rations and Monthly Rations. Three-day Rations applied to the households of those who held a rank equivalent to Ministers, Party Secretaries at the city level, and Central Party cadres ranked Deputy Director. Departmental directors in the Central Party institutions and section chiefs received Weekly Rations. Those who were Admitted to Dear Leader's circle, such as myself, received individual rations on a weekly basis, instead of household rations. This included 5 kilos of seafood and meat, 21 kilos of rice, thirty eggs, two bottles of cooking oil and fresh produce.

再往下是三日配给、每周配给和每月配给。三日配给适用于那些级别相当于部长、市级党委书记和副局长级别的中央党员干部的家庭。中央党政机构中的部门主任和科长享受每周配给。那些获领袖钦定之人，

如我，每周收到个人配给，而不是家庭配给。这包括5公斤的海鲜和肉类，21公斤的大米，30个鸡蛋，两瓶食用油和新鲜农产品。

曾经分配给绝大多数普通朝鲜人的每月配给，随着1994年国家PDS的瓦解而消失了。每周配给和以上级别的口粮仍然有效——只有忠诚和幸运的人才能享受。但适用于干部的配给等级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个秘密，因为他们完全依赖配给，突然间不得不自谋生路——而干部仍然得到供应。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一场“自给自足”的运动，以敦促人们以将军为榜样，自力更生。这意味着对上层阶级享有的配给信息的压制被更加严格地执行。

在艰苦的三月和这些经济困难的时期，火车勤奋地不仅运送人，而且运送自给自足的货物。观察着他们货物的重量，我在车站看到的其他一切都让我面露难色。当我站在那里，对眼前的混乱景象感到惊讶和震惊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那是我的朋友英南，他曾答应在车站接我。他的脸上明显有饥饿的痕迹，但他年轻的笑容还是和以前一样。看到他，我的眼里就像拨开了一层迷雾。“你已经长大了！”我说。

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我捏着他的耳垂，而不是握手。他胖乎乎的耳垂比任何人的都大，总是让我想起母亲肿胀的乳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有几次我甚至把它捏得流血了。

“我们走吧，”他说。

他为我解开背包时表现出的力量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嬉戏。离开检票口后，我在车站入口附近环顾四周。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对面的沙里院邮局，它没有任何变化，仿佛时间在我离开后静止了。同时，尽管在我的印象中它是一座大型建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似乎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破旧。事物和以前一模一样，但同时又更小更破旧，这一点与邮局旁边的杂货店和食品店的情况相同。但在我的记忆中，车站广场的水泥是光滑的，现在却充满了裂缝和伤痕。

一阵清风吹拂着我的脸，我注意到那棵大榆树仍然倾斜在一边，似乎要侧身倒下。它的继续生存让我有些欣喜。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和母亲经常在那棵树下等我父亲出差回来。鲜活的记忆汹涌而来。其中一个场景是，我从瓶子里捡起一块破碎的蓝色玻璃，用它来反射阳光，阳光透过树枝和树叶向不同方向闪烁。

当我们向车站广场右侧出发时，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走错了路。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公园，这里覆盖着鲜艳的树叶；没有以前在这里游荡的鹿或野鸡的迹象。这里没有一条直通公园的人行道，而是有许多通往混乱方向的土路。在这条错综复杂的道路两旁，蹲在地上的小贩排成长队，

穿着破旧的衣服，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用他们的饰品诱惑着旅行者。

英南催促我继续前进，但我不想错过任何东西。我故意放慢脚步，以便浏览分布在我两边的小贩的商品。当我看到朝鲜各省已知的各种贫困现象聚集在一起，在这块悲惨的土地上展示时，我不禁苦笑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未清洗的尸体的臭味。肮脏的双手乐观地摆放着商品，这些商品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想要购买的样子。我问一个女人，为什么她把一个空的保温瓶卖到20朝元。她回答说，如果我把它装满热水，我可以在晚上抱着它取暖。

看到自来水在出售，我也感到很困惑。用肥皂和水洗脸要10元，单用水洗要5元。英南告诉我，洗脸是前一年推出的一项服务，仿佛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这里不仅发生了饥荒，而且水的供应也断了。虽然妇女们喊着“水洗脸”，但她们自己的脸上却油腻腻的，满是污垢。看到这些妇女的状况沦落到卖自来水，没有自己的水的妇女被迫卖掉她们最宝贵的财产，令人感到沮丧。

当我发现出售的棉被里塞满了从旧烟头上收集的过滤嘴时，我无法抑制地发出了一声厌恶的哼声。一位妇女坐在她的商品旁边，专心致志地做着工作。填充一个被子需要多少个旧烟头？这就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吗？人们不应该这样生活：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们自己就像用过的烟头一样被丢弃。但是，仿佛预料到我的居高临下，老妇人对我发誓，喊道，那些不收集旧烟头的人就该死。

‘Don’t you think of looking down on me,’ she added, with a strange air of dignity.

“你不要想着看不起我，”她补充说，带着一种奇怪的尊严的气息。

转向公园的远处角落，我可以看到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看起来不是死了就是快死了。在这些男人和女人与冰冷的坟墓之间，除了他们自己的影子，没有任何东西，甚至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也明显在等待死亡。还有一些人像苍蝇一样在聚集在尸体旁，有时还用棍子戳着那些没有生命的人。我问英南他们在做什么。我的Jappo朋友一边隔着衣服挠着自己的皮肤，发出很大的声音，一边解释说道。

“他们是尸体科的，”他说。“由市党委派来的。”

“尸体科？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把尸体处理掉!也许你在平壤没有这种情况，但所有其他省份的委员会都将他们派往车站附近的主要公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经过车站，他们来这里乞讨，直到他们死亡。

英南的表情，即使面对死亡也无动于衷，是遥远而陌生的。尸体科？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存在于平壤，平壤是一个神圣的革命中心，是朝鲜的首都。虽然朝鲜的官方名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实际上，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平壤居民的共和国。当全国各地出现饥荒，供给停止时，供给作为第一优先分配给平壤居民。旅行证的发放受到严格限制，平壤边境管制站的安全也得到加强，这样，流向首都的物资就不会渗入其他省份。从1996年开始，当平壤的供给也出现问题时，党最终采取了与中国开放贸易的办法，以便可以将面粉和玉米运进来。即使平壤居民真的饿死或冻死了，也不能像外省那样让他们流落街头：平壤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朝鲜向外国游客展示的地方，其外观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

英南继续说："显然，咸兴市的党委书记想到了这个主意，并因此获得了一枚国家奖章。对他来说是好事!死者无以为报，但生者却很感激。不然我们怎么能把所有的尸体都处理掉？如果你报名参加这项工作，你可以得到一整天的口粮；这是很慷慨的，你知道。"

当我的朋友喋喋不休时，他似乎在用一种不同于平壤的语言说话。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不再熟悉。我站在一旁看着尸体科的工作，不理会英南挥手催促我继续前进。尸体科有一辆满载的人力车，上面放着一些空麻袋。六只光秃秃的瘦骨嶙峋的脚从这些东西下面探出，方向奇特。在最初的一瞬间，我不明白我看到了什么，但当我意识到这些空麻袋是人的尸体时，我感到恶心和反胃。我为自己看得太仔细而愤怒地颤抖着。我曾听说过一些传言，当公共分配系统崩溃时，在一些省份的街道上可以看到尸体。但我从未想过要在我自己的家乡看到这种情况。在我的记忆中，我所珍视的地方就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现在这幅画被永远玷污了，被撕成碎片。对于这种对我记忆的背叛，我感到愤怒中夹杂着困惑，从我内心深处升起。

当我见到乡亲们和我的老邻居时，我变得越来越绝望了。当我在英南家打开行李，换好衣服后，邻居们蜂拥而至。英男的母亲敲开了每个人的门，说医生的儿子回来了。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搁置起来，满怀惊喜来看我——一个被钦定者。无一例外，我看到的每个人都显得苍老和疲惫。

"我们听说你和将军一起吃饭了！他喜欢吃什么粥？他喜欢吃什么粥？"那是"高个子"朴先生，他以前住在我们街边。自从上次国庆节以来，他除了吃粥之外什么都没吃。他的脸色焦黄。

"将军？哦，你知道那首《将军的饭团》吗？就像那首歌一样，他和

我们分享了一个饭团，”我喃喃地回答道。

尽管这些人都是单纯的乡下人，劳动党告诉他们什么就信什么，但我想不到这么快就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揉了揉自己的手，上面粘满了汗水。但是乡亲们听说将军吃的是固体饭团而不是粥，似乎都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啧啧称奇，有些人则哑然失笑。我听到一个声音说，这就像党的干部告诉他们的那样，所以我们必须为爱国主义大米运动做更多的事情，即使这意味着为大米掏钱。爱国主义大米运动是一项运动，普通朝鲜人将他们的大米献给国家，作为一种爱国主义行为。

镇民们继续无休止地询问我关于将军的情况，焦急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关心他们领袖的福祉胜过关心他们自己的福祉，尽管他们的状况很糟糕。我尽力用谎言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但发现我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厌恶。

我的乡亲们的生命已经被抽空了，再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张脸都不会感到安慰。当我见到隔壁的顺英时——我曾经暗恋过她，在我们童年的婚姻游戏中，她一直是我的玩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毁容的老妇。我们的目光一相遇，她就收回了目光，垂下头，露出了她瘦弱的、光秃秃的脖子；这是她贫穷的另一个标志。明哲，曾经以他的力量而闻名，被镇上所有其他男孩羡慕，已经变成了一无所有，只有皮包骨。他们过早变黑的身体皮肤和脸上深深的人字形皱纹是他们多年来忍受饥饿的无声证明。

当我在人群中询问一些我看不到的邻居时，他们的回答是，他们每个人都饿死了。这种震惊的感觉就像在头上打了一拳。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名字属于那些活着的人，但他们已经不存在于这个星球上了。我为自己内心的空虚感到悲哀。

突然，我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高个子朴先生告诉我，那是苹果树小屋的爷爷。他已经疯了。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苹果树小屋。这所房子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他的孙女出生时，祖父在他们的院子里种了一棵苹果树，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长大了。每年秋天，镇上的孩子们都会围过来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摘苹果？”苹果树屋爷爷会回答：“这个星期天和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吧。别忘了，星期天是摘苹果的日子！”苹果树山庄一直都很欢迎我们。我问苹果树屋爷爷为什么会变得精神错乱。

明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没有苹果树了。祖父在他的孙女上吊自杀后把它砍了。她的母亲离家出走，和某个狗娘养的在一起，她的父亲几年前也去世了。母亲从未保持过联系，所以只剩下她的祖父。他

照顾她——一个青春期的女孩怎么可能自食其力？但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来了，把他们的苹果全摘了。第二天早上，祖父发现他的孙女在苹果树上吊死了。之后他就疯了。说是找到小偷后要把他吃掉。”

这个故事已经凄惨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当明哲说完，说大家仍然叫这个老人苹果树小屋爷爷，尽管已经没有苹果树了，我再也无法保持镇定，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涌出。我假装用手背擦拭一些污垢。我为自己对他们隐瞒自己的眼泪而深感抱歉，但我又为自己的眼泪而感到羞愧，不敢让他们看到。以我优越的生存条件，我怎么能在那些一无所有的人面前表达我的痛苦，他们甚至被剥夺了表达他们痛苦的手段？

带着这些想法，我被一种冲动所征服，藏起了我的双手，坐了下来。我的乡亲们的生命因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受到威胁，当国家处于这种状态时，我的双手却被用于文学创作，这是令人羞愧的。或者说，我迫切需要把我的手从我的老邻居那里藏起来。在我看来，我的双手体现了我的傲慢和自私，它们柔软的皮肤暴露了我是如何用它们来保证自己的存在，而牺牲了无数的生命。

那天晚上，在英南的母亲准备的晚餐上，我不得不再次忍住泪水。她自豪地解释说，她如何能够为我这个客人提供半碗米饭——她每顿饭都会藏起十粒米。除了米饭之外，还有一小碟盐渍卷心菜和腌制凤尾鱼，它们被呈现在我面前，好像是一种昂贵的美味。当我问她花了多长时间积攒大米时，她回答说：“三个月。”我难以置信他们是按粒吃米，而不是按份吃米。我嘀咕着找了个借口，说我在火车上吃完午餐后消化不良。

几乎在我离开餐桌的同时，英南的父亲就狠狠地责骂了他的妻子，说她让我吃不下饭了。他把我的勺子拿来，强迫我握住它，恳求我再次加入他们的餐桌。我从背包里拿出我的进口酒和罐头肉，这是我从平壤带来的，作为离别礼物。

“听着，不要为我担心。我不是因为食物不够而拒绝的，”我大声说。

虽然我把这些食品作为礼物带来，但当我要向一个以米为食的家庭解释我拥有如此奢侈的奢侈品时，我一筹莫展。当英南的父亲举起那瓶白兰地，惊叹不已时，我更感到一种不祥的预感。

“啊，我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西方的酒了，”他叹了口气。“你知道，当我们刚从日本抵达朝鲜时，我有很多瓶，只要有机会，我就把它们作为礼物送出去。”

与我带来的礼物相比，这位母亲突然为自己微薄的奉献感到尴尬，

怯生生地把那碗米饭向她丈夫挤了挤。她说："你吃米吧，也许我应该把它留到下次。"

这碗饭由父亲传给儿子，再由儿子传回给母亲。英南的母亲最终把它带回了厨房，为她的女儿留着，因为她已经出去在布料厂上夜班了。我感到胸口发闷，但我也被这种爱所感动，这种爱使这个自己没有多少米的家庭把最后的米提供给一个外来者。

英南的父亲继续惊讶地注视着我带来的那瓶进口酒。当我告诉他这是敬爱的领袖给我的时候，他的嘴都合不上了。金正日每年给他的高级干部送三次特别礼物：元旦、金日成的生日和他自己的生日。这些礼物可能包括来自意大利的西装面料、稀有药材或鞋子，都是特别进口的。但是，虽然其他物品可能会发生变化，但酒始终是一个关键特征。

建立进口酒类礼品的习俗，是因为许多干部以前不熟悉这些饮品，但却被它们迷住了，在国宴上或在国外任职期间喝得酩酊大醉，从而犯了社交错误。一般来说，酒类礼品包包括三种白兰地各两瓶——共六瓶。对于朝鲜干部来说，进口酒的礼物实际上就是外汇的礼物，因为每瓶酒在黑市上很容易卖到100美元左右。但任何在黑市上卖给商人的东西最终都会以贿赂的方式回到干部手中，所以这批白兰地的价值远远超过其面值。这也是朝鲜进口酒的价格在上述三个国家节日前后暴跌的原因。

英南的父亲似乎不仅仅对喝下瓶子里的东西感兴趣；他被这个外国标签迷住了，也许他想把这个瓶子作为一个纪念品。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愿意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他。当我说好的时候，他急忙给自己找了个空杯子，把白兰地倒满，似乎想尽快把酒喝掉。英南的父亲品尝着他的白兰地，解释说这让他想起了他的过去。但在喝掉两杯后，他失去了控制。

"你知道你家里的那架雅马哈钢琴吗？我把它送给了你的家人。你知道那个吗？对吗？还有我们的房子，你知道你父亲给了我这个。你也知道的，对吗？"

"是的，是的。"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单音节地回应，我可以感觉到血液涌向我的头。

"我永远被指定为Jappo，所以我从来没有被允许有一份真正的工作。你知道，去年这个时候，你父亲来我们家过夜。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我很饿。我是如此饥饿，以至于我联系了你父亲。你知道，我意识到，朋友比故乡好。正是由于你父亲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多活一年。我让他保证不告诉你。"

英南的母亲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喝醉了。不要再在孩子们面前那样谈论故乡了。此外，我们决定在你的要求下搬到朝鲜。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呢？”

在她的话语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能说的话语。

“是的，我很抱歉，”她丈夫回答。“我很抱歉把我们带到这个国家。但是今晚，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有你在这里，感觉就像我们自己吃了一顿正式的饭。你知道我们一直在为食物做什么吗？你知道吗，我的这个妻子，她把米水放在桌子上，叫它米饭。她把野菜煮熟，然后把液体汤汁端上桌，就好像它是一道合适的炖菜。桌子上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食物，但她仍然要求我们坐在桌前吃饭。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假装我们吃了合适的食物，对我们的生活感觉好些。”

英南抱着头坐着，从手指间瞪着他的父亲，似乎认为他的父亲正在毁掉他们生命中仅存的一丝尊严。当我注意到他头顶上有饥饿的痕迹时，我的心都碎了。英南，我不知道。请原谅我的无知。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我本来打算再呆两天，但找了个借口，说工作上有急事需要我。当我看到英南匆匆忙忙地跟着我走出家门、穿上的那双破旧的鞋子时，我很高兴自己做出了离开的决定。我想在回平壤之前给他买一双新鞋，我说我们应该去市场看看。我们边走边看，我偷瞄了一下他垂下的耳垂。它有干燥的白色片状皮肤，一直蔓延到他的脖子。我为我小时候捏他的所有次数感到苦涩的抱歉。

“那么，回家的感觉如何？与平壤有什么不同吗？”他的声音很虚弱，听起来好像从远处传来。

“你走到哪里，人们的生活都一样。我甚至在工作中经常被人指责。”

“我想搬到平壤。至少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甚至像你那样见到将军。”

我支支吾吾，寻找可能安慰他的词语。仅仅是与他并肩而行就令人感到羞愧，我感到内疚，因为我的来访使他的生活陷入混乱。但他开始倾诉他的心声。“你不明白，是吗？我没有未来了。至少你在平壤，在那里你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生活。你甚至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在这里，为下一顿饭争分夺秒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即使我今天成功了，还有下一顿饭要担心。还有下一顿。我所有清醒的时间都花在担心我是否能够再次进食。我们的生活并不比动物好。你在车站亲眼所见。你知道过去的标准问候语是：‘你吃了吗？’但是现在，你不能这么说，因为你能说什么来回应呢？‘不，我没有，你他妈的能做点什么？’你看不出来

吗？在平壤之外就不一样了。而且你们在首都也没有这些，对吗？”

我向他指的地方看去。市场入口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黑字标语，而不是通常的商品价格。“不遵守交通规则者枪毙！”“囤积粮食者枪毙！”“浪费电力者枪毙！”“切断军事通讯线路者枪毙！”“囤积国家资源者枪毙！”“传播外国文化者枪毙！”“说闲话者枪毙！”我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已经出台了这么多新法规。这些口号意味着，任何一个错误都会导致被行刑队处死。

在平壤，为了避开外国人和游客的眼睛和耳朵，新的规定是通过所有朝鲜人都必须参加的工作场所和居住单位会议在内部宣布的。我意识到我以前从未见过在公开可见的地方张贴条例。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想起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来市场。一旦我恢复了平静，我想尽快买下鞋子，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于是我带头，拉着英南的手。

闲逛的人比实际买卖的人多。当我们穿过人群时，臭味让人窒息。“小心你的钱包！”英南警告我说。我走得更快，终于找到了一个鞋摊。我让英男挑一双他喜欢的鞋。他拒绝了，说他很抱歉，不能把我当做客人好好招待，他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收受礼物。当他不情愿地挑了一双便宜的时候，我向卖家要了一双最贵的。结果发现那也是质量平平的，是一双中国制造的。

英南回忆起朝鲜谚语：“他们说，如果你买鞋作为离别礼物，你就再也见不到对方了。”

“你以为我是你的情人还是什么？你是什么意思，‘再也不见面了？’”我说。

看到英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感觉好了一些。买完东西后，我把零钱和钱包里剩下的钱强行塞进英南的口袋。但在我们要离开之前，某处响起了警笛声。

“那是什么？”我问。

我们周围人的反应比警笛声还要奇怪。每个人都显得很恼火，有些人大声地咒骂。

英南的眼睛是闭着的。他也显得很气愤。然后他嘶吼着说：“该死的地狱”。

当我再次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他说这是一场处决。

“什么？”我问。

正用破烂的抹布擦鞋的鞋贩子抬起头来，代替英南回答说：“你不是这里的人，是吗？时机不好，就是这样。将会有一场人民的审判。在它结束之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市场。”

在朝鲜，公开处决不被认为是一种惩罚。它被归类为一种道德教育的方法，也是权力斗争中使用的一种公共宣传工具。但在市场上执行死刑？当我困惑地看着英南时，他向我保证，这些处决几乎每周都会发生。它们总是发生在市场广场上，这样就有大量的观众可以观看整个过程。

果然，士兵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了广场，用他们的枪托把我们赶到中央。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让我退缩的是，由两名士兵带进来的囚犯没有穿囚服，而是穿着日常服装。这感觉就像故意向乡亲们传达一个信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处于他的位置；不需要有特殊的犯罪心理就能遭受这种命运。当他从下垂的眼皮和瘦骨嶙峋的眼窝下扫视周围的场景时，这个人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他的嘴唇周围有血迹。对他来说，这真的是人间地狱，他的同伴们看起来一定像恶魔一样可怕。

人民的审判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就结束了。这并不是真正的审判。一名军官只是宣读了他的判决书。囚犯的罪行被宣布为偷了一袋大米。由于国家是根据军事第一的先军政策进行统治的，全国所有的大米都属于军队，即使是轻微的犯罪也要根据戒严法进行处理。

“由行刑队执行死刑！”

法官刚一宣判，押制犯人的两名士兵中的一人就以迅速、熟练的动作将一个东西塞进了他的嘴里。那是一个V形弹簧，一旦塞进嘴里就会膨胀，使犯人无法说话。囚犯发出了声音，但没有人类的声音，只有呜咽声。这个装置是官方批准在公开处决时使用的，以便囚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法说出反叛的情绪，然后被带走。

砰!砰!砰!

我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枪声。血液在我的血管中冻结了。我不敢看犯人死亡的那一刻，我把目光投向了上方。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它是极其清晰和明亮的蓝色。但那些被安排见证死刑的乡亲们的脸色却很严肃。

当士兵们吹响哨子，喊着让人群散开时，人们没有任何反应，而是开始在彼此之间嘀咕。随着窃窃私语的传播，我可以捕捉到人们所说的内容。认识犯人的人已经确定了犯人的身份，在得知这个犯人的故事后，我感到的震惊是难以形容的。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一股刺痛的寒意从那里一直传到我的脚趾末端。

《死囚》

人群聚集之处，

必然有枪声。

今天，又有谁
被公开枪毙。
`绝对不能同情，死了
也要用义愤再杀一次！’
砰！砰！枪声说出了，
布告没有说完的话。
面对他，为什么今天
看客的沉默格外沉重？
因为偷窃一袋大米，
挨了九十发子弹。
这个人的职业
是：
农民。

那个因偷窃大米而被枪决的人曾是一个饥饿的农民。就连种地的人也找不到足够的食物。

第四章 窥视边境之罪

我一回到平壤的家，远离沙里院的人民审判，就进了浴室。感觉就像囚犯的皮肤和血液的碎片被喷到了我的皮肤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擦洗自己。一个多星期以来，每当我坐在桌前吃饭时，我都会感到恶心，一想到事物就受不了。在其他任何一个星期天，我都会睡懒觉，但那天，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离开了，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除了几个拿着鱼竿坐在大同江岸边的老人外，周围没有人。我找了一个面向水面的空凳子坐下来。初夏的微风随着河水飘过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吹了吹，把肺里的不适感赶走。这样做了几次后，我觉得我可以更轻松地呼吸了。

一股死气沉沉的臭味在河面上荡漾开来，一个皱巴巴的煎锅飘了过来。以前我不会注意到这种小的丑陋的东西。相反，我会让我的思绪随着水漂向深蓝的大海，大海的深处会像波浪上的阳光一样闪烁着诗歌的光芒，激励着我。但那个星期天却不同。当我看着煎锅被眼前的河水带走时，它的命运似乎代表了我的朋友和乡亲们的命运。水本身就像时间的流逝，这种流逝并不比流向我的河水更无意义，它只是向前流去。在江岸的另一边，一栋大楼的屋顶上挂着一条标语：“你的千里之苦后，还有万里之乐！”这句话显得很奇怪，也很虚无。

党把这个时代称为“艰苦的行军”，但实际情况难道不比仅仅“艰苦”要糟糕得多吗？此外，这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参加的行军。当普通的朝鲜人不得不在痛苦中行进一千英里时，干部们却在舒适的环境中漫步。我的乡亲们担心他们的领袖的饮食和健康，然而金正日却可以奢侈地吃着装饰着火焰的冰激凌。我满怀疑问，但我知道它们是危险的，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住在平壤。我是钦定者之一，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走过了这么长的路。为了我父母的利益，我不能有任何不正常的想法。如果我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我就会升到最令人羡慕的位置，成为对敬爱的领袖忠诚的典范。我必须继续下去。

我决心努力完成给我布置的任务，这首史诗在我背后有统战部的全力支持。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我比别人早到办公室，早上六点半就到了。在我安静的角落里，我用钢笔在一张衬纸上用大字写下了我的诗的题目：《微笑的太阳颂》。但到了晚上，我什么也没写出来。我的任务是描述我们的最高领袖是如何微笑的，但我所想到的却是我的乡亲们的苦难。

为什么我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是伟大的，为什么他的人民会饿死？改革使中国人走向繁荣，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党

不考虑改变政策？我讨厌这些问题像山泉一样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当我认为我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时，另一个问题又出现在它的位置上。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对自己、党和敬爱的领袖提出过这么多问题。

每个星期，林部长都会问我《微笑的太阳颂》的进展情况。我最终厌倦了自己的借口，拼命地等待每个工作日的结束。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充斥我脑海的是人民的眼泪，而不是我们的最高领袖。我坐立不安，渴望根据我所看到的写出现实主义的诗歌，而不是根据我们都被告知要看到的东西写出忠诚主义的诗歌。

因为我不能让别人发现这样的写作，所以我晚上在家里偷偷地写诗。这样一来，我每天都在写关于大米的诗歌，而不是关于我们亲爱的领袖，我的脑海中充满了我在家乡看到的场景。

这个男孩是在水样的米汤中长大的。
我在他生日时给他一碗真正的米饭，
但他跺着脚拒绝了。
"这不是饭！"他抗议道，坚持自己的立场。

写这首诗的那天晚上，我一直哭到天亮。这首诗是根据一位同事与我分享的关于他侄子的故事写成的，那时在一个难得的吐露真相的时刻，而我把这个故事记下了下来。

我开始关注平壤本身的贫穷，我想找出所有我能找到的东西。在获得统战部允许在平壤自由旅行和采访的许可后，我参观了平壤的市场，并不遗余力地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交谈。在我的家乡沙里院，饿死甚至被公开处决是常有的事，与此相反，平壤的居民会小心翼翼地谈论邻居的死亡，说他们知道那是饿死的，仿佛这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机密。他们生活在严密的恐惧之中，因为他们知道口风不严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失去在平壤生活的特权和被放逐到外省。

但在那些生活在平壤最贫穷地区的人的谈话中，在东大院（Dongdaewon）和松江（Sungyo），则能够很明显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一位妇女描述说，当她听到她的小儿子向朋友吹嘘说他那天吃了三顿饭，而她自己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她哭了。有一个乞丐，他最后的愿望是能够给别人一些东西，因为他一生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别人的帮助。当这些真实的记录被浓缩到我的秘密诗集中时，我感到自己终于进入群众之中。

但我也生活在恐惧之中。我知道有一个作家秘密地用现实主义风格写作，当他的罪行被发现时，他被送进了“古拉格”。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的诗藏起来，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记录我的真实感受，并向自己

确认我仍然是人。我抵抗麻木不仁的唯一方法是我对真相的信仰。但我也开始认真研究非朝鲜的书籍，在此之前，我一直把阅读这些书籍作为一种责任和职业好奇心。

直到我被统战部录取的那一天，我还不知道“大韩民国”（这是韩国对自己的称呼，字面意思是“大韩民族的伟大国家”）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是指什么国家。我以为这是东南亚的某个国家的名字，只知道它的名字与台湾相似（注：台湾在韩语的发音有点像“大韩民国”的前半部分）。我们只被告知韩国是“南朝鲜”，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下半部，甚至对韩国的好奇心也被视为对国家的颠覆。我是在进入统战部后才发现这些的，而在1998年夏天，当韩国政府提出向朝鲜运送大米时，朝鲜拒绝了，理由是麻袋上写着“大韩民国”。

只要是在韩国“本地化”的范围内，我都兴致勃勃地阅读每一篇外部文章，并痴迷地观看韩国电视。这是我和我的同事被给予的特殊特权，但对普通的朝鲜人来说是严格禁止的，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行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虽然朝鲜电视台从未提及对他们自己制度的批评，而韩国电视台也从未赞扬过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的新闻界缺乏统一性被公开展示出来，他们甚至会批评政府政策，不同意他们的政治家。当我从韩国报纸发展到关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期刊中提供的更详细的分析时，我寻求其他版本的真相的愿望更加强烈。

我定期阅读的期刊之一是《朝鲜月刊》。每当我打开它的页面，令人震惊的事实就会出现在我面前。我曾认为，韩国作为美国的殖民地，正被其资本主义制度所毁。因此，当我发现韩国的经济实际上是高度发达之时，我是非常惊讶的。我还感到好奇的是，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备受推崇的自豪感仅仅建立在我们的最高领导人的成就上，而韩国已经产生了许多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小型公司。韩国被嘲笑为美国的经济奴隶，然而数据显示，韩国的贸易额在世界排名中与美国并驾齐驱。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北之间存在的差距，这比意识形态的狂热或宣传更令人触动：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都是朝鲜族人，但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如此不同？

随着我对韩国和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我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内部，转向了朝鲜的政治制度。虽然统战部的口号是“本地化”，但外界涉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人性层面的文本，其亵渎的部分被审查员涂黑。正是这一点比任何事情都更能激起我的好奇心——如果你随便挥手让别人远离一个秘密，人们可能就会走开，但如果你拼命地隐藏它，人们的好奇心只会增加。

我一天工作中最快乐的时间是午餐后的休息时间，那时我的许多同

事会离开办公室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有一天，当我确定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我把我正在读的一页的黑色部分对着窗玻璃。当黑条在阳光下变得苍白时，下面的字母变得清晰可辨。我在那一页上看到的是最可怕的亵渎，在我们国家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看到或听到。即使是最小的事实——正是因为它们被如此小心翼翼地封存起来——也侵蚀了我对我们的制度不容置疑的信心。我曾相信，分裂我们祖国的内战是由1950年6月25日来自南方的入侵引发的。透过这层窗户纸的光亮，我读到，不仅在韩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历史学家通常把入侵的责任归于我们，而不是韩国。

相比之下，劳动党对我们历史的改写显得很寒酸。即使是我们最高领导人的伟大，也不是道德和正义的伟大。他的专制权力不是通过他的仁慈，而是通过自私的手段获得的，例如清洗和处决他的战友。当我发现这段历史时，我知道我不能再忠诚地顺从于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政权而写作。我试图说服林部长，正如朴主任所说，在诗中提到最高领导人的眼泪可能违背主体艺术理论的原则。也许是害怕承担责任，他最终默许了。

事情发生在2001年，根据最高指挥官金正日的命令，朝鲜人民被动员起来。为了在社会上建立先军思维方式，所有四十岁以下的平民，包括高中生，都必须进入强制性的三年兵役期。金正日强调，中央党员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树立“军事第一”的思想，他们也必须离开现有岗位，到军队服役。这导致了党委书记和部长们穿着小到无法掩盖其松弛身材的制服在街上游行的惊人景象。

在朝鲜，大学学位相当于中尉的级别。林部长确保我可以在驻平壤的部队中以中尉的身份服“兵役”，像其他许多在国内服“兵役”的士兵一样装腔作势。即使我在技术上是一名士兵，我也继续我的文学工作，长期住在统战部的宾馆里。当时，101办公所正准备与韩国作家进行文学交流，目的是引起韩国民众对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的同情。任务的一部分包括编纂“统一朝鲜文学”的文学选集。

到了金正日的全国动员令的第二年，它的执行不再被任何有名望的人重视。当我在2002年夏天回到101办公所时，我急切地填补上0了我所错过的韩国文学和媒体；而从明显的事实矛盾中升起的令人不安的想法，又重新困扰着我。我独自承受这些事实的时间越长，我的心情就越沉重，我的孤独感就越深。我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与他分享我的发现。

“这是一份南朝鲜期刊。别弄丢了。”

尽管我知道从统战部拿走一本书是一种叛国行为，但我还是把那里的一本书转交给了我的朋友黄永明（Hwang Young-min）。他曾是我在平壤艺术学校的同学。但我决定信任他，不仅仅是基于我们的友谊。他曾在多个场合非常谨慎地试图分享关于质疑我们系统的绝对正确的观念。

永明的父亲黄振泰（Hwang Jin-thaek）曾是社会安全部（今天的人民安全部）的二星将军和参谋长。名义上的社会安全部部长白学仁（Paek Hak-rim）是一位80多岁的荣誉任命者，而黄镇泰才是这个强大的国家监控机构的实际负责人。然而，在朝鲜，没有人能够掌握比金正日更多的权力。有一天，永明的父亲在党的一个问题上说得有点太大胆了，他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如果起诉达到了自然的结论，永明就会因为他父亲的罪行和他的家人一起被送进古拉格。朝鲜的连坐制度使这成为判刑实践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尽管黄振泰在调查结束前就能洗清罪名，但他还是死于审讯时受到的伤害。幸运的是，永明能够保留平壤的居住权，并恢复了王家山（Wangjaesan）乐团的作曲家身份。

王家山乐团与其他朝鲜文化机构分开，由党的组织指导部直接管理，作为金正日的宫廷乐团。还有一个这样的团体，即Bocheonbo乐队，以现代风格和电动乐器演奏，而王家山乐团的成员使用西方古典乐器，也以舞蹈为媒介工作。由于为金正日演奏的表演者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人们非正式地称她们为“欢乐之师”。

永明知道关于金正日个人生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外人所不知道的，这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从不多谈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在学校的友谊，在他被任命之前，我可能会认为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他比我高，有一头卷发。人们总是认为他是我们两个人中的长者，尽管我们年龄相仿。他严肃的眉毛，像煤灰一样黑，反映了他坚定不移的忠诚。有时，当他微笑时，他的脸颊会微微泛红，显示出他对世界所隐藏的激情的纯真性。即使在他父亲去世后，尽管他性格内向，但他仍能表现出无畏的反抗，而党内的组织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虽然永明被正式恢复了职务，但他发现自己不止一次被排除在金正日的视线之外，原因是一些牵强的借口。

当我们两个人一起喝醉了，而他放松伪装时，他甚至会说一些危险的话：“的确，我们的将军是太阳！如果你离他太近，就会被烧死，但如果你离他太远，就会被冻死。而这不是我的台词。我是直接从最有权力的干部那里听到的。你以为你了解金正日？我们的领袖爱的不是朝鲜人民，而是朝鲜的女孩。我亲眼所见，而且见得太多了。”

在朝鲜，禁止提及任何不包括在劳动党发布的官方宣传中的有关金正日的信息。敬爱的领袖是人民的父亲；一旦你知道他只是一个叫做“金正日”的人类，除非你被授权拥有这些知识，否则你的生命就会随着连坐制度的实施而走到尽头。许多干部最终被关进了监狱，因为接近权力中心是一个危险的平衡游戏，需要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当我与永明分享我从外部世界获得的阅读材料时，当永明告诉我金正日的秘密个人生活时，我们能够分享我们的负担。我们的友谊为我提供了继续前进的力量。真相被篡改得越少，就越有力量；当我们一起了解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一个与敬爱的领袖所描绘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的友谊就加深了。

2004年1月10日，我听到前门响亮而执着的敲门声。当我打开门时，永明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呼吸困难。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脖子上围着人造毛皮以保暖。当他站在那里，盯着我，无法说话时，我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你借给我的那本书，那本南朝鲜的书——我把它弄丢了。”

我紧紧抓住门把手，不让自己跌倒在地。他告诉我，他在地铁里睡着了，把包落在了火车上。他马上赶回去拿，但当他走到月台时，门就关上了。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去拿起桌上的笔，但又把它放了下来。即使拿着我最珍爱的东西，我也无法得到安慰。

“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在袋子里吗？”我问。

“不，只有那本书。”他回答。

“包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查到你的身份吗？”我再次问道。

“不，那是一个新包。事实上，我的笔记本也在那里。但至少在他们检查指纹之前，应该查不到我。”他说。

看起来，似乎是我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属于统战部的书籍都标有“最高机密：仅限内部人员阅读”的鲜红印章，以及写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统战部”的鲜蓝印章。每当有书借给特工时，我们必须出示正式身份证明并签字。在我的入党文件中，有一个条款把危险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把南朝鲜的文献暴露在部外，你将以叛国罪被处决。”

这本特殊书籍的内容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它包括由一位韩国学者撰写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传记，他把他们的家庭历史拼凑起来，尽管我们只被允许了解他们的革命历史。它甚至提到了金正日有情妇的事实。党要求其人民遵循源自儒家传统的荣誉准则，强调保守的家庭价值观，如服从父母、婚姻忠诚和长子的世袭权利，以加强王朝继承的合法性。

但是，在金家的个人历史中，这些价值观被公然忽视，血腥的清洗和暴力的政治构成了他们权力的基础，这与官方的事件版本形成了鲜明的、矛盾的对比。

不管这些事情是否属实，也不管我们是否相信可能存在未经授权的朝鲜历史版本，分享这些信息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叛国行为。尽管亵渎的部分用黑色记号笔进行了审查，但国家安全部不会相信我们读不出背后的文字。

我觉得秘密警察随时都会出现。一个干部离高层越近，他的结局就越惨烈。永明也是金正日的私人作曲家之一，是中央党的高级干部。这件事不可能仅以我们的死亡而告终，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在我们承认叛国并接受惩罚之后，我们的家人的生活将被立即摧毁。

在所有朝鲜人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连坐”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叛徒的家人和同伙与罪犯一起被摧毁，这样他或她的腐败就会被永远根除。我知道这个原则并不是空洞的威胁，因为只要有机会执行这个原则，国家就一定会向其人民展示。我一直以为这种悲惨的可能性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直到现在，当我发现自己有可能经历它的破坏性影响。永明和我通过我们的眼睛进行交流，没有说太多。我们并不关心为犯罪编造不在场证明，而是关心生存本身。随着白天的到来，我们的生活将变得黑暗，而我甚至不敢看时钟上的时间流逝。

我突然需要喝一杯。看到我伸手去拿酒，永明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最大的杯子。我们一起喝下了我们的第一杯酒。我们把我们的家庭置于可怕的危险之中，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浪费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需要一个计划，然后把它实施出来。

当我们一起喝下第二杯绝望的酒时，我们做出了决定。我们之间没有说话，但我们都很清楚。这杯酒并没有模糊我们的感官——它给了我们力量。

永明首先发言：“你知道那句话吗：小人物喝酒会呕吐，但大人物喝酒会干革命？嗯，我想说的是，那本南朝鲜的书……它让我感到……”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去韩国吧。”

永明的手指在他的酒杯边缘僵住了。

我继续说：“没有其他办法。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不能冒险招供。你知道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

他不需要任何劝说。他抓住我的手，似乎这还不够，他把我拉近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是对的，我们要离开。”他说。“无论如何我

们都会死，所以对我们来说无所谓。知道了那么多事情，我在这里甚至无法再呼吸了。在家里或在路上被杀，有什么区别？”

一旦我们确认了我们的决定，就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开始计划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我们同意明天早上照常上班。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确定的那样，永明丢失的包里没有直接的个人身份证明，所以只要我保持清醒，我就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当国家安全部从书中追踪到我时，我会辩称我只是把包放错了地方。无论如何，他们需要一天的时间来组建一个监视小组，而我作为钦定者之一的身份会阻止他们过于仓促地行动。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向北走。出国的唯一途径是越过边境进入中国，因为不可能越过非军事区进入韩国。可以从一个以前在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同学那里得到一张旅行证，他在平壤的一家跨境贸易公司工作。他总是需要钱，而一次体面的贿赂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发现第二天晚上9点有一列火车离开平壤前往边境地区。如果我们要登上这趟火车，那在我们离开的时间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假装一切正常。

计划完这些事情后，我赶紧收拾我的包。由于我下班后要直接去火车站，所以我们决定由永明来拿我的背包。他可以在下午离开工作岗位。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塞进了我的背包。我没有忘记我的秘密诗歌手稿。这是我的声音，我将带着它走出国门。

我说：“晚上7点半在平壤站见。”

永明点了点头，转身要走，但又猛然回头，抓住了我的胳膊。他垂下视线，仿佛不知所措，但随后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话。

“如果我们被抓，我们将自杀。”“自杀”这个词感觉就像一个有形的物体从他温柔的心中传递给我。想到死亡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我感到奇怪的兴奋：我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第五章 告别之罪

当我看到永明在夜里离开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没有睡着。我并不特别害怕即将到来的流放——这将在不到24小时内开始。我最害怕的是我必须要割舍的程度。我感到恶心的是，我的母亲和父亲必须在一个他们唯一的儿子突然消失的世界里度过余生。然而，我无法向他们说再见。

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计划，就不会放我走。他们会先自杀。一旦我离开这个国家，正式成为失踪人口，我知道国家安全部会如何审讯他们。如果他们怀疑我的父母知道我打算逃跑，他们就会被判定为协助叛徒。到目前为止，他们最好保持一无所知，这样他们就可以完全无罪地面对当局。我试着从他们能在一切正常的信念中多活一天的想法中获得一点安慰。

满怀这样的借口，我把脸埋在枕头里，以掩盖我的哭泣。我紧紧地抱着它，以克制自己不向墙壁发火。就在我哭泣并默默乞求父母原谅的时候，天亮了。这是我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早晨。

我听到母亲在餐厅里叫我，说如果我不快点的话，上班就要迟到了。我突然很害怕与我的父母面对面。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我会说什么呢？我怎么能说呢？我父亲对我喊道，早餐要凉了。我看着镜子 ，急忙揉了揉眼睛。看到自己的镜像，我想知道我以前是否在父母面前有过这样的不自然，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模糊了我的视线。如果我像这样出现，眼睛充血，他们会问的。慌乱中，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深色太阳镜。当我走进饭厅时，他们两个人同时向我提问。

“戴太阳镜做什么？”

“我的眼睛有点痛。”我设法编了一个借口，但我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母亲从她的椅子上跳下来，走到我身边。“让我看看。”

我本能地把脸从她那侧转开。“没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想打扮一下。”

“你确定你没有伤害吗？让我看看。”

我握住她的手，恳求道：“是的，我确定。我今天需要给某人留下好印象。”

我父亲粗暴地回应：“但是在早餐桌上穿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你打算一直戴着它们吗？”

我退缩了。他把我逮个正着，如果没有更好的借口，我不能戴着墨镜坐在这里吃早餐。我想和你坐在这里。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餐。

我无法说出这些话。当我想象着我心烦意乱的父母后来后悔他们没有吃东西就送我到未知的地方时，泪水再次涌出。

“没事的，我的眼睛真的很好。别担心。”我边说边笑，尽管我的眼睛是湿的。我赶紧抱住母亲，在她背后擦去泪水。她似乎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感觉她是陌生的，尽管是她养育了我。我的手臂感到异常的长和重，我想离开她，但却做不到。

“你今天怎么了？你的行为很奇怪。”她责备我。

一个母亲仅仅通过看孩子的影子就能看到孩子的心。从我身边退开，她再次尝试看我的眼睛。

我父亲进行了干预。“别管他了，他上班要迟到了。”如果他当时没有说话，我就无法阻止她发现真相。

我迅速穿过客厅，朝房门走去。只有当我到达门槛时，我才偷看了一下身后。我渴望再见到我的父母一次。但客厅是空的，我可以听到他们在厨房里的谈话。我父亲在抱怨我的姐姐们，说她们没和他们保持联系，他想多看看孙子们。他怎么会知道我对他来说是一个比我的姐妹们更糟糕的孩子？

一旦我离开这所房子，我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在房门看到我父母的鞋子。我的胸口感到很紧，仿佛要窒息了。我无法向他们鞠躬告别，而是向他们的鞋子鞠躬告别。

我一出门，在痛苦的啜泣中，眼泪就汹涌而出。我知道劳动党可以夺走我的生命权，但它也夺走了我与家人告别的权利，我不得不欺骗他们到最后。当我想起我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时，我哭了：“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我为什么要阻止她看她儿子的眼睛？我的身体因愤怒的后悔而颤抖着。

当我到达工作地点时，我的同事向我走来。“你的眼睛怎么了？”他们问。我撒谎说我的眼睛感染了，这导致了一次幸运。晨会结束后，朴哲主管敦促我去看医生，说他过去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以治疗眼部感染为借口，我在当天上午11点就可以下班了。

我来到贸易公司，我的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同学在那里担任监控负责人。在朝鲜，所有工作场所都有负责监视的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或雇用朝鲜人到海外出差的公司中，有许多监视人员。我知道我可以去找我的这位朋友，以获得特别的旅行通行证。

在朝鲜，有一种普通旅行证和一种特殊旅行证。它们的区别在于特别旅行证上划有一条红线。黄海省或咸镜南道等省份通常被列为普通地区，因为它们位于内陆。首都平壤和靠近韩国或中国边界的地区被视为

特殊地区。只有当地居民或持有特殊旅行证的人可以合法地踏入这些地区。

前往平壤的特别旅行证上只画了一条红线；进入边境地区的旅行证上有两条红线。在这方面，旅行证与护照不同，后者允许个人离开国家。而旅行证则是一种控制国内旅行的方法。根据标准程序，只有在获得国家安全部的批准后，才能签发特别旅行证。

幸运的是，此时，朝鲜黑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市场化力量已经传到了官方层面。只要你有足够的外汇，什么都可以买到。朝鲜贸易公司的存在理由是与设在中国的公司开展业务，以便为劳动党赚取外汇，它们获得的特别通行证配额比任何其他官方机构都多。在朝鲜，无论你是国家还是个人，为了生存，你必须出售你所拥有的一切。我的老同学一直催促我派人带着外汇去找他，买他分配的空白特别通行证。

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我想要什么。他说，虽然他一般以200美元的价格出售，但他只以100美元的价格卖给我，因为我们是老相识。虽然我的月薪2500韩元（约2美元）比大多数朝鲜人的工资高，但这仍然不足以维持任何人的生计。普通朝鲜人在黑市上谋生，而干部则靠特殊的供给和贿赂过活。一名统战部的干部每月可以通过出售通过统战部发放的国外特别供给来赚取约100美元。

But I was also privileged by family connections. Officially, North Korea operates two separately compartmentalised economies, referred to as the People's Economy and the Second Economy, the latter encompassing the military sphere. My relative headed the Middle East office of Bureau 99 in the Second Economy, overseeing North Korea's arms deals in the region. He was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in North Korea, and was able to offer a minimum of 10 million American dollars in 'loyalty remittances' to Kim Jong-il every year.

但我也因家庭关系而享有特权。官方称，朝鲜有两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被称为人民经济和第二经济，后者包括军事领域。我的亲戚是第二经济中99局中东办公室的负责人，负责监督朝鲜在该地区的武器交易。他是朝鲜最富有的人之一，每年能够向金正日提供至少1000万美元的"忠诚汇款"。

他不可能通过实际销售朝鲜武器来赚钱——以足够他定期给亲戚送礼和展示奔驰汽车。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在1980年代末之前，朝鲜的火箭弹在中东卖得相当好，因为它们很便宜，但各种因素导致在那之后交

易变得更困难。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在乌克兰和中东之间游走，建立了武器交易。从这些成功中，他建立了自己的声誉，成为备受欢迎的武器谈判专家。金正日认可了他的工作，并授予他朝鲜的最高奖章——英雄努力奖，还不仅仅是一次，而是两次。我珍贵的日本制造的新禧玛诺自行车也是他的许多礼物之一。作为金正日的钦定人之一，并且在我的朋友中被称为“钱包里总是至少带着1000美元的人”，我可以买一张空白的特别通行证，而不会引起过分的怀疑。当我递给他一张100美元的纸币时，我的同学唯一的要求是让我换两张50美元的纸币给他，因为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使用100美元的假钞的党内指令适得其反，使假钞充斥了国内经济。现在，即使是个人在私人交易中也尽可能地避免使用。

当我们交易完成后，我匆忙起身准备离开时，他叫住了我：“嘿，你要去哪里？你必须在通行证上写上旅行者的名字。”

“哦，我以后写进去就可以了。”

“你疯了吗？仅仅因为它是空白的，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任何老方法来填写它。你需要一个密码，它才能发挥作用。”

我别无选择，只好把永明的名字和身份也给了他。当我的老同学在特别通行证上写下我们的名字、职业和出生日期时，他向我解释了我的出生日期应如何与本周的密码相结合，以便在边境地区旅行。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密码，我担心我的无知迟早会给我的逃跑带来不可逾越和不可预见的障碍。我把通行证塞进口袋深处，转身离开。“注意不要越境叛逃！”我听到他在我身后喊道，我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他在笑。我轻描淡写地做了个手势，好像是在拒绝他的玩笑，但我的内心被刺痛了。

有了特别旅行证在手，我从这里开始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执行这个计划——叛逃。当我回到101办公所时，我的腿在颤抖。当我从小门进入并通过警卫时，我走得更快了。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朴哲主任从他的办公桌上抬起头。“党委第一书记要见你。快点去。”

一种恐惧的感觉涌上心头。在去党委第一书记办公室之前，我去了洗手间，把特殊的旅行证藏在我的脚和鞋底之间。这是我能做的所有准备。当我爬上楼梯时，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可怕的想法。

我深吸了一口气，敲响了党委会议室的门。声音回荡在走廊的尽头。门开了，秘书看到我时楞了一下。她拿起电话，对着电话说话：“党委第一书记同志，敬民同志来找你。”放下听筒后，她突然变得彬彬有礼，甚至为我开门进入房间。

从门口，我瞥见了排列在金日成和金正日画像下的劳动党旗。红色

的党旗似乎比平时的红色更加鲜艳。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在我注意到党的第一书记之前，我看到三个陌生的人在等我。其中一个人看起来五十出头，穿着深绿色大衣，另外两个人穿着黑色大衣，四十岁左右。当他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我想象着他们每个人都被训练过，可以感知我的真实想法。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被判刑的罪犯。

我借给永明的那本南朝鲜的书，还有他的笔记本，正放在房间里的长桌上。我的心沉到了肚子里。

三个人中最年长的那个人首先发言。他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但他的气势很明显。“我们来自国家安全部。”

听到这个名字——最轻微的暗示都足以让一个哭泣的朝鲜儿童安静下来——尤其从它的一个特工口中说出，就更令人恐惧了。不仅如此，这些人肯定来自该部臭名昭著的第10科，他们专门负责审讯朝鲜的最高级官员。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踏入统战部的场地。

“为什么这本书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在外面被发现？”这个男人问道。

对于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回答说，我一定是在办公室时把它塞进了我的公文包，然后不知不觉地把它带回家。然后我就把公文包放错地方了。

另一个人打断了我。“仔细选择你的话语，同志。我们已经向你的同事核实了，他们中没有人见过你拿着那个公文包。我们检查了指纹，这个包不是你的。我们将在几天内发现它的主人的身份。你是要等到那个时候，还是现在就认罪？”

我说得更有力了。“我将重复我之前说过的话。这个公文包属于我。你发现的指纹一定属于拿走它的那个小偷。”

这三个人轮流快速询问我。我在哪里买的公文包？公文包丢失的那天，我是什么时候下班的？是否有证人？我是什么时候发现公文包被遗失的？我可能把它丢在哪里？我下班回来时谁在家里？如果我把公文包放错了地方，为什么不早点通知当局？我是否试图阅读书中被涂黑的部分？我在公文包里还放了什么东西？

我虚弱地回答说，就只有这本书。看到我磕磕巴巴的样子，其中一个人问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我在落入陷阱之前抓住了自己。

“你想知道我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了什么？”

当他的同事回应时，我注意到他是如何略微强调他指的是我的笔记本，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永明的笔记本上有永明的笔迹，而不是我的。如果我声称笔记本是我的，以加强证明公文包是我的，他们就会因

为我的笔迹和永明的笔迹之间的对比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矛盾疑点，这个案子就坐实了。

我做出回想的表情，那些人仔细观察我的脸，寻找不自觉的眨眼或肌肉运动。但我还是自信地回答。

“我不记得里面写了什么。”我说。“这个笔记本不是我的。我在街上捡到的，放在我的公文包里，因为我不想让纸张浪费掉。”

最年长的那个人用笔敲了敲桌子，讽刺地说：“所以公文包是你的，但公文包里的笔记本不属于你。好吧，我们在这里似乎遇到一个问题。但公文包上的指纹会暴露一切。在明天确认结果之前，我将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坦白。你在这些场所之外拿了一份受限制的出版物，这本身就是一种背叛的罪行。但如果你告诉我们你把书借给了谁，还有谁可能接触到它，你可能会被轻易放过。在明天早上之前向党的第一书记同志坦白。明白了吗？”

在这些人离开房间后，党的第一书记向我恳求，好像他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些人不能逮捕你，同志，尽管他们很想。为什么？因为你是钦定者之一。所以你必须更诚实……比其他人更诚实……对安全部。如果你想起什么，任何事情，今晚给我打电话。或者在你明天上班就首先见到我。好吗？”

三个有资格下令当场处决的人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就离开了，因为我是金正日的一名钦定者。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可能会被逮捕并被拖到国安部的驻地，仅仅只是为了吓唬我，让我招供。我的身份给了我豁免权，尽管是暂时的。即使是臭名昭著的该部第10科也需要向党的总指挥部提出正式请求，然后转交给金正日，由他亲自批准，然后他们才能逮捕被钦定者。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确凿的证据，因为任何不确凿的证据都会导致他们自己被指控为叛国罪 ，因为他们试图通过伤害金正日的伙伴来攻击他。虽然我承认我目前的安全归功于敬爱的领袖，但我知道我不能在平壤多呆一天。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我开始数着秒数，等待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结束。每当我听到外面的汽车声，我的血液就会变冷，因为我想到该部的人带着逮捕令回来逮捕我。

晚上七点，该走了。我通常在下班回家时向大门口的警卫道别，但那天，这句话没有说出来。警卫大喊一声，举起枪，为我立正。扳动步枪的声音仿佛刮到了我的骨髓，我本能地瞪了他一眼。这时，我注意到屋外有两个人迅速转向我。

当我沿着统战部大院高墙边的人行道行走时，我非常清楚自己正被

后面两个人盯着。当我穿过马路时，我假装往两边看，并通过肩膀瞥了一眼。他们稍稍后退了一点，我现在确定他们在跟踪我。

我看到前面有一辆外国人的出租车。它们应该是朝鲜人的禁区，但任何有外币的人都可以使用它们。我检查了一下，附近没有其他出租车。没有——我就上了车。

“平壤酒店。请快一点，我迟到了。”我边说边关上了车门。

当出租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右转时，我转身看到那两个人无助地站在人行道上。我感到非常欣慰。不超过5分钟，就到达了大同江边的平壤饭店。我付了司机钱，进入酒店。在酒店里，有一家名为平壤宝阁的餐厅，你可以通过它进出酒店。我对这个地区很熟悉，通过餐厅离开了酒店。马路对面矗立着一座传统朝鲜风格的建筑，其陶瓦屋顶的形状类似于鹤的翅膀，这就是平壤大剧院。在它的后巷，我叫到另一辆出租车，终于朝平壤站驶去。

我比约定的时间晚了10分钟到达车站——从头顶的时钟可以看出。在车站公园边缘的一个灯柱下，在这个城市微弱的电力供应的昏暗光芒下，几乎看不到永明站在那里等待。他背着我的背包，那是我前一天晚上托付给他的。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他。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方是如何努力掩饰自己的绝望情绪的，于是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我先在他耳边说：“我们走吧。”

永明举起紧握的拳头，回答说：“我们走吧。”

这是我们准备离开我们的家、生活和家庭时的最后一句话。在离开的必要性中，我们两人的生命融为一体。

第六章 步枪瞄准之下

永明和我于2004年1月15日抵达边境小镇茂山（Musan）。我们已经走了465公里的路程。乘坐特快列车的旅程，按照时间表应该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却多花了四天时间。尽管延时了，但长途列车到达目的地就是奇迹，车上的每个人都发出了赞叹。有人用特有的北方口音喊道，上个月，同样的行程被推迟了十多天。永明和我对视了一眼，笑了笑。

他们说，一月份，在咸镜省北部，你小便时，冰柱会掉到地上。当我们这些来自平壤的城市男孩走下火车时，突然暴露在北方残酷的寒冷中，让我们感到震惊。永明的耳朵被冻得通红。与平壤的大型有盖车站不同，茂山站是一座离铁轨约30米远的小楼。我们周围的栅栏是为了防止没有旅行证的人离开车站，它比车站建筑更令人印象深刻。警卫吹响了哨子，把乘客们赶到一个亭子里，让我们出示火车票和旅行证。永明和我保持沉默，试图显得不显眼，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旅行的真正动机对任何仔细观察我们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一边走一边只用眼睛交流，当我们离警卫越来越近时，我们甚至停止了交流。

凭着我们的中央党证赋予我们的权力，我们站在最短的干部队列后面，那里只有三个人在我们前面等待。其他排队的军人和普通居民的队伍则远远落后。然而，警卫似乎对审查干部的通行证更加谨慎，也许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排队。在警卫对一名干部进行冗长询问的时间里，普通居民队伍中的四个人的证件被没收，甚至没有得到解释的机会。其中一个人甚至在被安全人员带走的时候，还挣扎着要回来拿他的行李。一名警卫对他喊叫和咒骂，当这个人仍然没有停止挣扎时，开始用军靴踢他。如果我的通行证被宣布无效，我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最后，轮到我们了。我从我的皮公文包里拿出我的身份证明文件，确保上面印有金色的劳动党徽章清晰可见。看到这一点，那个头发花白的警卫紧张起来，向我敬礼。我当时还不到30岁。

“请给我看看你的旅行证。”他温顺地说道。

特别旅行证已经让我们通过了几个检查站。在朝鲜，每次火车穿越省界或城市边界时，都有两种警卫检查乘客的旅行证和身份证件；这对平民和军人乘客都适用。尽管我已经轻松通过了这些关卡，但这最后一个检查站是现在唯一重要的一个。当警卫一边看我的文件一边向我瞥来时，我退缩了。即使我的通行证看起来是真的，我也担心我的罪恶感会显现出来。当他把我们的文件交还给我们时，没有一句话，永明和我尽可能平静地走出茂山站。

我们选择从茂山过境，因为图们江——构成分隔朝鲜和中国边界的一部分——在那里最窄。过江的宽度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爬上更高的山，那里可能会有更小的溪流汇入江河，减少我们越境的难度。但是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带我们走那么远。我们能够找到一列直达茂山的火车，因为那里是大型采矿业的所在地，而这是我们能够到达的最接近边境的地方。

当干部旷工三天时，就会被登记为失踪，如果是逃亡，就会发出搜查令。即使你生病了，也必须向有关部门通报你的行踪，会派人核实你是否在你所说的地方。这将是我们离开工作岗位的第四天，比我们计划的时间要长，因为我们的火车延时到达。平壤现在肯定已经发出了搜查令。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而我们已经输了。

我们一离开车站，就向图们江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迷了路，不得不向当地人问路。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我们的计划是到达河岸，然后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过河。我们把自己藏在树林里，然后等待道路通畅，在冰冻的河面上冲刺。

当我们接近图们江时，我感到一阵振奋。这条河是冰冻的，宽度不可能超过60米。过境完全没有问题!但当我意识到周围没有一丝植被时，我惊慌失措。我们该躲到哪里去呢？正如我在地图上看到的那样，我们周围都是丘陵。但即使是树木的残骸也被剥去了树皮，我推测是被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剥去的。即使是树枝也被收集起来作为燃料，而山丘则是裸露的。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着河岸，在一条未铺设的小路上继续前进，除了我们的证件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供保护。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可能会出现一片森林来掩护我们逃跑——我们纯粹是出于绝望才这么认为的——我们走了几英里。我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瞭望塔，这些瞭望塔在河岸边光秃秃的地势上相隔一公里远。

有时我们看到士兵的头盔在里面晃来晃去。在没有穿迷彩服的人走动的地方，固定在地上的牌子就像被遗弃的步枪一样，上面写着：禁止进入!边境地区!或者：站住!我们将向你开枪!凡是河道宽度较窄的地方，都有一个挂着红旗的驻军和一个检查站。任何希望通过的车辆或个人都必须接受询问，了解他们旅行的原因，搜查他们的行李，检查他们的口袋。但我们一出示证件，卫兵们就停止了雷鸣般的命令，向我们敬礼。有些人甚至压低了声音，恳求一支烟。

在路上，除了边境巡逻队，我们还遇到了几个民兵卫兵，他们没有穿军装，也没有佩戴军衔的徽章，而是穿着迷彩服。每当我们被拦住，

我们就把证件丢到他们脸上；如果我们认为对抗可能升级，我们也会提供香烟。

到日落时分，我们已经沿着边界走了将近30公里。晚上10点左右，当天完全黑下来，我们无法再看到前方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越江。永明和我向结冰的河流靠近。

“举起手来！”

一个士兵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响起。永明用力抓着我的胳膊，他让我跳了起来。我考虑给冲向我们的士兵一拳，把拳头握在身边，准备动手。但他吹了一声口哨；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无数的灯光亮起，它们的光束向我们汇聚。

我们没有机会解释，就被带到了6号岗亭，后面一路被冰冷的枪管戳着。当我们进入这座小楼时，我看到一间牢房的门开着。手铐挂在门栏上。

一名士兵对我们说。“这里是边境地区。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这里 ？给我看看你们的身份证件和旅行证。”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势示意，沉重的门砰地一声关上，把我们困在楼里。永明明显地颤抖起来，暗示我们在叛逃的时候被抓住了。

“我的朋友感到很冷。让我们先取暖吧。”我说，努力保持镇定。

当我把手伸进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拿我们的身份证明时，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跳。当我的手拂过我的上衣口袋时，我的手在颤抖，那里有叛国的罪证。我身上带着我秘密写的诗，早些时候我把它们从背包里拿出来。

当中尉伸手接过我的身份证件，看到它们并不属于一个普通公民时，他身体一僵，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虽然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但他似乎从未见过显示中央党员干部金质徽章的身份证件，也没见过印有秘密的统战部权力的蓝色印章。

“你为什么来边境地区？”中尉又问。也许我的年轻与徽章的严肃性显得不协调，他上下打量着我。他的眼睛似乎在问：“你的另一个口袋里有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们是党委派来的。我们的任务是去茂山人民军总部取回一些文件。但是晚上变冷了。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过夜的岗哨。”

“不对！我看到他们试图踏上冰面！”其中一名士兵打断了他的话。

我深谙党的等级阶梯，本能地采取了被下属挑衅的干部的姿态。“你个混蛋!你怎么敢用枪指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想揍你那无礼的

脸……”

我还没说完，中尉就插话了：“把电话打到茂山人民军总部，看看他们是否在等两个来自平壤的访客。”

我觉得很晕。一直在炉子旁暖手的永明向我投来绝望的目光。一个士兵拿起听筒，拨通了电话。他等了一下，然后把电话放回了机座上。“中尉同志，线路上的电力中断了。我无法接通。”

听到这些话，我顽强的求生意志又被点燃了。我对中尉说。“别再胡闹了。你可以让他明天早上再试试。给我们一些被褥，现在就做！快一点！”

我很绝望，也很虚张声势，但这似乎很有效。乞求他们放我们走就等于承认有罪，所以我反而要求他们让我们过夜。中尉摇摇头，再次低头看了看我的文件。他甚至给了我一把椅子。

当我坐下时，沉重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群士兵趿拉着鞋走了进来。他们是从巡逻队回来的。他们聚集在中尉身边，交替着看我、看永明和看身份证明文件。

巡逻队的一名少尉走过来问我：“你认识徐正焕（Seo Jung-hwan）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通过测试。但永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金泽市（Kimchaek）的徐正焕？那个父亲是金泽市党委书记的男孩？”

少尉明显变得很兴奋。“对，就是他!中尉同志，他认识我的老同学正焕！”

我仍然坐在那里发呆。中尉的脸上显示出一种轻蔑的表情，他看着少尉和永明，他们已经开始像老朋友一样喋喋不休了。我再次鼓起勇气，喊道：“嘿！你真的认识正焕？”

“是的，长官!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多么奇妙啊!一个亲爱的朋友的老朋友，而且离家这么远。我们一直在寻找过夜的地方。你能让我们住下吗？”在任何人提出抗议之前，我拿出了一瓶昂贵的西方白兰地和六包万宝路香烟。对朝鲜士兵来说，没有什么比酒和香烟更珍贵的了。虽然现金可以很好地作为贿赂，但香烟是更有声望的商品，特别是如果是外国品牌的香烟。除了个人物品，我在背包里装了三盒万宝路香烟和两瓶白兰地，就是为了准备这种场合。当那个中尉看到这些酒和香烟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即使是士兵最基本的供给也是断断续续的，况且外国商品还散发着醉人的光环：存在于边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信物。其中一名士兵感叹

道，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有机会尝试西方的酒，而这位中尉开始将香烟分发给他的部下，就好像是他自己的礼物一样。

晚上，我们得到了扎人的军用毯子，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士兵们的鼾声，以及每隔一小时的巡逻队变化。当每一组士兵出发时，他们接过上一班的武器，用备用子弹和手榴弹武装自己。金属声仿佛叫嚣着：叛徒去死吧！我轻轻地捅了捅永明，看到他也睡不着。我们躺在寒冷的环境中，时间悄然流逝。

第二天早上，我们带着少尉写给徐正焕的信离开了哨所。一群士兵和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尴尬地回敬了一下。我们一离开他们的视线，就互相击掌，兴奋地讲述前一天晚上的时刻，尽管声音很低。但我们的脚步很快变得沉重。边境地区比我们在平壤想象的宁静的乡村要严格控制和紧张得多。

永明首先发言。“我们应该回家吗？”

我们面对面，瘫坐在沿图们江延伸的一段废弃的铁轨上。

“现在已经太晚了。”我推断道。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天的工作，他们可能已经对我们发出了搜查令。你知道党的。我们不能回去了。”

“那我们怎么过去呢？”

仿佛他想让我代表我们承认失败一样。我疲惫地看着我们周围的环境。在一片寂静中，我们似乎是地球上唯一剩下的人。山丘和河流都是白色的，被雪覆盖。在很远的地方，一个哨子吹了三声——也许是另一次逮捕。就在河那边，在边界的另一边，我们可以听到牛的低鸣声。天空似乎非常蓝，一只鸟在那无边界的空间里飞翔。我们可以看到河那边，但我们无力渡河。

永明再次开口。“我们从平壤一路来到这里。在这条河的对面——就在那里——就是中国。它就在我们面前。可我们到底该怎么过去？”

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和中国之间没有什么距离，边界的每一边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的土地被雪覆盖，他们的土地也是如此；只是他们的山被像棉花球一样的树木覆盖，而我们的山是纯粹的，光秃秃的。在夏天，我们的山头是地狱般的红色，而他们的山头则是绿色的树叶。对我来说，这证实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渡河。

“让我们过去吧，就现在！”我对自己的话感到惊讶。直到这一刻之前，我还一直专注于在夜色的掩护下行动。“现在是时候了——士兵们在晚上保持警惕，但现在，天色已亮，我们可以在他们看到我们之前先看到他们。我们过河吧！”

就像我们计划好的那样，我在朝鲜一侧扫视了一圈，永明检查了中

国一侧。“周围没有人。”他说。“我们应该站起来吗？”

“现在？”

“是的！现在！”

虽然我们说得很自信，但我们都没有站起来。更让我们害怕的是，我们都没有勇气去行动。我们深呼吸，当我们羞辱性的心灵弱点被暴露出来时，这也是一种宣泄。沉默为我们的决心充电，我们伸手去握住对方的手，感受我们身体的温度。我们一起走到了这个江边悬崖的边缘，决定一起跳下去。

我们齐声数着。

“一……”

“二……”

“三……”

我们一跃而起，开始在冰封的图们江上冲刺。我的心每走一步都怦怦直跳，冰面在我们脚下发出轰鸣声。超过十米，二十米？有人开始大喊。

“嘿！抓住那些混蛋！”

我转过身去看向声音的方向。一群士兵站在那里，拿着步枪瞄准。我看到了枪管，听到了步枪的枪栓声。我的头盖骨疼痛难忍，我知道子弹会射入那里。我尖叫着，但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第二部：逃亡者

第一章 “延边看世界，世界看延边！”

“不要回头看，眼睛盯着前方。”我们在冰面上疾驰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喘着气。

我们脚下结冰的河面终于变成了陆地。我们踏入了中国，犯下了不可挽回的叛国之罪。在朝鲜这边，一名士兵喊道：“开枪!开枪!”

那喊声听起来好像是从很近的地方传来的。我没有听到枪声，但想象着一颗子弹擦身而过，落在了前面的一棵树上。我不能回头，因为没有回头路了。

我们咬紧牙关，继续往前走，朝着前面那座无名的山走去。虽然我的腿在动，但山似乎越来越远了。几乎每走一步，我都像果冻一样倒在地上。雪深及脚踝，我的四肢无力，无法支撑身体。当我们中的一个跌倒时，另一个把他拉了上来。恐惧推动着我们前进；恐惧使我们不敢回头看身后的人或物。

“再远一点，我们快到了。”我喘着气说。奇怪的是，我发现一股愤怒从内心涌起，淹没了一直笼罩着我的恐惧。难道这条狭窄的结冰的江河就是我们被定罪的全部原因吗?然而，我们还没有获得自由。恐怖不仅在于我们身后的枪。士兵也可能出现在前面的某个地方。

我对永明说，“看看周围有没有巡逻的；你看右边，我看左边。”

雪，田野，山。这片土地上没有士兵。听到彼此的声音说着同样的话——“这边没人”，我们松了一口气。就连朝鲜士兵的呼喊声也渐渐沉寂下来。但这将我们暴露在中国巨大空虚的可怕真空中，等待着将我们整个吞噬。中国士兵可能正在等待他们逼近的猎物，躲在我们看不见的未来。

但当我们继续向山的方向前进时，我们没有看到枪，也没有听到士兵的哨声。当我们接近山脚时，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生物。与山脚面对面，就像来到神的怀抱中寻求庇护。乡村被树木覆盖，不像朝鲜的荒山。这些树会欢迎我们，也会隐藏我们。就在几分钟前，我们看着这个地方，好像它是一个遥远的星球，但现在我们站在另一个世界里。直到这时，我们才缓过气来，回头望向朝鲜。没有士兵跟踪我们。

我们被狂喜抓住了。我们站在那里，像傻瓜一样呆呆地看着对方，眼泪顺着永明的脸颊流下来。当他用手背擦我的脸时，我意识到我也哭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这种时候哭泣是一个真正男人的标志。我没有大声说出来，而是握拳打在永明的胸口。他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又打了两三拳之后，我们大笑起来。我们经历了一个奇迹，我们为自己的

勇气感到骄傲。我摆出姿势，假想着用步枪瞄准永明。他张开双臂，挺起胸膛，挑衅我开枪。我们又笑了起来，捂着肚子，惊讶于我们怎么能沉迷于这样的游戏。

永明在地上捡到一块鹅卵石，朝朝鲜方向扔去。我感觉到那消失的斑点驱散了我胃里的愤怒，驱散了它。我们不仅摆脱了政权的控制，而且像永明扔出去的石子一样把它扔了出去。然而，边境上的寂静令人压抑，当我注意到只有我们的声音能被听到时，我畏缩了。但永明似乎从我们在这片深林中的隔离中获得了安全感，因为他再次张开双臂，向后倒在雪地上。

“我们在这儿休息几天吧，”他说。“如果我冻死在这座山上，那也没那么糟。”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一只鸟不知从哪儿飞过来，大声扇动着翅膀，低低地从我们头顶飞过。这感觉就像一个预兆，一个警告，其他生物就在附近。永明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发出鼾声，自己咯咯地笑。我想和他一起在雪地里打滚，但没有心情，我紧张地摆弄我的背包。我们经历了重重困难才来到这里，而就在几分钟前，我们还与死神擦肩而过。我能想到的最悲惨的事莫过于在设法越过边境后被抓住。

我说，“我们没时间了，朝鲜将向中国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待在这里，他们会找到我们的。我们再往前走一点，找个镇子。”

“怎么做到呢？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永明回答。

我不再摆弄我的背包了。正如永明所说，在这片陌生的天空下，我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也许我们应该沿着图们江向南走。

向森林和山丘深处望去，我发现远处有一个小村庄。我甚至能辨认出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如果她看到我们怎么办?她会报警吗?红色让我不寒而栗。尽管如此，我还是别无选择，只能向村子走去。

“我要去村子里看看。你待在这里。遇到麻烦我就喊。”我说。

我还处在信心满满的状态中——因之前自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逃离朝鲜边防警卫。我的话把永明从恍惚中唤醒，他抓住了我的胳膊。

“你到底上哪儿去?你怎么知道那里不会有巡逻队?”

我回答说，“你听说过吧，中国有很多韩国游客。我可以假装我是迷路的韩国游客。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永明不同意，决定呆在原地，但我还是朝村子走去。我走得很快，没有四处看太多，因为我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当我走近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时，我看到她似乎有四十多岁。她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那种会对陌生人保持警惕的妇女。

我走近她。“我是一名韩国游客。我能向你问路吗?”

她二话没说，匆匆走到我前面，指着一所房子。她不会说韩语，但我猜想她指的一定是朝鲜族的房子。

许多朝鲜族居住在中国东北三省，靠近中朝边境。20世纪初，在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期间，朝鲜定居者大量北上。满洲地区的朝鲜族人口从1870年的70万迅速增加到日本殖民统治结束时的170万。虽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占领也已经结束，但混乱在五年内以朝鲜战争的形式重新回到朝鲜地区。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朝鲜人被承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并被允许定居在中国东北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到2000年为止，在中国居住的朝鲜族有200多万名。也许是因为将他们与南方同胞分隔开的只是一条政治边界，我被带到的那所朝鲜族人的房子看起来与我家乡的乡村小屋没有太大区别。它不像周围的许多建筑那样有波纹铁皮或水泥屋顶。这些小屋在朝鲜被称为“土屋”，因为它们的形状表明它们是用泥土建造的。

小屋很破旧。泥墙的一个角落摇摇欲坠，显然没有人照看。也许它与朝鲜乡村小屋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更大的建筑。我走近大门，当我想往里面看时，一只白狗探出头来，开始吠叫。我跳了起来，感到冷汗从背上流下来。我担心永明会认为我有麻烦了。

“谁在那?”一名中年男子从内院左边的马厩里用朝鲜语喊道。他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又大又圆，黑得像铁锅的盖子。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仿皮夹克，但是他的裤子看起来很滑稽。也许他是从他妻子那里借来的那条点缀着粉红色小花的黄色裤子?他没穿鞋。我知道骗一个当地人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伸手去拿现金。我从口袋里拿出七张百元大钞给他看。

“我们刚刚渡过那条江。你能带我们去城里吗?我给你钱。”

那个男人像向前摔倒一样冲向我，用牛的力量把我拉进院子。我问我们是否离城市很远，但他没有理我。这里有一股浓浓的粪肥味。当我们走进房子时，高温让我脸红了。和朝鲜一样，那里也有供暖系统，厨房里的火将热量在地板下循环。当我脱下鞋子跟着他进去的时候，脚下的地板非常热。墙上有壁纸，有几张中国报纸粘在一起，我甚至在这幅拼贴画中看到了毛泽东的画像。如果有人在朝鲜做了这样的事，不小心回收了金日成或金正日的肖像，他就会被送到集中营。当我有时间反思我所看到的情况时，我想知道中国能够改革并变得更加开放，而朝鲜却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否在于，尽管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版本的最高领导人，甚至在某些方面与我们有着相似的领袖崇拜历史，但在中国，对一

个人的崇拜已经不再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和运作方式。

但这些想法是后来产生的。我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男人身上，他正在衣柜里找东西，衣柜里似乎有金属牛蹄铁做把手。有一张矮桌子，上面放着一顿没吃完的饭，地板上有一把干草叉，上面沾满了泥土。我意识到他为什么不穿鞋就走到院子里。

“给，我找到了，”他说。他拿出一件与自己相似的人造黑色皮夹克和一些深棕色的裤子，向我猛推。

他用咸镜北道口音说：“快穿上。”这种口音的特点是在最后音节上有重音。咸镜道位于朝鲜的最北部，也许该地区地理和历史的相近导致了这种共同的口音。

“我的衣服是日本制造的，”我回答，“我本来打算冒充游客……”我特别穿日本制造的衣服，因为我不想穿那种可能在中国很另类、会暴露我作为朝鲜人的身份的衣服。我那件昂贵的外套里塞满了羽绒，在寒冷的天气里很保暖。

他摇了摇头，“不，你必须穿得像当地人。如果你很另类，他们会在检查站注意到的。别抱怨，小伙子。照我说的做。啊，是的，还有那笔钱，是给我700美元吗？”

我一声不吭地递给他七张100美元的钞票，希望他能信任我。他匆匆数了数钞票。他的指甲上也沾满了泥。

我说：“我有一个朋友。”

在重新数钱前，这位农民抬起头来，眼睛睁得像刚在冰上滑倒的牛一样大。“什么，几个人？”

“一个”，我回答。

“好吧，你站在那里干什么？”他问到，“把他带到这里来。”

当我带着永明回来的时候，农夫已经换上了旅行服。他解释说，公共汽车十分钟后到达村庄。他不耐烦地帮我们换上新衣服。永明愤怒地看着他。我穿的那件黑色仿皮夹克还不错，但永明不得不穿一件橙色的，背面有显著的中文字样。我把旧衣服塞进帆布背包，把诗歌手稿塞进外套口袋。

我们离开房子，沿着未铺路面的路走了五分钟。这位农民现在穿的是深色裤子，而不是上面开着粉色花朵的黄色裤子，看起来比以前聪明多了。他介绍自己叫常勇。他看起来比我们更紧张，眼睛里带着怀疑，不停地环顾四周。他轻声说，“上车时一句话也不要说。在去延吉的路上有一个检查站。有时他们检查，有时他们不检查。如果有人试图进行对话，就假装你是聋子。如果边防警卫上车，我将代表你发言。记住，小

伙子们：一句话也不要说！你会没事的。这里有些朝鲜人不会说中文。如果你身上还有现金，就给我。如果你被抓到，我可以贿赂警察。你还有多少？”

我假装没有听到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准备好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在我们等公交车的时候，我对离边境这么近的一个村庄感到惊讶，听到一辆路过的卡车的噪音，我紧张地退缩了。在朝鲜一侧，除了路上的一两辆军用卡车外，最常见的景象是马车。

正如农民常勇所承诺的那样，公共汽车很快就到了。永明和我惊讶地面面相觑。这一点也不像我们在茂山延迟的火车非常晚到达时，乘客们欢呼着迎接我们时彼此傻笑的样子。在朝鲜首都，公交车从不准点，但在这里，即使是在中国边境的一个农村村庄，公交车似乎也是准点的。我们在常勇后面找到了空座位，就坐了下来。当车门嘎然一声关上时，感觉就像被关在牢房里，我真希望我们没有上车。但看到我们周围的中国人在吵吵嚷嚷地交谈，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放松了一些，似乎我们被欢迎进入了他们的世界。虽然这些人是中国的乡下人，但他们似乎在富裕中无忧无虑。男人们看起来吃得很好，女人们就像朝鲜党员干部的妻子一样丰满。有些人甚至戴着黄金首饰。生活在朝鲜农村的人不能以这种方式炫耀个人财富，因为他们会立即成为小偷的目标。即使从这些中国农村人穿的色彩鲜艳的衣服上，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经济的信心。

当我们向窗外望去时，看到图们江和对岸的朝鲜土地，感觉很诡异。如果我们当时犹豫了一下，而不是在冰面上疾驰，我们可能还在绝望地站在那里。当朝鲜人民凝视着我们光秃秃的山峦时，中国人或许对他们怀有怜悯之情。即使是我们两个刚从那个国家穿越过来的人，也对远处裸露的景色感到难堪。虽然我一句中文都不懂，但在我的耳朵里，我们的同车乘客似乎在咒骂朝鲜政权把自己的国家剥得一无所有。

汽车出发大约半小时后，常勇转向我们，眨了眨眼。我一直在做白日梦，当公共汽车突然停下来时，我被前面的景象吓了一跳。路上有一个画着伪装图案的障碍物，有武装士兵站岗。他们穿着长及膝盖的草色军大衣，与朝鲜士兵穿的深黄色制服形成鲜明对比。其中一人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让公共汽车停下来。

我确信他们是被派来逮捕我们的。当我在六号哨所时，我对我的诗歌手稿感到非常敏感。即使坐着，我的腿也无法控制地颤抖。常勇静止的轮廓似乎表明了他的冷漠，我责备自己如此轻易地相信一个陌生人。

我环顾四周，想看看如果士兵向我们走过来，我们怎样才能从公共汽车里逃出来。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靠在永明的肩膀上，假装睡着了。当我稍微睁开眼睛去看永明时，我看到他的眼睑在颤抖，尽管它们也闭着。为了让他放心，我发出了微弱的鼾声，小心翼翼地不引起他不必要的注意。

我听到公共汽车的门打开了。在沉重的军靴声中，我能感觉到士兵们步枪的重量。其中一人说话了，他用中文宣布的声音盖过了车上的闲聊声。我畏缩了一下，担心他说的可能是我们。

我听到皮靴的脚步声和乘客们的嘀咕声。如果我现在睁开眼睛，我会看到什么?那个士兵在监视我们吗?我坐在那里，感觉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闭上了眼睛。靴子从我们身边走开了，我听到公共汽车的门又关上了。我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事，但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了。当我终于敢睁开眼睛时，我看到公共汽车真的又在动了。

我回头一看，看到三个士兵的背影，他们正在向驶来的卡车司机示意。我摇了摇永明，他的眼睛仍然闭着。他开始笑了起来，仍然闭着眼睛，随着公共汽车的摇摆而笑。

常勇很快从座位上站起来，咧嘴笑着转向我们。他很快地小声说："干得好，小伙子们!保持下去。士兵们不会费心彻底检查每辆车。有时他们上了公共汽车，只是环顾一下。他们是来寻找朝鲜难民的。他们很容易被发现，因为他们营养不良，皮肤薄，在艰苦的生活后看起来很脏。但是你的皮肤和我们的一样，所以你不会很显眼。"

我看着常勇的皮肤。天很黑，能清楚地看出他是个整天在太阳下劳作的农民。

他接着说，"像你们这样的平壤人显然不同。还有一个检查点。再做一遍同样的事情。"

我们一直很高兴地听着他的解释，直到他提到前面还有一个检查站。一次是幸运的，但我们怎么能仅仅基于我们干净的皮肤就再冒一次生命危险?我试图离开座位，但常勇抓住我的膝盖，阻止了我。

他说，"如果你走了，他们会更加怀疑你。许多朝鲜人没有钱坐公共汽车，所以他们走山路，在那里被边境警卫抓住。今天路上车辆很多，我相信他们不会彻底检查的。我告诉你，别紧张。"

当地农民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在第二个检查站，我们的公共汽车甚至没有被拦下就通过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汗流浃背。我的紧张心情和我们刚过江时一样。

当我们的车驶入更宽的街道时，常勇过来坐在我们对面，告诉我们

现在安全了。我的恐慌终于开始平息下来。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周围高耸的山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田野。到处都有私人住宅。有行人，骑摩托车的人更多，最后，我们看到了写着TAXI的红色汽车。

永明指着一个巨大的标志，它矗立在道路上方，像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上面写着：“延边看世界，世界看延边!”上面写着大大的红色韩文。在异国他乡发现我们的作品已经够令人惊讶的了，更让我惊讶的是，即使是中国的一个省级边境城镇也想向世界开放。在朝鲜，我们的口号是“让我们安装蚊帐，把资本主义的风挡在外面!”或者“我们装上栅栏窗吧!”中国的开放深深打动了我。我的确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逃离一个故意把我们孤立起来的体制。离开了边境巡逻，我们就会躲在13亿中国人中间。我无法大声说出我的兴奋之情，但我的心却因兴奋而响。

第二章 构陷谋杀罪

“嘿!请在这里等我们!”常勇对司机喊道，公交车噼里啪啦地停了下来。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虽然道路变宽了，但我们仍然在乡下，似乎我们只是被扔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现在，如果你沿着这条路走，你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到达延吉市中心。没有检查点了。我想我的工作完成了。保重，小伙子们，祝你们好运。”常勇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我无法回应他的握手。天很快就黑了，我们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我们将何去何从?我冷得发抖。我回答说：“我真的很抱歉，但你能和我们多待一会儿吗?”你能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吗，并给我们一些如何远离当局的建议吗?”

常勇似乎很惊讶。“什么?你在延吉没有认识的人吗?但你告诉过我你必须过来!你是说你没计划就过江了?”

永明走上前去说：“我们这里确实有亲戚，但我们不知道怎么联系他们。”

常勇不知所措，但他还是决定可怜可怜我们。他打开手机，开始拨号。“是我，”他说，“我想我今晚回不了家了。是的，我当然拿到报酬了。我们在你妈妈家附近，我本来也要去看看的。你能不能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还有两个人要来?就这一晚。”

和妻子打完电话后，常勇向我们解释说，他的牛今天还没有喂食。今晚，我们可以住在他岳母家，但他明天一早就得离开我们去照顾那些动物。就在这时，一场暴风雪降临了，我们走着走着，大雪向我们袭来。常勇把他的短脖子缩进夹克领子里，开始抱怨起来。他说其他人可能会让我们听天由命，我们很幸运能遇到像他这样一个单纯的农民。当一辆出租车轰鸣着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用中文破口大骂。那声音似乎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你岳母家离这儿有多远?”永明问。

“十五分钟。”常勇回答。

说完这句话，他步履蹒跚地走在前面，好像在说，我们跟不跟他，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他蜷缩着抵御寒风，但在他身后，我们抑制不住兴奋：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既没有朝鲜士兵巡逻，也没有部里的秘密警察巡逻。似乎是为了反映这种差异，暴风雪突然停止了，出现了日落，这似乎是非常陌生和奇异的。我们不再以忠于领袖和党的生活来度过一天；相反，日落预示着新的一天，它的潜力我无法想象，就像童年经历的那样。大理石纹的天空因为这些想法而显得庄严。永明似乎也陶醉于

我们的新环境。当我们爬上小山丘，来到常勇岳母住的地方时，景色更美了。在我们面前，有数百座村庄的房屋，都很相似，但各不相同。在北方，冬天是漫长的，狭窄的烟囱突出地矗立在每个房屋的上方，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就像一支军队在迎风招展，迎风招展，迎风招展。

常勇说他不能空手去看岳母；尤其是他带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在一家临街的商店前停了下来，那里的屋檐下挂着肉。这违背了我们在朝鲜生活中所知道的所有逻辑——在那里，店主会站在他的商品周围，任何像肉这样珍贵的东西都被放在里面，以免潜在的小偷。我们买了两磅牛肉，走了一小段路就到了常勇岳母家，夜幕降临了。

常勇曾警告过我们，虽然他有几块地和几头牛，但他的岳母很穷。然而，当我们跨进她家的门槛时，这里比平壤一个中层干部的公寓要好得多。在家里，冰箱、彩电和沙发就是这个阶层富裕的标志。但在这里，除了这些东西，甚至衣柜和抽屉似乎也是高质量的物品。婆婆用和常勇一样的咸镜北道口音，焦急地问我们过河时是否受伤了。她对我们的关心比温暖房间的暖气更令人振奋。

我环顾四周，说着她的家多么宽敞漂亮，这时我的声音颤抖了，因为我注意到挂在窗帘旁的日历：上面有一张很大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只穿着比基尼的西方模特。在朝鲜，无论你的家多么私密，这样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是一个私密的家，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你当然会挂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肖像。确实有一些展示著名女演员的日历，但她们是通过自己的艺术来表达对党的忠诚：这些日历不应该是关于女性的名气、美貌或她们所宣传的某些产品。如果任何一个朝鲜人在家里的墙上挂了这样的日历，并且被发现了，这个人无疑会被认定为崇拜物质主义，并受到相应的惩罚。永明和我都觉得日历太令人震惊了，无法忍受，于是转身背对着它坐了下来，因为在我们受到庇护的朝鲜人眼里，它就像公开展示的色情作品。

蒸汽从厨房里奇妙地旋转着，常勇的岳母正在准备牛肉和切碎的蔬菜，我吸入了一股奇怪而强烈的气味，那只能是中国香料。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听常勇解释说，有10万多名朝鲜难民躲在中国。他告诉我们，中国当局积极寻找他们，试图减少他们的数量。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说难民被扣押，并被移交给朝鲜秘密警察。

“我们过江时士兵们为什么不开枪?”我大声问道。常勇暗示朝鲜士兵没有得到向中国开火的许可。他咧嘴一笑，拍拍我们俩的背，称赞我们跑得这么好。他补充说，虽然他遇到过很多逃亡的朝鲜人，但我们是唯一给他700美元的绅士。显然，这些钱够买一台耕田机了。他大声地

说，岳母也听到了，想到这里，他的脸上闪着喜悦的光。然后他皱起眉头，说如果他被发现接受了我们的钱，罚款将是费用的二十倍。他重复了几次，如果我们被抓住，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给了他钱。

听着听着，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逃亡远没有结束。我们成功地逃离了朝鲜士兵，但这里有中国士兵在等着我们。

突然，常勇的手机响了。他听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嘿，我说过我今晚不能回家了。怎么啦？再说一遍?"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尽管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已经挂了，但他仍然把电话夹在耳边，结结巴巴地对我们说："你们……你们是杀人犯吗?"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们俩的意料。婆婆还在厨房里做饭，她也停下手中的活，往里面张望，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常勇说："又是我妻子打来的电话。她说，边防军和武警一直在搜查这个村庄。时间，衣服，身高，都与你们相符。根据朝鲜的消息，你们是杀人犯。他们说你有武器，很危险。边境地区已经疯了。"

我的胸膛紧绷，脸气得通红。他们怎么可能陷害我们谋杀?我们最大的罪行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而逃亡。

常勇靠得更近了。"我知道你们不只是普通人，"他犹豫地说。"他们真的很想抓住那些叛逃者——好吧，朝鲜总是诬陷他们谋杀。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你有钱，皮肤又好。你来自平壤。你可能担任过重要的工作。你是谁?"

我们决定完全信任这个好人，因为中国当局现在正在追踪我们。我简单地告诉他，我是统战部的一员，我的朋友在第五科工作，这两个机构都附属于中央。

"请告诉我，这样我才能理解。我明白党，但什么是统一战线部，什么是第五部门?"

当我犹豫着要不要透露我们的全部身份时，常勇的大眼睛因为恐惧而睁得更大了，上面的荧光灯在他黑暗的瞳孔里反射得很亮。

"统一战线部监督与韩国有关的政策和行动，"我解释说，"第5部门——怎么说呢——通过"欢乐部门"等机构来满足金正日的个人需求。"

常勇惊讶地跳了起来。我以为他是对我提到统战部的反应，所以他的下一个问题完全把我弄糊涂了。

"欢乐部门?"他叫道。"就是金正日和女孩上床的那个?但你这位朋友是个男人!你不会是说金正日和男人上床吧?"

他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浓重的北方重音更加明显，永明和我都笑了起来。常勇困惑的表情让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时，他的岳母拿着一张小

桌子走了进来，桌上摆满了酒和炖牛肉。常勇伸手去拿酒，但他没有给我们都倒上一杯，而是激动地问我们所说的第五部门是什么意思。

永明咧嘴笑着解释说：“朝鲜最有权力的机构是劳动党组织指导部。这是因为我们的将军，我的意思是金正日，通过该部门行使他的所有权力。它控制着朝鲜每一个党、军队或行政实体的指挥系统。组织部的第5部分负责监督与金正日私人生活有关的事务。金正日的宾馆、别墅、健康、饮食、爱好和娱乐——所有这些都是第五部门的职责。你说的那些女孩，她们也受雇于第五部门。这就是为什么在朝鲜，我们称漂亮女孩为‘第五部门女孩’。我们在每个县、市、区都有工作人员，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女中学校里寻找最漂亮的。”

“他们只挑选13岁的孩子，这个年龄也是很多人开始月经的年龄。在13岁被选中后，这些女孩每年都会接受一次身体检查，以检查疾病并确保她们仍然是处女。16岁时，当女孩们完成中学学业时，第五部门会从她们中进行挑选。进入最后一轮的选手将被派去接受一年的训练，然后被派往全国各地金正日的度假别墅或狩猎场。他们17岁接受任务，24岁结束服役。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与金正日的私人保镖或获准从事外交事务的高级干部包办婚姻。有些人甚至自己也当了干部。第5部分管理整个操作。”

“至于我，”永明接着说，“我是宫廷乐师。金正日的长寿不仅与身体健康有关，还与情感健康有关。十年来，我一直是金正日私人随从的一员。还有我的朋友，他是我在音乐学校的同学。我主修钢琴，然后继续学习作曲，而我的朋友结束了他的音乐学业，转而从事文学工作。他曾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学习，后来进入统战部工作。”

当永明热切地想要解释时，我担心他说得太诚实了。但这是打翻的牛奶，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我决定插话。

“我的这位朋友在朝鲜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作曲家。他得到金正日的特别信任，金正日亲自送给他一架钢琴。他的祖父母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被称为抗日运动的领军人物，在金日成自己的回忆录《与世纪同行》(With the Century)中也是如此。”

常勇和岳母没有回应，只是呆若木鸡，被他们听到的一切惊呆了。

永明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迅速站起来，从我们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破旧的信封。“这是我亲戚几年前在中国的地址。如果你能带我们去那里，我会很感激的。”

看了一眼地址后，常勇提高了嗓门。“你的亲戚好有钱啊!这个地区的每个人都知道那里的房价有多贵。所以你想和你的亲戚住在一起?”

他似乎终于信任我们了，他俯身往我们的杯子里倒酒。

“不，我们打算去韩国。”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常勇高高举起了他的杯子。他严肃地说，“如果你想去韩国，交给我吧。我的侄子，他是专业做这事的。像你这样级别的叛逃者一定能顺利地前往韩国。”然后他弯下腰低声说：“不瞒你说，我的侄子可以直接和韩国间谍联系上。”

“真的吗?”我们俩同时说话了。常勇断然地点了点头，并坚持说，韩国间谍可能会派人护送像我们这样的叛逃者。听了这话，我们举杯碰杯。常勇的手机又响了。他听着，显得很震惊。“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愚蠢的女人。什么，他们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好,好。”

常勇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起来!当局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向我妻子要她母亲的地址。我的意思是他们和她核实过了，他们已经知道这里了。”

我们收拾好东西，迅速离开了房子，常勇的岳母训斥了我们，她精心准备的晚餐被破坏了。我们急忙跟在常勇后面，盲目地沿着他选择的小巷跑过去。脚下雪的吱吱声和周围狗的狂吠声使我更加恐慌。天亮的时候，这个烟囱林立的村庄看起来就像一片森林。但在巷子里跑了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黑暗荒凉的山腰。常勇停下来喘了口气，就像一头被强迫做了超过体力所允许的工作的公牛一样。他瘫倒在地，抓住自己的一个脚踝呻吟起来。我怀疑他是不是扭伤了。

我想问问他是否还好；我想表现出我真正的关心，但我所能做的就是抑制住内心涌起的一阵荒谬而可悲的笑声。我们像这样逃命；但随着我们进入他平静的生活，只要700美元，我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给常勇带来的痛苦，就像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黄色裤子上有粉红色的花朵图案一样。检查他的脚踝时，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但随后我们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农民常勇终于喘过气来，他开始愤怒起来。“记得吗?我问你怎么找到我家的，你说一个中国女人给你指了路。我敢打赌是她告发了我们。那贱人一定向当局告发了你。她以前做过一次。”

虽然天很黑，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能看出他的呼吸。

“我发誓我再也不帮助你们任何一个人了。我告诉你，是钱的问题。我不应该从你那拿走700美元。事实上，其他叛逃者都很好，但和你们两个纠缠在一起太危险了。你不知道我住在那条该死的江边，已经被审问过多少次了。不管怎样，你现在要去哪里?天黑了。”

听到他问我们正要问他的问题，我绝望了。空气又苦又冷。我们要

不要说服他，再给他200美元?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着钱，这时常勇叫了起来：“嘿!我知道。来吧。”

他解释说，他岳母在她家对面有一幢外屋。我们躲进去后，他会用挂锁把门锁上。

“什么?士兵们在找我们，你却想让我们躲在她家附近?”我反驳道。

永明也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宁愿到深山里去。我不在乎我们要走多远。”

常勇打断了他，说:“听我说。在中国人眼里，你们是杀人犯。没错，谋杀犯!即使在山里，你也不安全。再说了，你有什么吃的?天黑后在户外是有危险的。任何人都可以被夜间巡逻队拦下进行身份检查。如果你被抓了，我也完了。你要怎么解释你是怎么到延吉的?你准备好不牵连我了吗?我怎么能相信你们俩?你知道俗话说‘火把下最黑暗’吗?即使是士兵也不能进入别人锁着的棚屋，不管他们多么焦虑。你听到我说的了吗?我给你拿剩下的炖牛肉和毯子。还有酒。”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这个小屋实际上是一个小棚屋，可能曾经被用作家，尽管它看起来已经被遗弃了很多年。有个地方原来是老式厨房的壁炉。小屋的三个“房间”中最小的一个在屋顶上有一个洞，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这并不比在外面受冻好多少，但至少我们可以避开最猛烈的风。在厨房里，有一堆干松针用来引火。

常勇花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我们身边，也许是因为他在和岳母争吵。虽然严格来说这是延吉市的一部分，但它看起来就像农村一样偏远。在我们的小屋里，没有人居住的迹象，当然也没有暖气，也没有描绘比基尼模特的日历，但这个地方的孤僻给了我希望，只要我们需要，我们就可以躲在这里住多久。

我的白日梦被狗的叫声打乱了，听起来好像它们正在靠近。狗叫声肯定盖过了来往车辆的声音，因为随后我听到了引擎熄火和车门打开的声音。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沉重的军靴发出一阵混乱的跺脚声，然后是几个人的说话声。当我听到常勇在他们中间用中文说话的声音时，我最担心的事情得到了证实。满月的光透过窝棚的一扇肮脏的窗户照在我们身上，就像一盏聚光灯，想要揭示一个罪犯的下落，我们蹲在一个远离光照的黑暗角落里。背包还在小屋的另一边。我担心常勇会被吓到，向当局透露我们的下落，即使是匆忙跑到背包那里，似乎也太冒险了。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呆了半个多小时。

突然，沉重的脚步声紧跟着车门关上的声音，引擎启动的声音，汽

车开走的声音。我很感激最后的沉默。但永明和我仍然呆在角落里，粘在墙上，好像我们是它的一部分。

几分钟后，我听到常勇在院子里喃喃自语。他熟悉的声音是受欢迎的，但我有点担心士兵们可能在暗中跟踪他。当我们小屋的门打开时，我看到农民常勇独自一人，松了一口气。他带着一条大毯子和一个包裹。

“我告诉过你!”他叫道。“我是对的——是那个婊子告发了我们。但我守口如瓶，说我对你一无所知。他妈的婊子!”

“请冷静下来。”当我挥手让他安静下来时，永明向外面看了看，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在那里。

但常勇说话的声音比以前更大了。“别担心，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在找你们，说你们是一对杀人犯。他们还给我看了你们的照片。”他把包裹放在地上。“这里是一些饺子。吃了这个，待到早上。我已经打电话给我的侄子了，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了解韩国间谍的人。他说他在很远的地方，他让我再照顾你们五天。他说如果我把你藏好，就会有一大笔奖赏!真是个好孩子。不管怎样，我每天都会给你带一天的食物。坐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想到我们的照片落在当局手里，他们把我们当作在逃的杀人犯来通缉，我们就感到恐惧，同时又希望常勇的侄子能来救我们，我们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每一天都在我们面前像十年一样漫长。常勇每天晚上都给我们送吃的。

有一两次，黎明时分，在大声的狗吠声之后，常勇绕着我们的棚屋查看周围，然后又消失了。永明说，在我们被抓之前，他可能会死于心脏病，他每天都问好几次，我们直接去他的亲戚家里是不是更好。每一次，我都摇摇头。最后，我发了脾气，提高了嗓门。

“想想吧。”我厉声说。“我们已经被朝鲜边防军抓住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当局有我们的照片。我们已经在中国呆了几天了，现在这里的当局肯定从朝鲜发来了更多的证据。这些士兵追踪我们找到了常勇的岳母。你觉得他们不会知道你亲戚的事吗?他们可能已经把那地方包围了。所以算了吧。我们要等常勇的侄子。”

即使在睡梦中，永明也发出了巨大的叹息，这让我感到紧张。我不得不鼓起全部的耐心使自己保持安静。如果我抱怨，可能会更激怒他，我不想让争吵将我们暴露。

第三天晚上，我喝了常勇给我们端来的酒，很早就睡着了。他告诉我们这可能是冬天最冷的夜晚。永明摇了摇我，我被他惊恐的脸和周围

的狗吠声吵醒了。前一天晚上，一头牛在院子里游荡，它的影子把我吓坏了，我蜷缩成一团，后来一直发抖了一个小时。虽然我喃喃地说可能又是那只动物，但当我从门缝里看到外面有人在用手电筒照我们的小屋时，我还是跳了起来。我们跳回了锁着的门后面的角落。每当一束光从门缝和墙缝里透进来时，我就会退缩，好像它是一把能割破我皮肤的刀片。

光线越来越近，越来越亮。我把毯子拉到身边，蹲在角落里。有脚步声，然后停在门口。门上的锁猛烈地嘎嘎作响，声音在我的胸膛上抓挠。我以为闯入者可能会放弃并离开，但门最终打开了，露出一个高大的士兵。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他做了个鬼脸。过了一会儿，那个士兵才意识到我们有两个人，就开始用中文大喊大叫，然后冲了出去。我拍了拍永明的背提醒他。他弯着腰，疯狂地在地上找什么东西。

“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嘶嘶地说。然后我们跑进了黑暗中。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爬过小屋对面的高墙的。我常常透过遮蔽处肮脏的窗户盯着它看，心想即使我们的生命依赖于它，我也永远爬不过去。滚到另一边，我冲刺追赶前面跑的事物。我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但当我意识到我追逐的不是永明，而是一头小牛时，我停了下来。我回头看了看，但那里没有人。我弯下腰，折回原路去找永明，最后来到了一大片空地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屋。我数了数有四个火炬，然后又来了八个。

我仍然弯着腰，蹑手蹑脚地穿过小巷，寻找永明。突然的脚步声吓了我一跳，我意识到火炬的亮光是从附近的某个地方发出来的。在亮光的照耀下，我甚至能看到士兵帽子上的一颗红星。再过几秒钟，我们就面对面了。但是奇迹发生了。一头牛突然出现在我旁边。也许它就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头小牛的妈妈。我赶紧躲在它后面。那个士兵和我之间的距离肯定不到五米，如果他转过身来，他很有可能看到我的腿在那家伙的肚子下面。

但那头牛比士兵更早发现了我的存在。它紧张地移动了几步，然后开始更快地移动。我被迫跟牛朝同一个方向跑，并尽力躲在它的身体后面，我的衣服被灌木丛中缠绕的荆棘撕破了。当我们来到一个远离光源的黑暗地方时，我推着牛，用尽最后的力气向前跑，一直跑到山脚下。

在那里，我瘫倒在地，用手掌抵住紧绷的胸膛，使我因大口呼吸而剧烈跳动的心脏平静下来。我周围的环境看起来很熟悉，我意识到我一定是在第一个晚上我们从他岳母家逃跑的地方，当时常勇接到电话后，

我们在常勇的带领下逃了出来。也许这是附近唯一的一条路!如果是这样，永明可能也在附近。

“永明?”我叫道。“永明?你在吗?”我叫得更大声了一点。

大山没有回应，就好像它把背对着我，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黑暗的墙。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脚已经麻木，疼痛难忍，我光着脚。我陷进雪里，揉着冻僵的脚底。他们就像石头，不是肉体。冷风像针一样刺着我的脸颊和耳朵。我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类似于雪地上的脚步声。边防军一路跟踪我到这里来了吗?想到这里，我慌乱了，因为我已经失去了继续奔跑的意愿，因为我的脚冻僵了，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但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声音叫我。

“嘿，是我!在这里!”

我朝那声音望去，看见一些树枝在动。雪反射的光线足以让我看到永明微笑着挥手，从灌木丛的树枝间探出头来。那个混蛋还活着!我朝他跑过去，一靠近就给了他一拳。

“你怎么笑得出来?你这个自私的混蛋，你为了救自己而抛弃了你的朋友!”

永明毫无怨言地挨了我的拳头。我骂完之后，他才告诉我，他来的时候以为我就在他后面。然后他从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我。那是我从平壤带来的诗歌手稿。这就是他在我们逃跑之前在小木屋地上寻找的东西。即使在那种绝望的情况下，面对士兵，他也做了一个朋友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剧痛。然后我注意到永明也没穿鞋。

“傻孩子，你也应该把鞋子穿上。”我说，试图开个玩笑。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脱下任何其他东西，所以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相对温暖。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往山上爬了一点。一坐下，我们就把脚放在对方的肚子上取暖。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整个村庄，甚至可以数出我们下面巷子里的每一支火把。在我们藏身的地方附近，有两辆车的灯是亮着的，但引擎是关着的。常勇的婆婆可能在睡觉，因为她的房子里根本没有亮。

我们没等多久，天空就开始变亮，有了一些颜色。一定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因为火炬都向车辆移动了，然后车辆驶出了村庄。

“我们应该再下去吗?”永明先问。我觉得寒冷难以忍受，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下山回村子。在确认了我们在这个村子里之后，我想边防军可能留下了一些人。但我们看到每个火炬都消失在车里，此时对我们生命最大的威胁是寒冷。当我们小心翼翼地下山时，我们的脚已经完全失去

了知觉，绊倒了好几次。

当我们来到常勇岳母家时，我们敲了敲门，但没有回应。但就在我们叫常勇的名字时，里面亮了灯，他没有说话，而是冲出来让我们进去。当他打开门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岳母在用中文喊着什么。

“难以置信，”他对我们说。“你终究没有被抓住!你们太棒了。”

这些话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但在那一刻，我们需要的不是赞美，而是温暖。当常勇注意到我们裸露的脚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一句话也没说。他去给我们找了几双鞋，回来时给我们带来了袜子和橡胶便鞋，并向我们道歉说他只有这些东西。当我穿上鞋子时，它们出乎意料地温暖了我的脚。农民常勇说，如果我们被抓了，他也得过逃亡的生活。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比金正日更伟大的人。不管他为我们的安全感到宽慰的原因是什么，我很高兴他能分担我们的宽慰，那一刻他感觉就像我的叔叔一样。

“士兵们拿走了你的背包，”常勇说，“里面是什么?””

当我回答说只是一些书和换洗的衣服时，他让我确认包里没有钱。站在常勇身边的永明一听到“钱”两个字就脸色发白。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就回答说:“幸运的是，我们身上带着钱。”

永明用眼睛向我示意，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这时常勇的岳母从里面喊了一声，他就进了屋。

“你真的有钱?它在你的口袋里吗?”永明半是期待，半是怀疑地问道。

我把他带到院子的角落，对他说，“听着，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有。所有东西都在背包里。但我们得假装有钱。如果那个人愿意，他可以抛弃我们，但是没有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农夫常勇拿着另一个包裹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抱怨着，好像要让他的岳母听到，他递给我们一瓶酒，让我们相信他侄子的承诺。我们还得再等两天。他还说，我们要小心别在山里冻死。但我们不能生火，他警告我们。他说，中国当局积极寻找躲藏在山区的逃北者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经常引发山火。

“现在去，到那边的岩石那儿去。我再带些面包和毯子来。”一边推着永明往前走，一边抓住我的胳膊。他解释说，他的岳母对他很生气，因为他把我们留在她家的时间超过了她的预期，并把她置于危险之中。他说，唯一能让她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给她钱。

我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说:“我们相信了你的指示，来到这里，但我们几乎被抓住了。等你侄子来了，我会考虑给你更多的钱。我们不知

道还会发生什么，所以请理解我们的处境。”

说完，我和永明向山里走去。一个小时后，常勇来给我们一条旧毯子和一包食物。他向寒冷挥舞着拳头，说我们在山坡上比在无法遮挡任何方向的平地上要好；然后他沿着斜坡往回走。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了，说我们不能睡着，因为晚上气温可能会降到零下30度。他几次强调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保持清醒。

我们向他道谢后，又看他离开。我们找了一个不那么陡峭的地方，挖开雪，直到我们能看到泥土，腾出了一个只够两个人坐下的空间。我们坐在那里，用毯子盖着。我们一起喝的那瓶酒喝得太快了。但酒精让我全身散发热量，感觉很舒服。我们还每人带了一个热水瓶，知道常勇站在我们这边，我感到更温暖了。

永明说:“我们彼此都假装对方是女人。”

听到那些出人意料的话，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被关在一个锁着的小屋里，连自己的呼吸都怀疑起来，现在又笑了起来，感觉真好。一想到能如此惊险地躲过边防军，我也觉得这是一种胜利。

夜色渐深，这座山变得活跃起来。我记得，在朝鲜的一个安静的夜晚，我被咸镜南道永不停息的海浪拍击海岸的声音所吸引。我想我当时七岁。我以前没有见过海洋，当这广阔的海洋不停地拍打着我的时候，它似乎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物。那天晚上，我赤脚跑在沙滩上，说我要把大海从抽搐的睡梦中唤醒。

“你好,海!是我!醒醒，来和我玩吧!”

当我对着海浪大喊时，大海仿佛一下子苏醒了，远处黑暗的天空中闪过一道闪电。

就像那晚的大海一样，这座山在黑暗中低语、搏动，仿佛充满了灵魂。远处山顶上传来的声音随着声音传到山谷里而愈来愈大，我们的声音也跟着风声一起加大。当寒风从我们身边吹过，吹走，仿佛它是一个看得见的生物，我能感觉到大山深处的能量，因为它准备好了另一股风从它的顶峰吹下来。

那天晚上，我和永明像恋人一样分享了我们最深的秘密。我们的初恋，童年的回忆，我们离开的家庭；就像用我们记忆的颜色在天空上作画一样，即使是最小的回忆也具有意义。当话题转向我们所爱的人时，我和永明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支持对方。即使吞下了一把雪，我的喉咙还是因为激动而灼热。

谈话转向了朝鲜政权。我们的体制宁愿让我们被判为杀人犯并被杀

害，也不允许我们放弃它，更不用说阻碍它了。从胃里冒出来的胆汁的味道让我意识到，直到现在，我不仅在朝鲜境内生活，更是被它囚禁。

第三章 《金氏王朝实录》

1999年秋天，我被任命为国家历史工作者，负责编纂《金氏王朝实录》。5月，我为金正日写了一首史诗，这让他非常高兴，随后我被提升为他的钦定人之一，我成为了统战部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接到了林东玉第一副部长办公室的紧急召唤。在那里，我发现自己和来自统战部不同部门的7位同事在一起。

我刚坐下，林部长就说:“请站起来。”他低头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的那几张纸。“我受命传达将军的命令如下:“朝鲜时期李氏王朝的500年的毁灭也以《李氏王朝实录》的形式记录下来。我们没有《金氏王朝实录》来记录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伟大统治，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败。因此，UFD必须聚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紧急完成这项工作。”

《李氏王朝实录》是一部讲述朝鲜时代(公元1392年至1893年)的历史。然而，当我们生活在强烈批评封建王朝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模仿这些古老的典籍似乎是矛盾的。虽然我被任命加入这样一个团队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团队中经过精心挑选的成员是作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这表明历史真相让位于对最高领袖的崇拜。

我们八个人在Munsu招待所生活和工作，外人无法进入。这些招待所由中央各部门独立经营，为经过审查的干部提供严格保密的工作场所。这所房子装修得非常好，是为访问朝鲜的国家级别访客提供住宿的那种宾馆的小型版本。

UFD经营着Ui-Am和Soonan等多家招待所。其中，Munsu招待所以前是用来接待逃北者的。该建筑位于平壤东部大同江地区清流洞3号住宅区内，因此连当地居民都不知道这是秘密UFD作战场所。这座高墙的院落内部布置豪华，为了让最近的叛逃者更容易与朝鲜合作，这里装饰了豪华的外国家具和材料，包括韩国知名家具公司生产的昂贵家具。在那之前，我只通过阅读材料和消费品参与“本地化”，但当我进入一个已经本地化的整栋建筑时，我惊呆了。近年来，已经没有叛逃到朝鲜的人了，这座别墅现在被指定为UFD内部使用。我们是第一批入住的朝鲜客人。

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是金正日的构想。第一步是在1997年7月金日成逝世三周年时迈出的，当时金正日用他父亲的生日(1912年4月15日)来标志一个新的历史纪年的开始。随着金日成的诞生，朝鲜的历史重新开始。金正日将朝鲜人的民族身份定义为“金日成的人民”，他现在需要使这一身份合法化。他的计划是建立一部金日成的历史，以巩固和巩固朝鲜人认同的基础，即认同金日成的遗产，而不是认同共同的种族、语言

或文化。为了强调朝鲜是合法的朝鲜，他希望创造一段历史，不仅包括朝鲜的朝鲜人，还包括韩国和海外的朝鲜人。没有UFD许可，任何相关档案记录都不能向任何人公开。但最重要的是，金正日不能信任一个精心挑选的圈子之外的人，因为他拥有最高领袖不加掩饰的秘密历史。我们需要掌握这段秘密历史，然后才能重塑——或扭曲——它以达到金正日的目的。

朝鲜声称，日本在1945年的战败是金日成作为抗日游击队领袖所取得成就的直接结果。朝鲜战争实际上因停战协定而暂停，它被宣布为金日成对美帝国主义的彻底胜利。就连冷战的历史在朝鲜也被教授为围绕金日成努力的共产主义历史。中央的国际部门积极在海外建立主体研究机构，试图鼓励外国人认同朝鲜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朝鲜之所以无法进行改革和进一步向世界开放，原因之一是，这可能会暴露出国家的核心教条只是编造出来的。金正日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向公众提供任何与金日成过去有关的可能有害的原始材料。因此，他把创造历史的任务交给了统战部的干部，由于他们的政策和情报工作的敏感性，他们已经获得了全国最高的安全许可。

即便如此，我们的团队内部也建立了更深层次的原子化，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小组里，负责朝鲜历史上的一个特定主题或十年。在我们开始工作之前，我们签署了一份合同，确认如果我们在进行研究时超出了我们的职权范围，我们将接受严厉的惩罚。我们在不同的研究中进行工作。我负责研究金正日在宣传鼓动部的活动历史，包括他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的艺术成就。

我们不允许进入任何人的书房。但是，由于我们八个人在执行任务期间共同住在Munsu招待所，而我们都与朝鲜社会的其他人隔离，所以保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我们彼此之间形成了深厚的联系。

在我们八个人中，我认为负责金日成早年生活的作家的任务最具挑战性。晚饭后他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最近怎么样?”我们入住后不久，我小心地问道。他没有回答，而是又点了一支烟。但他最终还是转过身来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是这儿最小的。我问你个问题。我们的最高领袖生于1912年4月15日。这是如此重要的一天，有很多话要说。但是第二天他做了什么?我可以把他母亲的乳汁称为革命性的营养物质。但是最高领袖自己做了什么呢?说实话，那个年纪的婴儿除了尿尿还能做什么?我该如何描述这之后的两年呢?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另一位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朝鲜历史的作家与我分享了他的困境。他

说，他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一份个人备忘录中发现，他曾在1972年参加过平安北道的一场演出。他让我帮忙寻找有关类似事件的原始资料，他准备用这些资料填满他本该写的那十年的三天历史。就这样，我们的保密合同成了废纸，因为我们的共同安全基于相互信任。我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彼此交流，而不是各自奋战。当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历史记录时，我对原始资料中开始浮现的画面越来越感到不安。

我们小组被委托保管档案馆中有关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文件原件。分割政策使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看到朝鲜历史的全面概况，但当这些碎片放在一起时，整体图景的形状是清晰而明确的:金正日的权威并没有像官方的世袭叙述所述的那样，由金日成传给他，尽管他声称这是他合法性的基础。相反，儿子篡夺了父亲的地位。

有句老话说，权力不能在父亲和儿子之间分享，这暗示了某种普遍而不可避免的命运。金正日与父亲金日成恶性权力斗争的种子是在他8岁时无意中埋下的，当时他的生母金正淑(Kim Jong-suk)去世，他被父亲抛弃。在她去世一年后，即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入侵韩国。金正日与他的父亲分开了三年，因为他被送出战场。停战后，他回到平壤，但父子俩并没有变得更亲密。到1954年，他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金平日(Kim Pyong-il)，他的母亲金圣爱(Kim Sung-ae)是一名秘书，后来与金日成形影不离。

金正日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学习，并于1964年毕业。作为金日成的长子和父亲血脉的传人，如果真要进行权力的世袭转移，金正日应该会被授予一些职责或头衔，这符合朝鲜的习俗。但在金正日毕业的前一年，也就是1963年，金日成与金圣爱结婚，这巩固了金正日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的可能性。

作为第一夫人的金圣爱在这个时候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威，朝鲜的政治精英们站在她身后，就好像她是朝鲜的江青。由于金日成的亲信正在为金圣爱的儿子金平日(Kim Pyong-il，而不是她的继子金正日)的继位做准备，金正日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是，父亲的支持者已经变成了他的政敌。直到今天，在朝鲜，仅仅提及金平日在导致金正日继位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是一个亵渎性质的禁忌话题。

尽管朝鲜官方宣称金正日的职业生涯始于党的组织指导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故意歪曲历史，为未来敬爱的领袖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个合适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朝鲜的权力精英们坚定地支持金圣爱，甚至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也与他对立，金正日被安置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降至宣传动员部的一个职位。

当时，金正日并没有表现出与父亲反目成仇的迹象。事实上，在PAD（宣传动员部）的工作中，他为金日成的领袖崇拜和美化他父亲的游击同志的抗日活动做出了贡献。他的活动非常广泛，在他的指导下创办的《抗日战士回忆》月刊被认为是全国的必读刊物。许多金日成和抗日战士的雕像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最终，金正日早年在PAD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一套至关重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工具，当他最终通过思想独裁统治时，他将逐渐依赖这些工具。

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末，金日成还没有被奉为神明。1968年底，国家安全部长金昌凤（Kim Chang-bong）企图发动武装政变推翻金日成。1969年1月，在金日成正式清洗了金昌凤及其派系之后，他任命崔铉（Choi Hyon）将军为接班人。为了表示感谢，崔铉宣誓效忠最高领袖的绝对统治。但他是一个严格的保守派，他相信通过长子继承权力，正是他在1969年夏天的一次党内闭门会议上为金正日在OGD（组织指导部）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反过来，金正日余生都让崔铉的儿子崔龙海(Choi Ryong-hae)担任自己的左膀右臂。

但是，金圣爱的派系势力并不是轻易可以克服的。她的哥哥金光合(Kim Kwang-hop)是副总理，并得到了金日成的弟弟金永柱(Kim Yong-ju)的支持。在他们当中，金日成自己的支持者公开称他的儿子金平日(Kim Pyong-il)为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

然而，金正日在"三大革命目标"中找到了摆脱这些势力的方法，该目标模仿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结构。中国红卫兵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因素，而朝鲜的三个革命目标是意识形态、工业和文化。以红卫兵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由即将完成教育的青年组成的部队，以实现革命的三个目标。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地方官僚的滥用权力和腐败"。随着与地方势力有联系的中央党员干部一个个被清除，金正日的权力在中央得到了加强，同时也建立了坚实的地区支持。

此时，他的父亲金日成的权威是通过拥有统治权力的政府来传递的。在这种氛围下，金正日被认为对他父亲及其支持者的权力没有太大威胁，因为他只是劳动党的一名职员，而劳动党只是众多官僚机构中的一个。除了崔铉之外，没有其他部长认为他是金日成的潜在接班人。但由于金正日的权力基础是劳动党，这是他扩大影响力和对抗朝鲜政府的唯一手段。他在主体思想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支点

主体思想是基于对人的关注，因此是一种人文主义哲学。在金正日的监督下，这一理念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一理念，一个人现在必须成为一个机构的一部分才能取得进步，而那些被带入这样一个机构的人只有

在最高领袖(Suryong)的出色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主题思想形成了Suryong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是以一个人为中心:他的父亲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原作者、劳动党国际书记黄长烨(Hwang Jang-yop)最终于1997年逃离了他一手创办的主体思想，流亡到韩国。)

到1973年，主张最高领袖领导党、党领导人民的“金日成主义”已经成为党的万能武器。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金日成主义成为人民的意识形态，对金正日崇拜的忠诚服从成为每一个党员的道德良知。任何被视为挑战这种道德良知的人，无论以多么轻微的方式，都将与他或她的家族三代一起被送往集中营，在那里，家族的血脉将被终结。也是在这段时间，以前由社会保障部管辖的监督机构以新成立的国家安全部的形式获得了独立，直接向组织指导部报告。

金正日强调，如果要实现金日成主义，社会就需要党的组织、指导和宣传，从而提升了作为他权力基础的组织指导部和宣传动员部的权威。通过这种方式，他找到了一种手段，在其以党为基础的权力范围内容纳对金日成的崇拜，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对最高领导人的抽象崇拜转化为支持自己基于劳动党的权力。

1976年，江青在中国遭到清洗，她的倒台在她的朝鲜“镜像”金圣爱身上得到了反映，她被孤立，失宠。在金正日的继母金圣爱失去了妇女委员会主任的职位和对外关系的关键支持之后，金正日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为了巩固党的主张，“维护”最高领袖的指导，任命人员的权力从政府中删除，金正日的政敌被OGD的党的指导部门以意识形态监视为借口警惕地监视着。朝鲜国家以前建立在劳动党和政府的双重权力之上，后来完全依赖于党。到金正日时代，党已经取代了政府的所有职能，政府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和历史遗迹。

但为什么金日成袖手旁观，对他儿子巩固党的权力无动于衷呢?答案是:因为他只看到对自己的领袖崇拜，就像外面的世界一样。金正日对党的权力的巩固被披上了“金日成主义”的道德外衣，并通过最高领袖遗产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宣传自己。但是，尽管金正日在表面上和公众的印象中似乎仍然忠于他的父亲，但在幕后，他正在稳步削弱守旧势力，为一个人——他自己——拥有绝对和集中的权力来决定朝鲜未来的时代做好准备。

起初，以减轻其父职责压力为冠冕堂皇的借口，用卡带录音代替了对金日成的直接建议。录音提案有效地将所有提交金日成批准的提案转给了掌握这项技术的金正日。最终，每一份提案都要经过OGD的审核，

这样只有经过挑选和修订的提案才能送交金日成批准。到1980年，金正日已经完成了一个系统，即所有实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即OGD党委书记，而表面上权力似乎由金日成作为最高领袖掌握。

金正日通过OGD垄断了五大权力，巩固了他以党为基础的绝对权力。

第一大权利是OGD在核心机构中分配部门部长及以上职位的专有权。此外，在军队中，关键兵团的将军由OGD直接任命。

第二大权力是OGD对“党的指导”的绝对权利，这使得它可以干预任何级别的每一项行政任务。它通过严格监督地区和部门党委书记，并通过孤立的细胞状结构网络来实现这一目标。其结果是，其军事部门可以传唤朝鲜任何一位级别最高的将军卑躬屈膝，接受羞辱，而其外交部门对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干部(如外交官或商人)行使同样的权力。

第三大权力是OGD的绝对监督权利，这使得它可以监督、清洗或驱逐任何干部。这一部门的结构极其分散，但权力非常集中，旨在维护和促进金正日的恐怖统治。朝鲜的秘密警察，国家安全部，直接向OGD的这个部门报告。

第四，新闻部拥有批准和制裁政策的绝对权利。朝鲜所有机构的提案都必须通过OGD的报告部门，以便在提案生效前得到金正日的授权。

第五是OGD负责保护金日成和金正日并为他们提供食物。这意味着监督所有与金氏家族有关的事务，以及奢侈品的采购和卫队司令部的运作。

有点讽刺的是，这种精心巩固权力的过程的原始资料保存在党的历史和文学研究所，被归类为世袭继承过程中发生的派系斗争。

在我为《金氏王朝实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得到了研究所职员的有效回答。他们非常乐于助人，经常不厌其烦地给我发送额外的和相关的支持材料。但是，即使在这个本应包含朝鲜历史所有秘密的档案中，也没有一份文件总结了金日成和金正日两派之间存在的激烈竞争。虽然我们不情愿地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显示父子之间的敌意和权力斗争的压倒性证据(包括显示父子同时宣布直接对立的政策的文件)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就官方说法而言，金正日的合法性可能建立在父子世袭的基础上，但实际上，这涉及到儿子对父亲的篡位。金正日巩固权力的方式是从他父亲那里夺取的，而不是从他父亲那里获得的。

我知道“敬爱的领袖”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神性，他是通过恐怖、背叛和复仇的行为获得权力的，这让我感到恐惧。有一次，在和我们组

里我最信任的一位作家喝茶时，我坦白了一件事。“我想出去，”我说。“这些秘密太多了，我承受不了。知道了谎言背后的真相，我想我再也不能问心无愧了。”

他回答说:“别傻了。你现在根本停不下来。你能做的就是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什么也别告诉其他人，好吗?”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当林部长命令我为UFD创作2000年的史诗，以向金正日致敬时，我从完成编年史的全部任务中解脱出来。但是，尽管我回到了家里熟悉的床上，我并不觉得我回到了一个熟悉的世界。我知道，我作为金正日的秘密历史工作者的过去将永远困扰着我，就像怀疑的阴影一样注视着我。最让我恐惧的是，我知晓了关于领袖的绝对禁忌的知识，而且我永远也摆脱不了它。

当时最令我不安的是，金正日的无情清洗统治，连他自己的家人都没有放过。金正日一巩固自己的权力，就用“侧枝”的概念把他的家庭成员指定为一棵树的侧枝，必须修剪才能让它变得又高又壮。首先，他的姑父金英柱和继母金圣爱被软禁；1981年，他下令不接受金日成支持者的子女加入中央党。这成为OGD的内部规定。

金日成的助手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消失，那些留下来的人越来越不满，因为他们的子女被贬到省级职位、没有前途的政府职位或在党的权力结构之外的军队中任职。不满的金日成的支持者们在1982年4月15日金日成生日那天集体前往金寿山会议厅(也被称为最高领袖的宫殿)，与最高领袖本人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此时的金日成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通过OGD的触角，朝鲜的所有权力都被小心翼翼地转移到了金正日手中，真正有权力的职位由金正日在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同学占据。金正日对最高领袖本人的权力是绝对的:金日成在会见他的任何支持者或老同志之前，必须得到党的OGD的许可。他自己的权力被限制在那些会继续让他在朝鲜人和局外人面前显得强大的事情上，比如现场视察和外交权威。就连金日成的私人保镖——卫队司令部第一科，现在也直接听命于党的OGD。就这样，一位曾经受到忠诚卫队严密保护的领导人，在忠于金正日的卫队严密监视下度过了自己的最后时光。

这也是为什么从1980年10月第六次代表大会到2004年我渡过图们江，二十多年来没有召开过一次劳动党代表大会的原因。金正日严重削弱了党中央政治局本身的权力，它受党的总书记金日成的管辖，以至于它甚至没有能力召开会议。

随着金正日巩固自己的权威，父亲是公共权力的持有者、而儿子是

实际的权力持有者的这样一个双重结构形成了，真正的权力取决于金正日对一个人的信任程度，而不是一个人的官方职位。这使得外界无法分析朝鲜的运作，因为公开的等级制度是对守旧派的一种安抚，实际权力掌握在受信任的个人手中，不受公众监督。

换句话说，金日成的支持者可能会被授予显赫的官职，但实际权力仅限于金正日自己的亲信。一个具有两种权力结构的十字形体系出现了，公开的高级职位和金正日的实际权力从未授予同一个人。例如，外交通商部长官朴义春（Park Ui-chun）只是一个稻草人，而国际事务的实权掌握在第一次官姜锡柱（Kang Sok-ju）手中。这种隐藏结构和表面结构之间的差异，使金正日得以维持一个外人无法理解或操纵的控制系统。

在巩固自己权威的过程中，金正日毫不掩饰自己对父亲的羞辱，接下来的事件显示了这位最高领袖在儿子和儿子的OGD面前的无能为力。

作为编年史的八位作者之一，我被赋予了传唤与我的研究领域相关的朝鲜历史的任何幸存的官方证人进行采访的权力，包括该国最高级别的将军。通过其中一人，我发现了对金日成的军事顾问金杜南（Kim Du-nam）进行革命再教育的真正原因。

“革命再教育”包括所有与思想会议、强迫劳动、开除党籍、失去职务或驱逐有关的党的警告和惩罚。事实上，在朝鲜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多少人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再教育”，因为这被视为一种预防对权力全面贪婪的疫苗。甚至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曾在臭名昭著的Yodok劳改营服刑。与其他只能以尸体的身份离开的集中营不同，如果你选择顺从地忍受强迫劳动和教化，去yodek并不意味着你生命或事业的结束。这是一个残酷的意识形态训练营，在这里你重新学习朝鲜唯一重要的真理:对亲爱的领袖的忠诚可以赢得声誉，不服从会带来死亡。我第一次了解与金杜南有关的事件是从一位将军那里，他的父亲由于金日成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下台而失去了权威。虽然是他告诉我这个故事，但他似乎也害怕Yodok。

“这个故事不能让陌生人知道。不要把它写下来:只要知道它就行了。更好的办法是，听一听，了解它，然后把它从你的记忆中抹去。”

这是他告诉我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高级军事团体访问了朝鲜。金日成想询问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款待，并命令他的军事顾问、四星上将金杜南(Kim Du-nam)向军方外事局(Foreign Affairs Bureau)索要他们的行程安排。当金日成发现这些客人住在人民武装部队下属的宾馆时，他打电话给儿子

金正日，询问是否可以给予他们国家元首应有的款待，并提出可能会去Baekhwa-won宾馆的建议。

金正日立即命令OGD披露是谁向金日成办公室通报了苏联代表团的安排。第二天，他解除了人民武装力量部外交事务主任的职务，并判处金日成的军事顾问金杜南(Kim Du-nam)六个月的“革命再教育”。

在许多进一步的侮辱中，金日成不得不在1992年2月16日他儿子的五十岁生日上发表个人赞歌。

就这样，金日成在自己的邪教中以主角的身份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然而，这个邪教是由他的儿子控制的，他的儿子实际上已经篡夺了他的位置，现在将接替他的位置。

但金正日小心翼翼地保持父子相处融洽的假象。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朝鲜政府公开了与最高领导人办公室有关的文物。其中包括金日成去世前手写的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提议举行峰会，讨论与韩国的统一问题。该手稿还被公开展示在金寿山纪念宫，宣传南北朝鲜统一的思想。

金正日似乎支持他父亲追求和平统一。但在现实中和幕后，他强烈反对。1994年，受到美国先发制人打击威胁的警告，金正日允许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访问平壤。金日成借此机会公开宣布他赞成举行朝韩峰会，国际社会的许多人乐观地注意到，朝鲜领导人已经向世界伸出了手。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金日成已不再掌权，也没有意识到掌权的金正日正与父亲对立。

在我研究《金氏王朝纪事》(annals of the Kim Dynasty)的过程中看到的原始资料中，有一份文件特别说明了金正日通过宣传所描绘的与他的实际意图之间的对比。该文件是1994年7月初由金正日亲自组织的一次党的会议的记录。根据会议纪要，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当今的形势需要的是保护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政策，而不是统一祖国的政策”。它呼吁干部们对他父亲提出的与朝韩峰会有关的所有统一想法予以怀疑，甚至声称他的建议是衰老的标志。事实上，这段谈话记录了金正日最亲密的助手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不仅批评了金日成的提议，而且阻挠了它。

那么，为什么金日成不顾金正日的反对，执意要举行峰会呢?作为朝鲜表面上的领导人，与外界对话的权力是他仅存的权力。把统一提上议程，在全世界看来是如此公开和不可逆转，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以他儿子不能简单忽略和篡改的方式对韩国的未来发表意见。

金正日甚至拒绝满足他父亲最后的一个最简单的要求。金日成曾说过，他死后希望被葬在大成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与他逝去的战友们一

起。在他死后，他的前游击队同志甚至签署了一份集体请愿书，要求实现这一愿望。但金正日认为，如果金日成的遗体安葬在这个地方，他父亲的革命同志的权威将被视为重新确立，这反过来可能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力，因为他曾经夺走过他们的权力。

似乎是为了反映他对这种分裂和微妙的平衡的焦虑，在他拒绝大成山葬礼的同时，他通过劳动党报纸《劳动新闻》向世界宣布，“尊重第一代革命者是最正义和道德的事情”，指的正是他敌人的群体。与此同时，金日成（Kim　Il-sung）被拒绝了埋葬在支持者身边的遗愿，他在邱山纪念宫（Mount Keumsu Memorial Palace）被制成了木乃伊——在他死后，他作为一个宣传偶像，被用来使金正日的世袭权力合法化。

考虑到金正日对其父亲的诡计和阴谋，我和我在UFD的七位同事在1999年至2000年间撰写《金氏王朝实录》绝非易事。尽管如此，朝鲜国家电视台仍以“揭开金日成同志的革命史册”为题，继续每天播放这些视频。

第四章 罪行

那些仅仅是出于饥饿而渡江的叛逃者受到的惩罚相对较轻，他们会在劳改营待上几个月。但一个人的职位越高，叛逃就越被认为是背信弃义的，相应的惩罚也就越大。知道这一点，以及我们对可能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的后果的恐惧，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上。

带着太阳升起后，山上能暖和一点的希望，我和永明彻夜聊天。但黎明前来了一场更强的暴风雪。颤抖了一晚上，腿也伸不开，我觉得自己要昏过去了。我觉得我们好像来到了悬崖边，面对着我们必须在这种寒冷的条件下再度过24小时的现实。至少我们还有那瓶热茶和常勇给我们的面包，这给了我们一点安慰。

当常勇终于回来时，他带来了一条新毯子和一把斧头。我们的旧毯子像皱巴巴的铁，冻得僵硬，所以常勇不得不把它顶在头上下山。临行前，他抱怨说，平壤的男孩可能有钱，但他们不知道如何生存；他砍了小圆木，从附近收集了树枝，给我们做了一个遮蔽处。在里面，我们挡住了刺骨的寒风。

但这种喘息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阳光无法穿透，庇护所就像一个冷冻室，里面的空气非常寒冷。尽管我穿着胶鞋，但我的脚却好像浸在了冰水里。为了保暖，我们白天跑到山顶，又跑下来好几次。

到了晚上，暴风雪更严重了。农夫常勇给了我们两瓶酒，当我把一瓶酒放下来喝另一瓶时，瓶子在地上的几分钟里结了霜。然而，即使我所能期待的只有痛苦，我在山腰避难所幸存下来的每一秒都在提醒我生命的珍贵。

常勇答应的那个早晨终于来了。太阳过了正午的时候，他和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人又出现了。那个年轻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一件看起来很昂贵的米色皮夹克。他身体健康，动作敏捷，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他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可能与韩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给人的印象是他不轻易相信任何人，然而他却充满了平静的自信。他是那种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说话的人，他的问候尽量简短。但是在我们见面的整个过程中，他的脸上一直带着淡淡的微笑。

他说，我叫申光浩（Shin Gwang-ho）。

他的口音很重，很像咸镜北道，他无疑是常勇的侄子。他上下打量着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胶鞋时停了下来。当他终于伸出手来和我们握手时，他的手柔软而温暖。但在和我们握手之后，他偷偷地用牛仔裤擦了擦自己的手。

他要我们出示身份证件，说这只是例行的预防措施。我注意到他在

识别和检查日期、邮票和文件质量方面的专业性，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可以信任这个人。虽然常勇很紧张，听到远处的狗叫就坐立不安，但申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而是专注于他的事务。

他抬头看着我们，显然很满意。“请您等一会儿好吗?”

这一次，我想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韩国话。这是因为他在请求之前说了“请”。我在UFD学习到，在韩国有三种礼貌标记。第一种是用比听者低的音域称呼自己；第二种是添加像“would you”(以yo结尾的请求)这样的词，作为一般的尊重标志；第三种类似于军事用语:“长官，您可以吗?”(请求以sipnika结尾)。在朝鲜，有第一种和第三种礼貌标记，但没有第二种。不同的情况下没有微妙的区别，只有两种区别，一种是命令，另一种是服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级人员会说“等等!”，而下级人员就会服从。

然而，在朝鲜，还有一种礼貌标记，即使是最高级别的干部也不能使用，那就是专为执政的金正日保留的标记。最典型的用法是动词变位。例如，人们被说“做了”某事用hada表示，但最高领袖“做了”某事用ha-siut-da表示。这种区别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严格遵守，而且在各种形式的书面文字中也得到严格遵守。这样，尽管申先生用标准的礼貌语调(请求以“yo”结尾)和我们交谈，但他还加上了在朝鲜只有金日成和金正日才会用的“siut”接合词。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尊重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转身用手机打电话去了。他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后，就挂了电话，我们站在雪地里等着，弓着腰抵御寒冷。过了一会儿，一辆四轮驱动车出现了，停在了半山腰上。正如常勇所暗示的那样，他侄子的足智多谋与他的农民伯父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水平，对他的伯父来说，最大的兴奋就是能买到一台新的耕田机。当申先生让我们快点时，我们迅速拥抱了常勇，他张开双臂等着我们拥抱，我们说了再见。他不仅没有要更多的钱，而且当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时，他在我耳边低声说，我不应该告诉他侄子我们给了他700美元的事。当我们登上吉普车时，我们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并承诺我们到达韩国后会回来看望他。

这辆吉普车和申先生一样强大而灵活。我们在路上颠簸着，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韩国流行音乐，我觉得我们可以开着这辆吉普车一路开到首尔。然而相反，我们回到了延吉，这次是在一个现代化的中心地区。就在市中心，申先生把吉普车停了下来，打开车门，让我们下车。远离了日常生活的喧嚣，我们感到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我们不知所措。申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只是喊:“快点!”我们跟着他。

我们走进一家购物中心，我吃惊地看到一群武警在巡逻。然而，申

先生却敢大声叫我的名字。他明显的粗心大意让我感到不安，但当他在一家服装店外不耐烦地向我们招手时，我和永明还是照做了。

穿上他选的新衣服后，我照镜子，起初很高兴，但当我看到镜子里自己那张很容易认出的脸时，我很震惊。我在做什么，站在这样一个公共场所，把我的脸展示给所有人看?我马上要了一副太阳镜，而不是新衣服。申先生说这会引起怀疑，但永明也这样辩解。他甚至详细地解释了我们是如何把太阳镜丢在被迫丢弃的背包里的。申先生不愿意购买，说这可能会让我们过于显眼，但最后他向永明让步了。

从那以后，我们穿上了新衣服，戴上了太阳镜。我觉得自己可以站得很高，戴着墨镜很安全。永明从他的墨镜后面朝我咧嘴笑着，尽管我看不见他的眼睛。我感到一阵悲伤，想到这一定是我父母最后一次见到我时的样子。

当我们回到车上时，申先生正拿着相机等着我们。他说他必须向上级提供证据，证明他是如何使用他们的钱的。如果我们没有买太阳镜，我想我不可能让自己在公共场合被拍照。在我们拍完照片后，我注意到又有一些警察站在我们身后，完全无视我们。

那是我第一天感到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到中国改革的影响。就像朝鲜的“金刚山（Mount Keumgang）观光也要吃完饭”(即使是看世界上最好的风景也要吃饱)一样，我们先去吃午饭。申先生带我们去了一家昂贵的餐厅，专门供应一整只熏鸭。吃饱了鸭肉之后，我们平生第一次去了一间男女都可以去的韩式桑拿房。我问他为什么被称为“韩式”，申先生解释说，在韩国，你可以在同一家店洗澡、蒸桑拿、过夜。

当我一头扎进一个大热水浴缸里，洗掉离开平壤以来积攒的污垢时，似乎我所有的痛苦也都被冲走了。就连浴缸里的热水都溢出来了。到1994年，平壤的中央供暖系统几近崩溃，热水成了一种罕见的特权。1998年11月，就在入冬之前，党终于通过公共命令承认了这一点，规定每个家庭必须解决自己的供暖问题。当时，平壤居民公开表示，只要他们能得到像样的饮用水供应，他们很乐意放弃热水。

在平壤，向居民提供热水的地区只有中央干部居住的中区昌光洞。即使在那里，每天也只供应两次，每次两小时，时间是早上六到八点，晚上七到九点，那时人们正准备上班和回家。在这种情况下，高丽饭店等外国人常去的地方和桑拿房等外国人专用设施成为了朝鲜精英阶层的社交场所。

2004年离开平壤之前，市场上每公斤大米的价格是1000朝币。按照当时的汇率，这相当于50美分。在那个时代，许多人连这样一笔小钱都

买不起，有时几天都不吃东西，在招待外国人的浴室或桑拿房里，一次5美元或8美元的费用是不可想象的奢侈。相反，平壤的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力来负担这种奢侈，他们经常光顾外国大使馆、餐馆或中央国家机构的锅炉房。如果你行贿，工作人员就会让你从溢流管里得到一些热水。你有时可以在这些地方看到外国人，但周围总是有监控，没有人敢对这些游客太友好。

即使在今天，朝鲜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基本都难以满足，仍依赖从中国进口的塑料浴“温室”。它有单码和双码。如果你把这个塑料挂在天花板上，它会一直垂到地板上。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塑料袋。如果你提着一桶沸水进去，蒸汽就会上升，塑料袋就会像气球一样膨胀。你把冷水和沸水混合起来洗澡，桑拿的效果让你保持温暖。

与这一切相比，中国在我看来像是人间天堂。浴缸里的热水对我来说远不止这些。这是改革如何改变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例子，以朝鲜的标准来看，即使是普通人也能享受到最奢侈的特权。在听到我们对“温室”浴室的描述后，申先生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人们仍然在用类似的方法洗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中国的改革，这些“韩式”桑拿才出现。他似乎对此感到自豪，从浴缸里跳出来，宣称他将让我们朝鲜乡巴佬真正体验中国式改革。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有床的房间，一个穿着白色浴袍的男人站在那里。申先生说他是擦背工，为了几个硬币，他会给我们擦背。我不明白，究竟为什么有人会屈尊给别人擦背，哪怕是为了钱。我们被迫躺下来亲眼看看那是什么样子。这个人精力充沛地去工作，但我感到很尴尬，无法享受这种经历。我来自一个意识形态规定任何普通人都不允许从其他人的个人服务中获益的国家，这种后背搓澡的经历让我觉得自己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享乐行为上瘾了。

换上浴袍，我们跟着申先生走进大厅，在那里我们又一次被深深地震撼了。这一次，我看到的是同一个房间里的男女只穿着浴袍，尽管他们完全是陌生人。当一个穿着露出膝盖的短裤的女人走近并在我们旁边坐下时，我和永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朝鲜，只有疯女人才会在男人面前做出这种毫无防备的举动。当我们惊讶地看着她若无其事地剥橘子时，申先生笑了。

洗完桑拿后，我们去了卡拉OK厅。申先生可能认为我们会发现卡拉OK比背部擦洗服务更令人惊讶，但他错了。事实上，我们唱的卡拉OK比申先生还多。

平壤也有卡拉OK。他们和中国的主要区别是，在朝鲜国内，你必须

支付每人10美元的入场费，而且你没有时间一次唱尽可能多的歌。相反，你会用一美元换取一个特殊的代币，这个代币可以让你唱一首歌。但对于一个数百万人处于饥饿边缘的国家来说，卡拉OK就像热水一样，是一种奢侈品。

在平壤的卡拉OK歌厅，歌单上满是赞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歌曲，但头脑正常的人不会花宝贵的外汇去唱这种普通的歌曲。然而，即使是和朋友在卡拉OK酒吧喝醉了，如果一个人在唱赞美"敬爱的领袖"的歌时把歌词搞砸了，也不能免除颠覆罪的指控。因此，在这些机构中，最受欢迎的歌曲是《吹口哨》或《见到你很高兴》等歌曲:这些流行旋律被认为相对不含政治意味，但它们的歌词经过了改编，以符合党的要求。

在一个艺术明显与政治有关的国家，没有太多歌曲可供选择。每当永明和我去平壤的卡拉OK时，我们都会一遍又一遍地唱《晨露》。这首歌实际上是韩国的，是20世纪70年代反对该国军事独裁的韩国民主运动的歌曲之一。但党编辑了歌词，暗示韩国民众将金日成视为统一朝鲜半岛的力量，因此这首歌被批准用于卡拉OK。

当永明和我轮流以完美的音调唱《晨露》(Morning Dew)时，申先生对我们的音准感到惊讶。他对我们竖起大拇指，说我们明显不同于那些从未见过麦克风的普通难民。每当我们从音响系统中听到他的赞美之词时，我们都感到很尴尬，就挥手让他安静下来，但申先生继续醉醺醺地喊道:"在这片土地上，没有金正日!"

晚上过得很快，我们跌跌撞撞地走到外面时已经十点多了。当我们坐上出租车时，申先生告诉我们，我们将在他家住几天。出租车让我们在一栋破旧的建筑前下车，楼梯里没有灯。申先生拿着打火机领着我们上了他三楼的公寓，并警告我们楼梯很滑。

我们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门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302。申先生按响了门铃，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打开了前门。她穿着一件带帽的紫色运动衫和配套的裤子。不知是因为她挽起袖子，还是因为她撅起嘴唇，我觉得我能感觉到她内心的某种力量。但她的脸仍然是冷漠的，她只是用斯巴达式的方式说了句"是"或"不是"。

"这是我妻子。"申先生做了简短的介绍，但他的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身上的肌肉，自从渡过图们江以来，一直因为寒冷和对死亡的恐惧而紧张僵硬，现在稍微放松了一些。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妻子"更令人安慰的词了，因为它有家庭的内涵。

申先生的公寓内部看起来与朝鲜首都的普通公寓没有太大区别。厨房兼作浴室，在狭小的空间里，水龙头和厕所紧挨着。这也是我们脱鞋

之处，以便进入申先生家其他地方。除了厨房-浴室外，还有两个房间，申先生在加热的地板上吃饭和睡觉，这是真正的朝鲜风格。在较大的那个房间里，有三个衣柜。除了这些东西和地板上嗡嗡作响的风扇加热器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

在较小的房间里，有一些毯子叠在角落里。辛先生指着他们说:"你们可以用这个房间。它比另一个更热，因为它更小。晚安。"说完这些话，他就离开了我们。永明和我都伸展了四肢。听到关节里噼里啪啦的声音，我很高兴，因为我担心关节在过去几天的恐怖和寒冷中已经枯萎了。还有更多的事情给了我新的希望。我想，今晚我们不再是躲在棚屋里或冰封的山坡上，而是在一个真正的家。关了灯后，我在温暖的房间里依偎在毯子下面。

当我躺在黑暗中，过去几天里我们所经历的危险和死里逃生的画面开始在我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就像电影里的场景在重复。它们不过是回忆，但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脑子里充满了疑虑，我们是否能熬过今晚，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跑多久。外面一辆机动车发出的最微弱的声音让我浑身颤抖，当周围安静下来时，我屏住呼吸，期待着下一个潜在的危险。虽然这种模式一直持续着，没有任何真正的危险出现，但我那不安的头脑并没有厌倦这种循环模式。在这些天如此接近死亡之后，我的良好感觉和情绪都蒸发了，现在我完全依靠我的动物本能，除了生存什么都不渴望和想象。虽然我意识到并想拒绝这种回应，但我做不到。我为自己变得如此虚弱而感到沮丧和空虚。

永明背对着我睡觉，但每当他大声呼吸时，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痛苦。也许没有士兵来敲我们的门，但他们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了，我们不得不整夜与他们战斗。

早上，有人敲我们房间的门。

"你起床了吗?"申先生问。他手里拿着一些纸和一支笔。我们已经醒了一个小时，叠好毯子，透过窗户凝视着延吉。"我会带你参观延吉，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但现在不是时候。在我们吃早饭之前，我需要你们俩给我写一份声明。"

他递给我们纸和笔，让我们"仔细"写一份声明，详细说明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必须向韩国政府提供什么情报，以及我们叛逃的原因。他强调了情报的重要性，但他说，由于他自己不知道细节，我们应该用要点来总结。从他说话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我们能提供什么情报呢?尽管如此，他的要求还是很专业，就好像他直接代表韩国一样。

我想我从来没有像那天早上那样，认真对待一篇文章的每一个字。永明也非常努力，就像给总统本人写信一样。我们工作了一个多小时，并向申先生展示了结果。他说，即使我们写的是要点，我们也应该解释清楚，以确保我们可以被信任。例如，他建议我应该暗示“生种战略”指的是什么。我觉得，为了让韩国情报部门相信我们的资质，我首先需要获得申先生的信任，并告诉他，这个战略指的是朝鲜特工实施的绑架行动。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种巨大的犯罪活动是在平壤艺术学校上学的时候。在我的同学中，有一个女孩叫李贤淑（Ri Hyun-suk）。那次是我们刚吃完午饭，开始剥橘子给大家吃，她就对我坦白说:“我其实是日本人。”

我被一块柔软的水果噎住了。我认识她好几年了，她怎么可能是个外国人呢?所有朝鲜公民都必须是朝鲜人。我尴尬地笑了。贤淑开始哭，然后她离开了房间。几天后，在一起约会后，我有机会去她家看她。

她和母亲单独住在一幢非常豪华的私人豪宅里。不仅是她的房子，在这个有围墙的院落里，其他所有的房子都是豪宅。在我们分手之前，她告诉我，就像告诉我一个最高机密一样，那个有围墙的院子里的所有居民都参与了“本地化”计划。当我问她是什么意思时，她说这是被外国丈夫搞大肚子的朝鲜女特工和他们的孩子住的地方。这是为外国人建立朝鲜家庭联系计划的一部分，以使他们同情朝鲜。她说，她的父亲是日本社会党内最重要的人物。

我当时并不相信她所说的一切，直到我进入统战部后第二次遇到“本土化”战略。在那里，我亲身了解到，还有像贤淑这样的人，他们身上有外国血统，在不认识自己父亲的情况下长大。当时是1999年，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公民被朝鲜绑架的问题，并要求他们回国。

当时，我受林东玉部长的委托，正在写诗集，住在Ui-am宾馆。尽管作为UFD的负责人，他负责所有与韩国有关的间谍活动、政策或外交，但他需要保持自己的文学声望，因为UFD依赖于包含艺术的心理战工具。此外，林部长还卷入了最高层的权力竞争，他需要向金正日赠送一本诗集。OGD副部长黄炳瑞（Hwang Byong-seo）因触怒金正日而被流放到地方，他将诗集献给金正日，向金正日表示了歉意。当金正日以黄炳瑞的献身精神是他在逆境中绝对忠诚的证明为由，恢复了黄炳瑞的职位时，朝鲜最有权势的人开始互相竞争，用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取悦金正日。

平壤大同江地区的Ui-am宾馆是林东玉部长的。允许进入的人数非

常有限，而允许进入的人得到了他的特别信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进行国家机密的谈话。有一天，政策部长蔡昌国(音)来到宾馆时，我问他:“我们部门需要日本人吗?”

“你知道得太多会伤到自己的，”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开怀大笑。但那天晚上，当我们与其他干部在大院用餐时，在对日外交的背景下，同样的话题再次出现。蔡昌国似乎并不在意我是不是谈话的一部分，我心照不宣地明白，虽然他不能直接告诉我，但这是允许我知道的事情。那个晚上标志着我真正了解了朝鲜政权犯下的国际罪行的性质和规模。

朝鲜绑架事件的历史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朝鲜实际上一直由军方统治。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建立了军队的权威，以反韩情绪为基础巩固国内政治，并巩固自己的权力。但对金正日来说，军队是一个有威胁的实体:只要它能影响政策制定，它就能有效地掌握权力。金正日自上世纪70年代初就一直在为自己的继位做准备。在建立一个基于一党专政的国家的幌子下，金正日剥夺了军队的朝韩外交和商业特权，并将其转移给了劳动党。

由于金日成的高丽邦联战略的性质，军方不得不同意金正日的建议，根据该战略，朝鲜半岛最初将有两种政治制度，直到两个朝鲜能够在联邦政府下统一。要让这一切对金日成有利，不仅需要军事力量，还需要解散韩国的军事领导层。这是通过渗透韩国的民主运动来实现的，这些运动越来越多地起来抗议他们的军事独裁者。

这导致了统一战线部、战略司令部、第35办公室和外国调查局(外交事务局的前身)的成立，所有这些都由劳动党控制。为了展示党在朝韩活动中对军方的优势，1972年金正日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称为“本地化”。

虽然军方侦察局通过训练那些叛逃到朝鲜的人来培养间谍，但劳动党的新部门在如何获得“本地化”知识方面更加主动:他们选择绑架被监视的本国公民。最终，朝鲜军方被限制在收集朝韩领域的战术情报。虽然劳动党也在朝韩领域进行间谍活动，但其职责范围扩大到在国际层面上促进朝鲜统一(按照朝鲜的条件)，方法是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亲朝鲜的同情者，并从事反情报和心理战活动。

从事这些行动的干部提出了三个主要理由来证明金正日绑架外国公民的战略是正确的。首先，招聘能够提供本国“本土化”知识的教师，从而帮助培训朝鲜间谍。其次，它帮助实现了身份欺诈，并使朝鲜间谍获得了真正的外国身份。第三，根据个人的适应和忠诚情况，被绑架的儿

童可以接受训练，并作为朝鲜特工返回出生国。

1977年，最著名的被朝鲜绑架的日本女孩横田惠（Yokota Megumi）因第三个原因被绑架，当时她只有13岁。虽然她完全是外国人，但她的年轻意味着她可以被说服对朝鲜忠诚——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第二年，16岁的韩国学生金永南(Kim Young-nam)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数十名青少年在韩国全北群山市被绑架。

但是，被绑架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这是因为党的渗透韩国工作人员在Jochongryon，即日本的朝鲜人民协会有一个前哨站，从日本的基地发动对韩国的行动具有政治和地理上的优势。

然而，无论金正日的思想独裁的影响有多彻底，它都没有赢得被绑架者的真正忠诚。我认为，被绑架的青少年之所以能够抵制意识形态的洗脑，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曾经的生活，以及与父母分离的创伤，有着清晰的记忆。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正日提出了"生种战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的想法是打造看起来像外国人的间谍，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朝鲜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党的朝韩特工采取了双重战略，包括绑架外国女性，并将漂亮的朝鲜女性送到国外，让她们怀上白人、黑人或棕色皮肤的男性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出生在朝鲜，肤色与其他同胞不同，他们的余生都在严格的种族隔离中度过。他们的健康由朝鲜劳动党战略司令部915办公室负责，该办公室只接待朝韩特工。他们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需要都由朝鲜最有权力的实体——党的组织指导部直接安排。

然而，我的同学李贤淑却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度过了一生，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社会。这是因为，仅仅是她在平壤作为人质的存在，就提供了对抗她父亲的筹码，让他更有动力鼓励外国对朝鲜提供援助，并倡导有利于朝鲜的接触战略。

金正日在2002年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Koizumi)举行峰会时，首次向世界披露了他的国际罪行的规模。在确立了他对金日成的继承权后，他的罪行扩大到绑架。在此之前，就连日本人也对朝鲜可能绑架日本公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但在峰会上，金正日承认了横田惠等人被绑架的事实。他发表了道歉声明，称他是事后才知道这些事件的，特别部门实施绑架是出于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不仅日本，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金正日的严重误判源于朝鲜对日本114亿美元援助的预期，以及幕后发生的以下事件。就在小泉纯一郎抵达平壤之前，朝鲜外务省的最终峰会议程将提供给UFD以供查看。整个上午，我们都在等待议程的到

来，气氛很严肃:我们早些时候已经向金正日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说如果绑架问题已经被列入朝鲜-日本峰会的议程，就有可能因为韩国或日本平民的干涉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将使朝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而我们这边的某些人肯定会在峰会后遭遇可怕的下场。

接到主管朴哲的紧急会议通知后，我和同事们一起来到了会议室。桌子上放着议程，还有印在白纸上的一包文件。

“这份议程必须由101办公室确认，并在今天结束前送回总部。我们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单独发表意见，所以我建议我们提名一个人向大家大声朗读议程。”正常情况下，UFD的任何员工都可以查看金正日发给国务院的文件。但如果有部门会议讨论这些文件，这些文件就必须再次密封，并退还给它们的来源。

正如我们所怀疑的那样，议程看起来对我们不利。最重要的是，日本回应朝鲜提出的支付400亿美元战争赔款的态度令人担忧。朝鲜主张，自日本占领以来的战争损失和利息累计达400亿美元。日本回应称，在日本从朝鲜撤军后的一段时间里，朝鲜因使用日本建造的工厂、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而欠日本钱，这些设施后来没有被拆除。但他们打出的最中肯的一张牌是，日本不能用现金支付，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给美国提供机会，以检查核问题相关资金为借口进行干预。最终，朝鲜接受了114亿美元的物资援助。

小泉纯一郎抵达后，金正日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讨论之中，讨论的焦点是日本要求朝鲜就绑架日本公民一事做出国家层面的道歉。正如UFD所警告的那样，金正日已经走入了一个陷阱，他不得不参与一场“建设性”对话，这需要真正的——而不是战略上虚伪的——相互让步。

从金正日的角度来看，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第一次上午会议之后。日本代表团的房间被安装了窃听器。在会议休息期间，有人听到日本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强烈反对朝鲜不愿就绑架事件道歉进行谈判，并建议小泉纯一郎离开平壤，不要参加另一场会谈。这次谈话报告给了金正日，金正日当时肯定担心他迫切希望的外汇援助计划可能会面临风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震惊。

在随后下午的会谈中，金正日为绑架事件即席道歉。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公开道歉。在朝鲜方面，没有人见过金正日那样冲动地讲话，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再发生。为了减少损失，劳动党宣传动员部立即发布了金正日“承认”绑架的消息。但它无法控制日本媒体，他们适时地报道金正日已经为绑架事件“道歉”。

朝鲜有句谚语说:“拿着蛋糕的人没有分享的意思，但另一个人已经开始摆餐具了。”金正日梦想用双轨铁路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他经济重建计划的核心部分，因为他讨厌日本人铺设的单轨铁路，想要从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别提醒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宣传动员部通过所有媒体加强了反日宣传，强调朝鲜人民在日本占领下的苦难。

这就是金正日无视UFD建议的背景。为了表明他的观点，他在最后一刻把外交部的峰会议程发给了我们，作为对我们傲慢地批评他的象征性谴责。这被视为一个明确的警告，因为金正日通常在朝鲜与外部世界接触和外交的各个方面都信任统战部。从持续了几十年的紧张交换博弈中脱颖而出，统战部实际上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精心调整的组织，其使命是创造尽可能好的环境和背景，以确保各种“外交”和“接触”以有利于党的方式进行。在我们特殊的信任关系的背景下，统战部不得不参考外交部准备的议程，这是一种耻辱。尽管如此，我们一直担心114亿美元援助的前景会使金正日对其长期影响视而不见。

最终，以金正日道歉为高潮的2002年9月峰会对他来说，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随着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日本国内外传播开来，114亿美元的援助，以及在日本为朝鲜充当前哨和外汇安全的Jochongryon，都面临着风险。金正日允许五名被绑架的日本人去他们的祖国参观以示友好，但这并没有帮助。雪上加霜的是，这五人拒绝返回朝鲜。金正日被激怒了，并坚持在他有生之年不会再与日本举行峰会，除非日本支付他所要求的外汇。他重申了“外交是反情报行动”的规则，并取消了外交部对与绑架有关的任何问题的外交参与权利，将这些事务的控制权交还给了统战部。

第五章 朝鲜女人当“猪”卖

当我讲完“生种战略”时，申先生向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听着。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他一直与我们保持着某种居高临下的距离，但听了我的叙述后，他的态度似乎软化了。好像是第一次向我们自我介绍一样，他告诉我们他今年32岁，出生在延吉。他已经做了五年的掮客，帮助朝鲜难民逃离中国，并吹嘘自己在韩国情报机构有熟人。他补充说，任何与朝鲜难民一起工作的人都受到中国当局的监视，他已经不得不搬家好几次了。

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时瞥了他妻子一眼。多次搬家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是新婚夫妇，在一起开始新生活，但公寓里却没有私人物品。现在他想在韩国定居，过上稳定的生活，即使这意味着在那里做些卑微的工作。他边说边叹了口气，我觉得我们在他手里还是不安全。然而，当得知申先生的妻子来自朝鲜咸镜北道时，我对他的信任增加了，尽管永明似乎还没有被说服。

“早餐准备好了!”申太太在另一个房间里说。

我们刚和她见面，我就大声说，能见到另一个朝鲜人真是太好了。永明和我都急切地问她的故事和她的家乡。但她仍然面无表情，好像在问我们为什么对她的过去如此大惊小怪。她说话只是为了让我们赶紧吃东西，然后我们就沉默了。

她端出热气腾腾的米饭和浮着红辣椒油的炖豆腐。筷子和勺子被小心地放在我们的食物旁边。虽然她表面上有点不友好，但她显然是个热心肠的女人。这是我们过江后第一次真正坐下来享用家常菜，所以我立刻拿起了勺子。然后我意识到矮桌子对四个成年人来说太小了，而且只摆了三个位子。我注意到厨房里的地板上放着一只碗和一双筷子，看到她已经坐在它们旁边了。我还没来得及叫她加入我们，她就把一勺米饭塞进了嘴里。

“来，我们一起在这儿吃饭吧，”永明喊道。她垂下眼睛，转身离开了我们。朝鲜是一个父权社会，它直接从封建儒教到金氏王朝统治。从平壤往北走越远，女性的处境就越糟糕，寒冷和恶劣的气候只会让她们的家务更加繁重。但在异国他乡目睹这样的朝鲜地方主义让我感到尴尬。申先生也叹了口气，说他们需要买一张更大的桌子。为了掩饰尴尬，他详细地解释说，有客人时，房间不够用。但我很感激这个男人为了爱情娶了一个贫穷的朝鲜女人，这让我更加尊重他。

申先生先吃完，站起来穿上外套。他把我们的陈述、照片和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塞进一个信封，说，“中国当局有时会检查邮件。这就是为什

么我要把这个直接交给一个将驶往韩国仁川港的船夫。五天之内，我们将接到韩国人的电话或访问。然后你们就可以去首尔了。”

在他离开房子之前，他转过身告诉我们，韩国人在这种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会大喊“巴伊丁!”——在朝鲜语里的意思是“战斗!”永明和我面面相觑，喊道:“巴—伊—丁!”然后互相击掌庆贺。我们正要再喊一遍，但申先生的妻子先开口了，“小心!”她警告他。

大约三个小时后，门铃响了。申先生还没有回来，任何意想不到的声音都会让我们吓一跳。申太太在开门之前从窥视孔里窥视了一下。即使是这样的预防措施也让我们感到紧张，当她打开门闩时，我担心她可能会让麻烦进入房子。当门被打开时，随着一声巨响，几个女人踢掉鞋子走了进来。看起来她们的衣服都是在同一家商店里便宜买的，她们都穿着很薄的外套，其中一件有俗气的黄色拉链。其中一个女人背上有个孩子。他们操着和申女士非常相似的浓重北方口音，让她赶快关门，说今天到处都是警察，她们差点被拦下。

当她们注意到我们时，她们都沉默了。关上门时，申太太从她们身后喊道:“别担心，他们也是朝鲜人，是我丈夫的朋友。”我有点担心她会不小心暴露我们的身份。

随着女人们的到来和她们的谈话，我和永明退到我们的小房间里，关上了门。我很好奇他们在说什么，但他们浓重的口音和夹杂着的中文，几乎听不懂。

申先生一小时后回来了。他似乎很了解这些妇女，因为当他进来时，聚会突然活跃起来，但他立即离开了她们，到我们的房间来看我们，并归还了我们的文件。

“怎么样?你能把我们的文件寄出去吗?”他一进来我就问。

“是的，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寄去了。”他回答。

比起他说的话，他自信的微笑更让人安心。我问另一个房间里的女人是谁，申先生在回答之前检查了一下他身后的门是否关着。然后他靠过来低声说话。

“他们是成功逃脱的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贩卖人口吗?那是什么?”永明问道，我也很好奇。

申先生回答说:“在中国，女人比男人少，有些村庄根本没有女人。这些男人，没有钱就不能结婚。据说中国女人很吓人。还记得一个世纪前统治这里的慈禧太后吗?她很凶猛。总之，有相当多的男人专门绑架朝鲜女性，一旦她们越过边境进入中国。在边境地区，很多说朝鲜语的人都与犯罪组织有联系。”

“但常勇不会吗?”永明问道，希望答案是否定的。

申先生回答说:“我不是因为他是我叔叔才这么说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只知道他的牛和他的庄稼。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出人头地。你们俩真幸运。如果你遇到了不合适的人，你可能会被扣为人质，直到韩国间谍拿出足够的赎金。”

我记得在去他岳母家的路上，常勇告诉我们，能遇到他这样一个单纯的农民是多么幸运。我们坐在地板上时，申先生向我们靠得更近了。他接着说，“你知道他们怎么称呼这里的朝鲜妇女吗?”

我们摇了摇头。

“猪。在中国农村，猪是值钱的，所以人们称妇女为猪。他们是根据年龄和外貌来评分的。1级“猪”的价格在20万韩元左右；二级为15万韩元；而3级则是10万韩元。充当中间人的经纪人收取售价的一半作为佣金。一级相当于大约1500美元。如果你能以这个价格卖出去，至少你能住进更好的房子。”

“低于这个价格的女性会被带到非常偏远的农场，或者嫁给找不到老婆的残疾男性。他们的余生都在腐烂中度过——这里的乡村是个悲惨的地方。有些女人晚上被戴上镣铐，这样她们就跑不掉了。想想看，一个农民买了一个女人，这是一笔大投资，而这些朝鲜女人已经是跨越边境的冒险者了。你觉得她们不会逃跑吗?好吧，她们确实肯定要逃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她们被锁着，至少在她们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

“虽然大多数朝鲜女性都被出卖了，但朝鲜男性的结局只有两种。他们要么被抓到露宿街头，被遣送回朝鲜；或者，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钱，并遇到一个不错的经纪人，他们最终会到达韩国。但在人贩子看来，这里的女性每人至少值15万韩元。”

即使在我听的时候，我也怀疑我所听到的，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在朝鲜，被卖结婚也许比饿死好，但人像猪一样被定价是令人作呕的。一想到这些“妻子”被戴上了镣铐——想到外国男人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女人，我就感到震惊。我对那些从中赚钱的经纪人更生气。但最重要的是，我对金正日感到厌恶，他似乎一点也没有因为他把朝鲜女性的地位降低到这样的程度而感到羞辱，也没有足够关心去干预。

永明也很震惊。他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躺在地板上，然后又坐了起来。他问有多少女性处于这种困境中，申先生说他所知道的是大约有10万朝鲜人被困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我不敢相信平壤竟然没有人谈论如此严重的局势。

这时门开了一条缝，一个染了棕色头发的女人探出头来。“你是从平壤来的吗?”她问。“我朋友刚才说你是。”然后她走到门后低声说:“你说——我说不出来。”

我不知道她们想要什么，但她们似乎在互相推搡。申先生大声问道:“酒吗?你想喝点什么吗?”

“是的!”大家齐声回答，最后我们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地吃了顿午饭。在申先生的中国小公寓里，现在住了5个朝鲜人，我们开始依次自我介绍。第一个打开我们房间门的女人说她来自清津；她旁边的女人是咸兴人。我们依次加入沙里院、平壤和延吉，然后举杯为我们所有的家干杯。我们喝了三瓶中国烈性酒，只吃了酸菜和吃剩的豆腐，但和他们在一起，这是一场精彩而丰富的盛宴。

也许因为我们都是朝鲜人，都是逃犯，谈话的话题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如何躲避中国当局的视线。女人们似乎都同意染发的重要性。在朝鲜，由于纯粹的民族认同观念很强烈，所以每个人的头发都是黑色的，女性越过边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染成另一种颜色。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人，而不是逃亡中的朝鲜人。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所有的女性确实都把头发染成了不同深浅的棕色。那个背着孩子的女人把孩子哄睡着后回来了，她的头发也是棕色的。当永明说她们浅色的头发看起来像西方人时，她们笑了，对自己的伪装感到高兴。

对于难民来说，我们无法带走的东西带来的痛苦往往比我们正在逃离的东西更大。因此，当谈话转向谈论家乡时，每个人都认真地听着。在每个人的故事结束后，我们举杯缅怀逝去的亲人。然后轮到最年轻的女人说话了，就是带着孩子的那个。她还没有开口说话，永明也许是想让事情更容易些，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轮流说话的时候你不在。你多大岁数了?”

“16岁。”传来平静的回答。

事实上，永明怀疑她年轻，一直劝她不要喝太多酒。但她继续啜饮着杯子，现在她的脸颊变得鲜红。

“你真幸运，能和你的小妹妹一起出去，”他说。“你妈妈呢?”我相信永明是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但女孩眯起眼睛，狠狠地看了永明一眼，愤怒地啧啧叫了一声。然后她在塑料杯里装满了烧酒，一口气喝完了。

永明试图道歉:“对不起，我知道你妈妈没能和你一起越境。我希望你能再见到她……”

还没等他说完，女孩就把空塑料杯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闭嘴，你这个混蛋!”她喊道。

我们目瞪口呆。永明做了什么，引起了这样的反应?更让我们困惑的是，除了永明和我，其他人都保持沉默，看向别处。

永明环顾四周，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女孩又对他尖叫起来。“我是母亲!这让你感觉好点了吗?还有那个孩子，她不是我妹妹，她是我女儿。那么问题是什么呢?我是个怪胎吗?我的小女儿是个怪胎吗?”

永明的筷子从他的手指上掉了下来。她可能需要母亲的爱，然而她自己也是个母亲，有一个孩子需要照顾，而且在逃亡中，年仅16岁。就像她可怜自己一样，女孩突然抓住申太太的手哭了起来。“我该怎么办呢?”她抽泣着说。“我昨天去了医院。一个朋友带我去的。你知道医生怎么说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说不完话，拍了两下胸口。申太太给她倒了一杯水；她一口气喝了下去，又说了起来。“我的小贞贤，他们不能治好她的眼睛。她下半辈子都要瞎了。你知道他们还说了什么吗?他们问我怀孕时是否发生过什么事，是否碰过子宫或摔倒过。”

我看着女孩的眼睛，她的眼睛因为泪水而变得清澈明亮。她颤抖的嘴唇是淡粉色的。这次是我递给她水。她好像忘记了周围的环境，抬起头对着天花板说:“我昏过去了。那个混蛋买下我的时候，我才十四岁。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开始脱我的衣服。那个中年怪物。你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吗?我开始哭，因为我害怕。然后他的母亲和妹妹走进了房间，那两个女巫。他们按住我的胳膊和腿，把我的内裤脱了。”

女孩开始颤抖，一边哭一边紧紧抓住申太太的胳膊。“然后，你知道吗，那个所谓的婆婆，嫂子，当她们把我按倒的时候，那个老怪物，他——你知道——就在她们面前。”

申太太抿着嘴，眼里噙着泪水，紧紧地抱着那女孩。

女孩呜咽着说:“然后我就昏过去了。后来，我可怜的贞贤，我的贞贤生下来就是瞎子。因为那个该死的怪物。”

我努力眨着眼睛，不让泪水涌上眼眶，但却止不住。永明喝了杯烧酒，也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申太太把这位十几岁的母亲领进我们睡过的房间，唯一的声音是其他女人的啜泣声。那孩子只有十六岁。还有多少像她这样的人，被世人遗忘了?她们的生活是多么悲惨。当其他女性开始敞开心扉，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时，我的胸脯更加紧绷。

先介绍自己的清津女子说，至少她能跑掉。“我老家认识的一个女孩也过江逃了出来。她被卖到一个中国农村家庭，在那里她被锁起来，被家里所有的男人性交。今天是公公，明天是姐夫，都和她睡在一起。所以她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是丈夫还是公公还是姐夫。最后，他

们把她介绍给村里的其他男人，把钱私吞了。幸运的是，有一个好人帮她逃了出来。”

“中国有很多‘黑户’，是被朝鲜妇女遗弃的婴儿。因为她们的母亲是朝鲜人，她们没有任何权利，她们的出生也不被中国承认。他们不能去上学或做类似的事情，他们住在街上。这就是他们被称为‘黑户’的原因。”

这个来自咸兴的女人，在此之前似乎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她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她仍然无法相信她必须讲述的故事是她自己经历过的。

“我不打算提我自己的经历，但在我被卖之前，我被一个经纪人囚禁了起来。除了我，那儿还有十六个女人。他说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工作赚钱，结果变成了性聊天。我们被迫在镜头前全裸。当我反抗时，他威胁说要向当局告发我。当我还反抗时，他打了我。从早到晚，我们被逼着聊性。但六个月的工作加起来只给我们带来了大约一百美元的报酬。他说养活我们太贵了。此外，作为没有合法身份的朝鲜人，我们不能在这里开银行账户。所以经纪人说他会把我们的工资存在银行里，他会连本带利地还给我们。但是，到最后，我一个子儿也没看到，连那一百美元也没看到。他说他在一笔交易中丢了。在从我们身上赚了大约一年的钱之后，他打算把我们当作刚刚越境的新难民一样卖掉。他说如果我们不服从他就杀了我们。说真的，我知道他会杀了我。这一认识给了我逃跑的决心，然后我在街上遇到了我的朋友们。我们要去天津看看能不能在餐馆工作。他们说那里有很多韩国人。也许我们会遇到能帮我们去韩国的人。”

永明因为喝酒和愤怒而红着眼睛，明显很激动，她说回国可能比在中国忍受这样的羞辱更好。

“你真的是朝鲜人吗?”一个女人惊讶地问道，她还说，虽然她也许能忍受饥饿，但她再也受不了回到那个残酷的国家了。其他人也加入进来，咂咂舌头表示不赞成。

我原以为最孤僻的咸兴女子紧张地掰着指关节，激动地说，中国的很多难民都经历过遣返。我们这些被遣送回国的人，知道边境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通常会再次尝试逃跑。你知道遣返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吗?就连手铐也不一样。在中国，手铐又新又亮，但你一过鸭绿江上的友谊桥进入朝鲜，他们就换了手铐。朝鲜的手铐生锈了，令人作呕。此外，即使他们是外国人，中国人也比我们自己的人更有人情味。在我被遣返之前，一名中国官员甚至向我道歉，并给了我100元。但在朝鲜，他们是无情的。”

“他们把我们这些女人聚在一起，脱下我们的衣服，用手指摸我们的阴道。你知道的，找隐藏的钱什么的。孕妇被当作动物对待。我被抓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女人。朝鲜军官说她身上有中国杂种，一脚一脚地踢她的肚子，直到她昏过去。她死了。”

“当你经过处理后进入监狱时，那就是你真的想自杀的时候。他们会让你几天都睡不着觉，还会殴打你，审问你，以了解你是否打算去韩国或美国。如果他们怀疑你有任何一种行为，你就会被送到真正的劳改营，而不是被送到普通的劳改营服刑三年。但即使在那里，也很难做到不遭受永久残疾的痛苦。我一想到要去这两个地方就受不了。看到眼前的一切，我无法面对。所以我吞了一个发夹自杀。那些混蛋带我去了医院，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说，像我这样意志坚强的人肯定会把韩国作为我的目的地，等我一康复，我就会被送去接受六个月的预审监禁。”

“晚上，当监控松懈的时候，我设法逃了出来，再次过江。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敢相信。他们把我的肚子切开，把发夹取出来，然后缝合起来，虽然伤口又裂开了，但我感觉不到任何疼痛。真的，一点也不疼。”

当我听着她们的故事时，我能生动地看到每一个场景，想象自己被带走和遣返。刚才给我们讲了她的故事的那位女士问了我一个问题。

“这么说你是平壤来的干部。你为什么要离开?”她说话时，房间里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我们。似乎每一个目光都在说：“我离开是因为我别无选择，但你能有什么困难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永明首先发言。他说，“你们都是朝鲜人，你们听说过‘审查’吧?”

“是的。”有人回答。

“嗯，那件事的行政主管是我父亲。”

来自清津的女子在给自己倒了一杯烧酒时突然僵住了，好像连液体都变成了冰。当每个人都盯着永明时，他们的脸上不仅流露出震惊。人们突然对他敬而远之，仿佛他是一个怪诞恐怖的对象。

在整个朝鲜，只要提到“审查”，就足以让任何哭泣的孩子安静下来。当时每一个活着的朝鲜人都知道1997年8月开始的金正日审查，以及随之而来的血腥屠杀。

一个闷热的夏日，平壤发生了一场死刑。数十万观众聚集在一起观看行刑过程。据说，那个被判死刑的人是外国间谍。但事实上，站在笔直的木板上——四肢和躯干被绳子捆绑着——的被告不是别人，正是劳动党农业书记徐宽惠。作为掌管朝鲜粮食供应的人，他成了金正日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公共分配系统(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崩溃后大范围

饥荒的替罪羊。

徐宽惠(Seo Gwan-hui)被控为美国人和韩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据称，他受他们指派，在农业领域有系统地破坏朝鲜的“自力更生”原则。结果，庄稼年复一年地歉收。由于被指控饿死人民，他没有被行刑队处决。相反，他被激动得歇斯底里的人群，用石头打死。

徐宽惠(Seo Gwan-hui)被判间谍罪后，韩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清洗，并向“内部间谍”(the Spies Within)宣战。这场运动是处理徐宽惠的同一套机构运作的。当时，社会保障部(Ministry of Social Security)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监督朝鲜人的记录保存。每个朝鲜人在出生时都被分配了一本身份证明小册子。这是一张终生的成绩单，记录了他或她在教育中的任何变化，对工作场所的贡献和在当地党支部的努力。即使一个人没有工作，负责其居住地区的官员和部门的官员也将共同为他或她的行为打分；所以空白年份是不可能的。

社会保障部为了“证明”徐某与外国情报机关勾结，主张说，徐某的身份证明簿上的空白处表明，徐某曾出国到美国接受秘密训练。事实上，这三个月的空白反映了他生活中一段没有记录的时期，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混乱的朝鲜战争期间。

由于犯罪证据是通过仔细检查他的身份证而获得的，一场恰如其分的名为“审查”的运动开始了。这一过程升级到每个持有朝鲜战争时期身份证的人都要接受审查。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专门的审查办公室，总部设在社会保障部。永明的父亲、社会保障部部长黄振泽（Hwang Jin-thaek）被任命为监察本部行政科长。崔文德（Choe Mun-deok）被任命为政治主任。

金正日为了巩固社会保障部的权力，并在金日成去世后的不稳定局势和多年的大规模饥荒中分散注意力，他把监督运动的全面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妹夫张成泽（Jang Song-thaek），张成泽当时是党的行政部副部长。金正日的意图是增强社会保障部(Ministry of Social Security)的影响力。在此之前，社会保障部的监督权力一直低于国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和军方。由于金正日的话就是法律，而且在朝鲜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力，他通过宣布“我是你的审查运动的第一个对象”，实际上把监督的领导权交给了社会保障部。因此，社会保障部上升到同时控制军队和国家安全部的地位。

文成术（Moon Sung-sul），劳动党总秘书，在党内排名仅次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第三位人物，成为了金正日批准的审查的第一个受害者。作为劳动党总部的负责人，文成术还担任劳动党OGD的第一副部长，这

些部门的报告最终都要汇总给他，他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尽管如此，他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被张成泽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因为他负责将张成泽置于OGD的监视之下，并以张成泽是金氏家族的“分支”——构成了最大的派系威胁为理由限制张的影响力。

张成泽趁机将文成术严刑拷打致死，进行报复。然而，这一举动不仅仅是张成泽的个人复仇行为；这是对OGD领导层的一个明确警告，如果他们失去金正日的青睐，他们也不能幸免于毁灭。

国家安全部也收到了同样的警告。1998年，在“审查”期间，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金龙龙(Kim Yong-ryong)在社会保障部工作人员冲进他的房间逮捕他时开枪自杀。

就在这个时候，永明的父亲黄振泽(Hwang Jin-thaek)也被捕了。他对文成术倒台一事提出了质疑，而张成泽得以获得金正日的批准，以反革命罪名起诉黄振泽。

在张成泽带头进行报复之后，监察政治主任崔文德以涉嫌间谍罪起诉了平壤市委书记徐润锡（Seo Yoon-seok）。崔文德是在报复徐润锡的罢免。有毒的水向下渗透，其他人则受到上级树立的榜样的鼓舞，试图以类似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个人恩怨。通过广泛滥用审查机构提供的监视权力——该机构依赖于朝鲜战争记录条目中的漏洞，一场大屠杀席卷了整个国家。近2万名干部、军事人物和安全人员，以及退休学者、艺术家和运动员被处决或送往劳改营——这只是根据劳动党官方公告公布的数字。实际影响要大得多，因为连坐的原则，亲戚和亲密伙伴都和“罪犯”一起被清洗。

由于朝鲜干部和普通民众的不安和不满情绪不断增加，金正日决定将矛头转向“审查运动”本身，以缓和局势。根据他的说法，早期检察官崔文德滥用职权，在审查中播下了“贪婪权力”的危险种子。崔文德一人承担了金正日和张成泽的主要责任，并于2000年2月被公开处决。在他手下直接工作的六千名官员被立即剥夺了职级。

此时，永明的父亲得到了复职，党也恢复了他的名誉，但他在出狱两周后死于医院。永明说，当他看着父亲睁开但毫无生气的眼睛时，他哭了，不是因为哀悼，而是因为这一切的不公。他父亲曾在公开法庭作证反对专制。可怜的囚犯被卡车从劳改营运来，推到大厅里；甚至当最高指挥官金正日的释放命令被宣读时，他们也认为这可能是死刑的残酷前奏。一人求饶；另一个人咳血昏倒，以为自己要被杀了。有几个人实际上被处决了，因为他们在党厅的观众面前咒骂金正日。

在其他方面，“审查”受害者所经历的悲剧仅靠言语是无法扭转的。

有些配偶在丈夫或妻子被判刑时逃脱了惩罚，但被强制离婚，他们已经再婚；其他人则自杀了。一些受害者返回家园后发现他们的家园和财产被重新分配给他人，最终流落街头。随后，金正日下令各地区党委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房，并提供大米和食用油。党的宣传动员部以此为证据，发起大规模宣传运动，将金正日的领导描述为“像上天一样拥抱人民”，从以前的“强有力的领导”口号转变过来。

第六章 不知所措

我们和这些朝鲜女性只相处了一个下午，尽管时间很短，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们把每个人在朝鲜的生活经历压缩成几个小时，彼此分享，不再只保留在自己心里。最重要的是，我和永明以及这些女性在一起的经历证实，金正日暴政所依赖的谎言不可能永远免于审查。当我们在体制内时，他对绝对权威的指挥似乎是世界上真理的唯一和最有力的体现。但是，这种力量是多么邪恶和反常，甚至在我们离开它的边界之后，它还在追赶我们。

直到从外部世界回头看，我才意识到这种力量不可能属于一个强壮的人。这是一个被打败的男人的愤怒，一个不仅被永明和我抛弃的男人，而且被他认为是毫无价值和软弱的人抛弃的男人，比如这些忍受了最严重羞辱的女人。

我从这些女性身上学到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勇气。永明和我计划的逃跑是在绝望中诞生的，我们只是承诺如果失败就自杀。但这些女性被强大的决心所驱使，即使在被捕并返回朝鲜之后，她们也会继续尝试逃跑。对她们来说，这种决心促使她们决定采取行动，穿越中国来到天津。我们的命运并不孤单。

问题是，虽然申老师教过我们在这样不确定的时刻要喊“巴依丁”，但依然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所希望的奇迹会成为现实。即使她们走了，家里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她们的声音了，我们仍然没有收到韩国方面的任何回应。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申先生也在叹息。我尽可能长时间地把我的疑虑藏在心里，但最后我不得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还得躲着等多久?他叫妻子出去买些酒。然后他坐下来，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韩国人。他对朝鲜难民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他为韩国情报机构工作。”

“什么——你认为他为中情局工作?所以你不确定?”我问。

“哪个间谍会承认自己是间谍?”我见过他几次，他对朝鲜很了解。他说话总是小心翼翼，这是肯定的。他给了我几次定金，让我如果碰巧遇到平壤的叛逃者就联系他。就在几天前，他还在查你们的近况。我给你买的衣服，吃的，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开销，都是他的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购物后我拍了照片，连同你的文件副本一起寄给了他。但奇怪的是，我再也无法和他沟通了。当我拨打他的手机时，说这个号码不存在。”

我所有的希望瞬间破灭了。我们曾经信任的那个人，申先生的联络人，我们的救世主，可能只是个幻影。申先生甚至不确定这名男子的身

份，也根本无法保证他为韩国工作。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不确定的人创造奇迹。我甚至后悔问了这个问题——一无所知总比这种新的不确定要好。不仅是未来，甚至是迄今为止一直保佑我们的奇迹，这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为什么到我们的同胞生活的国家如此困难?申先生解释说，还有其他途径，可以通过越南、蒙古或泰国去韩国，但这只会让我们感觉更糟。从边境到延吉，我们已经有几次险些被捕——我们怎么可能走这么远，越过这么多边境?最后，问题出在了钱上。申先生提醒我们，待在这里不再需要钱，去任何地方都需要更多的钱。

永明说了声对不起，就去了我们的房间。他拿着信封回来了，信封里有他亲戚的地址。当申先生读到纸条上的内容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睁大眼睛的表情让我想起了他的叔叔常勇，他说这个亲戚一定很富有。他立刻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他说的是中文，我听不懂，但从他的脸上可以明显看出通话进行得很顺利。挂断电话后，他转向我们，开始解释时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

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延边广播公司的记者，他说，如果这些人真的是你的亲戚，把你送到韩国应该不成问题。事实上，我想我也听说过这个名字。这位女士，她出现在中国学校的教科书里，是一位抗日女英雄。她的孩子们在沈阳也有土地。她真的是你的亲戚吗?”

金日成的反日经历被极大地夸大，并像宗教教条一般灌输到每个朝鲜人的头脑中。此外，所有著名的朝鲜族抗日战士据说都效忠于金日成。在中国教科书中，朝鲜人被视为少数民族，他们被称赞为朝鲜族中国“抗日英雄”，而在朝鲜教科书中，他们被称赞为“金日成的忠诚同志”，追随金日成的抗日脚步。

我回答说，即使在朝鲜教科书中，永明的祖母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既然如此，申先生说我们绝对可以从这里到达韩国。对我们的关系，他甚至比他卑微的叔叔常勇还兴奋，甚至要求我们带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去韩国。那时我才知道，来自中国的朝鲜族人在被承认为朝鲜难民的合法配偶后，也有资格获得韩国公民身份。申先生对这种可能性的看法比我们乐观得多，他说我们当天晚上就应该去永明亲戚家看看。

永明急切地穿上外套，但我感觉不那么积极。可以肯定的是，到现在为止，警察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这位亲戚的房子。永明争辩说，韩国联系人已经10天没有回应了，现在电话号码坏了——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至少我们有申先生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决定试一试。

申先生坚持要我们叫一辆昂贵的出租车，这样看守房子的警察就不会那么怀疑。经过半小时的旅程，我们到达了一座私人住宅，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富丽堂皇，令人印象深刻。问题是周围的区域灯火通明。还有一辆看起来很可疑的私家车，它的侧灯开着，发动机在前门对面运转。我说我们应该绕着街区开车。但是，无论我们如何仔细地检查该地区，似乎步行都不可能安全地接近建筑物。

最后，我们决定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坐在出租车里等待，让申先生去那个住宅。他要安排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如果永明的亲戚不相信他是代表永明来的，他就会把永明的一个亲戚带到我们等候的巷子里。当他离开时，永明和我焦急地等待着。尽管很冷，我的手心还是在出汗。一旦申先生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那感觉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永明想让我们再绕着街区转一圈，但我们俩都不会用中文跟司机说话。

大约15分钟后，申先生跑了过来，胳膊和腿都乱蹦乱跳，明显惊慌失措。他一坐进出租车，就向司机挥手，催促他出发。他的眼里充满了恐惧，转身看看是否有人在跟踪我们。永明和我问了几次发生了什么事，但每次他都简短地回答说，等我们下了出租车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把车停在他家附近，而是往前开了几个街区。

出租车一走，他就生气地转向我们。“在延吉这里很多人都说朝鲜语!甚至一些中国出租车司机都懂朝鲜语，所以如果你一直问发生了什么，我该怎么说?”

他浑身发抖，用颤抖的手给自己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他稍稍平静下来，递给我们每人一支。我不想接受。他显然有坏消息要告诉我们。

“现在听着”他说，语气里透着不祥。“即使我们分开了，也不要想去那所房子。那里不只是被警察包围。甚至还有一些朝鲜特工待命，是国家安全部的检察小组。”

我们一听说国安部的检察小组，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影子降临在我们身上。

“当我按门铃时，一个男人出来了，说他是这家里的儿子。我告诉他是平壤的永明派我来的，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他不想知道他表兄的事，而且在你祖父母去世后他和你没有任何联系。他说，一个杀人犯怎么敢到他家来——你在浪费警察的时间，他和他的家人不得不应对朝鲜特工的持续监视；他说如果你想活命就别再出现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说服他来见你，但你知道停在大厦对面的那辆车吗?两个人从车里出来，开始向我走来。如果我没有看到他们，我现在就在审讯室里了。”

光是听到他说话，我就不寒而栗。如果我们自己去了，或者申先生被俘了，会发生什么?这种可能性让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担心那辆车可能一直在跟踪我们。我告诉申先生，我们应该回到公寓里，然后转身走，但当永明倒在一条小巷里时，我吓呆了，开始悲哀地呜咽起来。

回到公寓，我们试图安慰永明。就连他在朝鲜以外的家人现在也把他视为杀人犯，我很同情他，因为他看起来那么瘦小、那么孤独。申先生说，这位堂兄已经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他可能会改变主意，再打过来。尽管申先生尽力表示同情，但我觉得他的话缺乏说服力。永明的绝望是显而易见的，他甚至懒得脱下外套，从墙上滑下来，把头放在膝盖上坐着。

申太太在另一个房间里骂她丈夫。

“什么?你给他们留了电话号码?如果他们把它交给朝鲜方面呢?你到底在想什么?关掉手机，取出芯片!”

永明抬头看了看声音，但又陷入了沮丧之中。我度过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夜晚，先是试图让永明平静下来，然后在朝鲜特工已经把我扔进牢房的噩梦中进进出出。

第二天早上，我们很早就离开了申先生的家。对我们来说，在那里再呆下去太危险了——不仅对申先生，对他的妻子也是如此，她和我们一样，是在中国的朝鲜人，一旦身份被发现，她可能会被遣返回国。申先生让我们记住他的电话号码，说我们应该经常联系，因为韩国人可能会回复。他还把100元钱放在我手里，大约15美元。他为那一小笔钱表达抱歉之意，但好像他能给的只有这么多了。如果没有那100元，我们一走出大楼就会迷路，就像身无分文的外国人，在我们不懂语言的土地上游荡。

比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钱这一事实让我们的心情轻松了一些。申先生为我们送行，陪我们走了一会儿，并建议我们去寻找教堂。他说，这些地方有时会给朝鲜难民提供钱、食物和住所，传教士甚至可能帮助我们到达韩国。但是，他说，我们必须谨慎地坚持说我们是因为饥饿而逃离这个国家:如果他们发现我们被指控谋杀，可能会把他们吓跑。他还警告我们，有些教会是中国当局的幌子，可能会告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太轻易相信任何人。

“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宗教会免费给陌生人钱和食物，”永明说。他几天来第一次笑了。我为那个微笑感到欣慰。前一天晚上，他因为表弟的拒绝而辗转反侧，我躺在床上，担心他今天的脚步会有多沉重。我故意和永明大声击掌，低声说:“巴——伊——丁!”在我们拍手的声音中。

永明好像要把胸口的重物举起来，他使劲地拉，脖子上的青筋都露出来了，他低声叫道:“巴——伊——丁!”“战斗!

我们下意识地去拿太阳镜，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时，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这不仅有趣，而且可悲——就在我们鼓起勇气几秒钟之后，我们就在这里，把自己藏在黑暗的镜片后面。申先生送给我们的太阳镜比他给我们的食物、帮助和住所还要伟大。

我和永明戴着墨镜，按照申先生给我们的建议，走到延吉郊区，寻找任何有十字架的建筑。

“当我们遇到牧师时，我们应该对他说什么?”永明急切地问。我热情地回答说，我们应该回答每个问题，“阿门”，一切都会解决的。我一边说着，一边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自豪。

作为统战部的前成员，我以为自己对宗教了如指掌。即使在朝鲜，也有宗教。更具体地说，朝鲜有许多宗教机构是由统一战线部控制的。但实际上，朝鲜是一个单一宗教国家，只允许崇拜领袖。统战部的宗教机构的存在是为了让朝鲜声称自己是一个多元社会，从而符合那些希望通过第二条道路或“非正式”渠道提供援助或与朝鲜接触的人的价值观。

朝鲜所有的宗教机构都由统战部的“第二条道路外交”人员组成，包括朝鲜佛教协会、朝鲜基督教协会、朝鲜天主教协会和朝鲜天主教中央委员会。我知道，在与外界打交道时，统战部使用了不同宗教机构的名称。在内部，使用这些名称是非法的，所以它们是用数字来指代的。尽管在外界看来，这些干部可能是僧侣或牧师，但在统战部中，他们都是金氏宗教的忠实追随者。

如果你在平壤，去东大院地区的长天洞或万景台地区的八谷洞，你会看到屋顶上有十字架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里做礼拜的牧师唱着正宗的基督教赞美诗，就像朝鲜以外的人在普通教堂里唱的一样。但是集会完全由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组成，出于对党的责任，他们有义务参加。然而普通朝鲜人不可能在这些建筑里做礼拜，那里只允许统战部人员和外国人进入。

但是，在2000年，发生了以下事件。有一次，为了欢迎一个国际宗教组织来到朝鲜，统战部大张旗鼓地向公众打开了平壤Jangchun教会的大门。一位80多岁的老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本他藏了一辈子的《圣经》。他说，他在朝鲜战争前信仰耶稣，但在美国轰炸中失去家人后，他改变了信仰，成为最高领袖金日成的狂热信徒。他接着解释说，在他这个年纪，旧的记忆变得很重要，他来教堂是因为他很喜欢听童年的赞美诗。这位老人被身穿祭司服的统战部特工报告，并被秘密警察当场逮

捕。

这名干部随后被授予一级勋章，这是为对金正日最忠诚的人保留的，以表彰他揭露了一个宗教分子，这个宗教分子成功地将自己的颠覆信仰保密到现在。我坐在观众席上，为这位干部领取奖章鼓掌。这位老人被送进了劳改营，直到今天，同一本《圣经》仍被统战部用作吹嘘朝鲜宗教宽容历史的道具。

这些宗教活动让统战部享受到了普通朝鲜人无法享受的奢侈品。从技术上讲，朝鲜仍然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在朝鲜内部，所有来自外部的人道主义援助都被称为“战利品”。因为朝鲜体制将自己与主体思想联系在一起，它禁止使用“援助”一词，这被视为对“自力更生”的威胁。结果，统战部的员工每月收到的礼物包括各种韩国和国际宗教组织作为人道主义援助捐赠的“战利品”。

例如，2001年4月15日(金日成生日)，由韩国一家佛教NGO捐赠的自行车发给了统战部，足够我们每人拥有一辆。次月，一家韩国基督教NGO捐赠的尿布和奶粉被分发给了员工。我从亲身经历中知道，统战部的影响力有多大，因为它控制了向外界展示朝鲜的方式。这也是我如何知道“阿门”是一个强大的词，可以感动基督徒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能在延吉找到一个教堂。

但是，尽管永明和我走了一整天，我们没有遇到一个可以说阿门的教堂。任何有十字架的建筑要么是废弃的要么是上锁的。有一次，一名保安打开了门，但我们一说是逃北者，他就大发雷霆，把我们当成流浪狗一样赶走了。我从惨痛的教训中了解到，我们朝鲜人在国外是如何被憎恨的，尽管党教导我们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最光荣的人民，金日成的人民”。每次被拒之门外，我们都不幸地拿金氏王朝开玩笑，说金氏王朝让世界把我们看作是人渣。

当天开始变黑时，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兴奋，也许是因为我被白天的明亮吓坏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能像气球一样飘到黑暗中。摘下墨镜后，我看得比白天还清楚。我们周围全是乡村，没有别的行人。我可以自由地呼吸，与永明畅所欲言，而没有多疑和妄想，这让我觉得自己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开拓。

一月的寒风并不让我们担心，我们也不担心在户外度过冬夜。毕竟，我们已经在冰冻的山上度过了几个夜晚。在严冬的天空下，在中国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跑在一条无边无际的乡村小路上，扯着嗓子大喊。

我们最后到了一个叫龙井（Longjing）的小村庄。我们并没有打算

去那里——我们只是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寻找教堂，这是我们沿着随意的道路走到的第一个村庄。我们决定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再出发。

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空的马厩。它至少能挡住寒风。地板上也铺着厚厚的稻草。入睡前，我们把100元钞票拿在手里，每人举着一面，盯着它看了几分钟。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我们现在会看到什么?没有它，我们会多么绝望。在朝鲜的家中，我曾对那些被活活饿死的孩子们的尸体感到同情，但却把目光从成年人的尸体上移开并摇摇头，我当时心想:“他们为什么不更努力地活下去呢?为什么他们会愚蠢到饿死，对自己或对任何人都没有责任感?他们至少可以偷点食物，然后继续生活。”但那天晚上，我看到自己生命的尽头就在不远处。在我们用完钱，几天没吃东西后，我可能会坐下来，闭上眼睛休息，让意识消失，甚至意识不到我正在死去。我被这些想法惊呆了，我想测试一下我的声音，看看它是否还在。

“我相信会成功的。我们能在钱花光之前赶到韩国。我虽然说了这些话，却并不相信。”

永明放开了他那张纸条的一端，放下了他的手，好像他也不相信这些话，好像这100元钱不会打开我们的路。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想睡觉。但看在明天早上的份上，我不想就这样结束一天。我还能说什么呢?一想到要说话，我的嘴唇就发麻。最后，我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开始用口哨吹奏家乡的民歌《故乡的春天》。当我唱完第一段，开始吹第二段时，永明以较低的和声加入了我。

我们的饥饿和绝望减轻了一些，我想起了我们在音乐学校的一次表演。学西方音乐的学生借了铜管乐器来表演一场壮观的演出，那场演出让观众哄堂大笑。铜管乐器并不罕见，但它们的演奏方式是最关键的：小号演奏得诙谐，低音大号的声音缓慢而低沉，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掌声过后的沉默之后，学习作曲的男女学生组成了一个吹口哨的合唱团。观众都疯了，我们让整个学校吹了好几个星期的口哨。

当我们在马厩里吹口哨的演奏接近最后几个音符时，永明的脸上露出了淘气的笑容，他用不和谐的音符继续吹了一会儿。我故意延长了最后一个音，永明恢复了和声，我们以一个美丽的双音结束了。

永明先小声说:“巴——伊——丁!”

我回答道:“巴——伊——丁!”我发现我紧张的肌肉放松了。这可能就是我能睡着的原因。而那天晚上以前，连树叶的沙沙声都让我害怕。那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我能够忘记边防人员和朝鲜特工可能潜伏

在每一栋建筑、每一丛灌木和每一棵树的阴影里。

第七章 再会，永明

我们在牛的哞哞声中醒来。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发现旁边有个棕色的大东西在动，我吓了一跳。一头巨大的牛，好像被闯入它家里的人惹恼了，从它狭窄的眼睛缝里看了我们很久，大声地哼了一声。我本能地拍了拍口袋，生怕那头牛偷了我的钱。看到藏在我的诗里的那张红色的100元钞票，我松了一口气。

永明也坐了起来。他看看我，又看看那头牛，正要说话；但随后他低下头，开始可怜地抓着稻草。我们俩都意识到，我们的脸和衣服都被弄脏了，常勇说过，逃犯的样子会暴露我们是在逃的朝鲜人，但现在我们看起来就像逃犯的样子。如果我们这样继续赶路，毫无疑问会有人向当局告发我们的。我们用堆在谷仓外面的白雪擦脸，但雪土混在一起会更脏，使情况更糟。

我们走到最近的一所房子，敲了敲院门。院子的栅栏不是用水泥或砖块，而是用紧密连接的木板做成的。烟囱散落在暗橙色的铁皮屋顶上，上面没有我们在一些房子上看到的朝鲜屋顶瓦片。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我们感到很脆弱，因为我们肮脏的脸要暴露在任何开门的人面前。有一些动静，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点，露出一个老人正盯着我们。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外套，但纽扣又亮又新，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农民。他可能已经很老了，但他的脸看起来更年轻而不是老。他可能马上就能看出我们是在逃的朝鲜人，因为他要把我们关在门外。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先生，我们可以用您的肥皂洗脸吗?”

老人没有关门，而是把头从缝里伸出来，上下打量着我们。我们以为他可能听不懂我们的朝鲜语，但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完全打开了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我们说话，我们听到了欢迎的言辞。

“进来。”老人的院子干净整洁，不像常勇的房子那样墙壁摇摇欲坠。角落里有三棵苹果树，树干上裹着稻草，以防树被冻坏。老人离开在院子里瑟瑟发抖的我们，走进了房子。

过了一会儿，他从厨房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铜脸盆，里面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热水。我们赶忙过去帮他拿，把它搬到院子里苹果树对面的角落里。当永明和我礼貌地互相谦让让对方先洗时，老人拖着脚步向我们走来，点了一支烟，问道:“你是从江对面来的吗?””

永明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是的。”

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在冬天早晨的空气中白得可怕。他说:“难民来我家找我要吃的，真是没完没了。甚至有人偷东西，向我扔石头。但你!在我的一生中，我想从来没有人向我要求洗漱!”他难以置

信地摇了摇头。“你吃过了吗?””

当他看到我们不能立即回答“是”时，他踩灭了抽了一半的香烟，让我们洗漱后进来。他又从厨房里喊道:“你洗干净了就进来吧!”

洗漱完后，我们倒出肥皂水，把脸盆靠在房子边上，以便沥干肥皂水。我们走到厨房，推开了刚才有声音的那个房间的门。老人正在舀米。它的气味，与外面的空气如此不同，使我的肺充满了温暖。在那一刻，一种幸福的感觉冲进我的胸膛，使我的胸膛砰砰直跳。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卓越的崇高时刻。煮饭的味道证实了世界还没有抛弃我们。

米饭盛在大碗里，上面冒着热气。米饭很有粘性，每舀一勺，勺子下面和碗边都粘着米粒。我咽下食物时，喉咙里的温暖抚慰着我。我们吃饭的时候，老人严厉地批评金正日。他说，在这个现代时代，我们的领导人让整个国家挨饿是令人作呕的，并坚持认为，金正日的大肚子是他自私和贪婪的明显证据。

我很感激这米饭，但更感激他的同情。这感觉像是对我们困境的支持，尤其是在其他地方，难民们都被唾弃之时。

老人问:“你要去哪里?你是怎么陷入这种状态的?”

“我们想去韩国，”永明回答。

“那么，当局一定在追捕你。你一定是在逃跑。”

“是的，我们差点被当局抓住，”我回答。

“你们是一起过江的吗?”

“是的，我们是朋友。”

我们认真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想对他的关注表示感谢。但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们无言以对。

“你来自平壤，”他宣称，“你被控谋杀。”

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村子离延吉市中心很近，”老人继续说，“很多难民都经过这里。每天都有这样的人。所以当局一直盯着这个地方。事实上，前天，他们搜查了每家每户，寻找两名在杀人后从平壤逃到江边的叛逃者。”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米饭沉甸甸地放在我的胃里。当我们离开申先生家时，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些安慰。然而，在这个看起来如此遥远的村庄里，一位我们从未见过的老人知道我们是谁。当时的感觉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似乎无处可藏，而朝鲜对我们谋杀的诬陷会一直追到地球的尽头。

“我们不是杀人犯!”永明绝望地脱口而出，但老人挥手表示不屑。

“看，”他说，“我已经活了七十岁了。我一看你们就知道你们不是杀

人犯。我还知道那些朝鲜混蛋喜欢以谋杀罪陷害人。中国当局和这里的任何当地人都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我们一直紧张紧张，准备马上离开，但老人的表态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所以不要一起去任何地方，”老人建议我们。“分开走，小心点。”

“谢谢您，先生。”我发现自己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永明好像要偿还债务似的，把空碗和空勺拿回厨房。他坚持要洗碗，但老人设法把他叫回了正厅，并找到了一些纸和一支笔。他解释说，在延吉有一个他很熟悉的韩国教会，他会给我们写一封介绍信给那里的牧师。他说牧师可以帮我们去韩国。永明和我简直不敢相信，难以抑制我们的兴奋。

老人给我们画了一张地图，告诉我们如何从延吉公交总站去教堂，以确保我们不会迷路。他在教堂上画了一个十字架，又把十字架刷了几遍，使它更显眼。重复了一遍说明后，他又测试了我们几次，以确保我们没有忘记任何东西。“这是什么建筑?”他问。“那是什么路?”他仔细检查了一切。我们像两个热心的学生一样回答了他的问题。

在我们告别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到韩国后，就住在首尔，不要住在其他地方。”

听了这些话之后，我们离开老人的房子时，连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老人精心画的介绍信和地图，就像一张护照，能带我们一路去韩国。我们很自信，甚至都没戴墨镜。但我们小心地听从了老人关于保持距离的建议。

每当我们走到有人的路上，我们就假装不认识对方。这真的很令人兴奋。有时永明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最后我们为了谁能走在前面而争执。有一次，当我领路的时候，我搞了个恶作剧，躲在小巷里，我看着永明脸色发白，疯狂地在路上到处找我。坐公共汽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开玩笑的路上很快就过去了。

老人的指路很仔细，我们很容易就在繁忙的市中心找到了延吉教堂。与其他教堂不同的是，这座教堂只是占据了商业建筑中的一些办公空间。

在我们敲门之前，我瞥了一眼木牌，上面用黑色字体写着“延吉教堂”。我知道里面会有韩国人，一想到要投入同胞的怀抱，我就心潮汹涌。永明也快哭了，好像我们已经来到了韩国的门槛。我叫他敲门。果然，一个声音用韩语回答，当我们进去时，里面有三个中年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兴奋地看着我们。他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凝视着，显得异常的小。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他问。“进来，进来。”

教堂内部的空间与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学习室一样宽敞，朝鲜所有的工作场所都有那种革命学习室。在墙中央，我们原以为会挂金氏家族肖像的地方，却挂了一个十字架。但房间里的气氛和革命学习室一样肃穆。十字架上方是一个木制的标语，上面写着“说阿门，让我们得救”。大概有二十张木长凳，门边有一张桌子。

“我们想见见牧师，”我回答说。然而，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漏掉了韩国人在使用“牧师”或“老师”等头衔时必须加上的敬语后缀nim。在朝鲜，“nim”这个后缀只能用来称呼执政的金氏家族的成员或导师，因为金正日的头衔之一是“导师、敬爱的领袖”。就这样，虽然我们到这里来寻求我们的救世主，但我们对他甚至没有表现出最基本的尊重，戴眼镜的人的眼睛更窄了。

“你从哪儿来?”他带有怒气地说。

“我们只能告诉牧师。”

“他目前在韩国。你可以告诉我。他不在的时候，我来代替他。”

我的心怦怦直跳。如果牧师可以从这里去韩国，我们也可以!当我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要递给那个男人时，我的手颤抖了。当他看信时，永明好奇地看着桌子上的十字架和《圣经》，仿佛它们是奇怪的外星人工制品。在日常的环境中看到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朝鲜只能在统战部的行动区域看到，这让我觉得我已经进入了韩国的领土。我忍不住笑了。

突然，那人摘下眼镜，扯着嗓子尖叫起来。“马上离开这里!”

我站在那里无言以对。

“嘿!把这些家伙扔出去，他们是叛逃者!”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打昏了。我还没来得及考虑他可能是在开玩笑，另外两个人就走了过来，开始把我们推出去。永明没有挣扎，而是在门口跪了下来。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听说你是韩国人。”他喊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越过边境，就是为了去韩国。如果你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就会死在街上。”

“什么，你以为就你们两个吗?我们的牧师因为你们被捕过一次。因为你，教堂要关门了。滚出去!滚出去，你们这些混蛋!”

我很惊讶。这些人是从我们渴望避难的地方来的吗?当我看到那个戴眼镜的人开始打永明的头时，我感到血气上涌。当永明含泪哀求时，他给了他一巴掌。我发了脾气，尖叫起来。我把那个戴眼镜的人从永明身

边拖开，像拿武器一样拿起桌子上的十字架。

“你们还是人吗?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我喊道。

“快点!打电话给当局!报告他们!”

我本来想把他们骂一顿，但当我听到“当局”和“报告”这两个恐怖的词同时出现在一句话里时，我抓住永明的胳膊跑出了教堂。回到入口有一段很长的路，我们在逃跑时绊了一跤。

当我们终于走到街上时，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像汽笛一样响着，我心里充满了恐慌。永明在前面带路，但当他走到一个岔路口时，他不知道该往哪边拐，我撞到了他，我们俩都摔到了街上。

只有当我们来到城郊一个偏僻的街区时，我们才会想到回头看。当我喘口气的时候，一种巨大的空虚充满了我的灵魂。就连韩国教会也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似乎是为了证明我们什么都试过了，已无路可走，永明拿出老人仔细画的地图，撕成了碎片。它落到地上的每一片碎片，都是我们破碎生活的碎片。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永明拍了拍我的胳膊，我抬头望着天空，问道:“我们今天要花一些钱吗?”我们去喝一杯吧。”

我想起我们在平壤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喝完酒决定逃跑，但这次我忽略了他的提议。然后我说:“我宁愿找个地方过夜。”

我站起来转身要走，但永明挡住了我的去路。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看看我们刚才经历的情况，你认为我们还能去韩国吗?他们要告发我们!你和我，我们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韩国人!你明白吗?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想在一个自由的朝鲜定居，但它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虽然我的身体在这里，但我的灵魂似乎已经离开了，因为我太麻木了，什么都感觉不到。如果我在朝鲜自杀，至少我将被埋葬在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土地上。在这里，我们只能像狗一样流浪，直到严酷的死亡的来临，我们最终会消失，不为人知，无人哀悼，消失在这些外国道路的尘土中。想到我生命的悲惨结局，我确信这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

永明把我拉到市场的一个饮料摊，那里陈列着不同价格的瓶装酒。他指了指12元的一小瓶酒，又指了指一个空杯子，倒满它要5元。当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烈性的中国烧酒时，很明显，如果我们空腹喝这杯酒，我们会昏倒在大街上，那样我们就暴露给了当局。我们可以吃什么来预防这种情况?我一边心算，一边把杯子放回去。

“看，我们只有一百元。我不喝酒。不过，你可以喝一杯。”

永明绝望地看着我，眼皮颤抖着。我非常熟悉的那双黑色的眼睛，通常充满忠诚、友谊和音乐天才的火花，此刻却空洞了。他那充血的目光里只有失望和怨恨。我还能做什么?我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我觉得100元纸币是我们唯一需要持有的东西。我也很疲惫，很紧张，如果我们在这一百块钱中损失哪怕是一元，我们就会完蛋。所以我们没有喝酒，而是把100元换成了两张50元的钞票。我更害怕失去永明，而不是遇到会抓住我的士兵。如果我们平分这笔钱，至少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当我把50元钞票递给永明时，他叹了口气。“好吧，”他说，“等我们到了韩国，让我们喝得烂醉如泥。不过钱你留着吧，一个人照看比较好。”

我让他留着，但趁这个机会跟他开了个玩笑。“别以为我给你的钱就是你的了。它不是用来花的，而是让你在觉得饿的时候想:‘我有钱买食物!’”

“混蛋。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精力充沛，因为你一直拿着钱!”

“没错，”我笑着说，“我应该早点说的:你知道我们慌慌张张地跑出教堂的时候吗?我们可能还得再来一次，所以只要有岔路口，就走右边那条路。那样的话，你就不用停下来思考，我们就不太可能找不到对方。听着，没有你仅靠我自己是生存不下去的。你脑子里有申先生的电话吧?如果我们分开，这个电话号码就是我们唯一互助的事物。”

我们花的头3元钱买了一小块肥皂。尽管我们都感到饥饿，但如果我们不弄得干净点儿，就会引起怀疑。

我们放弃了教堂，决定寻找韩国企业，因为那似乎是进入韩国人网络的唯一的

另一扇大门。我们寻找任何我们可能认识的公司，比如三星(Samsung)、现代(Hyundai)或LG。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家外面挂着仿制“三星”标志的商店，结果被用中文辱骂的人赶了出去。晚上，我们会睡在水源附近，比如公共喷泉。我们不吃早餐，但在上午11点左右，我们会花2元买一些面包，晚上再一起吃。

在街上流浪了四天之后，我们的钱和精力都用光了。第五天，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吃，我感到非常虚弱。我们来到一个饺子摊，我问永明要了他最后的10元钱，这样我们就可以买一些食物了。

“什么10元?”永明问。

“你还剩10元。走吧，我们去买些吃的。”

“我没有钱!”永明对我的坚持抱怨着，给我看他空空的口袋。

虽然这是一笔很小的钱，也许是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钱，但我对这

笔钱一直很谨慎。我把他拉进一条小巷，摆出事实，让他知道他错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很明显，他应该还有10元钱。

“所以你打算继续撒谎?你在瞒着我什么?你没告诉我就吃了吗?”永明避开我的目光，摘了一株杂草，开始把它的茎撕成长长的丝。我一看到他的手指在拔它，就觉得恶心。“告诉我!”我问，“看着我，如果你吃了，直接告诉我!”

永明把剩下的茎秆扔到地上，掸掉手上的尘土。他说，“是的，我用了10元钱。我用它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反驳道:“不要为‘真的很重要’的事情找借口。如果你吃了，就像个男人一样承认吧。”

“好吧!是的，我确实瞒着你做了一件事。我买了一把刀片。”

永明从上衣侧面的口袋里拿出一把剃刀。我正要大喊:“为什么?”但这个词卡在了我的喉咙里。当我们为下一顿饭而担忧不已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买刀片?永明为什么不告诉我就买了一把刀片?

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接着说，“我们永远也到不了韩国。我们真愚蠢，竟然才想到这一点。我以为见个韩国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街上流浪了好几天，他们肯定很快就会抓到我们。然后呢?我不在乎我自己的生命，但如果党把我们抓回去，让我们认罪，他们也会毁了我的家庭。所以我买了这把刀来自杀，这样那些混蛋就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了。”

他的话在我的耳朵里回响个不停。看到他手掌上的刀片，我气得想先自杀。一想到我涌起的仅有的力量竟然来源于这个刀片，我就感到无助。没有希望远比没有钱糟糕。

看到我的绝望，永明说:“不，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再试试我表弟吗?也许如果他和我面对面，情况会有所不同。”

他的眼睛充血，说话急促，好像着了魔似的。令我沮丧的是，除了自杀的念头之外，他还抱着他表弟可能会帮助他的希望，我意识到这一定是使他软弱的原因。“你和我听得一样清楚。”我说，“他不再把你当作家人了。”

“警察在附近，他可能慌了。如果我用自己的话解释我没有谋杀任何人，他会明白的。就连申先生都说，如果他参与进来，我们进军韩国就没有问题。来吧，我们再试一次。”我转身走开，但永明继续说，“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了。”

我觉得说服他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又转过身来，说我们可以在乡下找个地方过夜后再考虑。永明盯着前方，但没有说不，我们朝田野走

去。

当我们到达第一个村庄时，天已经黑了。我的腿一直在颤抖，我不得不使劲儿努力来阻止自己当场倒下，阻止放弃的念头。我们敲了几扇门，但没有勇气说话。当又有一户人家在我们面前砰地关上门时，永明滑倒在门槛的冰上。

“那是因为我们有两个人。”他解释道。“也许白天没问题，但没有人会在晚上欢迎两个陌生男人进入他们的家。他们甚至可能怀疑我们是两个被通缉的杀人犯，然后告发我们。”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村里仅有的一盏街灯照亮了我们孤独的生活。夜空似乎异常的低，我能感觉到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

永明鼓起所有的力气再次站起来。他说:“这样怎么样:我们分开，各自找个地方住。这对我们的东道主来说也更容易些。明天早上我们在那棵树下见。”

我问:“如果我们找不到愿意让我们过夜的人怎么办?”

“那我们就继续努力。至少这棵树哪儿也不会去。”

我看了看永明指的地方。大约二十米开外，一棵大树孤零零地矗立着，它是村庄的守护者。我们说了再见。永明留在村里，看了更多的房子，而我则去了下一个村子。当永明认真地挥手让我走开时，我感到不安，但他的微笑让我转身走开了。

第三部：自由

第一章 从延吉到沈阳

没有永明，走在路上不仅孤独，而且可怕。这是我渡过图们江以来，第一次经历了一段持续不断的寂静，我每走一步都使我更加不安。时不时地我咳嗽一声，让自己确信自己还活着。有时我回头一看，因为我把自己的脚步声误认为是一个陌生人追赶的声音。也许是因为我体内没有食物，每当一阵风吹过，我的整个身体似乎都在随风摇摆。我没有力气举起手臂，我不再试图用手捂住耳朵，只好让它们暴露在风中。起初，耳朵很痛，开始失去知觉，最后变得发痒，这是耳朵被冻住的迹象。我不得不把手放回去，让它们暖和起来，但天太冷了，我刚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它们就疼得好像要从我的手臂上断下来似的。

当我到达农场附近时，狗比寒冷更可怕。每当我走近农舍的大门时，一只狗就会咆哮着迎接我，嘴唇向后卷曲露出牙齿。当我鼓起勇气去敲前门时，村里的狗向他们的主人喊道:“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凶手!”

我在邻村闲逛了一个多小时，意识到永明天真地认为他或我会因为是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一对陌生人而更容易被村子里的某户家庭收容。我想起了常勇，当我们躲在山里时，他给我们带来了饺子；申先生给了我们100元，并称之为“零花钱”；还有龙井村的老人，当我们只需要水洗脸时，他给我们喂了饭。虽然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好意，但我对自己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好运感到绝望。带着一种新的紧迫感，我决定转过身，带着我们承诺要见面的那棵树往回走。

虽然我注意到路上有几个马厩，但我没有足够的勇气独自在户外过夜。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寒冷的天空下再度过一个夜晚，我推断我们一起度过会更令人安慰。我希望永明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并在树下等我。即使他没有设法找到避难所，他也可能找到一些食物给我一个惊喜。

但当我到达树下时，永明不在那里。也许他很幸运，找到了一个温暖的房间过夜。随着黑暗的加深，我别无选择，只能独自过夜，那棵树是我唯一的伴侣。天气冷得令人难以忍受。我蜷缩在树下，大声数着时间，等待日出。随着风向的变化，我拖着脚步绕着树寻找更好的避难所。冰冷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

随着蓝色逐渐渗入夜空，清晨的临近，我的守夜变得更加绝望。我忍受着寒冷，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着永明的名字，用哈气温暖着我的手。然而，在约定的时间过去很久之后，永明没有出现。当大雪开始从乳白色的云层中飘落时，我再也无法忍受寒冷了。我跌跌撞撞地走进了离树不远的一栋小楼。里面有一些机械连接到一根似乎消失在山下的管

道上，我猜这座建筑里有一个水泵。

风从没有玻璃的小窗户吹进了泵房，但我很感激我的衣服保持干燥，没有融化的雪。然而，这种舒适感是短暂的，因为这个空间像坟墓一样冷，四面墙像冰块。当我决定再也受不了寒冷时，我跑回了外面。我又一次坐在树下，实际上感觉暖和了一些，但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我咬了咬嘴唇，想闭上嘴，但我的牙齿咔嗒作响，我无法阻止它们。

比寒冷更可怕的，是想到要独自在户外度过下一个夜晚。我抬头看着天空，担心天很快会再次变黑。突然，当我摇摇欲坠地走到崩溃的边缘时，广阔的天空发生了震动。我不得不呕吐，尽管我的肚子里什么都没有。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正在进一步沉入地下；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它似乎在左右摇摆，就好像我在荡秋千一样。

尽管我努力决定下一步行动，但我的大脑无法保持专注。尽管我下定决心要理清思绪，但我的头脑还是一片空白。一想到好几天没吃东西，我感到太痛苦了，我突然就想找个马厩啃干草。当我意识到这种奇怪的冲动时，我的一首诗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根据一个在朝鲜的乞讨女孩给我讲的故事改编的。我在平壤散步时，在街上看到了她。我知道不远处有一个食品摊，所以我问她最想吃什么，她可能会和她的兄弟姐妹一起吃。当我们走向摊位时，她抽泣着告诉我她的故事。

《世界上最好吃的》
三个月前我弟弟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热乎乎的玉米
两个月前我弟弟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用火烤熟的蝗虫
一个月前我弟弟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昨天夜里吃的梦
如果弟弟活到现在
活到这个月，他会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是什么……

当我写那首诗的时候，我把台灯关掉了，我哭了。即使我亲眼看不见，孩子眼中的恐惧和她的希望也太可怜了，无法用纸上的文字来面对。我讨厌那个女孩和她哥哥挨饿的现实，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但当我

发现自己处于这首诗的主人公的状态时，它不像我写这首诗时那样情绪化。它是遥远而无力的。我的感官，曾经适应了树叶沙沙作响的微弱声音，似乎已经枯萎，被寒风吹碎了。饥饿中没有诗歌。朝鲜是一个没有诗歌的国家。只剩下最后的这些想法，我的身体感觉更重了。我筋疲力尽地坐了下来，茫然地看着天空。

一位老妇人路过，吓了我一跳。“如果你是从朝鲜过来的，就不要呆在这里。”她说昨天，当局扫荡了这个村庄。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理解她的话，因为我迟钝的感官在绝望的狭小空间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当我努力集中注意力时，有一个词很突出。昨天，永明不是在这个村子里住的那个晚上吗？他被抓住了吗？然而，这位老妇人没有提及有人被捕。永明会慌不择路地逃走的。也许他跑得太远了，迷路了，正在寻找回去的路。或者，也许他是去找申先生的。延吉市中心离这里不远。

我决定给申先生打电话，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联系人。在我脑海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恼人的暗示，说我知道一些相关的事情。为了唤醒我的感官，我咬了咬舌头。在悸动的疼痛中，我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形象：龙井老人的房子，他不仅给了我们洗脸的水，还给了我们一顿饭。他肯定会再帮我一次。

我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急于在天黑前赶到老人家。但在我能够平衡自己之前，我迈出了一步，向前摔倒了。我的腿不稳了，我的脚也不再受我的控制了。当我再次站起来时，我的腿在摇晃，好像是撑起天空那般费劲。我的每一步之间的距离都不是由我的意志来控制的。无论是因为夜晚的黑暗，还是因为地球的引力失去了控制，有时我感觉自己在冲刺，有时感觉自己在原地行走。

在那三个小时的步行中，尽管我很担心，但我还是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老人的房子。我相信在他过夜之前我必须敲他的门，于是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口，筋疲力尽地倒在那里。

“先生！”我的手用力拍打着门底部坚硬的厚木板，我的手毫无知觉。

从房子里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小铃声。当老人走到门口，发现我躺在地上时，他弯下腰把我扶起来，把我扶到家里。感觉就像是一次拥抱。

“你的朋友？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在哪里？”老人问道。

“我们失去了彼此。”我一边说，一边爬近厨房的炉火，那里会有温暖。起初我感觉不到热，但渐渐地，它向我袭来。然后，我能感觉到我

的血液流动，流经因寒冷而变薄的静脉，一直流到我的脚趾末端。看到我的状态，老人明白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于是走进厨房。他带着一碗米饭、一盘采摘的卷心菜和五个煮土豆回来了。当老人转过身来给我拿勺子时，我想对他说：“谢谢你，先生。”但也许我身上已经没有力气了，因为没有声音出现。

他看着我吃东西，把一勺又一勺的米饭塞进我的嘴里。他抽了一支又一支的烟。我吃着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并不是因为我在几天没吃东西后急于解决饥饿问题，而是因为我流下了眼泪。我非常感激老人的好意，但眼泪是我唯一的表情。

“这里有很多土豆。”他说，“如果你想要更多，请告诉我。如果能再次见到你的朋友就太好了。”

听到这些话，我突然恢复了理智。”先生，我可以用你的电话打个电话吗？有个人的电话号码我和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想问他我朋友的下落。”

他点点头，给我看了他的座机。这是一部老式的旋转电话，号码随着使用而磨损。我拨电话太匆忙了，不得不重新开始。我把听筒紧紧地贴在耳朵上，希望能在另一端听到永明的声音，而不是申先生的声音。但从另一端，我能听到的只有中文。老人听了一会儿，告诉我电话已经关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告诉了老人我们离开他家后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试着再打一次电话。只有相同的录音信息。

当老人听说延吉教堂的人试图向当局举报我们时，他勃然大怒，好像是他自己受到了侮辱。他非常抱歉，并表示提出这个建议是他的错。我们静静地坐着。他已经独自生活了好几年了。他指着墙上一张妻子的照片，旧照片上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微笑女士。在那下面有一台小电视机和一部旋转电话。在远处的小房间里，透过打开的推拉门，我可以看到传统的木制家具和一台缝纫机。正如老人告诉我的那样，自从他妻子去世后，他的家就没有变过。

“待在我这里，直到你能联系到你的朋友。”他主动提议，“事实上，就在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找到自己的路。然后你们就可以再次在一起了。”

“谢谢。我相信我们会在第二天左右找到对方。在那之前，请让我帮你打扫房子。吩咐我做什么都行。”

第二天，我一醒来就再次拨打了申先生的电话。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我能听到铃声，而不是录音信息。

申先生拿起了电话，“你好？”

“你好，是我。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和永明走散了。”

“快说”他回答，“你现在在哪里？”

我不明白申先生为什么用如此紧迫的语气说话。“我在龙井，你知道吗？”

他打断了我的话。“现在听我说。你必须马上离开那里。”

“为什么？永明出了什么事吗？”

“相信我，你必须离开那里。如果你在和永明一起去的那所房子里，请挂断电话，从其他地方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不能在其他地方给你打电话，我也没有硬币。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在我试图独自前行之前，我需要知道实情。”

申先生解释道：“永明两天前的早上来找我。那肯定是距你们分手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因为当局突然赶到搜查村庄，所以他不得不逃跑。他千里迢迢来到延吉，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你不会相信的。他让我带他去他表弟家！”

我回答说，“所以，你说不，对吧？那个愚蠢的男孩现在在哪里？”

他说：“我不得不把他带回我的住处，因为他说你会打我的电话。在我的住处，他一直要求我带他去他表弟家。最后，我通过在当地广播电台工作的朋友与永明的叔叔取得了联系。”

“叔叔比表弟更有同情心，也许是因为他是近亲。他说他的侄子永远不会谋杀任何人，他真的很想见永明。”

“当永明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离开了房子，即使天已经黑了也没有回家。昨天下午四点左右，我接到了常勇叔叔妻子的电话。她说，当局已经来把常勇带走了，并声称你们两个刚刚被捕。”

“这让我很害怕，所以我关掉手机，收拾行李。我们已经准备好行动了。今天早上我短暂地重新打开了电话，这时你打来了。你必须离开那里。如果永明真的被捕了，他们知道你在哪里只是时间问题。”

当我放下听筒时，我的手被汗水弄得湿漉漉的。我确信门随时都会打开，士兵们会冲进来，就像我和永明躲在一起时担心的那样。

清晨的阳光穿透窗户，看起来像银色的刀片一样锋利。我从这里可以去哪里？我没有钱，外面的雪一直到我的脚踝。离开村庄我是不可能生存的。有一瞬间，我吓得连眼睛都不敢睁开，我认为投降是最好的选择。当我睁开眼睛时，我想到了一个想法——常勇从我们那里收到了700美元。我给他这笔钱不仅是为了运送我们几英里，而且是因为我错误地认为进城后去韩国的路会很容易。当然，要求退还我已经给别人的钱是很尴尬的，但以我目前的处境，还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首先，我打电话给申先生，想知道常勇的电话号码。当常勇的妻子接听电话时，我说：“你好，常勇回家了吗？”

起初，常勇的妻子用惊恐的声音问我是谁。当我解释说是我给了他700美元时，她开始抱怨，几乎哭了。“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警察说他早上会回家，但他仍然没有回家。如果你要逃跑，你应该远远地离开这里！你到底为什么一直待在延吉？”

我问：“警察真的说我的朋友也被捕了吗？”

“他们昨天就是这么说的。为什么他们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我可怜的丈夫带走？如果他们只是审问他，那没关系，但如果他们罚款，我们就完蛋了！他们会要求我们偿还20倍于我们收到的金额，而我们将一无所有地流落街头！”

我想诅咒她。她全神贯注于可能要支付的罚款，以至于她对我那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朋友只字不提。当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时，我意识到我有一个借口，可以为了生存而堕落到勒索的地步。“嘿，听我说。”我告诉她，“我的朋友不知道我给了你丈夫任何钱，因为是我给他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但如果我被抓住了，我不能保证我会守口如瓶。为了让我能逃得更远，向申先生保证你会给他100美元。告诉他你会马上把钱转给他。”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当我三次确认她会信守诺言时，她说她会以自己的全部家产发誓，家产由两头牛组成。这就足够了。

“先生，如果我能到韩国，我会回来报答你的。”我对老人说，他陪我一路走到出村的路上。然后我又戴上了太阳镜。

几小时后，我在延吉车站见到了申先生。他拿出800元人民币，相当于120美元，递给我。我不确定两头牛值多少钱，但常勇的妻子信守诺言。他尴尬地看着我说：“我很了解我叔叔和他的妻子。她不是那种只会像这样交一大笔钱的女人。你知道，我生来就有正确处理预感的诀窍。我相信你会到达韩国的”

我把400元钱放进口袋，然后把剩下的钱放回申先生的手里。我说，“如果永明来找你，请把这笔钱交给他，请确保你的手机开机！”

我上了一辆去沈阳的公交车，倒在了最后排的座位上。公共汽车已经坐满了一半，但大多数乘客都坐在靠前的位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想闭上眼睛，休息几分钟，但过去几天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涌上了我的脑海。永明的脸是强烈地浮现出来，这让我大吃一惊。我的朋友被抓了，我为什么打算逃跑？我们一起渡过了那条

江，下定决心如果我们面临遣返，就自杀。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永明知道表弟家被包围了，却执意要去表弟家？

我仔细检查了申先生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的一切。常勇已经被当局带走，当局声称我们两人已经被捕。他们说，经过一晚的审问，他将被送回家。但他们没有要求常勇支付所需的罚款，尽管没有比他们对那笔钱的了解更有力的理由来逮捕他。事实上，常勇的妻子把100美元还给了我，以便把另外600美元的秘密送到远离她和她丈夫的地方。我确信永明不会那么鲁莽地去他表弟家。他会先从远处监视房子——他有那种耐心。

从车窗外，我可以看到巨大的田野和成堆的谷物。当我们经过每一个地方时，我对自己重复着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会如何团聚。当公交车穿过一条宽阔的河流时，我停止了重复祈祷，并经历了片刻的解脱。我抬头看了看蓝天，那里有一只鸟的侧影。看到这个斑点，我非常希望有一个鸟的视野，也希望有一颗鸟的心，这样我就可以以冷漠的蔑视俯视地球及其所有琐碎的痛苦，并在空中翱翔。

直到那时，我才对龙井老人在我们道别时送给我的那个小袋子里的东西感到好奇。里面有六个花卷。我认为空腹只会加剧我的焦虑，于是把一块放进嘴里，决定不使用购买公交车票后剩下的钱。我能靠剩下的五个花卷活多久？也许一周。为了活下去，我必须在那段时间赶到韩国。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需要睡一会儿。

当我睁开眼睛，听到公交车扬声器里传来的响亮的中国声音时，我震惊地发现自己完全在另一个星球上。窗外是城市灯光的海洋。这个被电照亮的世界，让我想起人类反抗大自然黑暗的勇气。在朝鲜的黑暗中，只有金日成雕像周围的地区24小时通电。

在朝鲜，光就是力量，这种力量的展示在晚上最为明显。我工作的平壤钟谷地区的昌旺洞，以及成城地区成冲洞的军事建筑和住宅，实际上是这座城市的灯塔：如果它们保持三个多小时的无灯状态，那么平壤的其他地区就不可能在第二天晚上通电。我无法理解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导致国家日益繁荣的，而他们甚至以如此明显的方式浪费电力。铺天盖地的灯光世界让我觉得我眼前有中国的全部财富。

冲向这一切的中心让我兴奋不已，仿佛我正在进入一个大胆的新世界。然而，我也希望我能再等永明一段时间，这样他就可以和我一起看到这些光。这种遗憾在我心中跳动。

当公共汽车停在城里时，我非常清楚将要应对巡逻的警察。我害怕再次下车，于是透过脏兮兮的车窗向外张望，让自己确信他们没有在外

面等我。

巴士总站的大钟显示当时刚过午夜，所以旅程花了大约六个小时。我伸出瘦削的胳膊从公共汽车上爬下来。在我出发的村庄里，天和地都很黑，但在这个连夜都像白天的城市里，我觉得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寻求庇护。

然而，警察也在这里，一群穿着军绿色制服的警察。我放下伸出的双臂，迅速走开了。我走进的第一家灯光明亮的商店是一个装满电脑的大房间。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这个房间里的人一心盯着屏幕，根本没有注意到我。那里有空座位，我坐在角落附近的一个座位上。面对电脑的空白屏幕，我茫然地看着房间里的其他人，然后睡着了。

当有人使劲摇晃我时，我似乎还没睡着多久。我惊讶地醒来，看到一个留着令人震惊的粉红色头发的女人一边远离我一边叫着。原来当我陷入睡梦中时，她看到五个花卷从我腿上掉了下来。那些花卷是我的救命稻草，但她厌恶地看着它们，好像它们是大便。当我弯下腰去拿它们时，她在我背后用中文咒骂。我不敢回应，但又低声对她说："在朝鲜，像你这样的女孩会因为你的头发颜色而被拖到劳改营！"

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外面发呆。我似乎只在商店里呆了一会儿，但外面已经是白天了。当我转过身去看那家奇怪商店的招牌时，上面用大写英文字母写着："PC"。如果我需要找另一个地方过夜，我会找另一家"PC"店，我心想——但这家店要没有粉色头发女性的危险。

当我走在街上时，我的脚步声比在延吉时轻得多。这里相当拥挤，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走是不会引起注意的。面对着覆盖着建筑物四周的巨大广告牌，我忍不住停下来凝视。这是我见过的最具异国情调的一幕。在朝鲜，难以想象会有比金正日崇拜的图像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每一个可用的空间都被金正日的壁画或忠诚的口号占据，目光所及到处都是。

这是我来到的中国第一个大城市，它的规模和奢华令人惊叹。一块广告牌上画着一对情侣接吻，每人手里拿着一杯饮料。在另一张图像中，一名女子除了内裤什么也没穿。但当我漫步到城市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广告牌越来越小，焦虑开始了。在公共汽车站附近，到处都是韩语的标志，但我走得越远，韩语就越少。当我看到的所有标志都是中文时，我停了下来。我惊讶地从一位韩裔中国路人那里得知，我不是在沈阳，而是在长春。我没有意识到在长春有一个中途站，我应该在那里再乘一辆公交车去沈阳。

感谢那个好心地指导我如何回到公交车站的人，我开始往回走。我

现在依稀记得申先生说过在长春换公交车去沈阳的事。但我的脑子里一直充满了对永明的担忧，其他的都无关紧要。

我又从电话亭给申先生打了电话。“你好，我在长春，有关于永明或常勇的消息吗？”

他回答说：“好吧，祝贺你能独自到达那里！别担心常勇叔叔。他安全到家了。你知道你刚过江就遇到的那个中国女人吗？他被调查是因为她的报告——仅此而已。从他说的话来看，永明似乎还没有被抓住。不管怎样，长春离这里还很近，所以你最好走得更远，沈阳更安全。如果你的朋友打来电话，我会把他送到沈阳。”

我本以为400元是一大笔钱，但买了从延吉到长春，再从长春到沈阳的公交车票过后，我发现我只剩下3元了。我想，至少我买得起去沈阳的公交车票，并试着用这件事来安慰自己。我最想要的就是让永明赶到沈阳。也许他明天会出现在我身边。

我决定掷硬币来检验命运。如果有数字的一面显示出来，他明天就会到。在我把它扔起来之后，在把手掌从硬币上抬起来之前，硬币感觉很坚固，包含了我们的未来。“请让它显示数字。”我一边祈祷，一边把硬币举到额头。但当我看硬币的时候，它是另一面。我又试着把它扔了好几次，但硬币拒绝安慰我。

我把硬币放回口袋，想着很多事情的结果是出乎我的想象的，它们会变得更好。也许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正在为我策划这样的命运。我没有再扔硬币，担心触摸它可能会破坏这种力量。

当我坐上开往沈阳的公交车时，一想到永明可能安全了，我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在公交车上，即使是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穿着米色衣服的男人，从后面看也像是永明。我乐观地决定，我可以再吃两个花卷了。我看了看剩下的三个花卷，确信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再次见到永明。

当我在我前面空座的背面悠闲地弹钢琴时，我的手指停了下来。在我前面座位的网状口袋里，有一张用韩语印制的旅游传单。当我注意到韩国驻沈阳领事馆的电话号码时，我翻了翻，差点大声喊道。我仔细地看了一遍。是的，这确实是韩国领事馆的号码。能这么容易到达韩国吗？

我有一种感觉，我的胸部会因为兴奋而爆炸，我尽可能用力地把双手挤在一起，以消除多余的能量。为什么申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如此公开的电话号码？诚然，他是一个乡下男孩，但为什么我们这些老练的平壤城市男孩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迫不及待地想现在就到达沈阳。与长春之行不同，这次沈阳之旅似乎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找到驻沈阳领事馆并不困难，现在似乎没有理由不吃面包了。我把它们吃完了。当我把手里的塑料袋揉皱时，我很高兴。我所承受的一切痛苦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公共汽车的四个轮子在坚实的地面上慢慢转动，而我的思绪却已飞快地跑在了前面。

直到天黑后，这辆长途大巴才缓缓驶入沈阳汽车总站。谢天谢地，长途大巴一停下来，司机就打开了车门。我是第一个下车的，当长途大巴减速停车时，我已经走到了前面。我跑来跑去寻找一个电话亭。从渡江以来，我似乎一直在这样奔波，但直到现在，我才觉得自己在指挥自己的步伐。

当我找到一个电话亭并关上身后的门时，我的呼吸声充满了电话亭。当我把一枚硬币按进投币口并拨打号码时，我的手剧烈地颤抖。我按下最后一个数字后，它开始响了。我祈祷终会有人接听我的电话。

“你好。”一名男子用韩语回答。我屏住呼吸。

“你好。这是韩国领事馆，对吗？”

“是的，你是谁？”

“谢谢你，谢谢你。”我在一种梦幻般的状态下朝着电话低下头，惊讶于韩国领事馆接了我的电话。

“你是谁？”那人又问了一次。

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彬彬有礼地说话，就好像我站在他们的国旗前一样。“我来自朝鲜，一个朋友和我一起来了，我想在韩国申请庇护。”没有人回应，我意识到电话已经断线。

我敲了几下听筒。这个愚蠢的电话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坏掉，我赶紧去找另一个电话亭。与此同时，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韩国刚刚听到我的避难请求。我已经走到了旅程的尽头。当我用拳头擦脸时，我可以看到车站外一条主要道路上有三个电话亭。第一个看起来很老旧，所以我走进了另外两个看起来更新的电话亭。

“你好！”这次我先发言。

“是的，你是谁？”

“是我打电话来的。我想在韩国申请庇护。我带着身份证明文件。当局诬陷我们谋杀，正在寻找我们。但我们不是杀人犯。”

“你好，现在听我说。这部手机不太安全，你明白吗？”

我环顾四周。

“从这里到韩国很难，”这个声音继续说道。“在韩国驻沈阳领事馆，中国不允许向朝鲜难民发放签证。如果你想去韩国，你必须去韩国驻北京大使馆。我们在这里帮不了你。”

我们在这里帮不了你。

但我们都是韩国人，他和我！

“我怎么找到驻北京大使馆？请帮帮我，我不知道从这里怎么过去，我在延吉也有一个朋友在逃亡。”我恳求道。

“所有其他难民都是自己来的。你怎么能指望我们在这些基本细节上提供帮助？我不能在电话上呆太久，我现在必须挂断电话。”

说完这些话，线路就断了。平淡的拨号音感觉就像一颗子弹即将进入我的头骨发出的嗖嗖声。有一段时间，我拿着听筒站在那里，无法把它放回。当然，刚才和我交谈的那个人是一名韩国领事馆雇员，用我们的语言说话。他有没有可能听不懂我的话？也许我解释得太匆忙了。走了这么远，我是不是把这一切都搞砸了？

我在口袋里摸索着又找了一枚硬币。我惊慌失措，以为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我找到了一块钱。这不仅是我的最后一枚硬币，也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又拨了一次。这一次，我将详细解释我的情况。我会慢慢说话，这样另一端的男人就会完全理解我在说什么。电话响了十多次，但没有人接。当线路不通时，我试图拿回我的硬币，但就连电话也无动于衷，拒绝归还。

我滑到了地上。我把胳膊抱在膝盖上，身体前倾，把脸藏在手里。我可以用手指感觉到血在我的太阳穴里使劲地流。当我把手放在地上把自己撑起来时，我的视线模糊了。尽管我使劲睁开眼睛，尽可能地睁大，但我看到的只有黑暗。

我跪下来，深深地吸气和呼气。当我的视线在浓雾中逐渐恢复时，无限的光点在我面前盘旋。疼痛和恶心的漩涡逐渐变慢，我的视线开始清晰。我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

离开电话亭，我听天由命，走向了悲惨的结局，因为我预计自己会被推下世界的边缘。眼泪没有了，我意识到只有当我们知道有别人的手在擦眼泪时，眼泪才会流下来。

在黑夜的照耀下，我只是一粒在外国天空下翻滚的灰尘。贫穷的朝鲜依靠中国的援助生存，在中国当局的合作下，可以派遣其特工横冲直撞。但韩国，一个投资于中国改革的中国经济盟友，似乎没有意愿或权力拯救朝鲜的难民。我还有祖国吗？

我回头看了看电话亭，因为如果我不把徒劳的目光盯着它，我的身体和希望都可能化为乌有。我说我正在申请庇护，但员工告诉我电话不安全。是的，他会故意对我冷淡，因为他知道我们被监听了。

他说我必须去北京的大使馆。我是一个人千里迢迢来到沈阳的，当然我也能到达北京。当我和永明团聚时，我们会直接去北京大使馆。我还告诉自己，虽然我可能身无分文，但我在城市，而不是农村的偏远村庄。至于食物，在城市地区会比在农村更丰富。当然，我也可以在可能的时候借一部电话与申先生联系。我找了一个“PC”标志，就像我在长春记得的那个，我在沈阳的第一个晚上是在一家网吧里度过的。

第二天早上，带着新的决心，我去寻找一个地方，他们可能会让我不用付费就可以使用他们的手机。我需要看起来有礼貌，而且我已经不那么靠近朝鲜边境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太阳镜了。申先生可能是对的，穿上它们可能会让我看起来很奇怪。但找到一部我可以免费使用的电话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在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中，一切都需要钱。我注意到有几个人在街上向人们收取使用固定电话的费用，我没有勇气接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决定，就像在延吉和龙井一样，最有帮助的事情是找一个会说朝鲜语的人。我可以从哪里开始寻找？我似乎无法轻易区分朝鲜族和中国人。

我走到一条相对繁忙的街道上。那是一个市场小巷的入口。我的右边是服装摊，左边是一排小餐馆。由于太拥挤了，站在那里很尴尬，所以我走到街道上一个看起来不那么拥挤的地方。

然后我低声向每一个路人喊道。当一个男人走过时，我用朝鲜语喊道：“先生！”；当一个女人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喊道：“女士！”如果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会忽视我；但说朝鲜语的人肯定会转头看看是谁向他们喊的？

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我站在那条街上，向每一个路人呼喊。我坚守阵地，礼貌地呼喊，尽管我的身体饿得想倒在地上。到了下午四点，我有一种紧迫感。如果太阳再次落山而没有结果，我可能会在黑暗中变得更虚弱。

第二章 命定相遇王萎龄

我抬眼瞧，看到大约20米外，一位年轻女子向我走来。她的发型在国内被我们称为“水桶式”，因为看起来就像理发师把一个水桶放在一位女性的头上，然后在头周围剪。在朝鲜，女性不允许留头发或让头发垂下来，因为长发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只有女性舞者才被允许留长发，因为这是传统造型的一部分。但即使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得不把头发扎起来。很多朝鲜女性烫头发是因为这样可以让短发看起来更好。除此之外，他们只是穿着朴素。

向我走来的那个留着水桶式发型的女人中等身材，穿着皮靴。她的夹克是黄色的，肩膀上有一条黑色条纹。她的手提包是棕色格子布的。就她的衣服，甚至手提包而言，她看起来与数百名路过我身边的中国年轻女性没有什么不同，她们甚至都没有转头。

就像我之前的每一次问候一样，我向自己保证这将是最后一次。我在等她。如果我在行人面对我时大声呼喊，即使他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们通常也会回应，哪怕只是检查他们刚刚听到的内容。所以我在她离我不远的时候就说了。

“夫人！”

那个年轻女人停下来，转过身来看着我，眨着她的大眼睛，好像在问我是否和她说话。“你需要帮忙吗？”这位年轻女子用一种明显的朝鲜语问道。尽管这是我非常渴望听到的语言，但一开始我不知道如何回应。

“你需要帮忙吗？”她又问了一遍。

“是的，是的！”我非常热切地回答。

“好吧，我能帮你什么？”她甚至向我走了几步。当她走近时，我充满了感激之情。她有兴趣帮助我这一事实似乎证实了我毕竟是一个人。

“你需要指引吗？”她问道。

当她站在我面前时，我担心她可能会被我的恶臭所阻挡。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漱了。”“请答应我，你会把我的故事听到底。”我说。

她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头。她后悔找我了吗？她很快地上下打量着我，好像要走开似的。

“我不是个怪人。只是我不会说中文，所以我一直在找像你这样的人，女士。”如果我不小心的话，我可能很容易叫她“同志”。“请你抽出五分钟听我说完好吗？”

她瞥了一眼手表，好像在说我正好有五分钟的时间。“说吧。”她说。“我会听的。”

"谢谢你，"我回答。

我解释说，我是从朝鲜越境过来的，一直在躲避当局。我省略了因谋杀罪被通缉的部分。我描述了我和永明是如何走散的，最后向她问路，步行到达韩国驻北京大使馆。

"步行？为什么，你可以坐长途大巴去北京！"她似乎很惊讶，但从我的外表来看，她继续说道："你不可能一路走到北京！太远了。"

"去韩国还有别的路吗？"

她向前走了一步，开始解释，好像是在奖励我对她的慈善事业的信任。她说，大多数朝鲜人去的是北京大使馆，而不是沈阳领事馆。她说，如果我途经大连市，那里的许多人会说朝鲜语，这段旅程可能会更容易。如果我在大连赚了一些钱，也许我可以拿到一本伪造的中国护照，带着它进入韩国。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我惊讶地问道。

"我的父亲住在和龙市，他帮助过很多像你一样的人。"

听到这些，我发现自己在告诉她我在延吉和沈阳之间遇到的人：常勇、申先生和龙井的老人。那个女人离我更近了。

"你在沈阳有家人吗？"她问道。

我尴尬地笑了笑，摇了摇头。

"那么你晚上要在哪里度过呢？你吃了吗？"我不能让自己说我已经吃了，但我也不能告诉一个女人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我开始用手比划，寻找借口，但她已经拿出了手机。她准备向当局举报我吗？我看着她的手机，焦急地听着她用我听不懂的快速中文说话。

当她把手机合上时，露出了高兴的表情。"我有两张桑拿汽车旅馆的代金券。我本来打算和未婚夫一起去的，但我刚给他打了电话，他很高兴把代金券给你。你今晚想呆在那里吗？离这里不远的。"

一想到我面前的女孩似乎和她提到的父亲一样善良，我一时没有回答。

她继续说道，"你可以在那里洗漱和睡觉。正如我所说，离这里不远。"

她转向马路，好像在说："我们走吧。"当她靠近我这个恶臭的逃犯时，我感到很尴尬。我们走得很慢，因为我试着跟在她后面一步，而她放慢速度应和我的步伐。

"谢谢你这样帮助我，"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些事情吗？"

"是的，"她回答。

"你说你有两张桑拿券。你说你要和你的'未婚夫'一起去。这是你朋

友的名字吗？”

“哦，我的未婚夫！”她咧嘴笑了，“这个词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订婚了，我们要结婚了。在中国，你要嫁的是你的‘未婚夫’。我想这就像朝鲜的…嗯！我不确定怎么说。”

虽然我是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作家，但我从未想过在朝鲜语中会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词来指代你要与之结婚的人。

她继续说道，“不管怎样，他说你可以同时拥有这两张代金券。这意味着你可以在那里住两个晚上。他人是不是很好？”

我想说他们俩都很好。“他是个大善人！非常感谢。请代我向他问好。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名字吗？我希望能够铭记你的帮助。”

“我？王袭龄（Wang Cho-rin）。”

“王卓英（Wang Cho Ing）？”

当我努力念出她的名字时，她笑了。她慢慢地重复着每个音节，然后又笑了起来。我来到了一片语言的绿洲，非常感激，但她没有注意到我的惊讶，而是用朝鲜语说话，好像这是在中国最自然的事情。我想说点什么来取悦她。

“让我猜猜你的年龄。“我很擅长猜年龄，”我说。

“你这么认为吗？”她回答。她指着路边的一个食品摊说：“如果你猜对了，我会从那个摊位给你买一个羊肉串。”

我变得非常认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想正确猜测女人的年龄来换取食物。我一定很想吃，因为当我想说“二十六”时，我却喃喃自语地说“羊肉串”。我脸红了。虽然她只化了淡妆，但她的皮肤容光焕发，我猜她大概二十几岁了。

“二十五。”

“嗯？你这么认为吗？”

“那么，你多大了？”我问。

“二十七。”

我很伤心，但袭龄有一颗善良的心。作为对我猜测她比实际年龄小的回报，她不仅买了四个——而不是一个——羊肉串。她为自己留了一个，并把另外三个给了我。熟肉的味道使我不知所措。

她的善良唤醒了我一种观念，即无论我们的意志多么软弱，我们都有权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任何不幸都有其罪魁祸首。因为袭龄给了我代金券，那天晚上我可以用温水洗澡了。

当我坐在一个装满热水的浴缸里时，我想知道永明可能在哪里。我真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这里的浴室比申先生带我们去延吉的澡堂大得

多，人也比那次多。有些人边走边吃，聊天声和水的声音太大了，没人注意到我。

我用橙色香味的肥皂擦掉逃犯身上的污垢，仔细思考着在我们相遇时袭龄和我之间所说的话。最令人难忘的是，她把她要嫁给的男人称为她的未婚夫。在朝鲜的制度主义生活中，任何比你年长或在工作中级别更高的人都被称为dongji（同志），其他与你平等的人都是dongmu（同志朋友）。这些是我们忠心耿耿的战友。在日常生活中，基于年龄和资历的尊重等级制度如此明确，对领导人忠诚和顺从感觉是一种自然的尊重形式，而不是政治或法律上的事情。

即使在情侣之间也是如此。女人称呼所有男人为dongji，男人称呼所有女人为dongmu。用任何其他称呼或头衔称呼你的爱人——就像在中国这样——都被认为是颠覆性的。无条件的爱只留给金日成和金正日，他们的肖像总是展示在每个人佩戴的徽章上。没有人可以以任何方式将其他人的位置置于两位领袖之上，所有人被爱的等级都降为领袖之外的第二等。尽管在外人看来很奇怪，但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爱其他人胜过了爱金日成和金正日，那就是不可想象的。我的生活是按照一个自私的暴君的极权主义词汇来进行的，他侵犯了我们最亲密的情感，以将其从个人身上偷走。因此，我忍不住惊叹于袭龄教给我的“未婚夫”这个词的美丽。

洗完澡后，我打开储物柜取回衣服。当我的眼睛落在我珍贵的一捆来自平壤的手写诗稿上时，我为自己跑到沈阳感到难过，因为我只想着自己的生存。

我在汽车旅馆里闲逛，寻找一部电话。考虑到这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了一位女士，她为我提供了两晚的庇护，我想知道我是否会再次得到幸运眷顾。也许如果我给申先生打电话，他会给我带来好消息。汽车旅馆门厅的一角有两部付费电话。我坐在他们下面，好像一枚一元硬币可能从天堂掉到我身上，最后我跪着睡着了。

“你好？”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有人在轻轻地戳我，我把眼睛闭得更紧了。我没有勇气睁开眼，因为我害怕发现自己被当局控制。但当我意识到这个声音属于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时，一想到可能是汽车旅馆的一名女员工，我就放心了，于是坐了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把头转向说话的人。自从跨过图们江后，我就不再是一个敢于直视别人眼睛的人了。

“你就是我昨天遇到的那个人，是吗？”

当我看到她时，我抬起头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王袭龄，我曾以为我再也见不到她了。看起来她刚洗完澡，头发还湿着。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惊呼。我感到很高兴，能够与这位中国朋友惊喜重逢，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用平壤口音大声呼喊。

“太棒了！”袭龄打开一个装满热白面包的塑料容器时咧嘴笑了，但那一刻，我看到她真的比看到食物更高兴。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重复了一遍，“你和你的未婚夫一起来的吗？”

“不，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是来给你带点吃的。无论如何，我路过这个地方，我想如果我不给你带点东西，你今天可能得饿肚子。我做得很好，对吧？”

当她递给我一个面包时，我想给她一些回报。我非常渴望我背包里的钱，当我们躲在常勇婆婆家附近时，当局拿走了这些钱。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她继续说道，“我吹嘘自己是如何帮助像你这样的人的。”

当她说出这些话时，我担心她所说的“一切”是什么意思。我抬头一看，发现她苍白的脖子上有静脉。她细腻的皮肤看起来半透明，玻璃一般似乎显示着她的善良。每次她笑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会闭上，像两个小新月一样，天真无邪。但是，在她柔软的小脸上，她上翘的鼻子暗示着一种内心的反抗，如果被激怒，这种反抗可能会像蜂针一样扎人。

“你的未婚夫说了什么？他是中国人吗？”我问。

她朝那盒面包挥挥手，“我已经吃了，你都吃了吧。哦，你刚才问我什么？是的，他是汉族。他说我能帮你真是太好了，所以他星期天要带我去购物！他真的很讨厌金正日。我敢打赌，大多数中国人恨他，哪怕只是因为他的大肚子。”

我笑了。然后我想知道他们的关系。“许多汉族中国人娶了朝鲜族人吗？”

“是的，为什么不呢？虽然他们是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而我们在56个其他民族中只是少数，但众所周知，我们是最勤奋的民族之一。此外，随着与韩国关系的加强，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富有。不过，我承认，汉族女性嫁给朝鲜族男性并不常见，因为这样的男性更难在新的社会阶梯上站稳脚跟。但它经常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你知道吗？我们朝鲜女人擅长做家务，中国汉族男人也知道这一点！”

我很感激食物，但更感激她的陪伴。我想为她做点什么，环顾四周，看看能不能给她拿杯水。但她先我一步。“哦，让我给你拿点喝

的，”她说。当我看着她匆匆忙忙地给我拿水时，我确信我很快就会过上普通的家庭生活。过了一会儿，裘龄回来了，两只手都拿着一个纸杯，小心翼翼地走着。我跳起来迎接她。我们找到了一张长椅，我坐了下来，裘龄在短裤上擦了擦湿漉漉的手，然后坐在我旁边。

当她弯下腰时，我瞥见了她白皙的乳沟，很快把目光移开。我觉得我对一个向我提供帮助的人做了一些不尊重的事。我本来想咬一口面包，但我又把它放了下来。当我听到她按下手机键盘时，我有点放心了，但我仍然无法面对与她进行眼神交流。

“吃你的面包，不然就凉了。”她说，然后开玩笑地补充道，“我能问你点什么吗？我听说朝鲜因为饥饿而吃人，这是真的吗？”“关于这种事情的传言时有发生，但我和我的任何朋友都没有看到。但我曾经目睹过一位母亲试图在市场上卖掉她的女儿。”

“真的吗？她的女儿？你亲眼看到了吗？”

那是1999年，再不过平常的一天，我办事路经东大原地区。尽管东大原位于平壤，但它是该市最贫穷人口集中的贫困地区。这里的市场比大多数都破旧，付不起房租的小贩绝望地向路人叫卖。其中一个人走近我，拿出一些面包。

“请花100朝元买一包面包。请帮帮我！”

当她拿出一个包，里面装着五个小面包，每个面包都有婴儿拳头一般大小，她皱巴巴的手肿了起来，很多地方都裂开了。我只想给她100朝元（价值约10美分），而不是拿走包裹，但我意识到我把钱包忘在了家里的另一件外套里。

“对不起，我把钱包忘在家里了。真的。”

她本可以再恳求我一次，但她却轻蔑地左右摇头，上下打量着我衣冠楚楚的着装。我穿了一套正式的西装，打了一条领带，场面尴尬。

我想尽快摆脱尴尬的场面。但就在这时，几个人跑过去，其中一个撞到了我。一大群人聚集在前面，这让我很恼火。我本来想快速通过，因为市场上独特的气味让我反感。在酷热中变质的肉类和鱼类仍在展出，小贩们试图用苍蝇拍挡开苍蝇。地面没有铺砌，食物垃圾和污水汇集在泥泞的土地上。体味和人类排泄物的恶臭与这些气味混在一起，我不得不努力抑制才能不呕吐。

“让让路行吗？我必须过去。”

我试图过去，但人群变得如此拥挤，仿佛我走一步都是与整个人群较劲。当我到达一个至少可以看到脚下地面的地方时，眼前的景象吸引了我的目光，都顾不上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在所有买家和卖家通常聚集的广场上，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年轻女孩，就像即将在公开处决中被枪决的囚犯。当我看到挂在女孩脖子上的那张纸上写着什么时，厌恶感让我的身体僵硬了。她看起来大约七岁。纸条上写着：“我以100朝元的价格卖掉我的女儿。”

站在她旁边的那个女人，似乎是她的母亲，低着头。我经常听说母亲会抛弃孩子或把孩子送人的情况，但我从未遇到过有人以100朝元的价格卖掉自己的孩子。

其他旁观者也有同样的想法，纷纷咒骂她。

“那个婊子疯了！”

“你这个婊子！即使你饿了，你怎么能卖掉自己的女儿呢？”

“她看起来像妓女一样漂亮，但她的灵魂已经腐朽了。”

“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人渣。”

一位老人大声问女孩：“孩子，那个女人真的是你妈妈吗？你可以说实话，我们会帮助你的。她真的是你妈妈吗？”

我看着女孩的嘴唇。就在她犹豫的时候，人群中不时响起喧哗声。当有人喊道：“大家安静！让我们听听这个女孩要说什么！”就连站在我旁边的那个一直在抓身体不同部位的中年男子也停止了他的动作。女孩一边抓着女人的衣服，一边喃喃自语地回答。

“她是我的母亲。”

她妈妈？那个母亲以100朝元的价格卖掉了她的女儿？围观的人越来越激动。

“啧啧。可怜的孩子！”

“嘿，婊子，如果你要卖掉你的孩子，就给她恰当的定价！”

“即使是一只狗也要3000朝元！你女儿的身价低于这个吗？”

“谁会买一个连自己都吃不饱的女孩？”

“当然，也许如果她恳求别人带走她的女儿，她可能会得到一些同情。”

“愚蠢的女人！你打算用100朝元做什么？”

奇怪的是，这个女人没有反应。她的眼睛盯着地面，一动不动。这似乎让观众更加恼火，直到有人喊道：“说点什么，你这个愚蠢的妓女！”“嘿，你又聋又哑吗？”

这些侮辱很快就变成了窃窃私语。

“她聋了？”

“嘿，她聋了！”

在我看来，这个女人出了什么问题。暴徒中响起了另一个声音，问

女孩是否有父亲，似乎接受了诅咒一个聋哑女人没有用的事实。

“不，我已经没有父亲了。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女孩又喃喃自语地回答，然后突然抬起头尖叫道：“别再说我妈妈的坏事了！他们说她只剩下几天的生命了！她快要死了！”

孩子的尖叫声刺透了空气。有些人开始啧啧称奇，好像在承认等待某个死亡比死亡本身更糟糕。看着那里的母亲和女儿，我确信我们生活在世界末日。我身边的一位老妇人开始哭泣。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如果这位母亲至少能出声，她就能表达悲伤，并与他人分享她的痛苦。

这个失聪的女人有一种蜡质的表情，好像她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她骨瘦如柴的手上似乎没有血。她的衬衫袖子和裤装都垫得很厚，打了很多次补丁。完美的缝合是一个人反抗贫困的可悲证据。

我想起了一句话，残疾人的手很熟练。这个孩子长得很像她母亲，很漂亮。虽然她的颧骨很突出，但你可以看到，如果有一点肉，她会很有吸引力。就在她嘴唇下面的下巴上，有一颗美丽的痣。我的长辈们过去常说，如果一个女孩在可见的地方有痣，那就是运气不好。这里的情况确实如此。

这时，没有人再对这个女人诅咒了，只有同情的低语。

“那么，母亲去世后，这个女孩将如何生活呢？”

“如果有办法让两个人都活下去就好了。”

“也许有一个亲戚可以收留这个女孩？”

一位看起来再也受不了的女市场小贩拿出200朝元递给了这位母亲，“女士，我们都在勉强维持生计，”她说，“没有人会收留你的女儿。给，拿着这个。”

其他人则表示同意。

“她是对的，拿走她的钱。”

“继续说，如果你继续走在街上，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为了你的女儿，你必须活着。”

无论是因为她无法理解，还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慈善机构的庇护，这位母亲都紧握双手，拒绝接受这笔钱。小贩试图向她证明200朝元的价值超过100朝元，但这位母亲没有让步。当小贩试图把钱放在女儿手中时，母亲愤怒地接过钱，把钱塞回了商人的口袋。

然后，她从女儿脖子上取下纸签，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让开！让开！”严厉的叫喊声和哨声越来越近。那是一名身穿军装的保安，也许有人通知了他。他径直走向母亲，用手掌击打她的肩膀，“你疯了吗？你认为这是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吗？在那里你可以

像奴隶一样买卖人类？离开这里！把你他妈的招牌摘下来！”他一把抓住那张纸，把它撕碎了。当撕碎的纸掉到地上时，人群再次变得焦躁不安。

“嘿，你干什么，她得了绝症。你至少应该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有人喊道。

受此鼓舞，其他人的愤怒情绪被激起，嘲弄的声音四起。

“你以为你负责管事只是因为你是他妈的安保吗？撕毁她的招牌有什么意义？”

“看看那个混蛋，他看起来像只该死的老鼠。”

“这个狗娘养的是那种会出卖自己妻子的人。”

保安非常愤怒，转身指认了侮辱的来源。

另一个声音响起：“什么？你没看见我们吗？睁开你他妈的眼睛！”

整个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笑声。他的脸现在因愤怒而发红了，保安开始向这个失聪的女人发泄他的愤怒，“你跟我来，你这个婊子！”他吼道，“你怎么敢出卖你的女儿，蔑视社会主义？你喜欢钱吗？你在宣传资本主义吗？试试吃豆米，婊子！”

年轻女孩哭了起来，但那个男人拽着那个女人的胳膊，好像要折断它。她踉踉跄跄，奋力站稳。围观者的愤怒达到了高潮，但没有人敢向一名身穿军装的男子迈出一步。然后有人走近他，抓住了他的胳膊。那是一名军官，身上有中尉的条纹。

“我会带走那个女孩。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对吧？”

“什么？”保安转向那个声音，准备打它的主人，但他一登记警官的军衔就停了下来。

中尉把保安从那个女人身边拉开。他看起来很强壮。“我从国家领取军需口粮，”他解释道，“我有信心对这个女孩负责。所以，让她拿100朝元吧。”这名警官的话表明，他不是以100朝元的价格买下这个女儿，而是扮演了这个女儿的母亲的角色。为了向那个女人表明自己的观点，他把女孩抱在怀里。

这位母亲的反应出人意料。在她接受了中尉的100朝元纸币后，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她冲破人群消失了。警官困惑地站在那里，女孩仍然抱在他的怀里。母亲是不是因为担心他会改变主意而逃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愚蠢的。但也许她患有精神病，这就解释了她为什么试图卖掉女儿。

旁观者胡乱猜测。突然，后面有人喊道：“她回来了！让开！母亲回来了！”人群为回来的女人开辟了一条狭窄的通道，她跌跌撞撞，上气不

接下气。她拿着面包，正是刚才市场里有人要卖给我的那种面包。

她是不是下定决心为了那包可怜的面包做出如此卑鄙的行为？难道她连100朝元都不给女儿吃最后一顿饭，以作为做母亲的最后一幕吗？

令我惊讶的是，这位母亲张开嘴，开始哭泣：“原谅我！原谅你妈妈！我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女人！这是我走之前能给你的全部。”她跪在女儿面前，剧烈地抽泣着，把面包片塞进女儿的嘴里。

“她不聋不哑！”

“她一直都能听到我们的话！”

“她内心一定很痛苦。”

人群中有几个人开始哭泣。站在他们中间，我忍不住和他们一起哭了。

第三章 成为钢琴老师

我刚说完，但袭龄的肩膀还在发抖。她用湿漉漉的手在长袍上擦了擦，又把手举到眼睛前，擦去了更多的眼泪。

“金正日怎么能称自己为伟大的领导人？他是个坏人。”她喝了点水，擤了擤鼻涕。

“你离开那个国家做得很好，”袭龄说，“你为什么要呆在那里？”她转过身来面对我，尴尬地拍着脸颊，“我从不哭。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哭过。”

她镇定下来，继续说道：“你怎么去韩国？即使是到达北京大使馆的朝鲜难民也会在门口被捕。在新闻上经常听到这种事。你必须找到一条更安全的路线。”

她把头发拂到耳朵后面，决定我们应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她说，她会通过联系申先生来处理永明的下落，但当务之急是我的安全。我不能永远呆在桑拿汽车旅馆里，这样每顿饭都成问题。她不是一个单身的女人；她订婚了，不可能一直和我在一起。无论是在寻找避难所，还是去韩国旅行，问题都在于钱。她突然抬起头来问：“你能做些什么赚钱吗？”

我讽刺地说，自从我穿过图们江以来，我唯一练习的就是留意警察并保持警惕。我补充说我会弹钢琴，但这并没有任何用处。但袭龄高兴地拍了拍手。

“真的吗？你会弹钢琴吗？是这样吗，这样用双手？”

看着袭龄像一个溺水的女人一样挥舞着手臂，我咧嘴笑了。

“是的。虽然不够职业级别的演奏，但我为朋友们演奏过。”

袭龄又拍了拍手，然后惊讶地看着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她解释说，她的叔叔住在附近的西塔街，那里有很多韩裔华人。事实上，他一直在为儿子寻找钢琴教师。他很富有，如果我教他儿子钢琴，我不仅有地方住，还能赚些钱。这个建议对我来说很有用。除了能赚一些钱，我在西塔——也被称为沈阳的“韩国小镇”——度过一段时间，肯定有助于我找到去韩国的路。

袭龄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立即拨打了她叔叔的电话号码。她和他聊了半个多小时，每当谈话变得更加紧张时，她就会脱口而出整句中文。当她终于把手机拿走时，我轻蔑地挥手说：“如果他不同意，那没关系。无论如何，我需要尽快离开中国。”

“不，没关系！他说我今晚要带你去他家。”

在会面前的几个小时里，我试图用袭龄给我的钱给申先生打了几次

电话。我用的是公用电话，因为如果中国当局窃听申先生的电话，我不想暴露袭龄的手机号码。晚上七点左右，我终于接通了申先生的电话。

他说仍然没有来自永明的消息。我说，当他接到永明的电话时，他应该强调，一定不能让永明回他表弟家，而是应该去沈阳。申先生给了我他妻子的手机号码，以防我打不通他的电话。他说，当我找到安全到达韩国的方法时，我应该通知他们，这样他的妻子就可以加入我的行列。我请申先生保持手机畅通，因为我知道永明会打电话的。

那天晚上，我和袭龄打车去了她叔叔家。我们没有走主干道，而是穿过了很多小巷。袭龄解释说，由于当时是高峰时段，司机走了一条捷径，但这段路程仍然需要20多分钟。最后她付了车费。这对我来说像是一笔财富：超过25元。

在一栋豪华公寓楼的入口处，袭龄转向我对我说话，语气非常严肃，好像我的生命就取决于接下来的行为。“当我叔叔问起时，你就说你钢琴弹得很好。他一点都不懂音乐，所以你不必担心。如果你觉得弹钢琴不舒服，就说你的手疼。你知道音乐家在手受伤的时候是怎么不演奏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公寓在八楼。正如袭龄所说，她的叔叔确实是个富人。家具和家具都很贵。与申先生的公寓不同，这所房子的加热地板覆盖着老式的油毡，而大理石地板覆盖着一些毛绒地毯。这只是我一生中见过的第二个大理石地板的私人住宅。

在朝鲜，最豪华的私人住宅位于平壤东部的Eundok村，金正日最亲密的同伙就住在那里。它的周围风景优美，有许多树木，附近流过大同江。由于该住宅区据说是作为金正日的特殊恩惠而建造的，因此被命名为“Eundok”（韩语中“恩惠”的意思）。

林部长住在那里，我经常被邀请到他的家里。Eundok村被电栅栏包围，并由武装警卫巡逻。大院内有六栋建筑，村庄有自己的柴油发电机，为居民提供不间断的电力供应。所有六栋建筑都有四层，形状和大小都是相同的矩形。一楼由车库组成，一楼往上是家庭公寓。每一层楼只住一个家庭。电梯由日本三菱公司制造。林部长住在他那栋楼的二楼。

二楼的电梯门直接通向林部长的家。走廊里摆满了自行车、网球拍和各种各样的盒子。当你脱下鞋子进入主生活区时，你把它们放在一个鞋柜里，鞋柜从地板一直延伸到高高的天花板。公寓中央有一条主走廊，走廊两边房间的门都面对面排列。第一个大空间是客厅，厨房在走廊的尽头。有两间浴室，除浴室外共有十个房间。

客厅的墙上挂满了镶框的照片，照片上是林部长与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合影。三个桃花心木陈列柜靠着一面墙。橱柜里陈列着国家勋章、金表和其他特殊礼物，以及金日成或金正日为他倒葡萄酒的酒杯。在林部长的私人书房里，我发现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一部电话。这是一部黑色的旋转电话机，表盘中央有红色的劳动党党徽。林部长向我解释说，普通的电话没有那么可靠；此外，它们可能会被窃听。他解释说，这个老式型号的电话机是专门为他给金正日的电话热线而设立的。电话后面有一个小天线和一个红色LED灯，当接到金正日的电话时，LED灯亮了。

事实上，这些公寓只能作为金正日的"恩惠"才能建造出来。即使在厨房里，也有一个大吊灯，上面有无数闪闪发光的水晶。林部长解释说，这是专门从德国进口的高端设计。他说，每颗晶体都有320个侧面，就像钻石一样，晶体的切割对光线的反射方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过，对我来说，大理石地板是他家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大多数朝鲜普通家庭的地板只不过比壁纸强一点。那些家境较好的人装饰了从中国或日本进口的油毡地板或木地板。但那些都与令我感到惊讶的大理石地板不同：在走进林部长的家之前，我曾认为大理石地板是一种一流的建筑特色，只能用于与金日成和金正日直接相关的神圣建筑，例如所有学校和工作场所的革命室。在这些教室里，学生们接受了适合他们年龄段的思想灌输，这样，他们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结束的整个成长期，都会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思想灌输课程所覆盖。对于在职成年人来说，各种政治和自我批评会议都在工作场所的会议室举行，那里挂满了金正日进行相关现场指导的照片。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室必须至少每三年更新一次展览，为此要预留维持对金正日崇拜的资金。我向林部长请教他家的大理石地板，他蹲下来用指关节敲击，解释说这是用粉红色的意大利大理石做的。虽然袭龄的叔叔的公寓里也有一块大理石地板，但它是黄色的，看起来好像失去了原来的颜色。客厅墙上挂着三幅画，而不是与金日成和金正日合影。虽然我看不到炉子，但公寓的暖气很舒服。在客厅的四个角落里，每个角落都有一个传统的红色上釉的中国花瓶，与成年人一般高。大窗户上挂着深棕色的窗帘。当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时，我柔和地陷了进去。

"很高兴见到你，"叔叔说。他是一个五十多岁出头的男人，穿着一件棕色羊毛衫。他的目光柔和，嘴唇丰满。他的口音与申先生没有太大区别。由于他已经从袭龄那里听到了我的故事，他似乎对进一步的细节不感兴趣。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他问道："所以你以前是一名钢琴家？"

"是的。"在裘龄早些时候的坚持下，我试图坚持一个简短的答案，但对这种对我钢琴演奏技巧的夸大感到不安，我觉得我需要提供更多的解释："我的音乐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移居朝鲜之前，他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成员。我从未接受过专业钢琴家的训练，但我从老师那里学会了演奏。"

叔叔看着裘龄。

她说："是的，没错，他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太棒了，不是吗？就像你一样，叔叔，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说实话，你现在不能自称是世界级的商业专家，是吗？"她说话时瞥了一眼自己的手，看起来有点不自在。

叔叔说："是的，是的，裘龄，你已经说过了。好吧，你能为我们演奏点什么吗？"

当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时，裘龄冲到了我身边。"你觉得你能演奏吗？你确定你的手没有受伤吗？叔叔，你就不能相信我的话吗？"

"不，我不能。"

裘龄摆出一副假装愤怒的表情。很明显，他们非常亲密，因为他对她假装的任性开怀大笑。

经过一条通向客厅右侧的走廊，我们进入了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辆黑色的雅马哈钢琴。它看起来比我们在朝鲜家里的雅马哈钢琴要令人印象深刻得多。我测试了踏板。我的脚并没有受到平稳的阻力，而是有一种刮擦的感觉。这架钢琴似乎从来没有演奏过。

我开始从低音一直演奏到高音。幸运的是，这把乐器没有太大的走调，尽管我确信它买回来后就没有被碰过。我解释说钢琴是一种有生命、有呼吸的东西。如果不定期照顾它，天气的变化会影响它的音调。我看到裘龄笑容满面，看起来对我展示的专业知识很满意。

"给我们弹一首吧！"她催促我。

我应该弹奏什么？我决定选一首简单的曲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语》，我可以凭记忆演奏。家里的照片萦绕我的脑海，其中一张照片尤其让我会心一笑。有一次，在一个国定假日，我在家里为客人举办的一场迷你音乐会上演奏了《秋语》。负责我居住区的保安一定收到了附近的投诉，他来驱散聚会。在朝鲜，以在大学学习西方音乐的学生为例，除非演出获得授权，否则你不被允许欣赏或分享外国文化。但即使对音乐学生来说，这种授权仍然是一种受限制的特权。像我在私人音乐会上那样，为外行表演是被严格禁止的。

保安人员恳求我，说他会让我们在其他任何国定假日继续，但这是将军的生日。他说："在这样的一天，他真的不能冒险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演唱会。"。观众中有人给保安端了一杯酒，他终于让步了，坐在客人中间。听完一首曲子后，他对我赞不绝口，说钢琴声很美。

我渴望在观众中看到的面孔一张接一张地出现在我面前。当我演奏每一个旋律优美的短语时，我在脑海中回忆起它们的名字。从我视野的边缘，我可以看到裘龄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这部秋天的作品将我深深地拉进了我的记忆中，回想起我与之离别的家庭的画面。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妈妈坐在沙发上听我练习钢琴；当我父亲闭着眼睛坐在她旁边时，烟从他的烟头飘了出来。接着，当我的姐姐们和她们的丈夫一起来看我时，我看到年幼的侄子吮吸着我姐姐的乳房时的小手，以及其他侄子和侄女冲进叔叔怀里时闪闪发光的眼睛。

接下来，旋律节奏的加快唤起了一个破碎的平静、无声的道别和恐怖的故事；我的耳朵里响起了当我跑过图们江时双脚与江面的撞击声，还有军靴在追赶时的踩踏声。当我弹奏到曲子的最后，来到了秋日田野，天空一片湛蓝。我想让引起共鸣的最后一个音符袅袅徘徊，于是慢慢地把脚从踏板上抬起。我等待指尖抬起，感受离开键盘的敏感触感，然后轻轻地把手放回膝盖上。

随着最后的音符逐渐消失，我能听到裘龄的哭泣。"你是一个有如此音乐天赋的人，你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痛苦？你还挨饿。你甚至一直露宿街头。哦，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对不起，我一直在哭。"

裘龄的叔叔什么也没说，但他站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回到客厅后，他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却又把它收起来了。他仍然一言不发，用手指转动打火机。当他终于点燃香烟并呼出烟雾时，开始语重心切地说话。

"说实话，我只是让裘龄带你来这里，因为她非常坚持。在你来这儿之前，我四处打听了一下。目前，这里对朝鲜难民的镇压相当严厉。他们说最近几天情况变得更糟了。"

"叔叔，一个人怎么能食言呢？"裘龄打断了他的话。

"我这辈子阅历很多。我不认为你是那种从饥饿中逃脱的人。我说得对吗？"

"有些情况导致我逃离，"我回答。

"当然，但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和我们中国当局都不会轻易放弃你。"

我低下头，默默地表示同意。

“那么，你在韩国有联系人吗？是什么把你一路带到沈阳的？”

“事实上，我和一个朋友一起过了江。但我们在延吉失散了。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

“那是怎么回事？你说你们一起逃离了朝鲜？”

我大概描述了下我们渡江后发生的事情。

袭龄的叔叔把烟灰弹落到烟灰缸里，做出了提议。“我们接下里这么做，”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朋友什么时候会出现，但你可以呆在这里直到那时。不过，答应我两件事。首先，你不能离开房子。在西塔，警察比蟑螂还多。另一件事是我不能让你们两个都住在我家里。你的朋友一到，你就必须马上离开。”

袭龄用力扯了扯她叔叔的袖子，“叔叔，即使他的朋友来了，如果他教钢琴，他们就不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吗？”她问道。

“说实话，我的那个儿子一点音乐天赋都没有。事实上，他不喜欢音乐。我买了一架钢琴，只是想看看它是否能让他变得文雅一些。此外，你还得挣点钱。在你再次见到你的朋友之前，你可以教我儿子一些钢琴。不过这并不容易。他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马。”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你可以待在我们空闲的房间里；我会确保你有足够的床上用品。我会单独支付你的钢琴学费，所以当你再次见到你的朋友时，你有足够的钱和他一起去北京。而我接下里会四处打听韩国的联系人。怎么样？听起来不错吗？”

“谢谢你，谢谢你！”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感激地鞠了一躬。当他让我坐下时，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然而，当他向我请教我的音乐课怎样有助于改善他儿子的言行举止时，他的表情变暗了。

“首先，让他熟悉一下钢琴的声音会很好，”我回答道，“当他能够区分和谐与不和谐时，我希望他能对周围的世界有更多的洞察力。”

叔叔把手拍在咖啡桌上，用中文对袭龄说话，袭龄看起来很高兴。突然，我们被一声巨响吓了一跳，一个小男孩冲进房间，几乎把门从铰链上撞下来。尽管袭龄的叔叔用中文对他大喊大叫，但孩子没有理会他，到处乱跑寻找什么东西，把所有到手的东西都扔在一边，显然他没找到合适的。最后，他从桌子下面抓起一把玩具剑。然后，他风驰电掣地冲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好像要打破门框，就像他走进房间时一样。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就好像龙卷风呼啸而过，而不是一个十岁男孩。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道，仍然咧嘴笑着，对男孩的活力感到惊讶

不已。

“王侯。”男孩的父亲绝望地看着我。“在中国你只能有一个孩子，而我和妻子在他出生时已经步入中年。我们给他取名“侯”，意思是老虎，这样他就会变得强壮和独立。也许孩子注定不会像他们的父母，而是取决于他们被赋予的名字……”

事实上，这个男孩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狂野。他的父亲解释说，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的能量来自哪里。从他醒来到睡着，他要么到处乱跑，要么大发脾气。他对垃圾食品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但他痴迷于电视上的历史剧，他唯一会玩的玩具是塑料剑。靠在他卧室的一面墙上的是一排玩具剑，每把剑各不相同。我可以看出我将面临一场战斗。

那是一月份，男孩正在放寒假。我们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五点安排钢琴课。袭龄会为我们做翻译。她平时在她叔叔的公司做会计，但她会休息一段时间，和我们一起呆在家里。

对于我们的第一次上课，我不得不承认失败了。那天早上，我给申先生的妻子打了电话，给她留下了我住的房子的号码。一想到要和永明团聚，我就有了一个积极的开始，但这个男孩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当袭龄向他转达我的指示时，王侯没有理会。他继续着他奇怪的跳跃和奇怪的动作，仿佛他是电视上的一个武术角色。他甚至坚持要像骑马一样爬到袭龄的背上。于是我发脾气，使劲敲琴键试图引起男孩的注意，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害怕之意。相反，他坐在凳子上，用脚后跟踩踏琴键，发出更大的噪音。当我把琴键的键盘盖合上时，他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

他绝望的母亲一手拿着棍子，另一手拿著菜刀，试图恐吓男孩服从。看到我惊讶的表情，袭龄解释说，如果他的母亲只举起棍子，男孩就会跑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作为回应。有一次，他甚至割伤了她的腿；从那时起，她一直把菜刀放在自己手里。家里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我意识到我必须找到一种自己的方式才能与他沟通。我下定决心，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当时钟敲了三下时，我从厨房里拿起刀，敲了敲男孩卧室的门。没有人回应，所以我又敲了一次。我听到门的另一边砰砰作响。我用指关节敲了敲，但他用他的玩具剑回应。

我说，“袭龄，告诉他，他的钢琴教师正在找他。”

当袭龄为我翻译时，男孩大声回应。从袭龄急促的呼吸来看，很明显这个男孩使用了脏话。我背着菜刀，打开门，走进他的房间。

“袭龄，告诉他，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钢琴老师，我不会对他手下留

情。”

当袭龄气鼓鼓地翻译时，男孩把手放在屁股上，笑了起来。我从他的收藏品中拿起一把玩具剑，小心翼翼、缓慢地走进客厅。为了确保男孩在看，我把菜刀举到塑料玩具剑的上方。我重重一击，玩具剑啪的一声摔成了两半，然后静静地掉在毛绒地毯上。男孩尖叫起来。仿佛第一次目睹了男孩对一个成年人的恐惧，他的母亲和表姐默默地惊讶地站在那里。

我拿着菜刀向钢琴房做了个手势。“去，坐那儿去。”

男孩愤怒地握紧拳头，但他仍然呆在原地，明确表示他不会退缩。我再次走进他的卧室，这次我带着一大堆玩具剑回来了。我把它们撒在地毯上，又指向钢琴房。

“去，坐在那里。”

我还没来得及说完我的短句，男孩就在地毯上吐了一口唾沫。我把第二把玩具剑切成两半，他的嘴唇开始颤抖。

我告诉袭龄，“告诉他，我不介意再砍一把玩具剑。让他坐在钢琴前。告诉他我不是他的母亲或父亲。袭龄，你在听吗？”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套上了一个陌生的成年人的外形，我还记得当崔亮在沙里旺当我的音乐老师时，我是多么害怕他。现在我知道作为一名老师管教学生的感觉了，我可以从脑海中看到崔亮额头上深深的皱纹。

袭龄翻译了我的信息，但语气不太坚定。然后奇迹发生了。男孩不情愿地拖着脚步走进钢琴房。他焦急地看着我和我拿着的菜刀，似乎在恳求我不要再伤害他剩下的玩具剑。当我把刀还给他母亲时，我向她眨眼。她惊讶地看着我的眼睛。此前，我在她家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她一直努力避免与我眼神交流。

当我回到房间时，男孩安静地站在钢琴旁边。我指着凳子。

“来吧，王侯。坐在这里。”

虽然我说的是朝鲜语，但他理解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能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兴奋地和丈夫通电话。袭龄从她手中接过电话，边说边笑。虽然大人们现在精神很好，但这个男孩看起来完全失败了，我为他感到难过。那天晚上，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投降而筋疲力尽，他提前入睡了。当他惊讶的父亲回到家时，他在熟睡的儿子身边坐了很长时间。

“让我们喝一杯。”

晚饭后，裘龄的叔叔在桌子上放了一瓶绍兴酒。我原以为所有的中国酒都是白色的，但这一款是淡红色的。他解释说，这是中国十大名酒之一，蒋介石的最爱。蒋介石是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在输给共产党后撤退到台湾。生活在寒冷气候中的北方人更喜欢白酒，而据说南方人更喜欢黄酒；他宣称其中最好的是绍兴酒。我承认我不善饮酒。他回答说，这是一款女性喜欢的酒，因为它不烈，然后给我倒了一大杯。

我曾以为中国酒都是一样浓烈，但绍兴酒出乎我的意料。王侯的母亲晚饭后上床睡觉，但裘龄和她的叔叔留在桌子旁和我一起喝酒。当她和我喝绍兴酒时，她的叔叔选择了高粱酒。当我们开始醉醺醺的时候，他又点了一支烟，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知道，看到你在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你们朝鲜人一定有某种反抗精神。看，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仍然在谈判桌任由金正日摆布。尽管这个国家一贫如洗！我一直想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秘密是什么？你们朝鲜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很简单，”我回答，“美国进行谈判是为了在一个问题上寻求共同点；但当朝鲜来到谈判桌上时，这是一场反情报行动。换言之，朝鲜将对话作为欺骗的工具，而不是谈判的工具，其目的是维护其他国家对朝鲜的错位的信任。为什么不呢？毕竟朝鲜的不透明是其最大的优势。它允许按照自己的条件行事，而其他国家则继续从表面上接受朝鲜的说法。事实上，金正日正式将这三项原则作为外交接触的基础：‘美国会相信任何谎言，只要它是合乎逻辑的’；‘日本容易受到情绪操纵’；以及‘韩国可以被忽视或勒索’。”

裘龄的叔叔笑了，“所以韩国是最可怜的一个，嗯！但朝鲜是如何无视韩国的要求的呢？朝鲜难道不需要他们的合作吗？”

“也需要，但我们知道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

在我逃离时，朝鲜对韩国的秘密外交武器是北方界线（NLL）战略。这个问题至今仍然非常敏感。

NLL是联合国在黄海建立的领海划界，在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司令部、朝鲜和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时签署停战协议后，朝鲜对其提出了质疑。在阳光政策时代，它成为朝鲜对韩国军事挑衅的焦点。

1998年2月，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领导的左翼政府上台后，韩国开始了一项外交政策，重点是缓和与朝鲜的关系，软化朝鲜对韩国敌对的看法。这就是阳光政策，其名字的灵感来自伊索寓言，在寓言中，强风

（一种强硬的政策）无法迫使一个人脱下外套，但阳光（一种和解的政策）以其拥抱的温暖做到了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政策只会巩固金正日日益下滑的控制，并使该党能够巩固和调整其政治和经济权力，以适应新时代。

到1999年，由于朝鲜已是连续第五年没有发放国家口粮，维护国内的统治系统安全已是迫在眉睫。随着大规模饥荒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困难，民众对党的忠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弱。撇开平壤的核心中央机构不谈，许多组织的部门或地区职能已经瘫痪，而且越来越多的组织将自己和员工的生存需求置于对党的责任之前。这是一个危险的情况：金正日把自己画到了一个他无法走出的角落，并慢慢失去了对人民的铁腕控制。正是在那时，韩国的阳光政策无意中出手相救，这让朝鲜劳动党从深深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起初，朝鲜批评了这一政策，称其真正目的是通过软实力战略摧毁朝鲜体制。但到1998年年中，金正日已下令，令统一部制定阳光开发战略，使该党能够从韩国获得急需的经济利益，同时尽可能少地做出让步。

统战部的所有可用的资源都部署在这次任务中。为了通过合作企业吸引韩国公司进行投资，统战部制定了和解和谈判战略。韩国现代集团首席执行官郑俊英（Jung Joo-young）在6月和10月的访问是重大事件，有助于使朝韩之间“合作”的新现状合法化。随着国际和韩国粮食援助进入该体系，该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口粮供应，使其能够恢复使用更强有力的执法手段，以确保人民的服从。

当时，朝鲜劳动党的最高优先事项是获得所需的最小量资源，以扭转其对国家日益减少的控制。但正如它今天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在确保权力稳定所需的最低水平上满足国家的经济需求，并确保所有机会都通过党审查的渠道获得，在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后，金正日不得不专注于下一个最紧迫的优先事项：管理无条件援助和联合经济企业，以防止朝鲜不得不做出回应或接受外部世界的要求。

在阳光政策的第一步中，韩国金大中政府建议允许朝韩家庭团聚，以换取韩国的化肥援助。当时的韩国反对党保守派批评阳光政策将资源投入无底洞。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原则，即朝鲜必须做出切实的妥协作为回报，例如减少军费开支或实施改革。

“也许他们说得有道理？”裘龄的叔叔问。

“也许吧，”我讽刺地说。为了阻止始于饥荒时期的党的控制的削弱，金正日迫切需要接受韩国的援助和投资。但如果金大中政府屈服于

反对党的压力，决定适用互惠原则，金正日可能会被迫拒绝援助，并面临权力进一步消散的风险。

军事挑衅行为可能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朝鲜可以利用一项筹码——主动提出停止挑衅，作为备用应急措施。此外，如果我们真的互让，我们的立场不仅会得到加强，而且一旦阳光政策的无条件援助开始流入，潜在的军事对抗威胁甚至可能确保该政策的长期有效。虽然韩国有资金可以提供，这是朝鲜真正想要的，但朝鲜将有和平可以提供，而韩国也同样需要，甚至更多。基本逻辑很简单：韩国必须继续提供无条件援助，将与朝鲜的接触与政治问题分开，否则将再次放弃和平。

“等一下，”裘龄打断道，“就在朝鲜计划从阳光政策中受益的同时，它准备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这太疯狂了，不是吗？”

我耸耸肩。这种想法对我来说并不新鲜。1999年2月初，金正日命令统战部计划对韩国进行首次军事挑衅。当时，应林部长的邀请，我住在Ui-Am宾馆，完成了献给金正日的诗《春天停留在神的枪管上》。这家宾馆距离林部长位于Eundok村的家不远，是他协调阳光开发战略和军事挑衅战略的控制中心。来自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被召集到统战部宾馆献谋献策，我近距离、长时间地目睹了它的进展。我仍然记得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对话，例如政策部长蔡昌国和林部长之间的以下交流：

“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郑俊英去年与我们会面时，我们已经就投资计划达成了协议。我们正在努力推进与有韩国公司参与进来的和解与谈判。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利用阳光开采战略来进行军事挑衅？”政策部长蔡昌国询问林部长，他的愤怒显而易见。

林部长紧闭着他的厚嘴唇，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他在这一场合的沉默标志着朝鲜最有权势的人对领袖的无条件服从，尽管他们可能拥有极高的权力，但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能参与对金正日批准的命令的质疑。他的目光停留在蔡昌国身上，也许是嫉妒他的下属可以自由地提出投诉，无论多么微不足道。

停顿了一下，他说：“来吧，蔡昌国。想清楚。你可以为这份工作选择你需要的人，全力以赴吧。”

在那次对话一周后，统战部开始明确战略，即在陆地上，朝鲜将继续专注于接受援助和寻求与韩国的经济合作；但在海上——而且只有在海上——它才会进行军事挑衅。这一安排为阳光开发战略和军事挑衅留出了空间，是朝鲜对韩国“阳光政策”精心准备的回应。对于外界，我们将我们的立场称为Uriminzokkiri政策，意思是“就在我们朝鲜族人之

间”，以强调我们已经进入了与韩国“友好”的新时代。在内部，我们将其命名为北方界线——NLL——战略。

当统战部向金正日介绍这一战略时，他非常高兴。

为了支持这一战略，党报《劳动新闻》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文章，建议通过对我们有利的朝鲜半岛的独特的海岸形状，来加强朝鲜的海军力量。这些文章还发表了更公开的声明，说明朝韩之间的军事边界不仅限于非军事区，而且延伸到海上的北方界线。

1999年6月15日的第一次延坪岛战役标志着NLL地区最初的主要冲突。朝鲜将其视为韩国的挑衅行为，实际上是由金正日本人下令、统战部策划并由海军司令部执行的。对峙始于朝鲜船只撞击韩国船只，最终以朝鲜明显的海军失利而告终。

尽管韩国明确受到了朝鲜的挑衅，但金大中政府对此淡化处理，没有升级冲突。统战部一直屏住呼吸，非常欣慰地庆祝这一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推进NLL战略。事实上，在韩国耐心缔造和平的努力的鼓舞下，朝鲜决定将军事挑衅作为其外交政策战略的长期基础，该战略将以挑衅、标记立场和维护三阶段框架为指导。这将通过在国际问题层面上发展核武器和在朝韩问题层面上进行海军挑衅来实现。

统战部决定选择2002年6月，也就是韩日世界杯的时间，作为NLL地区第二次海军对抗的日期，这背后有一个具体的原因。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在举世瞩目的国际足球赛事期间行动，将领土争端从挑衅的最初阶段转移到标记立场的第二阶段。根据统战部的指示，海军司令金尹锡（Kim Yoon-sim）指挥了第二次延坪岛战役，双方交火，双方伤亡惨重。在2002年4月晋升为海军司令之前，金尹锡曾是西海部队的指挥官，接替武装部队长官金日哲（Kim Il-chul）担任该职位。

2002年5月1日，金正日打破了在国际劳动节当天对工厂进行现场视察的传统。相反，他去视察了海军指挥所和与黄海交战有关的设施。2002年5月2日的《劳动新闻》刊登的照片显示，军队将领站在金正日旁边，其中大多数参加了海军的交战。2002年6月29日，在世界杯第三名韩国队与土耳其队的附加赛当天，朝鲜开始挑衅，导致了NLL地区的第二次重大对抗。统战部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将计划的细节隐藏起来，以使冲突看起来像是意外升级。为了避免美韩联合部队的窃听，该任务的队长是在被传唤到金尹锡的私人办公室后才被指派的。

2003年12月，在统战部的年终会议上，我们探讨了未来一年的议程，林部长在演讲中宣布了以下内容：

“我们的目标仍然很明确。开城工业园区是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这

种发展必须继续下去，但仅限于南北韩陆地合作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在海上对韩国进行有系统的挑衅。”

我向和我喝酒的朋友们解释了这么多。在逃到外部世界之后，我逐渐从朝韩事务的现状和韩国对它的看法中意识到，统战部对阳光政策的协调回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在我结束了漫长的解释后，袭龄的叔叔和袭龄都没有说任何话。我原以为袭龄可能对这些政策细节不感兴趣，但她看起来也很震惊。她的叔叔喝完了他的一杯酒，把酒杯举起来，这样袭龄就可以再给他倒一杯了，但她太专注了，没有注意到。

她说："我以为金正日只是一个愚蠢的人，不知道如何养活自己的人民，我不知道朝鲜在政策制定上花了这么多心思。"

袭龄的叔叔抬起头来，好像她刚刚闯入了他静默的思绪，然后他伸手去拿酒瓶。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点了一支烟，"我想我再也见不到像你这样的人了。朝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怎么看待中国？朝鲜肯定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依靠了吗？"

现在已经过了午夜，但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们，朝鲜和中国之间的真正关系。

我说，"金正日最讨厌的国家是中国。"

袭龄和她的叔叔似乎都突然清醒了。

"你是什么意思？朝鲜难道不感激中国的支持吗？金正日怎么会恨中国？"袭龄的叔叔问道。

与外界对朝鲜感到不可思议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他的惊讶源于金正日的领袖崇拜，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政治。朝鲜有句谚语说，如果你撒谎一百次，即使是编造谎言的人最终也会相信。在巩固了朝鲜人民对领袖无所不能的崇拜之后，金正日开始相信自己有权获得绝对权威。但事实证明，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是他的眼中钉。

美国很容易被塑造成帝国主义和腐败资本主义的化身，这使朝鲜能够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敢于反抗超级大国的勇敢挑战者。然而，中国本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朝鲜站在同一边，却制造了无尽的挑战，削弱了金正日的权威。即使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也被认为是主体思想自力更生意识形态的危险敌人，永远用改革和开放的成果诱惑着与世隔绝的朝鲜人民。

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追求与韩国的经济关系，在金正日身上激起了强烈的背叛感。随着韩国企业进入中国东北三省的市场，中国公众开始对韩国产生好感，但他们对朝鲜的尊重并没有相应改善。越来越多

的朝鲜难民涌入中国，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1997年，金正日发表了一份党内宣言，称：“中朝边界是一条意识形态边界，就像三八线一样。”

三八线是朝鲜半岛上的一条线，苏联和美国同意这条线将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南北之间的控制区的边界线。在1997年的声明中，金正日宣布，将朝鲜的孤立与中国的开放分隔开来的中朝边界是意识形态的边界，就像三八线代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鸿沟一样。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朝边境的边防巡逻部队从后方警卫晋升为兵团，以反映他们工作的重要性。此前工作重点从美国、韩国和日本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中国。几位通过Jochongryon（日本朝鲜人协会）工作的统战部同事被要求在中国建立类似的业务。由于这些干部在与海外韩国人合作方面有着最丰富的经验，他们将把自己的知识应用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我回忆起与他们中的一位对话，他是金日成大学的前同学，在一个醉酒的夜晚，他在家里表达了对我的不满。

“在日本的朝鲜人很有同情心，也有多余的钱，但在中国的朝鲜族人是可怜的渣滓。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通过韩国人赚钱，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和我们有任何关系呢？即使他们有信息可以代替金钱，我们会用什么来支付他们？我不知道我的收入是否还能继续增长。”

与统战部一样，负责海外情报行动的35号办公室也被要求将工作重心转向中国。金正日更害怕盟友的意图，而不是他的死敌的意图。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是相对公开地披露给媒体，然而我们难以确定中国对朝鲜到底知道些什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党的忠诚的干部成立了许多公司，作为在东北三省建立业务的阵地。

我从统战部的工作中就很清楚这一背景，但金正日于2000年5月和2001年1月访问中国的原因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我请当时在中国经营着良好业务的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同学解释。

“鸟儿白天听私人谈话，老鼠晚上也听。”当他检查房间的窗户是否关上时，他喃喃自语。

当他确信我们不会被偷听到时，他开始说道：“你还记得我们的将军访问中国驻平壤大使馆的时候，对吧？那是2000年3月5日？他与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赵明录（Cho Myong-rok）、军事参谋长金英春（Kim Young-chun）和朝鲜人民军司令金日哲（Kim Il-chul）一同前往。

“你知道他去他们大使馆的原因吗？他去向中国吹嘘我们获得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涉及中国对20世纪50年代中朝之间达成的反美/亲朝协议的当时的立场。该文件包括一些中国高级干部的声明，他们表示，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中国应该删除协议中自动涉及其军队的条款。甚至有

声明提议，中国应要求平壤为其在朝鲜战争期间获得的中方的支持而赔偿。在我们的将军去平壤大使馆之前，中国没有人得到通知，我们的国家通讯社在没有事先告诉中国的情况下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这简直是对中国的外交侮辱。”

“当我们的将军在平壤会见中国大使万永祥时，他说他知道中国对该公约提出的修正案，以及中国要求对朝鲜战争进行赔偿的意图。我们的将军威胁说，如果中国真的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朝鲜将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大使试图解释说，文件中的观点并没有反映中国领导层的官方立场，而是反映了某些个人的观点。”

“没想到这一切会适得其反。中国领导层随后立即解除了万大使的职务，以表达他们对他对金正日软弱反驳的不满。当时，由于万永祥与金正日关系良好，中国对新任驻平壤大使的任命已经被推迟了四个月。但现在他们决定用强硬派王国章取代万永祥。”

“中国的迅速决定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向我们的将军报告了。第二天，正如你所知，党中央干部接到了通知。作为回应，我们的将军发布了一项内部命令，要求我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做好撤离准备。每个人都收拾好了行李。但我敢打赌，这是我们的将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与中国玩他与美国玩的那种游戏。我们都知道，如果他们封锁我们，我们就死定了。”

“两个月后，即5月29日至31日，北京邀请我们的将军进行非正式访问。他可能不得不坐着听关于经济改革之类的讲座。不管怎么样，情况都会很糟糕，因为在那之后我们不得不处理该死的沈阳事件。”

沈阳事件是一项危机事件，指的是朝鲜35号办公室的干部被抓到在地方政府、警察和边境部队培训中国共产党干部。中国国家安全部因沈阳事件逮捕的人数超过60人。最终，虽然主人可以踢他的狗而不受惩罚，但这只狗——在这种情况下是朝鲜——咬主人的行为不会那么容易被原谅。

我的同学继续说道，“中国国家安全部一直在关注我们，向韩国表明它致力于保护他们在东北地区的投资。他们以前并没有真正指责过我们，但这次他们真的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给予警告。除了逮捕，他们甚至停止了对朝鲜的物资援助。作为报复，我们的将军所能做的就是处决一些在中国学习过的党的干部，清洗所谓的中国式改革的支持者。”

“面对中国的愤怒，他还能做什么？如果他们决定我们的政权必须下台，它就会下台。2001年1月，当我们的将军被召集到北京时，他别无选择，只能再次访问。他们让他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城外等了好几

天，尽管他们一开始就发出了邀请。最终，我们的将军别无选择，只能卑躬屈膝，参观了上海浦东经济特区，宣布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钦佩"。随后，媒体都报道了这次访问，以表明我们将军对中国式改革的兴趣。他们真的知道如何扭转刀片！你知道我们这些在中国为他工作的人怎么说吗？我们的将军有一次虚张声势地去了中国大使馆，但作为惩罚，他被拖到了中国两次。"

像我们这样的朋友可以分享这种危险的信息，因为朝鲜两名干部之间的对话，无论多么具有颠覆性，都不能作为起诉的依据，除非有独立证据表明发生了这种对话。党将此作为国家安全部的内部条例，试图防止有权势的干部之间的个人恩怨失控——而这是很常见的。这项规定也是朝鲜精英用来建立互信和建立联盟的漏洞。事实上，没有什么比分享官方叙事背后的真相更宝贵的信任关系了：毕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我们忠诚地支持捏造的对金正恩的崇拜以避免叛国罪，我们彼此之间很难建立互信。

2002年，为了减少朝鲜人民对中国的依赖，金正日发布命令，要求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贸易的朝鲜公司停止与中国的商业活动。但是，朝鲜经济已经过于依赖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打击中国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只会导致价格上涨和黑市经济的加强。由于经济权力下放将导致失去社会和政治控制，金正日在仅仅三个月后就撤销了他的命令。

当我解释完时，袭龄的叔叔慢慢摇了摇头，好像难以置信，"你说的真的是这样吗？"他问道。他低声说，"只有这样一个腐败政权的核心人物才能知道这些事情。"于是他从杯子里喝了最后一大口，重复了"三"这个数字好几次，就好像这是他的预言，即当前的朝鲜政权不会持续三代人以上。"告诉你，"他说，"我可能是少数民族，但尽管如此，我很高兴——不，很感激——生来就是中国公民，而不是朝鲜公民。"

第五章 迎合袭龄

经过这些交谈，袭龄的叔叔对我非常尊重。当他早上去上班时，他一定要敲我的门说再见。他每天至少给家里打两次电话，问我有没有小吃或小点心想让他带回家。每次，袭龄都会利用这个机会索要她想要的各种美食。

我以这种方式度过了奢侈的三天。尽管如此，每天早上，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申先生打电话。他一直让我放心，说我有运气，但我听到的越多，我就越担心永明。如果他因为遭受了一些创伤而忘记了申先生的电话号码呢？我拐弯抹角地向申先生提到了这件事。申先生说，更严重的危险是永明可能会在审讯中泄露他的电话号码，于是当局会追踪到我们两人。

我理解他的担忧。他的妻子也是一名朝鲜难民。当我问到是否要派人再次检查永明亲戚的家时，申先生借口说他很忙。站在我旁边的袭龄让我把电话递给她。我想也许袭龄有男人意想不到的好主意。

“你好！”袭龄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欢快。她接着说道：“请帮忙找到他的朋友。毕竟，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当地人才能提供帮助，因为我们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请和他一起来沈阳把！我会带你们出去吃顿好的。”她正要把听筒还给我，这时她停顿了一会儿，把听筒拿回来，补充道：“说定了，再见！”

申先生非常好奇。她是我的女朋友吗？我们怎么会住在一起？他说她说话方式独特，充满感情，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补充道：“祝贺你！”然后他向我保证，并多次承诺，当天他会派人去永明亲戚家。

就她表弟的钢琴课而言，袭龄也领先我一步。如果我扮演暴君，在孩子面前挥舞菜刀，袭龄会以同情心引领她表弟。当男孩因为弹不对音符而要发脾气时，她替表弟弹对音符，这样他的自尊心就不会受到伤害。袭龄通过她和表弟的亲属关系来处理表弟的不满。有时，她会假装非常沮丧和流泪，说如果表弟继续行为不端，那个可怕的钢琴老师就会找她的麻烦——尽管我当然不会这样。然而，袭龄的做法奏效了，这只凶猛的老虎又变回了十岁的男孩。

有一次，男孩说他累了，就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当言语无法说服他时，袭龄尝试了一种新的策略。为了激起他的嫉妒，她坐在我旁边的钢琴凳上。看到我们这样无视他，他一定很生气，因为他从另一个房间尖叫着说，如果她不马上从凳子上下来，他会把它扔出窗外。当她为我翻译这些词时，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她的头发散发出的柠檬香味充盈了我的身体。我突然忘记了那个男

孩。当男孩再次尖叫时，袭龄将她的动作进一步升级，当我的手放在键盘上时，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然后抬起手，让我的手臂搂住她的肩膀。我被这种亲密感征服了。在朝鲜，没有男人敢与别人的未婚妻进行身体接触，女人也永远不会率先以这种方式和男性接触。此外，从平壤到沈阳，我所接触到的都是粗糙的东西。即使当我握住永明的手时，我的手也会颤抖，感觉到一种几乎无法维持的生活。袭龄放在我手上的温暖唤醒了我生命的触摸。我开始专注于我的呼吸，担心我最轻微的动作可能会打破这一刻的宁静。当袭龄再次抬起头时，我想知道她是否也觉得时间已经为我们而静止。

当袭龄试图平息她表弟的愤怒时，我走进浴室，用冷水泼了脸。我想洗去我的无耻。然而，即使我用毛巾擦了擦脸，我仍有那样的感觉。当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告诉自己，袭龄的行为背后不会有双重含义。她真的很想帮助我，对此她很满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就不会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喜欢和我一起笑了。她也不会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牵着我的手，以此作为一种恶作剧来惹恼男孩。我根本没有权利期望袭龄对我有任何的她对她的未婚夫的那种感情。事实上，我很感激她的许多善意，并觉得有义务以一种我永远不会后悔的方式来回报她们。

突然，我听到袭龄从另一个房间里尖叫起来。这声音非常令人震惊，因为当我为她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并感到忏悔时，尖叫声响起了。当我跑出浴室时，我看到那个男孩在我监管不到之时又开始了新的暴行。他试图把手放在袭龄的衬衫下面，而袭龄正在反抗。

袭龄挣扎着想把男孩推开，但推不动。她不够强壮，无法阻止他抓住她的乳房。我赶紧从后面把他从她身上拉下来，他大声喊叫，他的身体在我怀里挣扎。看到袭龄快要哭了，我狠狠地打了男孩的屁股，然后用尽全力把他从她身上扯下来。就在我准备开始对他大喊大叫的时候，我意识到男孩手里紧握着袭龄的胸罩和从衬衫上撕下来的一块布。与此同时，袭龄哭了。我很快闭上了眼睛，袭龄几乎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遮掩自己的胸部。

我把男孩转过来面对我，这样我就看不到袭龄了。当我转过身来时，我听到袭龄跑出了房间。那个男孩在我怀里挣扎着，那一刻我恨极了他。我紧紧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拖到他的房间。我想把他的精力限制在那里，直到他道歉。

虽然我不会说中文，但这个男孩一定理解我的决心。“坐在那里！”我命令道。那个男孩遵从了我的朝鲜语，双臂环抱着膝盖。我小时

候有一次发脾气，父亲就把我限制在房间里。当我听到母亲和他争论，说应该允许我出去和家人一起吃饭时，她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但我父亲坚持认为纪律比吃饭更重要，直到饭后我才被允许外出。那也许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吃饭的权利视为重要的事情。

我俯身用手指指着他："你给我待在这个房间。"

说完这些话，我把他留在了他的卧室里。但在客厅里，尴尬的气氛依然弥漫着。这里太安静了，当我坐在沙发上时，我被下面皮革的声音吓了一跳。起初，我担心这个男孩会有多难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担心袭龄。她会坐在另一个房间里，还是会站着？我不知道手足无措。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听到男孩卧室的门打开了。

尽管我让他冷静下来，但他一直处于愤怒状态。当男孩跑向前门时，我已经没有力气对付他了。他举起鞋子穿上，转向我喊道："Shabi zai zi！"当他打开前门准备离开时，他喊道："Shabi，wo da si ni！"

他砰地关上身后的前门，这些话继续在我耳边响起。男孩走了，情况更加尴尬。我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喃喃自语："Shabi zai zi，Shabi，wo da si ni。"我恍惚地抬起头，看到了袭龄。

她站在客厅的另一端，似乎无法靠近我，也无法看着我。甚至她的手也不自然地动了动，先是碰了碰眉毛，然后又碰了碰嘴唇。她似乎换的衣服不太合身，心烦意乱地扯着衬衫的下摆。当我发现自己站在那里发呆时，我也感到很尴尬。然后我们的目光相遇，我们都脸红了。她是那个被破坏了庄重的女孩，而我是那个为此感到尴尬的男孩。

我逃进了钢琴房。房子的这一部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让我感到安慰。我坐在凳子上，打开了钢琴的盖子。黑色和白色的琴键就像黑色的瞳孔映衬着白色的眼睛，所有的琴键都凝视着我的心。

"请给我放点东西。"

袭龄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听起来很近，好像在证实我们两个是房子这一部分仅有的两个人。似乎没有任何音乐能超越她的声音，但我应该演奏什么呢？

我想演奏一首简短而简单、又让人流连忘返的曲子。我记得崔亮老师在我们的音乐史课上经常重复的一句话："贝多芬一生都在创作黑暗的音乐。其中有一首歌很动听，是他为一个情人写的：《致爱丽丝》。我开始为袭龄演奏这首曲子。她似乎很喜欢这首熟悉的曲子，但对我来说，这次不同了。每一个乐节，我都感受到了贝多芬的困境，他在生活中失去了挚爱，但却留下了永恒的乐章。

大约半个小时后，袭龄的叔叔和婶婶一起进门。男孩的父亲一边拖

鞋，一边叫他的儿子。听到声响，袭龄皱着眉头，去迎接她的叔叔。接着听起来，袭龄好像抱怨了很久。这位母亲说她会去找那个男孩，他可能正在附近的街机里玩电子游戏。但父亲用一种愤怒的声音回答说，她不必麻烦。当她拿出茶时，她的丈夫把我叫到客厅。我坐到座位上，他让我准确地重复他儿子对我说的话。我不知道语句的意思，我只是原样重复了他儿子的话。

“Shabi, wo da si ni! Shabi zai zi.”

妻子惊诧不已，袭龄激动地说：“看，没有什么他不会说的！”

我很想知道这些话的意思，但看到父亲极为严肃的表情，我只好保持沉默。“不管怎样，就是这样子，”他最后一边按摩太阳穴，一边说道。“有关于你朋友的消息吗？”他说得很友善，也许是为了转移话题。

“还没有。我今天早上打电话给延吉的联系人，他说要派人去我朋友的亲戚家看看。”

“很好。我也一直在利用我的人脉，在韩国企业中寻找出路，所以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些好消息。你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今晚让我请客。”他从钱包里掏出350元，继续说道：“你来这里住了以后就没出去过。今晚，你何不去城里玩玩呢？今晚我允许了。袭龄，带他看看这座城市的景色！”

“好主意，叔叔。真是太巧了！我的未婚夫今天从上海出差回来了，所以我们原本也打算出去的。”袭龄迅速转向我，说：“我们一起出去吧，我的未婚夫想见你。他比我有钱，所以他可以请客。听起来怎么样？”

我感到有点尴尬。事实上，我对袭龄兴奋于我们晚上一起出去玩而感到非常不舒服，一想到要和她及她的未婚夫一起度过一个晚上，我的情绪就变得混乱起来。我找借口说我感觉不舒服，这样他们两个就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度过一段时间。袭龄没有回答，但在扣上外套纽扣时徘徊了一下。她的叔叔和阿姨都劝我和袭龄及她的未婚夫出去玩。当我把钱塞进口袋时，我决定走了，因为我现在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报袭龄的好意了。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我，尽管我没有任何回报。但现在，我确实有所收获。与其说是钱，不如说是因为有了钱，我重新找回了在逃亡时失去的尊严，那时除了我那破旧的一捆诗，没有其他财产。

“是的，袭龄，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袭龄很高兴能够见到她的未婚夫，现在我已经下定决心和他们一起去了，我对第一次离开家的前景感到兴奋。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离开。

当她的婶婶告诉她要小心，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时，袭龄挥了挥手，先离开了公寓。五分钟后，她打了家里的电话，我下去发现一辆出租车在大楼外等我。袭龄透过出租车车窗向我挥手，让我快点。她当时戴着手闷子。我突然想到我可以给她买一副皮手套。

当我从出租车车窗向外看时，我对街上的人数感到惊讶，而不是对明亮的路灯和耀眼的霓虹灯感到惊讶。我问："今天是中国的国庆节吗？"

"不，你为什么这么问？"她答道。

"那么他们都要去哪里呢？是否正在发生大规模动员活动？"

"在中国，我们没有这样愚蠢的事情！每天人都很多。由于寒冷，今天的人群比平时还少了。"

这对我来说仍然不可思议。在平壤，一天中最繁忙的时间是晚上7点到8点之间的晚高峰。最多不到一两个小时后，街道就像潮水一样清澈见底。由于朝鲜的一切都是按照中央系统运行的，你不能因为想出去吃饭就出去吃饭。即使是平壤著名的Okryugwan冷面馆也在晚上8点关门，而且你不能只用现金支付。要进入餐厅，你需要一张由劳动党轻工业部特别发放的特殊优惠券。这种优惠券制度最早出现在口粮开始减少的1992年左右。该制度的引入是为了维护国家定价的完整性，而国家定价是朝鲜社会主义的骄傲。但从1994年起，口粮分配系统已经完全崩溃，许多接受特殊优惠券和国家定价的国营商店和餐馆倒闭了。

随着市场定价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超过了国家定价，国家工资可以支撑生计的观念遭受质疑。大约150朝元的平均月薪变得毫无价值，甚至一天都养活不了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月了。由于无法供养人民，劳动党别无选择，只能对非法贸易和全国各地涌现的市场视而不见。但随着这种"灰色"经济迅速发展，以及普通朝鲜人不再为了养活他们自己而出现在国家工作岗位上，这种情况成为了一个黑洞，削弱了劳动党控制人民的能力。

2000年7月1日，朝鲜宣布了7.1措施，孤注一掷地试图夺回其控制权的垄断地位，因为人民的生计问题已经超出了党的控制权的应对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社会对这些措施表示欢迎，称其为朝鲜意图改革的证据。事实上，劳动党已将向非国家控制的经济宣战，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今天，劳动党在面对计划外的市场力量时努力保持控制权的垄断。

7.1措施通过将政府平均工资从150朝元提高到2000朝元，含蓄地承认了政府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差异。劳动党敦促人民重返国家工作

岗位，并表示将积极监管市场价格。但突然的加薪和对市场价格的严厉打击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飙升。随着工资的上涨，物价飙升，政府的平均月收入只能买到五个鸡蛋。最后，只有通过将部分市场合法化、收取租金和限制开放时间，劳动党才能对市场实施某种形式的控制。

在平壤，劳动党的权力基础所在，没有一个在黑夜外出的行人会被误认为是出去享受夜生活的人。相反，他们所有人——包括儿童、大学生和士兵——都是被动员参加政治活动或训练演习的，如平壤的百万人集会、阿里郎群众运动会或部队检阅。看到沈阳繁忙的街道，惊叹于灯光和人的结合，我想知道这怎么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节日的例外。这些人是怎么挣到足够的钱来过这样的生活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容忍的？这让我很惊讶。

沉浸在这些想法中，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袭龄已经交了出租车费，我反应太晚了。如果袭龄今天坚持为小的消费买单，我告诉自己，我会为大的消费买单。

“袭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的未婚夫？”我问。

“七点半。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附近有百货公司吗？”

“怎么？你想去里面逛逛吗？”

“是的。你说过我们有时间。”

百货公司就在附近，不到五十米远。在大楼的一侧，一则大型可口可乐广告照亮了周围的区域。入口是一个旋转门。我满怀兴奋地带路，然后惊慌失措地转过身来，刚进去就出来了。入口处有一个持枪守卫的警察，而我差点就撞他怀里了。袭龄看起来很困惑，然后开玩笑地轻推我的手臂，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警察，笨蛋！他只是个保安！手枪也是假的，只是为了展示。”我感到很羞愧，心想袭龄现在可能会把我当成懦夫。我再次带路。平壤也有卖进口商品的百货公司，但它们只接受外币，大多数普通人不能在那里购物。我在沈阳看到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出售的商品比平壤的多，但我很失望地看到这些不是外国进口的，而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注意到一个摊位上摆着皮手套，赶紧向它走去。为了挽回自己刚才在假警察那里的糟糕表现，我挑选了一副真皮手套。

我把它们给袭龄看，“给，试试这个。”

“为什么？”她问道。

当我回答说我想给她买一双时，她摇了摇头，告诉我不要那么傻。她说家里有几双；而且，无论如何，我不能把钱浪费在无用的东西上。

当我看到价格标签时，我泄气了。四百元一副手套？我再次感到羞愧，只能温顺地跟着袭龄走出商店，她催促我，说现在我们要迟到了。

就在大门口内，我注意到一个玩具摊位。我从展品中挑选出两把玩具剑。它们是现代的，把手上有电池，当你按下按钮时，灯会闪烁不同的颜色。我想象着，当袭龄的表弟看到这些剑时，他会很高兴，也许会弥补我们的关系。过了一会儿，袭龄出现在我身边，捏了捏我的胳膊，说她出去后以为和我失散了，于是惊慌失措地冲回来找我。接着，当她看到我买的东西时，她斥责了我，并要求我退款。我努力说服她，坚持认为这是我教学方法的一部分。

在外面，袭龄变得比我更兴奋，咧嘴笑着，在空中切下一把阿拉伯花纹的玩具剑。每当剑一亮，袭龄就显得更加美丽。

袭龄安排在一家昂贵的餐厅与未婚夫见面，那里的服务员在长长的入口迎接我们。我惊讶地看到他们鞠躬，好像在卑躬屈膝。两位女服务员带领我们去到我们的餐桌，我们发现袭龄的未婚夫正在一间私人房间里等我们。仅从第一印象来看，他似乎是个好人。他的朝鲜语发音是Ju Yun-bal。袭龄介绍了我们，并补充说他和一位著名的中国演员同名。我非常喜欢他的笑容，他年轻英俊的外表似乎证实了情侣之间往往是长相相似的人。虽然我唯一学会的中文是问候语“你好！”他似乎对我的这句话很满意。他很有礼貌，帮袭龄脱下外套，在把衣肩弄平，然后把它挂起来。他显然会是袭龄的完美丈夫。

当服务员给我们端来菜单时，袭龄看了一眼，然后递给我。我本来打算付晚饭的钱，然后高兴地开始翻阅菜单。虽然我看不懂汉字，但我对每件商品旁边的数字感到绝望——一份开胃菜的价格在50元以上。我买了玩具剑后还剩340元。

我把菜单递给了袭龄的未婚夫，她叫了服务员，点了一盘又一盘。我用朝鲜语问袭龄，“我想买单，但我只有这么多钱，晚饭，我们可以点什么？”

“算了，”她回答我，“把你带出来也不是要你付款。”

然后她改变了话题，好像在警告我不要再提付款的事儿了。袭龄解释说，在中国，点餐在很多方面都是为了炫耀。例如，如果你要啤酒，他们会理解成你要的不是一瓶啤酒，而是一箱十瓶啤酒。我想知道这是与中国的规模有关，还是与经济改革的成果——经济改革导致炫耀购买力可以标示社会阶层地位——有关。

很快，大圆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对我们三个人来说太多了，对九个人来说可能都绰绰有余。我猜账单会超过1500元。果不其然，正

如袭龄所说，他们给了我们一箱十瓶啤酒。

我说我想去趟洗手间，然后从桌子上站了起来。我记得当我们进入餐厅时，我们走过一个陈列葡萄酒的玻璃柜。虽然我买不起食物，但我至少想给他们买一瓶好酒，尤其是在Ju Yun-bal慷慨点菜之后，即使这真的只是为了炫耀。幸运的是，有一瓶相当好看的葡萄酒，售价350元。我给服务员看了我的钱，虽然他看到钱比要价少了10元，但我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接受了钞票，笑着把瓶子递给了我。

我突然想起了我和永明在延吉的一条小巷里为区区10元钱发生的争吵，我感到内疚，因为我把这些钱花在了葡萄酒上，而他可能正饿着肚子在街上徘徊。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发现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过得很好，他肯定会对他的朋友感到失望。我马上祈祷，我在延吉留给申先生的400元钱能送到永明手中，他能带着钱安全抵达沈阳。当我把这笔钱和我买葡萄酒的钱进行比较时，这瓶酒感觉更珍贵了。尽管如此，当我想到初遇袭龄时，我是如何身无分文的，我现在就感到得以，因为我至少能买得起这瓶酒来向她表示感谢。

当我端着酒走回餐桌时，正在喝一口水的袭龄用力放下杯子，发出了声音。我说我早就知道她会有这样的反应，但为时已晚——瓶子已经打开了。但没想到，当她看到标签时，态度缓和了，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葡萄酒。把瓶子递给未婚夫后，她看了我一眼，并用威胁的语气说，她会向她叔叔要钱，因为我在葡萄酒上浪费了钱。

从那时起，我们把啤酒杯放在一边，用葡萄酒杯敬酒。我很惊讶地发现，在中文中，你也说了Gunbae！当你祝酒时，就像我们在朝鲜一样。当袭龄的未婚夫接到一个电话时，我们正在讨论这个词的来源。

我把袭龄的杯子和我自己的杯子都装满了。“袭龄，我能问你点什么吗？”

“你想问我什么都行。”

“你知道你表弟今天早些时候喊了什么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shabi zai zi。”

“嘘！”她对未婚夫点点头。“他可能会听到。”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他们说，如果你知道生活的所有答案，你就活不了多久！”

“那我就去问Ju Yun-bal。”

“不，不要那样做！我会告诉你的。安静。”

“那么，shabi是什么意思？”

“傻……逼。”

“这孩子！什么是wo da si ni？”

“我要把你打死。”

“哇。那zai zi是什么？”

“你不需要知道。”

“那我就去问你的未婚夫。”

“别，我会告诉你的。”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它的意思是‘刺’。”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就像男性器官一样。”

也许是因为她喝醉了，裘龄脸红到了耳朵尖。当我说我会要求她的表弟在我给他玩具之前为他的侮辱和对她的攻击道歉时，裘龄拍手微笑。当她的未婚夫打完电话时，他问我们在说什么。

裘龄问我，“我应该告诉他什么？”她的脸上满是恶作剧。

“告诉他，如果他让你哭，你会像你表弟那样和他说话。”

她把头往后仰，笑了。她的未婚夫现在似乎更好奇了，我担心她可能会准确地翻译我说的话。当他竖起大拇指时，我松了一口气，但很困惑。裘龄解释说，她告诉他现在该轮到他买葡萄酒了。我重新认识到，人际关系是建立在谨慎的话语之上的。

晚饭后，我们去散步。当时没有下雪，于是这是一个壮丽的冬夜。裘龄走在我们中间，每只胳膊上都有一个人。我本想像这样一路走回西塔，但一辆出租车在经过时减速了，尽管我们没有招呼它。我们决定上车。当我们到达西塔时，裘龄是最后一个下车的。她的未婚夫斥责她没有把零钱留给司机。裘龄生气了，她继续往前走，并把手伸进我外套的口袋。她解开我紧握的拳头，把零钱按在我手里。当我试图从口袋里掏出钱时，裘龄把我的手压住。当我再试一次时，她捏了捏我的手背。当我的手投降时，她用手指拍了拍，好像是为了奖励它的良好行为。

在大楼的入口处，裘龄的未婚夫差点摔倒在冰上。当裘龄和我冲过去扶他时，我们都失去了平衡，大笑起来。裘龄喝得头晕目眩，坚持走楼梯而不是乘电梯，让我们和她一起爬了八层楼。我很快乐，但当我们到达公寓时，我们在一起的夜晚似乎结束得太早了。

裘龄按了门铃，然后不耐烦地敲门，旁边的两个男人给她壮胆了。我们的精神状态都很好，但当门打开，出现一个表情严肃的警察时，我们踉踉跄跄地后退。就在警察身后，站着另一个人。

第六章 谋杀犯政权

开门的警官走了过来，站在我们三人的后面。我的心跳得很快，但我惊讶地发现，情况并没有像其他危机时期那样糟糕。当我们走进客厅时，袭龄的叔叔用快速的朝鲜语解释道："我和妻子简短地谈过你的事，但我儿子一定是无意中听到了。他问了一些问题，我妻子几次让他承诺，他不能告诉任何人有朝鲜人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事情。但他不是那种按要求行事的人，是吗？所以他带着这些人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家里藏着一个朝鲜人。"他咬紧牙关补充道："今晚我要打断他的腿。但请保持冷静，我已经告诉他们你是韩国人了。"

其中一名男子示意叔叔不要说话，然后向男孩坐的沙发做了个手势。当他叫他时，男孩急切地跳了起来，这让我很不安。想起袭龄对他的表弟评价不高，这让我预感到事情不会进展顺利，当他大摇大摆地向我走来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他用手指指着我，然后用手指戳了我的肚子好几次。

我的双手因焦虑而紧握，失去了控制，装着他的两把玩具剑的袋子掉到了地板上。当男孩看到它们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看着我，确认我不会阻止他，于是抓住它们，冲回沙发。两名警官自信地向我走来。

他们说你必须给他们看你的护照。"用韩语说点什么，我会用中文告诉他们，你的包丢了。"袭龄迅速指示，抓住我的胳膊，好像我们是情侣一样。

当我们与这些人来回翻译时，男孩固执地打断了我们几次，也许是为了指出我们是如何撒谎的。父亲最终拍了拍他的后脑勺，让他闭嘴，男孩尖叫着跑进卧室，大声关上门。

袭龄的未婚夫本来之前一直保持沉默，但突然对警察大喊大叫。其中一人推搡他的胸部以恐吓他。Ju Yun-bal再次挑衅地向警察喊道，并威胁性地向前走去。当袭龄走到他们中间时，另一个人打了一个电话。每个人都安静了一会儿，袭龄脸色惨白。

"你得跑了，他们刚刚要求增援。"

警察把手机放回口袋，解开腰带上的手铐。正如申先生家的一个女孩所描述的那样，这些中国手铐闪闪发光，崭新锃亮。我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话，告诉袭龄，"请为我争取一点时间。"

我大步穿过客厅，尽力表现得毫不在乎，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人试图阻止我。我走进钢琴房，收集了我的诗歌手稿、带有我真实身份的身份证明文件和太阳镜。

我转身朝前门走去，但那两个人挡住了我的去路。袭龄尖叫了一声，与此同时，她的未婚夫冲向其中一名警察，抓住他的腰部。袭龄冲向另一名警官，喊道："快跑！快！"

我没有停下来环顾四周，就跑下了楼梯，一次跳了几级。当我从一个台阶飞奔到另一个台阶时，我可以听到身后的喊叫声，然后是袭龄的尖叫声，接着是身体落地冲击而发出的砰砰声。我能听到更多挣扎的声音，还有一扇门撞在墙上的声音。突然间，楼梯上传来沉重的靴子声。

跑出大楼时，我被台阶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我再度回到公寓楼旁边的巷子，藏在垃圾桶里。警察们迟早会离开，然后我就可以向袭龄和Ju Yun-bal，以及她叔叔的家人做最后的告别了。我希望袭龄能想办法溜出去和我告别。

但情况越来越糟。靴子声传来，一名警官怒气冲冲地冲到了公寓大楼的大门外。他的帽子不见了，上衣的纽扣也开了；楼上肯定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警报声响起，一辆警车出现。又有两辆面包车紧随其后，八名警官冲出车外。他们集结在无帽警官附近，听他的指示，然后开始执行他的命令。其中四人回到了公寓，其余的人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其中两个人开始向我走来。他们离我只有十米。如果我再呆在那里，我就会被抓住。我低下头，开始跑。

"站住！站住！"

他们中的一个人发现了我，开始大喊大叫。我开始冲刺。可怕的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想象着一只粗糙的手随时会抓住我的衣领。就像我渡过图们江时一样，我的双腿在我身下颤抖着。我气喘吁吁，胸口发闷。我拐进了一条两边都是高墙的小巷，军官们的靴子声在我周围回荡。

我担心自己会走入死胡同，于是惊慌失措，意识到这里的街道与延吉的街道不同，那里的道路一直是开放的。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不能再冲刺下去了。我的腿很重，感觉每一步都在拖动。我考虑放弃了。

正好前面有一面钢鼓，我用尽我的力量把它扔到我身后，当鼓落地时，我听到了军官们的惨叫——对我的乐感完美的耳朵来说，这是一种甜蜜的和谐声音。追击的靴子声似乎停止了。但是没有，靴子声又响起。这个人比倒下的那个人更强壮，而且在不断追赶。20米、15米、10米......我必须做出决定。我拿起一块金属管子。我大声尖叫着，转身面对迎面而来的警官。

他身子一僵，几乎向前倒去，因为他猛然停下了脚步。虽然天很黑，但他站得很近，我可以看清他的眼睫毛。我把管子高高举过头顶，

当杆子刮到两边隆起的水泥墙之一时，它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我获得了信心，抡起杆子又刮了一下，拼命地刮。火花从管道的末端飞出。我大叫着，像一条喷着火焰的龙，“shabi！wo da si ni！Shabi zai zi！”

我再次将管子高高举过头顶，向那名警官跑去。他退了几步，然后转身就跑。追赶他几米后，我看到一条小巷通向右边。我又用管子在水泥墙上刮了一下，让他知道我有意要跟着他。为了防止他改变主意，决定再次追赶我，我又喊了一声：“sha bi，wo da si ni!Shabi zai zi!”然后我飞快地跑进小巷。

我在巷子里跑了大约十分钟。当我走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时，我放慢了脚步，但我继续前进。那时我已经放下了管子，我感到从我的手到肩膀都已麻木。当我用另一只手触摸时，完全没有感觉——就像摸到一个异物。我的手指末端在颤抖和抽搐。

我检查了我的口袋，我的诗安然无恙。也许这些诗是我的幸运符，正护佑着我。以往每次我和我的诗分开时，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延吉，永明把它们还给了我，在沈阳，袭龄为我争取了时间来取回它们。我双手抱胸，决心再也不让我的手稿离开我的上衣口袋。

袭龄出了什么事？她和她的未婚夫，她的叔叔和婶婶——他们一定很震惊！我担心当局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我已经跑到了郊区，现在我被黑暗所包围。我可以看到远处有一片区域，那里集中了明亮的城市灯光。也许那是围绕着袭龄叔叔家的警灯发出的光芒。

袭龄的表弟将在他的父亲那里受到严厉的教训。袭龄也不会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然后我想起了那些玩具剑。我把它们放在哪里了？我把它们带到公寓里了吗？是的，我记得那个男孩把它们捡起来了。我本来想把它们作为礼物，但最后却成了他向当局举报我的奖励。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多么愚蠢的人啊!我像个疯子一样大声笑了起来，直到我意识到那个男孩在某些方面帮助了我。我之所以能够鼓起勇气在一个警察面前挥舞钢管，是因为我一直在模仿这个男孩。而他给我上的中文课也是非常有用的：Shabi, wo da si ni!Shabi zai zi!

我对自己重复这句话，走到一个有路灯的地方。袭龄如果知道我安然无恙，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如果我再见到她，我会向她描述我用钢管击退一名警察的武打壮举。她会像母亲对待男孩一样拍拍我的头。看到我安全，王侯的父母会原谅他。

我快步走起来。如果我真的再见到袭龄，我们将不得不说再见，而我将不得不去北京。如果我再见到她，我不确定是否能忍住泪水的涌动。

我继续走着，而我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我意识到我已被汗水浸透。我很难相信，我能在延吉附近的山上度过两个晚上而没有被冻死。

当我看到到处都是的韩文标志时，我意识到我一定是回到了西塔区。如果我再往前走一点，我可能会到达那个熟悉的公寓楼，也许袭龄会在那里等着。也许警察已经走了，我可以偷偷回公寓？我感到幸运在眷顾我，而且希望似乎离我越来越近。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熟悉的可口可乐广告。这与我和袭龄进入的百货公司墙上的广告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广告移到了不同建筑物的墙上？当我走近时，我意识到那是一家餐馆，而不是一家百货商店。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另一个广告，完全一样，在霓虹灯中闪烁。我来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人们到处行走，不在乎他们是踩在人行道上还是马路上。铺天盖地的混乱行人，加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交通噪音，使我更难恢复方向感。

恐慌笼罩着我。今天是我第一次外出。当我们到达袭龄的叔叔家时，以及当我们和她的朋友一起去餐厅时，我们都是坐出租车。我意识到我并不知道哪条路通向何方。

远处火车的隆隆声让我想起，当我从袭龄叔叔的公寓向外看时，越过低层建筑的屋顶，我能够看到许多相交的铁轨。如果我到了铁路交叉口，我想我也许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走了半个多小时，但意识到我完全迷路了。我周围的环境变得很破旧。除了头顶上像蛇一样纠缠在一起的天桥，所有的公寓楼看起来都一样。我试着回忆我在躲避警察后的路线，但根本记不起来。当我回到看起来像西塔的中心区域时，街道更空旷了，车和人都少了。一辆警车从我身边驶过，警笛无声，警灯闪烁。

我对自己很生气。在和袭龄的叔叔住在一起时，我放松了警惕。我是多么粗心大意，没有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可能完成前往韩国的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

那天晚上，我睡在某个公寓楼的楼梯间里，蜷缩着抵御寒冷，抬起膝盖，把脸贴在上面。这种姿势肯定对我的血液循环不利，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时，感觉身体里仿佛结冰了。我的牙齿不受控制地咔咔作响。当我试图伸展我的四肢时，仿佛能听到冰块破裂的声音。全身上下没有不疼的——我的胳膊、腿和背都在疼痛中抽动。我担心我可能骨折了——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跑步已经很困难了，但如果受伤，我就完了。当我

看到经过昨晚冲刺后给身上留下的淤伤时，松了一口气，我发现了我疼痛的来源。

看着天空随着黎明的到来而呈现出色彩，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马上就能找到回去的路。但这个城市比我在黑暗中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我绝望了，因为我脑海中精心拼凑的熟悉地方的地图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这个难以捉摸的城市的混乱。

经过中午进入下午，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只有当我想到食物时，我才意识到我又一次身无分文了。在惊慌失措的几秒钟里，我赶忙往回走，以为我把350元钱掉在了地上。当我想起我在晚餐时把钱花在了一瓶酒上，而且袭龄在看标签时很欣赏我的选择时，我不禁苦笑起来。在这个积极的记忆基础上，我有了个点子。我可以给申先生打电话：他妻子的手机上会有袭龄叔叔的座机号码。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找回那个号码，然后我就能见到袭龄最后一面。

起初我兴奋地快步走着，当我想到要如何找到硬币来打电话时，我放慢了脚步。我只需要一元钱。然后我想起袭龄曾提到过西塔教堂的事。她说，很多朝鲜难民去那里寻求帮助，而韩国人则提供钱来帮助他们。一个难民甚至得到了足够的钱来购买假护照，并能够飞往韩国。我决定要去这个西塔教堂。我不会乞求援助来满足我的全部逃亡需求，只是以同情的理由要求得到一元钱。任何人都可能有落难之时，而一元钱的请求也不会太多。我戴上太阳镜，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我注意到一个韩文牌子，上面写着“Kyonghoeru”。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统战部研究汉城时曾了解过。Kyonghoe指的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良性会面，是十四世纪一位朝鲜国王在汉城景福宫附近建造的一座塔的名字。就像这个名字背后的历史一样，这家餐厅也很大。当我进入时，只有一个女人在打扫卫生，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午餐的供应。幸运的是，她会说朝鲜语。她亲切地告诉我去西塔教堂的方向，甚至给我画了一张地图。

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后，我成功地找到了教堂。教堂外面有一些人在交谈。当我接近他们时，我可以听到一些朝鲜语片段。我认出了自己的语言，迫切地想加入其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群朝鲜人似乎在中国人中显得很特别，甚至在他们的穿着上也是如此，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时尚感。一个年轻人穿着鲜艳的夹克和长裤，配着一件精巧的白衬衫。旁边一对高大的夫妇在交谈，两人都穿着精巧的黑色长外套。我为我的朝鲜同胞们看起来这么好而感到自豪，并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平等地站在他们中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无法忍受向他们

乞讨的想法。尽管我只想要一元钱，但我无法向他们要钱。我想起了我父母在我年轻时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决不能向别人乞讨。相比于乞讨，要求安全抵达韩国，几乎变得更容易被接受。

当我带着这个想法走到大楼的入口时，有两个人阻止我进入。

“你在找谁？”

“我到里面有些事情。”

“你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会众的成员。”

“我不是，我是从朝鲜来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谈。这里很危险，我真的必须去……”

我还没说完，其中一个人就抓住我的胳膊，阻止它伸向把手，另一个人把我推了回去。

“星期天再来吧。那时我们可能会给你钱。今天不行。”

我立即反驳道：“我不是来讨钱的。请相信我。我不是来要钱的。我不是那种人。”

“这不是给朝鲜难民避难的地方!还有，你的太阳镜是怎么回事？快离开这里。去找一个领事馆或大使馆，你这个垃圾。正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渣不断来到这里，当局才为难我们。你听不到我说话吗？离开这里，出去！”

我向后倒去。当我迅速离开时，我想我能听到身后有军靴的踩踏声。我的脸被羞辱得发烫，想象着楼外的人群在我背后嘲笑我，我越来越愤怒。我放慢了脚步，以维护我的尊严，但内心却在呐喊：难道我不是在用相同的语言发出求救的声音吗？难道我们不是同胞，说着同样的语言吗？

我在离教堂不远的一个公园里的长椅上坐下。即使我抬头仰望广阔的天空，依然感觉不到丝毫的自由气息。我曾想象，我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自由的边界就像浩渺宇宙一样宽广。但结果是，自由遥不可及。是否有某些人被设定为生而自由的？是否自由是一种预定的命运，而我无权享受？

我记得永明说过，在我们被赶出延吉的教堂后，我们将永远无法到达韩国。也许他用我们最后的10元钱买刀片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绝望地坐立不安，双手在口袋里开开合合，我的手指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皱巴巴的小纸团。我把它拿出来，扔到地上。我的目光茫然地停留在它上面，直到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团垃圾，而是一些珍贵的人民币。我伸手捡起它，发现有两张一元的纸币。这是来自天堂的礼物？

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困惑地想了一会，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袭龄的

脸。那是我们一起坐出租车之时。

我叫出了她的名字："袭龄！"

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奔跑起来寻找电话亭，但却发现一个老妇人在街上用她的座机提供有偿电话服务。我把钱递给她，用另一只手接过听筒。我开始拨号，在申先生接听前的短暂时间里，袭龄的脸在我脑海中闪过。

"喂？"申先生接听电话。

"嗨，是我。你知道你妻子手机上的那个号码吗？"我快速地说，试图使信息尽可能简短，以便我可以给袭龄打电话。"我没有钱了，所以在我这个电话的分钟数用完之前，你知道我曾打过的那个号码，你能给我念出来吗？我很快就会给你回电话！"

"你到底在说什么？"申先生问道。我很恼火，开始重复我的句子，但申先生将其打断。"你的朋友已经死了。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没有回应。

申先生继续说："你在听吗？你的朋友永明——他已经死了。"

我怀疑我刚才听到的不是一个真实的声音，我还检查了我是否仍在拿着电话。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我艰难地说道。听筒在我手中颤抖。

"保持冷静。听我说话。昨天，我接到了永明叔叔的电话，要我紧急见面。他不说原因。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这个人非常痛苦，无法说话。然后他泪流满面，告诉我他的侄子已经死了，而且是一个可怕的结局。他说，永明被中国当局用汽车带走了，他们在开车经过一个山口时，他显然要求在路边解手。他利用这个机会从岩壁上跳了下去，自杀了。永明在房子附近被抓之前，已经在街头流浪了一个星期。叔叔被要求辨认他的尸体，他确认了。"

之后申先生说的话我就再也听不进去了。我放下了听筒。甚至当老妇人把电话从我身边拿走，抱怨我超过了规定的时间时，我也没有察觉。

晚霞映照在我们周围的玻璃建筑上。当世界淹没在红色的浪潮中时，我肯定以前见过这样的天空。这也是我和永明在第一个晚上看到的夕阳，在去找常勇的婆婆家的路上。那是一个美丽的夕阳，充满了希望。我感觉到永明正在从那个遥远的地方向我走来。当他在我眼中变得越来越清晰时，我的视线却变得模糊起来。永明不可能死。这不可能是真的，即使是永明的父亲确认了永明的尸体也不行。他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和我在一起？我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好像如果我哭了，

就意味永明真的死了，但如果我忍住眼泪，永明就会回到我身边。

我走了几步，然后跪倒在地，因为我想起了永明在延吉市场拼命想买酒的情景。他所想要的只是在我们逃离追捕者的时候暂时地放纵一下。但我甚至拒绝了他最后的那点安慰。现在，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我们对自由的希望，即使这意味着投降，我还是徒劳地希望我们能共享那最后一个醉人的夜晚。

我感到满满的痛苦的遗憾，跪在人行道上哭了起来。我没有陪他走到最后。他从岩壁上跳下，因为我没有在那里握住他的手。当他知道自己要掉下去的时候，他感到了什么痛苦？在那最后的时刻，我那善良的朋友又是如何祈祷的呢？我呻吟着，眼泪止不住地流。在永明自杀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弹钢琴，奏那本来应该由他来演奏的音乐。

我在痛苦中哭泣，因为我一无所有，甚至没有一杯酒来纪念永明，这让我更加痛苦了。我所有的只是我的名字，我只能用我那可怜的泪水来祭奠永明的魂灵。

第七章 自由万岁！

黎明到来了。新的一天给我带来了挑战，我折断了太阳镜的镜架，把破碎的太阳镜扔在地上，把它们踩在脚下。得知永明已死，我无法再胆怯下去，无法再躲在墨色的镜片后面，从世界上隐藏自己。如果我继续隐藏，永明的灵魂会嘲笑我。我为自己的独活感到羞耻，而继续懦弱下去是一种更严重的背叛。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是一个逃亡者。我不再是出于恐惧而逃亡，而是为我的自由而战，这样我就可以揭穿金正日的谎言。我并害怕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死去，这个想法将我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当我路过一个警察时，我甚至没有退缩。如果我必须走永明走过的路，那就走吧。我默默地对每一个路过的警官发誓：Shabi, wo da si ni!Shabi zai zi!

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不是我来的路和我要去的路，而是一条我已知的路和一条未知的路。后者才是关键，我要找到一条去北京的路。当我再次看到韩国餐厅“Kyonghoeru”的招牌时，我觉得我得尝试利用任何我遇到的事物。

当我打开门时，我发现了前一天给我指路去西塔教堂的那个女人。

“进来吧，”她说。她认出了我，甚至问我是否能顺利找到教堂。

“是的，我找到了。你人真好，谢谢你。”

那女人听到我的赞美，羞涩地笑了。“你想点什么？”她问。

“我不吃了，谢谢。请你给餐馆的老板打个电话好吗？”

“你认识他吗？”

“请告诉他有人想见见他，谢谢！”

“先生!先生！”女人跑去找老板了，她的声音变得遥远。现在离午餐时间还太早，所以没有其他顾客。我看着窗玻璃中的自己，整理了下自己的头发。我尽可能地拍掉肩上的灰尘和污垢，用口水抹在外套上，使外套干净些。痕迹变深。

“他五分钟内就会下来。他在刷牙呢。请坐这儿等。”那位女士向一把椅子做了个手势，然后走进了厨房。也许她是要在餐厅上客之前先把自己的饭吃完。

我准备给餐馆老板留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虽然我的外表可能很寒酸，但我想传达出礼貌和威严，这样他就会把我看成一个普通人。我应该挺直腰板坐着，显示出自信？或者我应该坐得更谦虚，但把头抬高？当我尝试不同的姿势时，我注意到另一张桌子上有一份报纸。我决定，没有比等待时手拿一张打开的报纸更自然的姿势了。我向后坐，交叉双腿，打开报纸，但当我看到它是什么时，立即坐直了。这一份韩国报

纸，我以前在统战部工作允许时喜欢读它。

统战部通过中国购买韩国的报纸，所以当它们到达我们那里的时候总是过时的，最好的也已经过了三天。但现在我在这里，读的是今天的报纸！我觉得我已经进入了自由的世界！由于这是一份从我的最终目的地过来的报纸，我不能只是匆匆浏览。我不想错过其中的任何一个故事。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电话号码，供读者提供故事线索。在我翻过这一页前，我又看了看这个号码。我怎么能利用它呢？这个联系方式是用来征集独家新闻的；它不是一个寻求庇护之人的求助热线。如果连韩国驻沈阳领事馆都不关心我的情况，为什么一个记者要关心？此外，如果我真的向他们提供信息，我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多的危险。

记者与间谍没有任何关系。然而，那些为自由媒体工作的人可能愿意冒风险去揭穿一个谎言。如果我能够见到他们中的一个人，他们可能会听我的故事。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为我去北京的车费弄到足够的钱。

“你在找我吗？”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我对面。当我注意到他紧闭的嘴唇时，我知道，如果这不成功，那就完蛋了。

“是的，我是来告诉你一些事情。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了。

“拿两杯茶来！”男人朝厨房喊道。他拿起我正在读的报纸，把它卷起来，拍打着桌子边缘的一只苍蝇。然后他把报纸扔进了垃圾桶，再次转向我。他的态度让我觉得他不会在乎我说什么。我感到内疚，决定要编一个故事。

“我来自朝鲜，”我开始说。

一直舒服地坐着的餐馆老板又转身对厨房喊道，“为这位先生提供早餐！”

自从我第一次踏进餐厅，我的肚子就一直在呻吟，但我假装对早餐的提供感到吃惊。“我不是来这里吃免费餐的！”我感叹道。“我是来和你谈点事的。”

那人疑惑地看着我，又对厨房喊道：“取消那份早餐！”

我的心一沉，但我尽量不表现出我的失望。我问道：“你知道韩国家具巨头Ace Bed公司吗？”

他回答说：“我与那样的公司没有任何联系，我也不感兴趣。你想说什么？”

Ace Bed的董事长安玉秀（Ahn Yoo-su），最初来自朝鲜。我在统战部工作中知道安董事长的背景。我们编制了大量韩国首席执行官的资

料，以便操纵韩国企业集团向我们提供援助。安玉秀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因为他和我一样，出生在我的家乡黄海北道的沙里院。他在朝鲜战争期间逃到南方，从零开始，创建了韩国最大的家具公司。沙里院的主要道路是由安氏捐赠的资金购买的沥青铺设的。

我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许多个人细节，这样餐馆老板就不会把我当作一个绝境中的的难民来看待。我停顿了一会儿，特别强调了我的下一句话："我是安主席的侄子。"

那人抬头看了我一眼。他此前一直专注于他茶杯上的图案。

"我叔叔在北京有一个子公司，"我继续说。"我一从朝鲜过江，到达延吉，就给北京子公司的总经理打电话。他说他会把我的信息传达给董事长，并说他会在办公室等我。我只要求你提供去北京的长途车费。我保证我一定会报答你。我的叔叔也会永远感激你。"

这这其实根本说不通。为什么一个大亨的侄子会缺车费？即使他确实缺车费，那为什么北京的总经理会在办公室等我，而不是派车来接我？我真是个白痴。汗水顺着我的背脊流了下来。

"我不是镇上这一带唯一的朝鲜族人。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向我要长途车费？"

我想不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确信他希望我离开。即使我真的是有钱叔叔的无钱侄子，他也不会在乎。我们之间出现了片刻的沉默。我张开嘴想说话，绝望地希望我的心能引导我的话语。

"因为你是Kyonghoeru的老板，因为你经营着沈阳这里最大的韩式餐馆，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我说。

这些话，至少是真诚的。

在我把自己弄得如此可怜之后，我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离开餐厅，在门口等着他的决定。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用他的大手抚摸着脸颊，盯着我。然后他向一边倾斜，似乎要从椅子上站起来。但在我惊恐地闭上眼睛之前，他从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一个钱包。

"到北京的车费是250元。如你所说，我是Kyonghoeru的老板，所以这里多了一百块。在路上吃点东西。你的嘴唇都干裂了。"

我内心涌动的绝望的泪水变成了感激的泪水。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滚落下来，流到我的手背上。Kyonghoeru的老板假装没有看到，站了起来。你不需要还我钱，"他和蔼地说道。"你现在有车费了。走之前吃点早餐吧。"当他向厨房喊道"这位先生的早餐！"时，他又变回了粗暴管理者。

为了掩饰我的泪水，我站起来时低下了头。由于无法直视他的眼

睛，我把腰弯得更深。“谢谢你。我会报答你的感激之情。请记住我——我的脸和我的声音。我会报答你的。”我再次鞠躬，然后转身离开。

“嘿！”那人喊道。“吃点早餐吧！”

我跑到外面，但没跑多远，我回头看了看牌子：“Kyong-hoe-ru”。我将在我的余生中珍惜这三个音节。而现在，我将能够前往北京，前往韩国大使馆。

我直奔沈阳汽车总站而去。在路上，我给申先生打了个电话。我想向他和裘龄保证，如果我在韩国成功获得庇护，我将回来看他们。但申先生的电话已关机，他妻子的电话也没有接通。

我在汽车总站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没有打通。我担心当局在成功抓获永明后，可能已经抓获了申先生。我告诉自己，等我到了北京再试试。

在等车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在餐厅看到的韩国报纸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一名女士，想到与韩国驻沈阳领事馆通话的糟糕经历，我准备好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方式通话。

“你好，我能为你做什么？”她风趣地说。

“喂!这是用于提供线索的电话，对吗？”我尽可能平静地说话。

“是的，就是这样。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和地址好吗？”

“我是从朝鲜过来的。”

“你说什么？”

“我打电话不是为了寻求庇护或类似的东西。我在统战部从事朝韩事务工作。我是来中国出差的。我打电话是为了向贵报提供一个独家新闻。”

“你说的是统战部吗？朝韩事务？好的，请稍等。”她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喊道。“先生，先生!你有时间吗？”

我想象得到，那个女人放下电话，跑去找编辑。几秒钟后，我听到一个男人急切的声音。

“喂？你好!非常感谢你的联系，这很难得。你此刻到底在哪里？你说统战部？那是处理韩国关系的部门吗？”

“是的，”我答道。

“我明白了!很荣幸能与您交谈。能否请您解释一下您在该部门的职务？”

“我不能长时间呆在线路上。你必须理解。”

“当然，我完全理解。请你告诉我一些关于你想向我们提供的信息好吗？至于其他的，现在不必急着说。”

“我带着我的朝鲜身份文件。但你怎么能仅仅通过与我通电话就相信我是真的呢？”

“不，我相信你。当我听到你的声音时，我可以——”

“对不起，我得赶紧说：请给我你们驻北京记者的电话。不是他的办公室号码，而是他的手机号码。这也必须是一个私人号码以防被窃听。”

“好的，请稍等片刻。我真的很抱歉，这真的只需要一会儿。”

韩国的记者们很快就找到了号码。编辑很快又和我通话，给了我一个他们驻北京的记者的私人号码。他说我应该等十分钟再打电话，我们挂断电话后他会马上给那位记者打电话，告诉他等我的电话。

在这十分钟的等待中，我全神贯注——就像我在创作诗歌时那样——思考：当我接通记者的电话时，我要说什么。我只有一通电话可以让他站在我这边。

当我打电话时，电话那头立即接通了。

“你好，”我开始说，“我曾经在劳动党的统战部工作。拨打这样一个私人号码，我觉得更可以放开说话。”为了确立我身份的合理性，我告诉他我为什么离开朝鲜，我可以提供什么信息，以及我被陷害为谋杀犯的事实。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要点上，并尽可能地保持简洁。然后我用坦率的语气说：“如果你决定见我，你必须意识到风险。我很高兴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事情，但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更不用说我自己的安全。如果我到了韩国，我保证会用许多独家新闻来报答你。请帮助我。”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问。

“请为我联系一个在北京的韩国间谍。”

“恐怕我不能帮助你。我不认识任何间谍。”

“我不傻。你是一名记者，在中国这样一个朝鲜特工自由活动的国家，如果你不知道，你一定离知道的人只有一个电话之遥。请你站在我的立场上。当你挂断电话后，你可以回到你的正常生活中去，但对我来说，唯一剩下的就是自杀。”

有那么一会儿，电话里只有电流声。我以为他会像韩国领事馆的雇员那样挂断电话。

“你说你现在就在沈阳？”

仅仅是再次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感到很高兴。“是的，我在沈阳的汽车总站，”我急切地说道。“我已经买了一张中午去北京的车票。”

他让我一到北京就给他回电话。他说他会在我到达之前尽最大努力为我找到援助。

到北京的旅程花了八个小时。在这漫长的八个小时里，我每时每刻

都在脑海中回放我与北京记者的谈话细节。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重点，他每一句话的语气——我都一一检视过了。最后，想到我不是和一个普通的当地人说话，而是和一家韩国大报的记者说话，而且他承诺会尽力而为，我才得以稍稍放松。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相信他的话。

在北京一下车，我就四处寻找电话亭。北京的汽车总站比沈阳的那个大得多。一个巨大的时钟显示，现在是九点十分，在右边我发现了一个电话亭。拨通号码后，我祈祷记者会接听。在这个时候，我不在乎他是否给我一个冷漠的拒绝——我只希望他能接电话。

“喂？”他接了电话。

我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我刚刚抵达北京。”

“我要给你念一个电话号码，”他说。“请不要把它写下来，只能心记。我们一挂断电话，你就应该马上打那个电话，有人会接听。只是你要知道，接电话的那个人不是韩国情报部门的人，但他可以帮助你联系韩国大使馆。那人让我重复一遍电话号码，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的手指在拨号时颤抖。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有人接了。

他说：“你好，你怎么样？”

“你好！你好！我是——”

他打断了我的话。“暂时不要说什么，先生，请你仔细听。从你所站的地方看，十点钟方向有一棵树。你看到它旁边的垃圾桶了吗？”

十点钟方向确实有一棵树，旁边还有一个垃圾桶。一定有人在监视我！当我意识到这一事实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朝鲜特工，我惊慌地环顾四周。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推断如果是朝鲜特工的话，现在应该已经扑向我了，于是我把目光投向那棵树和垃圾桶。

“是的，我可以看到那些东西，”我回答。

“如果你看看垃圾桶里面，你会发现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塑料袋里有一部手机。让我们用那个电话再联系。”

我还没来得及问任何问题，电话就断了。我走到垃圾桶旁，往里面看。天太黑了，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于是我把手伸进垃圾桶，开始摸索塑料袋。我拉出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只破损的运动鞋。我又试了试，然后我感觉到了类似塑料的东西。我把它拉出来，打开袋子，发现一个手机和另一个物体，很厚，用纸紧紧地包着。

拿出手机，我翻开了它，开机。我的手在疯狂地颤抖，我能感觉到我的脉搏在我的脖子上怦怦作响。

电话马上就响了。我回应：“我找到了！”

“是的，很高兴见到你，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我们？是指韩国的间谍？还是记者？

“我们一直在努力联系你，最后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现在请仔细听。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中国当局不仅派出了边防军和警察，而且还动员了国家安全部的特工。而朝鲜的特工几天前也来到了他们在北京的大使馆。”

中国国家安全部？那是他们的秘密警察。我对中国共产党犯了什么罪？

“所以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安全，你必须完全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是的，我明白。”

“首先，我想问你一件事。当你在沈阳时，你是否向韩国记者提供了任何文件形式的信息？”

“不，我们只在电话里谈过。”

“我明白了。很好。请迅速向主干道走去，打一辆出租车。等你上了出租车再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司机该去哪里。”

我照做了。我走到大路上，我向一辆开着灯向我驶来的出租车挥手示意。有一瞬间，我以为司机没有看到我。但后来他在超过我所站位置的十米处停下，并倒车，直到车在我面前。当我上车时，他用中文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示意他等待，并再次给那个韩国人打电话。

“喂？我在出租车上，”我说。

“好。现在把电话递给司机。”

也许司机被电话里柔和的外国声音惹恼了，因为他的反应很粗暴。他把电话递给我时甚至没有回头看，就匆匆忙忙地开车了。

当出租车驶向我们未知的目的地时，我一直在看向后方。我并不担心有隐蔽的眼睛在看着我，反而担心以这种极快的速度，我们可能会过于远离我的监护人。我焦虑地坐着，当司机加速到太快时，我甚至向他打手势让他慢下来。

电话又响了。“塑料袋里有2000元，”那声音说道。

“在哪？”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塑料袋里的另一个物体是一捆现金。

下车时给司机100元。他可以保留这些零钱。拐进下一条街后，出租车会停下来。

出租车停稳后，我发现我们来到了一家酒店，但我来不及记住它的名字。电话里的声音直接引导我去酒店大堂的咖啡馆。它指示我点一杯咖啡，甚至告诉我应该怎么坐。

“好了，我们这边就完事儿了，”那个声音总结道。“五分钟后，一个男人会坐在你的桌子旁。从现在开始，你所要做的就是听从他的吩咐。再见。”

当电话结束时，我的生命线也好似消失了，而手机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物品。我感到一股灾难即将来临的冲动。我担心那个人说的“从现在开始”是一个指令，让我用付完出租车费和一杯咖啡后剩下的1850元钱过上逃亡者的新生活。否则他们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现金？

当手机小屏幕上的时间每过一分钟，我的呼吸声就越来越大。当我缺乏一元钱来打电话，或者再缺乏十元钱来和永明一起喝酒的时候，我经历了比我所能想象的更多的绝望。然而，拥有1850元人民币并不能让我感到安慰。它沉甸甸地躺在我的手里，我紧紧抓住它，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抓住。

“张先生？”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想站起来，但感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仅仅五分钟后，他就到来了，这似乎证实了他的可信度，而当他最终站在我面前时，他的身体仿佛一座山一样坚实的存在。他是一个50岁出头的精明人，穿着刚熨好的西装，戴着闪闪发光的眼镜，显得很潇洒。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过来，”我说。

“请不要再四处张望，只看我，”他一边小声嘀咕着，一边从一个红包里抽出一支烟。“张先生，我想亲眼见见你本人，”他继续说，“所以我请一位朋友带你到这里。你们俩能在车站联系上，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谢谢你的策划。我来到这里没遇到任何麻烦。”

他点了点头。“我在中国当局有一个联系人。大约两个星期前，他提到了你。你和一个朋友一起过的江，是这样吗？”

“是的，正是那样。”

“你们为什么要分开？”

“当时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我们认为没有哪户居民会同时收留我们两个人。”

“我明白。你带着你的身份证件吗？只是为了例行核查。”

“是的，我带了。”

我把手伸进我的内袋，但在拿出证件之前犹豫了一下，然后我空着手慢慢放回桌上。我也把我的另一只一直在揉搓膝盖的手，放在了桌子上。

“如果我没有带证件呢？”我说道。那人退缩了，几乎不易察觉，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与他潇洒的外表相冲突的东西。我一边看着他的眼

睛，一边说出我接下来的话："如果我没有身份证明文件，我是否会被拒绝庇护？我现在正在说朝鲜语。这还不足以证明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吗？你说你是从你在中国当局的联系人那里得知我的情况的。从那时起——事实上，就在几天前——我的朋友自杀了。他和我，我们不是唯一在中国领土上被追捕的朝鲜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逃离朝鲜。如果我们没有证件，我们是否都要像他一样死去？"

我的音量提高了。那人迅速环视了一下咖啡馆，轻声说："如果你的朋友没有做出那样的决定，我们会通过某种手段救出他。说实话，我和我的同事们，对你朋友的死感到非常遗憾。张先生，我理解你的遭遇，我不会再问你的身份证件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走吧。"

我对这个人对我的爆发所作出的温和反应感到惊讶。他甚至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一捆钱，我确实完全忘记了。

我们通过主大门走出了酒店。一辆黑色轿车立即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它一定是在一直等着。那个男人为我打开了后门，然后和司机坐在前面。我们只行驶了大约两分钟，车子就停在了一条小巷里。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两个后门都打开了，另外两个人从我的两侧滑了进去，把我困在了座位中间。

他们的蛮横与朝鲜国家安全部特工的凶恶程度一致，自从渡过图们江后，我一直担心会遇到他们。我突然想起我们离开延吉时，申先生曾多次重复的警告。他解释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经常会遇到与朝鲜有联系的掮客，他们可能会决定背叛他所照顾的难民。

一声微弱的呜咽从我嘴里发出，我咳嗽着掩饰它。难道韩国的间谍真的一直都知道我和永明逃跑的细节，甚至知道他的自杀？为什么我这么轻易地相信了他们？我的胸口因痛苦的悔恨而绷紧。

坐在我两边的两个大汉可能是在执行朝鲜特工押送罪犯的标准程序。我略微向左边的人靠了靠，想闻闻他身上是否有明显的朝鲜味道，比如朝鲜香烟或须后水的味道。如果我闻到了，我就会奋力一搏。但是从他和我右边的人身上，我都没有闻到任何味道。我注意到我右边那个人的膝盖上有一块磨损的补丁。我想，一个来自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男人是不会穿这么邋遢的裤子的，于是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我想起了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事情，他的父亲在朝鲜国家安全部工作。当他们的海外特工把一个被认为有逃亡风险的罪犯带回家时，他们会先打断他的四肢，然后把他放进棺材里运过边境。我开始相信，这辆车不是开往韩国大使馆，而是开往朝鲜大使馆。在那里，这两个人将打断我的四肢，我无助的身体将被装进棺材运回朝鲜。我开始感到关节疼

痛。我甚至羡慕永明，羡慕他能够迅速地杀死自己。随着我们的车急速驶向我确信是地狱的地方，我考虑我现在是否可能通过咬舌自尽而流血致死。

大概15分钟后，其中一个人对我说话。“张先生，你现在安全了。你可以微笑了。看那边——那面旗子。那是韩国的国旗。”

我茫然地看向那个声音，然后低下头去看他指的地方。那是韩国的国旗。我真的看到了那面白底的国旗在逐渐变蓝的天空下，在韩国大使馆的屋顶上飘扬。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车里的人。他们都在咧嘴笑着。

我无法在本书中描述我是如何安全地进入使馆大院的。我也不能说我是如何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通过有中国警卫站岗护卫的前门的。事实上，为了所有在我之后寻求自由的朝鲜人，有许多事情我还不能在这本书中解释。

但是，当我踏入大使馆大院时，我的那种感受不应该由我独自品味。它属于自由，为了自由的缘故，我必须将其分享。

“张先生，你现在是在韩国的领土上。你现在自由了。”

当使馆官员拥抱我，对我说这些话时，我请他再重复一遍。即使在听他说了两遍之后，我还是再次要求。在我真正确定我已经成功了之前，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感到强烈的想要获得希望。

当我紧张地站在那里，瞥了一眼门外岗位上的中国警卫的背影时，大使馆官员紧紧地拥抱着我，再次告诉我，“你已经踏上了韩国的土地。张先生，你正站在韩国的土地上。”

只有在那时，我才知道我所站立的地方标志着我逃亡旅程的结束，以及我作为一个自由人的生活的开始，我的泪水猛然涌出。我无言以对，只有无尽的泪水，既为自己，也为永明而流。

大使馆官员试图让我平静下来，拍了拍我的背。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眼泪，也不是我可以忍住的。我默默地从心里哭了出来：自由万岁，自由万岁，自由万岁！

跋

今天，我作为一个韩国公民生活。从一个各项生活细节都由上级组织支配的社会，转而进入一个自由的新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我被正式告知我现在是朝鲜公民时，我不禁心花怒放。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平等的国家中的公民，而不再是一个只为一个人服务的国家中的臣民。在朝鲜，忠诚是生命的意义，不服从会导致死亡，这就是全部准则。

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让我记忆犹新。我在汉城的一个安全屋里接受了八个月的问询，并于2004年12月17日正式成为韩国公民。那天晚上，我在汉城的街道上徘徊到凌晨，享受着我新获得的自由。

突然，一辆汽车伴着刺耳的鸣笛声急停下来，一个男人伸出窗外对我破口大骂："他妈该死的!走路看道啊！"那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当我闯红灯时，他不得不为我急刹车。我一直沉浸其中的自由光辉瞬间就被驱散了。出租车司机对我做了个手势，又骂了几句，然后继续开车。随着震惊的消退，我只能苦笑，因为我意识到我现在真的被确认为一个自由人，不比其他人有更多或更少的权利。在就在那个我独自外出的第一个晚上，我试图给申先生打电话，但他的号码已经不在通讯录上了。在我到达韩国后，当时因为我在安全屋里，所以我没能立即与他联系。虽然除了那个号码，我再没有办法与他联系，但我们注定要再次见面。就在三年后，我在汉城（那时改名首尔）北部地区的一个公共桑拿房里意外地碰到了他 。他的朝鲜难民妻子在韩国获得庇护，于是他也被允许在这里定居。他与妻子和两个儿子住在首尔一个政府资助的难民公寓里。他，一个朝鲜裔中国人，和我，一个朝鲜人，关系变得非常亲密：我们的友谊依然深厚，因为我们都在异国他乡没有亲戚。

申先生也没有袭龄的电话。虽然他对此无能为力，但他有一个关于他叔叔常勇的好消息。用我们给他的700美元（减去我从他妻子那里拿回来的100美元），他最终买下的不是他曾兴奋地谈论的耕种机，而是两头好牛。

第二年我拿到护照后，我回了一趟沈阳，那里的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我没能找到袭龄、她的叔叔及她的未婚夫来对他们的帮助表达感谢。但我确实见到了Kyonghoeru的老板，我不仅偿还了车费，而且还适当地报答了他的恩情。我回到了龙井老人的家，但这栋楼已经被现代化的建筑所取代，一个新的家庭已经搬了进来。我也得以与韩国报纸的北京记者热烈团聚。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朝鲜脱北者会这样向他伸出援手，我开玩笑说报社的人都很纯真。

2005年1月，我成为首尔国家安全研究所的一名高级分析员，该研究所隶属于国家情报局。我曾是朝鲜的韩国问题专家，现在的角色正好相反。

虽然情报工作是我的职业，但在2008年我决定重启我的诗人生涯。不过这一次，我是一个自由人，一个流亡诗人，而不再是御用诗人。我的第一本出版作品是一本诗集，名为《我的女儿100元》，根据我从平壤带来的手稿写就，以我的笔名张进成出版。也许是由于这本书在我们逃离朝鲜的过程中得到了永明的救助和保护，这本书立即成为畅销书，在各大书店的排行榜上占据了首位。该书的标题同名诗作已被改编为电视、歌曲和戏剧，并在韩国最大的首尔艺术中心剧院演出。

最近，我收到了参加帕纳苏斯诗会的邀请，该活动由英国伦敦南岸艺术中心主办，是2012年夏天伦敦奥运会的一部分。每个参加奥运会的国家都有一位诗人受到邀请，在其他几位朝鲜流亡诗人中，我被选为代表。与作家们的这种接触让我确认，一个国家如果不在言论自由方面取得进展，就不可能真正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这加强了我通过书面文字宣布朝鲜的真相的决心。

2010年，我终于离职，并随之永远离开了政府机构。我可以花更多时间写作，我在2011年用我的全部离职津贴成立了“新焦点”，这是第一家由朝鲜流亡者经营的新闻机构。我这样命名有两个主要原因：希望朝鲜能够追求新的愿景；以及向外界展示，在现有的解释框架或政府议程允许的范围之外，还有另一种理解朝鲜的方式。我希望朝鲜人的知识和经验能被认真看待。2013年4月，我为《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写道：

在朝鲜国内有两个朝鲜：一个是真实的朝鲜，另一个是政权制造的虚假朝鲜。在我叛逃之后……我才认识到第三个朝鲜的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朝鲜。这是由外部世界构建的朝鲜……。

在渡过图们江后，我为了躲避中国和朝鲜当局而逃亡了三十五天。那不过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多月，但那段经历的痛苦却类似于分娩。痛苦何在？任何出生在自由国度上的人都是生而自由的，但其他国家的人则必须为自由冒生命危险。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由这个词可能太普通了，意义也很空洞；但追求自由却让我的朋友永明付出了跳崖而亡的代价。

即使在今天，朝鲜劳动党对其臣民进行洗脑，告诉他们，他们身份的本质是基于他们生活在“金日成的祖国”，他们首先是“金正日的人民”。我的文学导师金相欧通过诗作《我的祖国》赞美金日成，但我，他

的学生，不能跟随他的做法，用一个人取代一个国家。对我来说，我的祖国不是我出生的国家，也不是我服从的人，而是我想埋葬的世界；所以我逃离了一个文学只允许为一个人的遗产服务的体系。

写下我的逃亡经历需要我发自内心地呼喊：自由是我的故乡。我不是这本书唯一的作者，因为我是和永明一起走过来的。我也不是这本书的唯一主人公。这个故事也是关于我的朋友的，他见证了那驱使数百万朝鲜人的绝望，那份绝望趋势他们已经并仍然站在悬崖边上，除了翻过悬崖，别无他法。本书也是对那些在我的旅程中帮助过我的人的致敬，感谢那些帮助我度过难关的人，他们的忠诚不是对那些当权者的，而是对着我们共同的人性。

今天，有超过25,000名朝鲜人逃入韩国。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在山洞里躲藏多年；还有一些人被抓获后遣返朝鲜，随后又奇迹般地逃了出来。如果他们所有的故事都能被写成文字，那么我的经历仅仅勉强填满那本书的一页。

一名朝鲜外交官在国外被朝鲜特工抓获，在被遣返朝鲜的过程中，不幸遭遇车祸——因此得以从车辆残骸中逃脱，并向当地政府寻求庇护。另一个人带着镣铐，从送他回平壤的火车上一跃而下，爬回冰冷的图们江，重获新生。显然，冒一次险并不足以抵消他对自由的渴望，而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经历过三次遣返，并三次逃脱。还有一些人，没犯任何罪行，仅仅因为受父母牵连就被关进了劳改营，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名字，但依然设法逃亡。

还有多少朝鲜人在异国他乡徘徊，无名地死去？有一个悲剧，是关于一对夫妇的，他们徒步穿越中国后试图到达东南亚；但在渡过湄公河时，他们把全家的命运托付给一个漂浮的轮胎内胎，但最终只有他们的孩子幸存下来。还有一个例子，一对母女在韩国领事馆的门槛上被分开，因为中国当局抓住了其中一人，而另一人则设法冲向那可怕的自由。

所谓逃亡，就是我们所有的流亡者不仅要逃离体制，而且还要冒着死亡的危险，主动放弃我们活着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韩国定居后做了多年的恶梦。晚上，我们被恐惧攥紧，仿佛我们被送回到压迫性的监视中，或者发现自己被秘密警察逮捕并被拖到了劳改营。我们彼此之间谈论着，只有当我们的梦魇在新国家的安全环境中不再出现，我们才是真正的离开了朝鲜。即使在我们清醒的时候，特别是在任何标志着时间流逝的场合，如新年或周年纪念日，我们也会被压倒性的情绪所攫取，压得我们瘫痪，无法解开心结。

朝鲜流亡者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自由和暴政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唤起怜悯的工具。他们是在哭诉正义，为了那些无声无息死去的人们。他们持续的发声是在与暴君的残酷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类的胜利。

金正日说，在他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个词。这是独裁者的权力腐败，对他来说，宣布他挥舞枪支和他实际挥舞枪支一样有效。对我来说，也没有“不可能”，但仅仅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生存的代价是失去了所爱的人，而他们也失去了我；无论前面有什么困难，我都感觉不到更大的痛苦和惆怅。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知道并猛烈地拥有我的自由权利，这给了我力量，让我每跌倒一百次就能站起来一千次。

朝鲜政权对我的迫害还没有结束。它不仅秘密地试图寻找和伤害我，而且还通过媒体公开威胁我。例如，2013年6月，人民安全部通过朝鲜国家新闻机构朝中社发表官方声明，称其将“从这个宇宙中删除我的存在”。金正日的暴政现在已经被第三代人继承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持续地对抗专制主义，直到我们的人民获得自由。如果不能实现，那么我的自由特权也不过只是我私有的。朝鲜政权的武器库里有谋杀、谎言和核弹，而我挥舞的武器就是真相。

在自由世界，我也找到了个人的幸福。由于北方持续的暗杀威胁，我总是由警察护送，但现在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女人并不反感在我们三年的恋爱过程中陪伴我们约会的大块头的警卫人员。当我说我们应该停止约会，代之以给她一枚订婚戒指时，我很感激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去年，我们有了一个健康而英俊的男婴。一个来自平壤的男人与一个来自首尔的女人的婚姻，诞生了一个统一的民族的孩子。虽然朝鲜可能被分为南北两方，但我们的孩子的出生标志了统一。

每当我洗碗时，我的妻子都会拍拍我的背，说：“亲爱的，你正在很好地适应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世界。如果你继续这样，我知道你会成功的。”而我举起双手，承认：“这一定是我的奴性命运。我在朝鲜被一个独裁者统治，而现在，在韩国，我被我的妻子统治了！”

后记：朝鲜的未来

外部世界通过局外人的视角看待朝鲜。当金正恩在其父亲去世后开始执政时，许多人根据在金正日葬礼上最引人注目的七位抬棺人来解释新政权的权力等级。但实际上，这七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拥有党的决定性文件所认可的任何实际权力。

在朝鲜的精英阶层中，真正的荣誉和权力的来源只有依据忠诚地服从最高领袖的指示——通过作为执行者的组织指导部——而且不是通过正式的职位来体现，而是通过面对这种指示时的谦逊来获得。讽刺的是，在外界看来是朝鲜权力核心的七名抬棺人中，有五人（其中包括张成泽，即金正日的妹夫、金正恩的姑父）已经被组织指导部免职了。剩下的两位，即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崔泰福（Choe Tae-bok）和劳动党宣传动员部部长金基南（Kim Ki-nam），他们的生死对劳动党而言根本无足轻重。

为了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运作的，外界必须看到朝鲜的内在。尽管披着群众组织和外交机构的外衣，但统战部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行动实体，专门从事反间谍和心理战；组织指导部的扭曲影响使权力的表象和实际运作之间存在许多根本的差异。金正恩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由他父亲在组织指导部的手下控制的结构，作为报复，张成泽（Jang Song-thaek）在2013年被血腥处决。甚至连朝鲜军队也仅仅是党的一个部门，没有任何权力任命自己的工作人员或发布命令。

张成泽被处决是我创立的组织“新焦点国际”（New Focus International）首次向世界展示组织指导部的实际情况及其影响力的机会。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从一开始的指导原则就是：不必在意是否比那些已经领先的人走得更快；只需关注是否更诚实。真相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在谎言褪去之后，真相会绵延恒久。

朝鲜唯一最强大的实体并不被外界所知，也不被普通朝鲜人所知，因为组织指导部的真实情况与金正日上台的秘密历史交织在一起。金正日打造了组织指导部，而组织指导部的部长--即他本人--变得比最高领袖金日成更有权力，而金日成所拥有的只是象征性的权力。组织指导部必须保持隐蔽，因为正是它摧毁了金日成，即使它在表面上维护了最高领袖最神圣的合法性。

组织指导部是朝鲜的动力引擎。这个引擎可能是隐蔽的，但它仍起核心作用。正如组织指导部与金正日秘密上台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一样，它的绝对权威也被其运作的秘密所掩盖。世界相信金正日的继任是由金日成促成的；但如果没有组织指导部，金正日不可能获得权力，没

有组织指导部，金正恩也不可能保持权力。通过对全体人员的无孔不入的审查和监视，甚至连军队——更不用说其中的任何个体——都无法脱离组织指导部而掌握权力。在授权的商业或外交领域，情况也不例外。此外，组织指导部不仅通过国家安全部管理朝鲜的秘密警察和监狱，还指挥着执政的金正日的保镖，而且正如本书其他部分所叙述的那样，所有的政策建议都要通过它。

许多外界与朝鲜的接触，关注的焦点都在该政权可能进行改革。因此，他们一方面对其进行制裁，另一方面则利用外交、官方贸易和投资。然而，管制不住的市场力量自下而上地爆发，扩大了非官方贸易的流通量，这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削弱组织指导部的极权主义控制力。就外部世界而言，朝鲜可能被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政权所统治，但在这个国家内部，这个政权连一个鸡蛋的价格都不再能控制。在展望朝鲜的未来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现实以及朝鲜的权力现实：虽然组织指导部不会主动在控制权上妥协，但只要朝鲜人民的生计和机会脱离其掌控，那么其权威就必然会减弱。我们必须对朝鲜人民有信心，而不是寄希望于囚禁他们的制度。

名词解释

【钦定】：

——这是金正日亲自要求出席的一小群精英，他们在闭门会谈中与金正日交谈了20多分钟。

【艰苦的行军】

——1995年至1998年朝鲜官方对粮食紧急状态的说法。

【CHOSON】

——朝鲜自己的名字。

【敬爱的领袖】

——金正日。

【DMZ】

——朝鲜非军事区：自1953年以来分隔朝鲜半岛的停战线。

【DPRK】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将军】

——金正日。

【伟大的领袖】

——金日成或金正日。

【Gukgun】

——韩国国家军队。

【Jochongryon】

——日本朝鲜人协会：由UFD管理的组织，代表在日本的朝鲜裔。

【主体】

——北朝鲜的以自力更生原则为基础的国家政策。

【KPA】

——朝鲜人民军。

【本地化】

——UFD采用韩国思维方式以影响韩国的政策。

【NLL】

——北方界线：在黄海划分朝鲜和韩国之间的领海。

【Office 101】

——统战部的决策部门

【OGD】

——组织指导部：劳动党的执行指挥链。

【PAD】

——宣传动员部。

【PAF】

——朝鲜人民军(朝鲜)。

【PDS】

——决定朝鲜所有生活必需品分配的公共分配制度。

【《劳动新闻》】

——朝鲜劳动党的官方报纸。

【审查】

——朝鲜术语是“shimhwajo”，直译过来就是“加强(身份证件的)审查”。

【第五部门】

——OGD负责金正日个人需求的部门。

【生种战略】

——朝鲜绑架外国人的战略，尤其是日本公民。

【侧支】

——为了让这棵树长得又高又壮，金氏家族的一名成员将被“修剪”。

【Songun】

——朝鲜先军政策。

【南朝鲜】

——朝鲜对韩国的称呼。

【阳光政策】

——韩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在2010年被韩国宣布为失败。

【最高领袖】

——金日成。

【Suryong】

——最高领袖。

【UFD】

统战部：劳动党的关键部门，负责对朝间谍活动、政策制定和外交。

【劳动党（Workers’ Party）】

朝鲜官方的执政党。